实践智慧

THE ESSENCE OF GREAT JUDGEMENTS

商学院绝对学不到的诺曼底领导力

[日] 野中郁次郎 荻野进介 著

陈涤 译

全景展现诺曼底登陆始末细节　从史上最大登陆战中汲取精进的力量

张瑞敏
海尔集团董事长、CEO
极力推崇

任正非
华为创始人、总裁
力荐诺曼底人才

宁向东
“得到管理学主讲人”
专业推荐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实践智慧：商学院绝对学不到的诺曼底领导力

作者:[日]野中郁次郎,[日]荻野进介

译者:陈涤

ISBN:9787508692678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序章

史上最大战役及其拥有实践智慧的领导者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

1918.11.11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9.6.28 《凡尔赛和约》签订

1920.1.16 国际联盟成立

1925.12.1 《洛迦诺公约》签署（确认莱茵兰的非军事化等）

1928.8.27 《巴黎非战公约》签署（集体安全保障体制）

1929.10.19 华尔街大股灾

1931.9.18 “九一八”事变

1932.1.9 德国发布不再支付战争赔款的声明

3.1 伪满洲国成立

1933.1.30 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纳粹党、国家人民党、冲锋队合并）

3.4 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第32任美国总统

3.28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10.14 德国退出国际联盟

1934.1.26 德国和波兰签署互不侵犯条约

8.2 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统兼总理（兴登堡去世）

1935.3.16 德国通过《国防军强化法案》（重整军备宣言、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成立空军）

8.31 美国通过中立法案（对交战国实施武器禁运）

9.15 德国制定《纽伦堡法案》（开始迫害犹太人）

9.18 苏联加入国际联盟

10.3 意大利侵入埃塞俄比亚（1936.5.9吞并）

10.5 罗斯福发表“隔离演说”（指责意大利的侵略行径）

1936.2.29 美国通过第二次中立法案（禁止借款给交战国）

3.7 德军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撕毁《洛迦诺公约》）

3.19 英法结成同盟（禁止单独媾和）

7.17 西班牙内战爆发（1939.3.28结束）

11.25 日德签署“防共协定”

12.11 意大利退出国际联盟

1937.4.26 德国空袭格尔尼卡

6.11 斯大林“清洗”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红军将领

7.7 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11.5 《霍斯巴赫备忘录》（希特勒论扩大东方生存圈的必要性）

在人类历史上，有些大型项目是通过众多的人团结协作才最终取得成功的。谈到这样的项目，我们首先会想到哪些呢？

有人可能说金字塔，在没有重型机械的时代，金字塔是依靠人力经

过长年累月建造起来的。可能也有人想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因其宏伟壮观，即使在太空中都清晰可见。时代不断向前发展，可能也有人会提到总预算达200亿美元、由40万人参与的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

不！“大型项目”并不只局限于“建设”，以破坏和杀戮为特征的战争也属于宏大的项目——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众人必须相互协作，集思广益。

无论是激烈程度，还是规模范围，在历史上这种致力于胜利的战争项目中，最为辉煌的就是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胜负大势的诺曼底登陆战。

诺曼底登陆战从计划到实施共耗时两年零两个月，以美军、英军以及加拿大军队为主，共有300万名官兵参战。仅在1944年6月6日的登陆突袭，就投入了包括12个装甲师和3个空降师在内的39个师。次日，在6艘战列舰、1 070只战斗舰艇的护送下，133 000名官兵、14 000台各种车辆、14 500吨补给物资利用6 000艘各类船只，渡过了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被送上诺曼底海岸。在空中，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也频繁出动，忙于支援、掩护和运输。

而整个战役又必须秘密进行。为了不让德军察觉登陆的地点和时间，需要尽可能地伪装和欺骗。同时，为了顺利输送后续部队和补给物资，人工码头的建设和水陆两栖坦克等新设备的研发也不可或缺。由于盟军的战役司令部是由以英美为中心的多国将领组成的，还存在怎样做到意见统一等人事组织问题。

进一步说，登陆并不代表战斗的结束，而是和接下来解放法国、向德国中心地带进攻的内陆战役形成一个整体。既然是如此大规模的战役，总统、首相等各国政要都深度参与了战役的计划与实施。

对！诺曼底登陆战就是在盟军和纳粹德国之间展开的、史上最大规模的“智力竞赛”。

战争正是人类品德与能力的基础

可能有人会说："把战争比喻成什么智力竞赛是不合适的。"也有人认为战争是罪恶，所以对这个词本身都厌恶和避讳。事实果然如此吗？

在"爱好和平"方面，英国评论家约翰·罗斯金并不落于人后，但是他对战争却采取强烈的现实态度。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介绍他的言论如下：

> 当我说战争是一切技术的基础时，意思是战争同时也是人类一切崇高品德和能力的基础。这一发现于我有些奇异，且颇为恐怖，但我知道，这却是难以否定的事实。简而言之，我发现，所有伟大的国民，他们真理和思想的力量都是从战争中得来，并在战争中得到滋养的，而至和平时代则被浪费。他们因战争而得到教诲，因和平而受到欺骗，因战争得到训练，因和平而遭到背叛。总之，生于战争，死于和平。

当代著名战略思想家爱德华·N.勒特韦克在他的《战略论》中引用"想要和平就得备战"的古罗马格言，提出了"战争或许是大恶，但也是大善"的观点。

如果真如他们所言，战争是人类品德与能力的基础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回避它，而是需要真诚地面对。因为在战争中，的确存在着值得后人吸取的大量教训，其中也包括避免战争的智慧。

我曾在《失败的本质》中分析二战中日本军队的失败原因，很幸运，该书获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后来，以"形势逆转的战争"为主题的《战略的本质》也得以付梓。

本书和《失败的本质》正好相反，主题不是失败，而是成功，且以盟军的一次战役为题材，并没有出现日本的一兵一卒。具体地说，就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行，追寻"史上最大战役"的计划与实施过程，

和德军方面相比较，在政治、军事两方面去发现盟国和盟军领导者的卓越之处。

登陆战役人才济济

诺曼底登陆战不但实际出动的官兵人数最多，使用的武器数量最多，而且众多不同国籍的政治家也都深度参与了战役的计划和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说，诺曼底登陆战也是史无前例的。

图0-1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

“战略”一词的词源是古希腊语的“strategos”，意思是“将军的工作”。在此战略有三种含义，一种是决定国家资源如何使用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一种是决定靠现有武力如何战斗的“军事战略”（military strategy），还有一种是决定何时何地、怎样战斗的“作战

战略”（operational strategy）。再接下来的就是具体决定怎样战斗的“战术”（tactics）。这个词也是以希腊语“taktikos”为词源，有“配置部队”的意思。

不过，战略和战术意义上的界限本来很模糊，可以说没有明确的区别。最早对二者做出明确区分的，是活跃于18世纪的普鲁士军人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他在《战争论》中做了这样的定义：“战略是运用战斗的方法，战术则是运用战斗力的方法。”

这里重要的是各种战略和战术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战术是从它上一级的作战战略出发推导出来的，但有时不得不根据现场形势做出改变，这时它上一级的作战战略也不得不改变。这样一来，各种战略和战术就不是依靠简单的因果关系来维系的，而是构成了一个互相影响的复杂体系。

那么，在诺曼底登陆战中，战略战术的各层级都是由什么人来决策和推行的呢？

首先，参与盟军大战略的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以及领导“自由法国”的夏尔·戴高乐、强烈主张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最后成为诺曼底登陆战）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

与上述四人针锋相对的是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而盟军方面大战略的间接参与者还有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真可谓人才济济。

那么下一层级的军事战略的参与者，美国方面是在盟军最高指挥部任欧洲战场最高司令官的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以及大战中始终做其坚强后盾的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英国方面则是担任陆军总参谋长的阿兰·布鲁克。

德国军事战略的首脑是德军西线总司令卡尔·鲁道夫·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不过希特勒并不信任包括他在内的现场指挥官，经常横加干预，所以伦德施泰特的作用无法和艾森豪威尔以及马歇尔等盟军将领相

提并论。

在作战战略的决策和推行中承担重要任务的，美国方面是指挥第1集团军的奥马尔·布莱德雷、打破战线胶着状态的第3集团军司令乔治·巴顿，英国方面是登陆地面部队司令伯纳德·蒙哥马利、空军上将特拉福德·利——马洛里以及海军上将伯特伦·拉姆齐。而在德国方面和他们针锋相对的则是号称“沙漠之狐”的B集团军群司令埃尔温·隆美尔。

及至战术层面，更是涌现了无数具备卓越领导力的英雄。例如盟军美国方面的代表人物：从诺曼底最大的激战区奥马哈滩登陆、奋勇当先深入敌阵的诺曼·科塔准将。

杂乱无章的盟国大战略

诺曼底登陆绝不是采用通常办法的战役，从当时形势看，不能实现的可能性也很大。这和盟国的政治战略，也就是“大战略”并非坚如磐石有很大关系。

丘吉尔头脑中反复盘算的，是维持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的议会制民主制度和大英帝国的持续发展，因此他对在德军占领区直接登陆的诺曼底登陆战（向法国北部进攻）并不积极。相比于这种“直接战略”，他更主张从北非或“轴心国柔软的小腹”之称的地中海经巴尔干半岛进攻德国的“间接战略”。在他意见的背后，则是对战后世界更深远的展望——与斯大林支配下的东欧以及巴尔干国家相抗衡。

但罗斯福并不像丘吉尔那么厌恶斯大林和苏联，甚至已经怀有将苏联也纳入“国家联合机构”（后来的联合国）的构想。

而且，由于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成为大战的当事者，不得不同时进行两场战争：在太平洋面对日本以及在大西洋和欧洲面对德国，其负担的确沉重。究竟哪个优先呢？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罗斯福曾对丘吉尔表示，击败德国要先于击败日本，而提出这一顺序的，则是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他主张“欧洲优先，击败德国最重要”，说服罗斯福相信“向

法国北部，即诺曼底进攻是通向胜利的捷径”。这是因为他们对本国的军工生产能力和军事技术有着莫大的自信。

而斯大林则一直疑神疑鬼。他认为英美居然袖手旁观，避免流血，只让苏联和德国一决胜负，真正目的是让德国和苏联最好两败俱伤。实际上，自1941年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巴巴罗萨计划”）以来，的确是苏联在独自承受着轴心国的军事进攻，所以斯大林产生这种心理也不无道理。

总之，斯大林只盼望德国早日垮台，对其他方面，不管是盟军在北非战场击溃德军，还是遏制威胁大西洋船队的德国U型潜艇，抑或对本国的巨额物资援助，都不以为意。

唯一得到斯大林肯定的就是诺曼底登陆战，由此形成的欧洲第二战场使苏联方面的压力大为减轻。在1942年11月6日的苏联革命纪念日演说中，斯大林甚至威胁说，如果第二战场迟迟无法开辟的话，他将不得不与德国单独媾和。

所以说，尽管盟国在打败德国这一目标上是一致的，可是到了具体方案上，各国首脑的大战略却大相径庭。1944年6月6日“D日”计划的实现还面临着错综复杂、反复无常的形势。最后，美国在德黑兰会议（1943年11—12月）上，利用斯大林的力量，终于实现了诺曼底登陆战的决策。这正是在盟国内部展开的政治战略游戏。

如果采纳丘吉尔突击“轴心国小腹”的主张，那么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役也许就无从谈起了。当然，现实中它还是实现了，这完全是由于盟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将领们的决策使然。

“实践智慧”带来的最优判断

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要做出无数次判断，何况在战争期间！

作战部署、组织编制、领导人选、兵站保障、新武器研发、行动时

间、行动地点、进攻到什么位置、何时取胜等，从大战略到军事战略、作战战略，以至于现场战术，所有领导者都必须在对瞬息万变的形势加以判断的同时依次做出行动。一旦做出决策，即使知道有误也无法推翻重来。领导者们必须在“当下”做出“最优判断”。

能够获取的信息也未必很充分，不仅如此，战时信息传播受限，当然会经常出错。在这样信息不足的条件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仍能做出“最优判断”呢？

让我们在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实践智慧”中寻求答案。这个词可翻译为“深谋远虑”（prudence）、“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或“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我们多将其称为“实践智慧”。

实践智慧指的是为实现全社会所追求的正确目标（共同善），在注意事物之间复杂关系的同时，及时且完美地做出判断的能力。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具备实践智慧的领导者的典型是古希腊将军伯里克利。他是把雅典带进兴盛期的卓越政治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详细记载了他的事迹。

正确决策的基础是正确的判断。判断一词的英语是“judgment”，它和“决定”（decision）有着微妙的不同。“决定”指的是在已有的多个选项中找到合理的。如果给计算机编好程序，可以通过计算机代为决定。在这一点上，判断则不一样。“判断”是考虑选项本身时必要的智慧和才能，它需要全身心地投入，所以也伴随着行动。

那么，具备这种实践智慧的领导者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呢？换句话说，出色的判断力、出色的决断力是由哪些能力构成的呢？

我们认为以下六种能力很重要：

（1）树立正确目标的能力

（2）直面现实的能力

（3）适时创造氛围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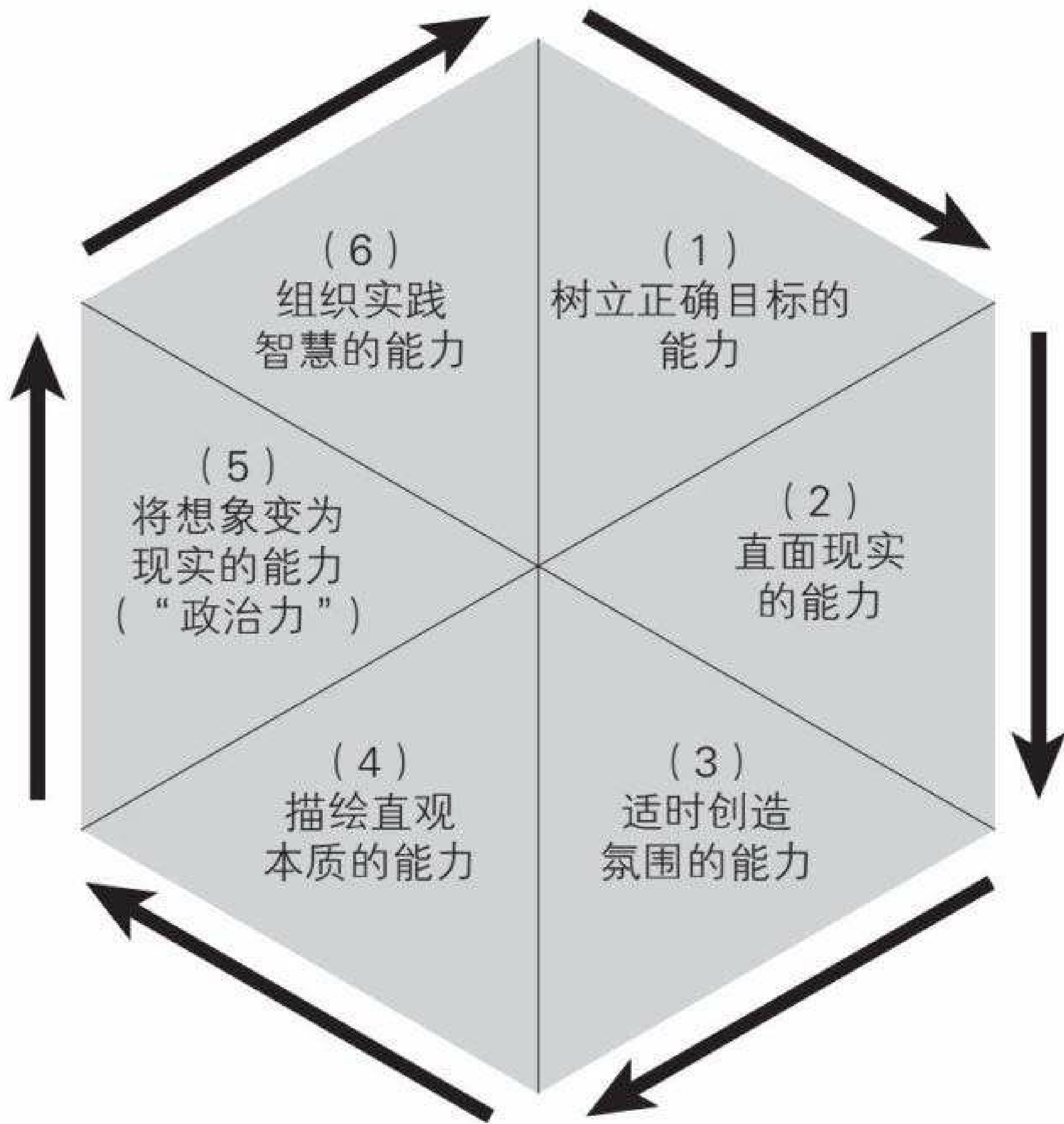
（4）描绘直观本质的能力

（5）将想象变为现实的能力（“政治力”）

（6）组织实践智慧的能力

实际上，我在归纳这些能力的时候会想起的一个领导者是丘吉尔。丘吉尔堪称现代版的伯里克利，是具备实践智慧的领导者。

拥有实践智慧的领导者的六大能力
——“实践理性领导力”



实践智慧领导者的典型：丘吉尔

下面我们就前面提到的六种能力进行具体说明。

第一，丘吉尔最重要的，是对善恶的判断非常清晰。在厌倦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国民面前，丘吉尔的前任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以及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一直对纳粹采取绥靖政策。哈利法克斯甚至主张，应

该委托意大利总理贝尼托·墨索里尼做中间人，向希特勒探听一下保持和平的条件。而丘吉尔与他们不同，只有他明确提出“我们必须坚守文明与自由”，只身一人与希特勒针锋相对。丘吉尔认为，英国国民是基督教文明与自由主义的守护者，坚持着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铸就的“民主主义”这种“共同善”，在他的演说中总是保持着这样的信念和气概，而全体英国国民也被他这种正确目标所打动，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第二，丘吉尔具备直面现实的能力。他喜欢到现场去，也频繁地出现在战场上，从和军官们的交谈中获得启发，制定新政策。他绝不是那种坐在桌前冥思苦想的类型，而是边行走边思考。

日语中的“现实”一词有“真实”（reality）和“事实”（actuality）两层意思。“真实”的意思是，将自我主体和眼前的主体分离，用旁观者的态度面对客体，并以客体为对象进行分析；而调动五感，深入当时的脉络，深刻地参与客体，在主客不分的状态下直接观察，则是“事实”。丘吉尔在任何时候都注意“活生生的现实”。

第三，丘吉尔善于在各种场合与别人脉络相通，保持一致的感受。他频频创造和其他盟国首脑直接对话的机会：他和罗斯福、斯大林、流亡政府“自由法国”领导人戴高乐，以及直接指挥诺曼底登陆战的盟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等频繁相会，直接对话。

丘吉尔也总是注意国民的视线，经常亲自视察受灾地区和机场，是“常露面的首相”。他易受感动，时常落泪，在众人面前热泪盈眶也不觉得难为情。即使面对意想不到的事态，他也能展现出绝妙的幽默，缓和现场气氛。由于他善于控制氛围，因此很多人内心里能够萌生“追随这位领袖而战”的愿望。

第四，丘吉尔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事物直观本质的能力也很突出，也可以说是“修辞”能力突出。战略的制定也是编写故事，通晓历史和文学的丘吉尔具备写作才能，后来甚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据说遭受空袭的伦敦市民都是通过聆听广播中他那莎士比亚风格的绝妙演讲和辩论得以安然入睡的。同时，他洞悉整个战局，面对敌方的行动时，有着一个

战时领袖所应有的言行、见解和观察，而这一切都来自他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洞察。

有这样一则逸闻。在德军就要发动进攻的某个夜晚，丘吉尔与内阁官员们谈论英国本土遭到侵略的话题，有人注意到丘吉尔的用词是过去式的。原来丘吉尔所谈论的，并不是近在眼前的德军，而是11世纪诺曼人进攻英格兰的故事。

第五，丘吉尔具备使自己所编写的故事得以实现的政治魄力。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充分利用战时的最高领导机构——战时内阁（War Cabinet）。丘吉尔兼任国防大臣，首先把自己安排在能够就最重要的问题发挥最大影响力的位置上。此外，战时内阁的成员也压缩到最有能力的、约5人左右的政治家，力图彻底与迅速地实现决策。内阁成员当然也和其他议员以及陆海空三军领导层一起发表积极言论，使这场国家保卫战得以顺利进行。

他的行事作风并不只限于理性做法。在处理政治纠葛所必需的过程中，为达成一致意见，他也会依靠人的情感跨越与对方的分歧点。说服、威胁、愤怒（或真或假）、嘲讽、冷漠、谩骂、毒舌、泪水等等，他把所有手段都巧妙地结合到一起。

第六，丘吉尔也具备组织实践智慧的能力，也就是说，他特别注意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他尤其擅长各尽所能的人才调配。当他认识到取得对德空中保卫战的胜利将左右英国今后的命运时，立刻就赋予空军研究研发部门负责人、推进雷达研发的休·道丁上将空军战斗机司令这一新职位，后来这个雷达的确是拯救了英国。另外，为了使举国一致的战时体制坚如磐石，他任命工党的资深议员欧内斯特·贝文为劳工大臣，全盘接受了后者提出的“增加劳动者权利和充实社会保障制度”的要求，因为在战争时期，工厂、矿山和运输线上的劳动者的力量尤其不可或缺。

正如他自己所说：“困住、难住、咬住。”所谓丘吉尔式的人才培养法就是提出按照常理不易回答的根本性问题，以及质疑旁人的建议。例如陆海空三军的参谋长反驳丘吉尔的主张时，如果不能提出高度缜密的

反对意见就不可能得到采纳。对在他手下任职的人而言，丘吉尔的做法是极为苛刻的，简直是那种师父训练徒弟的作风。丘吉尔就是依靠和众多部属形成类似师徒的关系来培养实践智慧的。

希特勒缺乏实践智慧

那么，与丘吉尔相对立的希特勒是怎样做的呢？

第一，尽管在当时的德国，废除《凡尔赛和约》以及振兴德意志民族、收复领土的战争目标得到支持，可是一旦跨出德国本土，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怎么也说不上是正确了，最后竟然上演了“屠杀犹太人”这种惨无人道的戏码。在《大西洋宪章》中，罗斯福与丘吉尔宣告遵从人类的“共同善”，不谋求领土扩张，而希特勒显然不具备这种否定帝国主义的理念。

第二，希特勒的认知能力也有所欠缺。他坚信自己永远正确，不能平和地接受他人的建议，更不肯听取尖锐的批评。

第三，希特勒直面现实的能力也不及格。在整个二战期间，希特勒只是在进攻波兰时亲赴前线。即使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他也不理会前线指挥官的意见，而是在遥远的德国发出意向模糊的指示，最后白白浪费了大量时间，未能成功退敌。至于他抵达巴黎东北部120千米处的梅济耶尔视察西部战线，已经是诺曼底登陆11天以后的事情了。

不过，希特勒确实能够敏锐地洞悉对手的心理，善于发动隐藏于其后的突然袭击。他不惜冒险，能够灵活运用新式武器，敢于抓住对手破绽采用大胆的作战方案。从突破《凡尔赛和约》禁止重新武装德国的限制、进军莱茵兰非军事区，到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入侵波兰，在采用对别国态度保持高度关注的“将死棋”一样的心理战、海因茨·古德里安提出的闪击战，以及埃里希·冯·曼施泰因主张的“挥镰行动”等方面，希特勒充分显示了他军事才能的锋芒。

第四，关于直观本质的讲述能力，希特勒也相当不一般。他增加信

徒的演讲才能使听众如同被实施了催眠术一般。不过，他的修辞能力似乎对有足够智慧的人并不灵验。

第五，希特勒的“政治力”也许可以说及格了，不过，比起令他人自愿服从，他的强制性和处罚性更为可怕。

第六，关于实践智慧的组织化，说希特勒性格孤僻、不肯信任他人，应该不会错。

丘吉尔比希特勒年长15岁，两人是真正的对手。

虽然丘吉尔和希特勒都是理想主义者，但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指出两人的内心截然不同。他说：

> 经常年锻炼，丘吉尔的视野堪称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而希特勒的理想主义则植根于德国人特有的传统，认为历史是观念的产物。

希特勒在无视现实的唯心论上暴露出了软肋。

另一位实践智慧领导者艾森豪威尔

我们注意到还有一位领导者有着和丘吉尔不一样的实践智慧，这就是诺曼底登陆战的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

从1944年6月6日的“D日”开始，艾森豪威尔巧妙地指挥欧洲战场的盟军，最终击败德国。战后他访问苏联，和苏联的最高统帅斯大林、元帅格奥尔吉·朱可夫等人多次会谈，从一个军人的角度对冷战的体制有着深刻的理解。在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总司令后，他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总统，1953年1月，他就任第34任美国总统。虽然他作为政治家的经验为零，但外交经验极为丰富，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总统。

在以平易近人的品格和充满魅力的笑容赢得国民爱戴的同时，他对

苏联推行冷静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取得封锁政策的成功。近年来，艾森豪威尔因“对第三次世界大战防患于未然”而重获好评的希望越来越大。

盟军最后取得胜利，应得益于以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为代表的拥有实践智慧的领导者。

开场白有点过长了。再说明一下本书的结构。第一章至第六章在关注上述各领导者决策的同时，还将探讨“史上最大战役”是如何计划和实施的，第七章从战史研究的角度回到诺曼底登陆战的战略论，第八章则尝试深入挖掘率军作战的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的领导艺术。

关于军队组织编制

时代不同，国别不同，军队的编制也有所不同。但是到了现代，对军队的组织编制和等级，各国基本都采取大致一样的标准。下面是不同时期各部队组织编制概况，可供阅读本书时参考。因兵种不同，部队人数等也存在很大差异。“级别标志”是室内演习时所用的标记。

部队编制

		级别标志	编制（指挥官军衔）	官兵数量(人）
集团军群	army group	× × × × ×	2个集团军以上(元帅、上将）	
集团军	field army	× × × ×	2个军以上（中将以上）	5万＋
军	corps	× × ×	2个师以上（上将、中将）	3万＋
师	division	× ×	2 ~ 4个旅 / 团（中将、少将）	1万 ~ 2万
旅	brigade	×	2个团 / 营以上(少将至上校）	2 000 ~ 5 000
团	regiment	｜｜｜	1个营以上 / 多个连（上校、中校）	500 ~ 5 000
※	英军和加拿大军是以营规模（装甲、工兵、炮兵）为基础组成合成部队，美军则以旅的规模为基础组成合成部队，德军以战斗群“Kampfgruppe”或营 / 旅的规模为基础组成合成部队。			
营	battalion	｜｜	2 ~ 6个连（中校、少校）	300 ~ 1 000
连	company	｜	2个排以上（少校至中尉）	60 ~ 250
排	platoon		2个班以上（中尉至中士）	30 ~ 60
班	squad		————（中士、下士）	8 ~ 12

失败的教训

第一章

希特勒的挑战和丘吉尔的英明决断

——以“闪击战”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从欺骗战到史上最大规模的撤退

1938.2.4 希特勒掌握军队的最高指挥权

3.13 德国吞并奥地利

9.29 慕尼黑会议（英法德意）决定割让苏台德地区

11.9 “水晶之夜”（德国全境掠夺和屠杀犹太人）

1939.1.12 罗斯福发布国防计划报告（总额5.35亿美元）

3.14 德军进驻捷克斯洛伐克，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划为保护领地

4.7 意大利吞并阿尔巴尼亚

5.11 诺门坎事件

5.22 德国和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钢铁条约》）

8.23 苏联和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秘密协定瓜分波兰）

8.25 英国和波兰签署互助条约（后来成为对德宣战的根据）

9.1 德军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9.1 马歇尔就任美国陆军参谋长

9.3 英法对德宣战（澳大利亚、新西兰同时对德宣战。9月10日加拿大对德宣战。丘吉尔就任海军大臣）

9.5 美国发布中立法案

9.13 美国成立中立法案修正特别议会

9.17 苏联进攻波兰

10.6 波兰对德投降

11.30 苏联军队进攻芬兰

美国允许交战国购买本国军火（采用现金购买运输自理的方式）

12.14 国际联盟将苏联除名

1940.3.12 芬兰和苏联媾和（芬兰割让卡累利阿地峡等）

4.9 德军进攻北欧，丹麦当天投降

5.10 德军进攻荷兰，在西部战线开始发动攻势（出动136个师、坦克2 500辆、飞机3 200架）

丘吉尔就任英国首相（兼任国防大臣），组织战时内阁

5.14 德军装甲部队突破阿登森林（闪击战）

德军伞兵在荷兰以及比利时境内空降

5.15 荷兰投降

5.26 敦刻尔克大撤退（6.4结束。“发电机行动”）

5.28 比利时投降

1

五天决胜负的闪击战

德军进攻波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8个月后，经历过“宣而不战”的战争，沿着卢森堡、荷兰、比利时三国与德国相邻的边界形成了西部战线。其南方——法德边境横亘着马其诺防线。这一防线像比利时南部的森林与沼泽一样，发挥着天然屏障的作用。

德军突破传统做法，执行崭新的作战方案——更主要的是他们的闪击战，加上一次又一次的好运气，号称拥有欧洲最强大陆军的法国只坚持六个星期就战败了，而英国则竭尽全力投入本土防卫。

它被称为“宣而不战”的战争。1939年9月1日拂晓，德军突然进攻波兰。翌日，与波兰缔结互助条约的英国发布宣战文告，与德国开战。6小时后，法国也畏畏缩缩地采取了同样举措。从此以后，伴随着巨大的物质破坏、伤亡人数达6 000万之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转瞬之间，波兰就遭到德军蹂躏——无论是战略理论还是军事装备，波兰军队都落后于时代，还处于以骑兵为主力的水平，根本不是德军先进坦克的对手。9月17日，根据前一个月和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时的秘密协定，苏联军队也侵入波兰。

波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遭到了德国和苏联的瓜分，波兰政府成员不得不逃往罗马尼亚。

这期间，英法两国却没有任何应战动作。尽管法国陆军相比德国陆军占有更大优势，可是面对德军进攻波兰，法国只作壁上观。德军也没

有继续向西进攻的态势，所以尽管有了宣战文告，但一直没有发生战斗。因此，这一时期的状态被世人嘲讽为“宣而不战”的战争。

英国人的海军拥有守卫英吉利海峡的强大力量，即使德国的轰炸机飞来，英国空军也可轻易将其击落。他们深信，法国人的坚固堡垒马其诺防线已经把德国的威胁远远隔开。所以，英法两国的民众仅仅是防卫意识比较强烈，在战争初期，他们的确缺乏真正的战斗意志。

德国没有西进的三个原因

那么德军为什么没有积极西进？

首先，希特勒希望和英法，尤其是和英国达成和解。实际上在10月6日进行的议会演讲中，他说：“如果德国和英国达成和解，有望给欧洲以及世界带来和平。”

然而，这样的和解等于让英法承认德国获得的领土，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自1936年3月以后，希特勒屡施奸计，在莱茵河西岸莱茵兰的非军事区驻军，占据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正如你见到的，又把波兰收入囊中。

不久，看到英法的坚决态度，希特勒明白和平解决已经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于是向陆海空三军的首脑表明了进攻西欧的打算。希特勒认为：“德国陆军强于法国陆军，只要装甲部队和空军相互配合，就可轻易把敌人击溃。”尽管陆军强烈反对，但希特勒固执己见。有一次甚至已经把11月12日确定为向西进攻的开始日期，最终由于天气原因不得已推迟。西进计划后来屡次延迟，延迟次数竟达39次之多。如此，军方反对加上天气不佳，是德国推迟进攻的第二个原因。

到了第二年的1940年1月10日，希特勒命令一个星期后开始进攻。但是在1月17日，德国第2航空队的联络官发生了一次意外，他乘坐的飞机不幸迫降在比利时境内（“梅赫伦事件”）。这名军官携带着记录希特勒整个西进计划的文件，尽管他当场就销毁了一部分，但大部分都落到

了比利时政府手里。

德国方面也吃惊不小。本应严格保密的作战计划暴露无遗，只好再一次彻底更改计划。这是德国进攻延迟的第三个原因。

尽管如此，“宣而不战”的状态结束的日子还是到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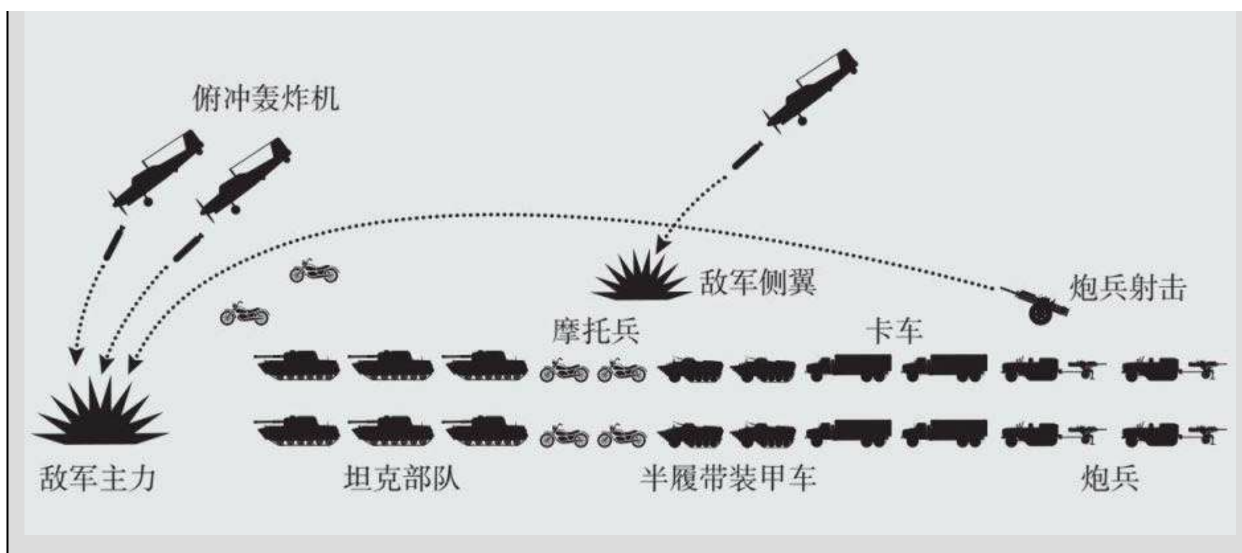
古德里安的“闪击战”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德军从4月9日开始进攻挪威，直到5月10日凌晨，持续对重要目标进行空中打击。由此开始，希特勒启动进攻比荷卢三国和法国北部的“黄色计划”，开始进攻西欧。希特勒认为击败法国是迫使英国议和的最好办法。德军的装甲部队势如破竹，很快就突破了卢森堡、荷兰、比利时等国的边境。

最初的闪击战，入侵波兰的德军装甲部队（1939.9.3）（Bundesarchiv，Bild 146-1976-071-36/photo）

什么是闪击战？——以德国装甲部队为例

闪击战的核心内容，就是将所有的坦克和装甲部队倾尽全力集中于战略要地，保持不给敌人丝毫喘息之机的作战速度



有力支援地面装甲部队的德国空军俯冲轰炸机容克JU-87（1940）（Bundesarchiv_Bild 101I-646-5184-26/photo）

总之，所谓的闪击战，就是以坦克为核心，快速开动装甲运输车，由跟随战车部队的机械化步兵和乘坐卡车的装甲步兵组成快速部队，抓住敌军防线上的弱点加以突破，继而迂回到敌军后方的战斗方法。闪击战通常是地空一体作战，由俯冲轰炸机和空降部队打头阵，拔除妨碍地面部队进攻的火炮和碉堡。这样就把前线的敌军从后方孤立出来，使其陷入混乱和不安，不能全身心投入战斗和组织有效反击，不能发挥有组织的战斗力。

古德里安在运用闪击战这一新型作战方式的同时，自己也作为指挥

官亲率部队屡建奇功。他乘坐最新式的装甲指挥车，与先头部队同行，通过无线电向所属部队发布命令。由指挥官赶赴几乎可与敌军直接交战的前方，这和在后方安全的指挥所里指挥前线部队的惯用战法截然不同。而后者这种老方法对于机动能力优异的装甲部队是行不通的，指挥官这样奔赴最前线，观察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亲身感受并当机立断，不错失战机，迅速通过无线电指挥所属部队的做法最有效力。古德里安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方法，而支撑这一切的则是德国先进的无线电技术。

那么为什么古德里安能够想到这种战法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德国陆军的规模急剧萎缩，古德里安被调到陆军运输兵总监部。当时他是这样思考的：德国此时不设防，在可预想的未来战争中，发生阵地战的可能性非常低。这时只能依靠机动性的防卫力量，汽车运输不可或缺。这样掩护汽车的装甲车辆就成为必需。这里所说的装甲车辆指装甲侦察车、装甲运兵车、装甲运输车等，是装置了装甲的军用车辆的总称，坦克也包括在内。

当时德国的装甲车辆极少，在这一领域英国和法国要稍好一些。古德里安找到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利德尔·哈特、吉法德·马特尔等诸多英国军事家的著作，刻苦钻研各国装甲部队的情况。最后他得出结论，步兵和骑兵已经落后于时代，应该把汽摩部队从随从的后勤部队变化为主力战斗部队。所以，部队需要披上抵挡敌军炮击的装甲。

领导者肖像

海因茨•古德里安
Heinz Wilhelm Guderian（1888—1954）

他生于普鲁士军人之家，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学习了无线电技术，“一战”后管理通信运输，研究汽车及坦克等机械化战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还在德军设于苏联境内的秘密基地参与装甲部队的使用和训练。1935年德国公开重新武装计划，古德里安被提拔为新设立的装甲师师长。他在所有车辆中装备无线电，亲自乘坐指挥车在前线指挥战斗。

他集中利用坦克部队和空中支援，将闪击战应用于实战，在西部战线任装甲兵第19军军长，成为击败法国的主力。后任装甲兵总监，努力重建被消耗掉的装甲部队。1944年7月希特勒经历暗杀未遂事件后任命其为陆军总参谋长，但他一直对介入具体战斗指挥的希特勒怀有对立情绪，在战争结束前遭解职。

这样的闪击战可以说是机动作战的一种，关于后者，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讲述。

古德里安在1929年认识到了这一点，四年后，出任德国总理的希特勒也很快对闪击战表现出强烈兴趣。

在1933年召开的新式武器展览会上，古德里安在希特勒面前讲解了大约30分钟。当一小队摩托兵、坦克兵和反坦克兵在眼前进行实战演练时，希特勒非常注重部队的速度和行动的准确性，不停地叫嚷："这个应该有！这正是我长期以来所盼望的！"

德国最早的坦克部队出现于第二年的1934年，其后，众多坦克得到研发和量产，其乘员——坦克兵也得到大量培养。

曼施泰因计划的采纳

5月10日凌晨1点，巴黎东部文赛诺城的法军总司令部接连不断地收到有关德军动向的报告。到早晨6点，德军的入侵已成定局，英法及荷兰、比利时联军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奋勇发出"实施代尔河计划"的命令，但最终还是没能遏制德军的猛烈进攻，正确地说，是徒劳无功。这是为什么呢？

代尔河是布鲁塞尔以东20千米处的一条南北走向的河流，英法联军坚信，这次大战德国仍将以荷兰和比利时为立足点攻入法国。如果德军发动进攻，英法两国军队就先进军比利时，在代尔河构筑防线阻击德军——这就是前一年9月对德宣战以后联军持续操练的"代尔河计划"。如果德国照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施里芬计划"，从比利时向西进攻，那么"代尔河计划"正好对其迎头痛击。

施里芬计划是"一战"时期德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元帅采取的作战方案，尽管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它使德军避开了沿法国东部国境修建的坚固的马其诺防线，突破了荷兰、比利时两个中立国，攻入了法国西北部。

但显而易见，“施里芬计划”不仅谈不上是奇袭，而且使德军正好与料定自己会通过比利时来犯的英法精锐部队正面交锋。当时在德国陆军内部也存在争议，认为应该有一个能击溃敌人的、更具想象力的作战方案。

确实有一个更具想象力的作战方案，它由伦德施泰特麾下的A集团军群参谋长埃里希·冯·曼施泰因中将提出。该方案并没有以英法联军所料想的右翼为目标，取而代之的是位于中央位置的、从比利时南部延展到卢森堡北部的阿登森林。也就是说，由B集团军群从右翼侵入比利时与荷兰，佯攻联军，这样作为主力的A集团军群就未必会受到敌人攻击，可以从防守薄弱的中部强行突击。此时能够想到的主力就是机械化的装甲师。

在法国方面有一个顽固的预设，就是“德军不会穿过阿登森林而来”。1934年，在法国陆军委员会上，菲利普·贝当元帅也明确表示：“阿登森林并不是危险地域。”其实德国方面也抱有同样的认识，只有一个人不这么想，他就是曼施泰因。正是曼施泰因制订了这样一个通过阿登森林进攻法国的作战计划。

曼施泰因和自己的大学同学、闪击战的践行者古德里安商议该方案。古德里安详细地对照地图，并考虑了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了解的地形特点，认为该计划很有可能实现。不过他对大量投入机械化装甲师这一点，持有保留意见。

大多数德国军官的认识是一致的：机械化部队在被湿地围绕、道路狭窄的阿登森林通行极为困难。所以，尽管曼施泰因得到顶头上司伦德施泰特的支持，制订了具体的作战计划，但送到陆军总司令部后并未获得通过。结果，强烈主张这个计划的曼施泰因遭到司令部降职。

后来不知为什么，就在不得不重新制订计划时，曼施泰因居然获得了谒见希特勒的荣誉。在进行说明后，该计划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

虽然该计划最初并未获得希特勒的首肯，但由于希特勒最喜欢奇

袭，所以他逐渐动心了。1940年2月，希特勒不顾陆军内部的反对，执意采用该计划，仿佛最初他就是这么考虑的一样。

无济于事的马其诺防线

在“代尔河计划”中，法军将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部署在比利时北方，而在森林和沼泽遍布的南方——阿登附近，则是最孱弱的部队。作为意在将德军永远拒之门外的唯一屏障，马其诺防线一直延伸到那里。

那么马其诺防线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法国与德国接壤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是地下资源的宝库，两国围绕这一地区的所有权经常发生纷争。19世纪后半叶的普法战争后，这里归胜利者德国所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则刚好相反，这里成了法国的领地。如果德国再次发动侵略，法国将不得不在国境线上抵御敌人的进攻。那么在援军赶到之前，用什么办法才能守住这个地方呢？

1922年，法国陆军部长安德雷·马其诺力推的防线构筑计划得到采纳，这就是1929年开始建设的马其诺防线。不过即使在陆军内部，关于防线的形制和长度也存在着不同意见，而且受困于建设资金短缺以及工人的频繁罢工，防线竣工时已经是1938年了。尽管最初的目的是保卫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但是最终，却将从瑞士到比利时长达760千米的广大地域都纳入了保护范围。

从德国的角度看，马其诺防线简直是沿着法国东部及东北部国境线建造的从巴塞尔到蒙梅迪的法国版“万里长城”。不，应该说是用钢筋水泥建造的“陆地战舰”更为恰当。反坦克障碍工事、地雷阵、机枪位、反坦克炮等，紧紧环绕着每隔15千米设置一座的要塞，要塞之间用地道甚至地铁连接起来，要塞里面设置了升降梯、扶梯和士兵居住区，以及电话交换机房、医院、士兵休息室等等。

领导者肖像

阿道夫·希特勒
Adolf Hitler（1889—1945）

德国总统兼总理，使整个欧洲陷入战火长达6年。在1925年以前是奥地利国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入德国陆军，在西部战线战斗4年，升任下士。曾被英军的毒气伤害，一度失明，在波希米亚住院，其住院期间德国战败。

痊愈出院后，他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发誓要在战后兴起的共产主义势力和犹太人的“毒害”中守卫德国和德意志民族。标榜德国是继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帝国之后的“第三帝国”，力图向东方扩展德意志民族的生存范围。他思维独特，有时确能成功，但因主张“战略、战术和战斗并无区别”而招致德国军人的批评。

斯大林格勒战役惨败后，他坚决不认可军队依靠机动性来组织灵活的防卫战术，孤注一掷地下达“死守”的命令。他并不关注挫败诺曼底登陆的盟军后把兵力集中到东部战线去，而是期待在诺曼底展开决战，对驻法的德国部队的损耗反应冷淡。

防线上配备了最先进的火力，如同受到指挥一样，能使炮弹准确命中敌人的进击地点。在要塞前面设置的观察所中有地图，地图用数字和希腊字母划出区域，例如，当敌人出现在“248—B”的时候，观察哨就当即用电话发出报告，10秒之后，这一区域就会有炮弹从天而降。

“只要有了这个就能抵挡德国的侵略！”所以法国人沉溺于错误的安全感中也是理所当然。

不过，马其诺防线存在着本质缺陷：由于防线只修筑到蒙梅迪（洛林地区的默兹省），如果德军迂回绕过这里，就可以长驱直入整个法国。这简直就像小孩子玩的抢地盘游戏一样，却又是近在眼前的事实。

流产的“代尔河计划”

曼施泰因计划的行军路线恰似镰刀挥出的形状，所以称为“挥镰行动”。根据该计划，德军的攻击要点正是马其诺防线的断点——比利时边境。

为什么马其诺防线已经延伸到那里却没有继续修筑呢？首先，除了地表柔软难以夯筑地基这个理由，据说法国也担心遭到比利时国民指责“法国只守卫自己的国土，而对我们见死不救”，所以和比利时接壤的边境并没有构筑防线。

即便是在预料之外的地点遭到攻击，法国也装备着机动性不亚于德军的坦克部队。与德军的2 800辆坦克相比，联军的坦克数量多达4 000

辆。不过，虽然数量占据优势，但联军方面也有致命的软肋，那就是作战意愿和行军速度。

卢森堡很快就放弃了抵抗，对德军的通过只是袖手旁观。荷兰军队同样经受不住德军的猛烈进攻，不得不后撤。德军在比利时的进击也异常迅猛。

尽管如此，以法军为核心的联军却遏制了最初的颓势，居然守到了5月13日。如果在第二天，也就是5月14日，根据“代尔河计划”开始反击的话，整个形势还是有可能逆转的。然而这时传来了坏消息：荷兰投降了（5月15日正式投降），所以德军已经不需要在那里投入更多兵力，而是把矛头指向了其他地区。

联军也终于弄清了德军的意图。原来德军并不打算经由中部的比利时突破，而是计划突破南部的阿登森林地区，沿防御薄弱的默兹河一路打来！

法军阵线被打开一个80千米长的缺口，大量德军由此涌入。德军的目标是多佛尔海峡。放弃战斗向西败退的法军士兵越来越多，甚至阻碍了沿大路东进的运输部队。

在此期间，法国总理保罗·雷诺多次致电同盟国英国首相丘吉尔，也屡次要求“把英国空军战斗机部队派来”。5月16日，丘吉尔思忖自己应该亲眼去观察战况，于是从伦敦飞到了巴黎。在总理办公室召开的会议上，除了雷诺，还有国防部长兼陆军部长爱德华·达拉第、联军总司令甘末林上将出席。

甘末林将军站在地图前，用了大约5分钟时间向丘吉尔介绍了联军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于是丘吉尔问道：“战略预备队，也就是机动部队的主力在哪里呢？”

甘末林耸了耸肩膀回答：“哪里都没有！”

负责防守长达800千米战线的司令官居然没有机动部队！建造马其诺防线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把军队直接守卫的国境缩短，然后把节省出

来的兵力充作机动部队吗？后来丘吉尔在他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中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最为惊讶的事情之一。”面对甘末林“为遏止颓势请派出战斗机”的要求，丘吉尔决定派遣极为珍贵的6个中队的战斗机予以支援。

5月20日，德军A集团军群浩浩荡荡地开进位于索姆河口的阿布维尔。阿布维尔以东是比利时的平原，英国的远征军和法国第1集团军已经处于西面的德国A集团军群和东面的德国B集团军群所构成的钳形夹击中。5月28日比利时投降，英法联军与钻进口袋的老鼠别无二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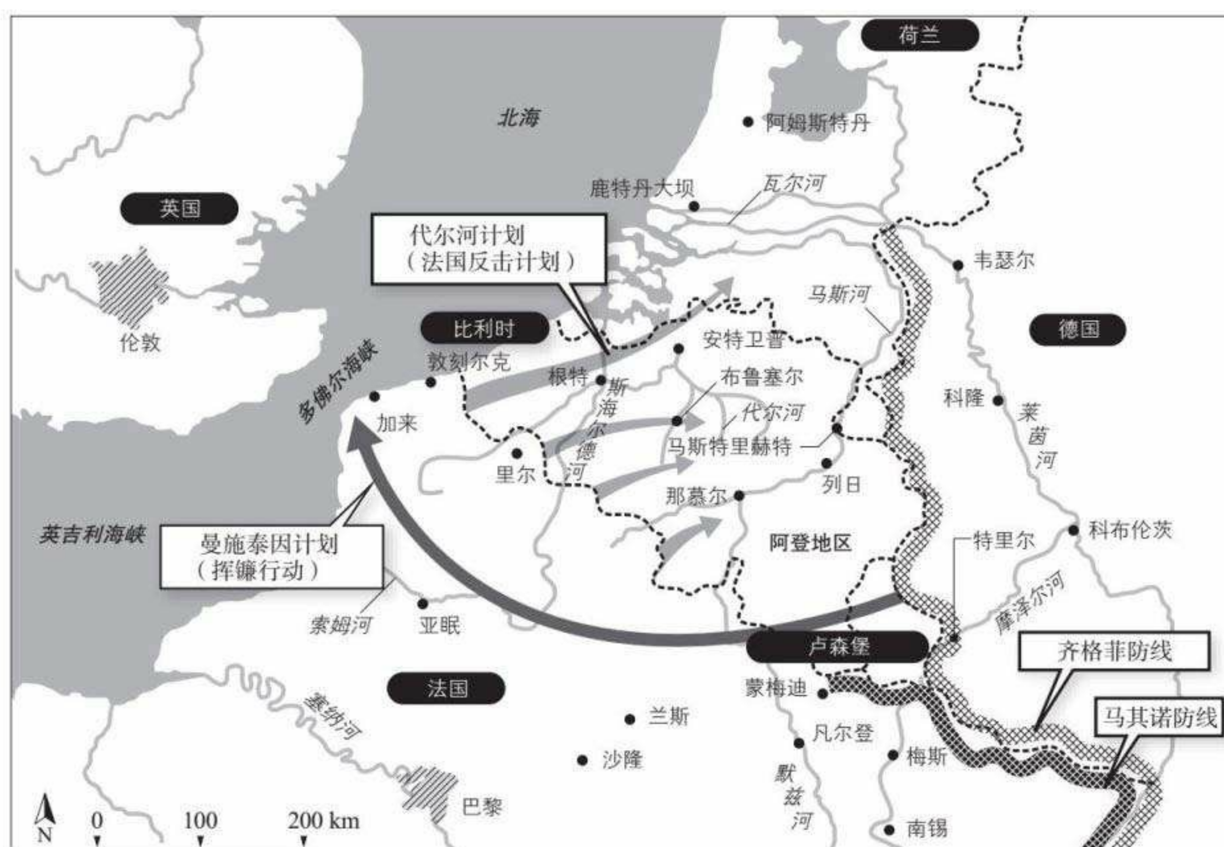


图1-1 西部战线的进攻计划和反击计划

2

另一个命运之日：1940年5月10日

希特勒于5月10日开始向西发动闪击战，说来也巧，在海峡对岸的英国，丘吉尔也在这一天就任首相。丘吉尔立即抛弃了前任首相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呼吁国民义无反顾地抵抗纳粹。

少数派丘吉尔就任首相

1940年5月10日是星期五，两天后就是圣灵降临节了。伦敦市内将从这个周末开始迎来连休，街头一派祥和景象。对西欧的基督教徒而言，举行纪念基督受难和复活的祭典是非常重要的活动，从复活节开始到50天后的圣灵降临节，7个星期都被称为复活节期。

在这种祥和的气氛背后，笼罩着整个英国的则是山雨欲来的形势。希特勒为了获得北海的制海权，于4月9日突袭挪威和丹麦。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遭到轰炸威胁，因此当天就宣布投降了；挪威得到英法两国的支援，进行了顽强战斗，但到6月9日，其国王和政府也迫不得已逃亡，整个国家处于德国的支配之下。

英国事先察觉到了德军的动向。为防止德国进攻本土，英军计划在中立国挪威登陆，发动进攻，最后却失败了。从5月7日开始到第二天，围绕着失败责任问题，英国政界从上到下吵成一团。

5月10日传来德国进军比荷卢三国的消息，由于来自保守党内的反对，下午5点过后，张伯伦首相辞职。据说国王乔治六世本期待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出任首相，但后者却不具下院的议席。

正如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所评论的“老将出马”，有工党参与的英国战时内阁选择了当时65岁的温斯顿·丘吉尔做首相。那个时候斯大林61岁，罗斯福58岁，希特勒51岁。

初入政坛当选下院议员40年后，丘吉尔就任首相。他这样表明自己的信念：

> 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你们会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对此我的回答是，我们要尽自己的全部力量，以及上帝赐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空中战斗！与人类黑暗的、可悲的犯罪记录上前所未有的暴政战斗！你们会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艰难，也要争取胜利！

丘吉尔和战时内阁

英国的战时内阁体制十分独特，其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1916年12月，由当时的首相戴维·劳合·乔治倡议组成。

丘吉尔的战时内阁有5人。首相兼国防大臣由丘吉尔本人担任，枢密院议长为前首相张伯伦，掌玺大臣为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外交大臣由哈利法克斯留任（后为安东尼·艾登），不管部大臣为工党副领袖阿瑟·格林伍德。

正如丘吉尔所说：“如果我们没能获胜，那么押赴刑场面临砍头的，只有这5个人。”顾名思义，这是一个由极少数精英所组成的战时领导体制。在这个体制中，虽然有像哈利法克斯那样主张对德妥协的声音，但丘吉尔绝无此意。丘吉尔上任后，就在前面引用过的议会演讲中，面向国民表达了无论如何也要战斗到底的决心，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丘吉尔由首相兼任国防大臣这一异常的职务安排。这一兼任虽然得到了国王的认可，但并没有因此修订法律。丘吉尔模糊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就是为了在战时充分发挥领导力。

本来英国当时并没有“国防部”这个部门，国防大臣的职能是指挥监督参谋长会议，掌握战争指挥权，相当于军事协调委员会委员长。而丘吉尔同时还是首相，在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掌握着包括人事权在内的广泛权力。

当然，丘吉尔并没有堕入独裁的权力欲之中。尽管对所有的军事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但他从不把自己的见解拿到参谋长会议上去讨论。

参谋长会议的主要成员阿兰·布鲁克是丘吉尔的得力干将，他精心设计了“发电机行动”，也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述这一经过。后来他升任陆军总参谋长。他的作用是向战时内阁报告在参谋长会议上达成的一致意见。陆军大臣詹姆斯·格里格评价布鲁克是“比其他任何陆军军人——恐怕也比任何海军军人或空军军人——更有对整个战争的观察力”。丘吉尔有时出于政治或经济原因，也肯倾听不同意见，但在军事问题上则完全遵从参谋长会议的决定。

领导者肖像

阿兰·布鲁克
Alan Francis Brooke（1883—1963）

生于法国并在法国接受教育，曾在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在陆军大学和国防大学任教后，他作为英国远征军军长在二战爆发后被派往法国，指挥了敦刻尔克大撤退。1941年12月就任陆军总参谋长，直至战争结束。他作为军事顾问辅佐首相，在战时内阁下属的参谋长会议任议长，负责战略指导。

他头脑冷静而敏锐，从不掩饰自己对经验欠缺的美国司令官的担忧："在使英美关系尽可能保持良好方面，艾森豪威尔毫无疑问功不可没；可是他对战略却一无所知。作为推动战争的最高司令官，非常明显，他并不胜任这一职务。"

Imperial War Museums

在匆忙完成内阁官员的任命后，时间已经是5月11日凌晨3点了，丘吉尔终于安心就寝，他这样记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 就这样，我终于掌握了对整个局面发号施令的权力。我感到自己和命运同行。而我过去的人生，都不过是为了现在，为了今天的考验而做的准备。

当然，此时的丘吉尔并不知道，要取得对德作战的胜利，还需要花费五年的时间。

世家子弟

人们印象中的丘吉尔总是戴着大礼帽，手上夹着雪茄。他出身于公爵家庭，是一个世家子弟。

1874年11月30日，温斯顿·丘吉尔出生于牛津附近的布伦海姆宫。这里是首次击败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令英吉利王国在欧洲名声大噪的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约翰·丘吉尔建造的。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是丘吉尔的八世祖。后来丘吉尔还为自己的这位祖先撰写过传记。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是著名的政治家，母亲詹妮是一位美国富豪的女儿。（所以后来有人暗地说丘吉尔是“美国佬”。）

丘吉尔历经三次才考入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骑兵专业。从军官学校毕业后，丘吉尔很快加入轻骑兵第四团任陆军少尉，前往印度。他利用假期考察古巴战争，将其见闻投寄到《每日图片报》（*Daily Graphic*）上刊载。

他文笔优美，又有在埃及和苏丹的从军经历，1899年被任命为《晨邮报》的特派记者，前往南非。当时那里有荷兰裔移民建立的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他们正与英国开战。丘吉尔在这里被敌人俘虏。虽然被关在战俘营，但丘吉尔居然跳出了厕所的窗户，翻墙逃脱了。

丘吉尔将这段经历写成《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出版，四个月就卖了15 000册。依靠稿酬支付日常的各种开销，这种生活方式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

在此期间，丘吉尔不再认为当军人是男人一生的事业追求，转而立志成为和父亲一样的政治家。1900年9月大选时，26岁的丘吉尔第二次成为候选人，当选为下院议员。33岁时，丘吉尔被任命为商务大臣，首次进入内阁。三年后由内务大臣转任海军大臣，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年加里波利登陆战失败，他一直耿耿于怀。尽管他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于保守党内阁中任财政大臣，作为政治家获得了新生，但20世纪30年代，他不再担任阁僚，这一时期被人称为“在野期”。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丘吉尔再度担任张伯伦内阁的海军大臣，次年，他一路做到了首相。对他而言，大战的爆发正是命运的安排。

领导者肖像

温斯顿·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1965）

一个贵族政治家，只穿丝质内衣，即便在战争时期也没戒掉昂贵的雪茄，绅士风度无人能出其右。

他对所有事情都有着浓厚兴趣，积极果敢，尤其对军事作战保持着烈火般的热情，经常亲临现场，思如泉涌，然后用纸条写下自己的想法让手下执行（尽管多数不切实际）。

如果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是“超乎善恶”的政治家，那么丘吉尔则平易近人、充满激情。他演讲时面带笑容，使用一些独特的古语，能使人感受到鼓舞国民勇气的热情，所以也产生了很多名言。

正如罗斯福的妻子艾莉诺所谓“幸运的友情”，在纳粹猖獗的黑暗时期，美国和英国由罗斯福和丘吉尔带向光明是幸运的。而这样的友情用丘吉尔面对戴高乐时的表述，则是：“我们是要解放欧洲吧？那是因为美国和我们在一起。如果需要我在您和罗斯福之间做出选择，我应该选择罗斯福。”

从讲述军旅生活的作品到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丘吉尔著述颇丰，195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Yousuf Karsh.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e010751643

3
英法联军的“史上最大撤退战”

敦刻尔克是个边境港口，位于巴黎以北240千米，直面多佛尔海峡和北海。其名称在佛兰德语中的意思是“沙丘上的教堂”。大约公元7世纪，在这一带的沙丘上建有一座教堂，后来围绕着教堂出现了贫穷的小村庄。人们可能不太熟悉这里，但它却是排在勒阿弗尔和马赛之后的法国第三大港口。1940年5月，西欧的大国法国和英国被德军步步紧逼，在敦刻尔克展开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撤退”，退向英国本土。

实施“发电机行动”

1940年5月下旬，面向多佛尔海峡的敦刻尔克海岸，这里的海面上漂浮着无数船只。驱逐舰、巡洋舰、扫雷艇、鱼雷艇这些军用舰艇自不必说，还有大量的商船、渔船、小舢板、游船、牡蛎舟，最后连漂在伦敦泰晤士河上施放烟花的小船都出现了。

沙滩上聚集着无数士兵。匆忙建起的栈桥从沙滩伸向海中，小船频繁往来，将士兵运送到海面上停泊着的驱逐舰等大型船舶上去。而在空中，则是涂着“卐”字形纳粹徽标的战斗机不停地用机枪向海滩扫射，“容克式”俯冲轰炸机投下的炸弹发出尖厉的呼啸。

在此前的5月26日傍晚6点57分，英国海军总部发出命令：实施“发电机行动”。这一名称来自在多佛尔城下断崖深处设置的地下备战工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人们将发电机放置进去，而将工事本身称

为“发电机房”。

“在两天之内，将如同袋中老鼠一样被德军围困的英国远征军和法军共计45 000人从大陆撤退到多佛尔。”

这就是海军总部的作战目标。虽然想救回更多的将士，但可以预见，德军对撤退的部队当然不会置之不理。

实际上，海军总部也曾考虑从同样面向多佛尔海峡的布洛涅和加来撤军，但很不凑巧，上述两地都承受着德军的巨大压力，能够作为撤退桥头堡的只剩下拥有漫长海岸线的敦刻尔克了。

作战指挥官是伯特伦·拉姆齐海军中将，他也是多佛尔军港的司令，对整个海峡了如指掌。在后来的诺曼底登陆战中，他已晋升为海军上将，并任海军总司令。

人们在敦刻尔克和多佛尔之间选定了三条逃生航线。据该战役亲历者的记录《敦刻尔克的奇迹》，最短航线是Z航线，有65千米，需两个小时。当德军逼近敦刻尔克，这条航线难以利用时，还有比较绕远的X航线（90千米）和Y航线（145千米）。

通往成功道路上的难题堆积如山，如：接收撤退官兵的多佛尔港的准备、海峡排雷、对敌舰和敌方潜艇的防御、低空防御等等，最大的问题是必须保证船只。海峡的地形错综复杂，而且有的地方是浅滩，无法使用大型船舶。与此同时，不但要面对来自陆地上的攻击，空中的轰炸也是可以想象的。当然，军队也拥有一定数量的小型船只，但根本不够使用。

根据拉姆齐海军中将的建议，海军部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通过BBC（英国广播公司），向全体国民发出呼吁，要求所有带动力船只的船主向政府报到。战役开始后，海军部的官员还深入锚地和船坞，甚至连机帆船、汽艇、小船、钓船、舢板、运货船、游船……凡是长度在9米以上能使用的船都征用了。除了船，他们还集结了渔夫、救生员、船员、消防员等勇敢的志愿者。总之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动用了一切力

量。

获救的官兵超出预计八倍

地面上，德军的攻势也咄咄逼人。敦刻尔克市区和通往多佛尔的航线成了炮击目标。加来附近最短距离的Z航线自不必说，X航线的危险性也增加了，只剩下兜个大圈子的Y航线，这使船只往来的次数大为减少。行动实施的第一天，从早到晚，自敦刻尔克乘船的官兵数量只有7 669人，不过到了第二天，大量小船到来，并且幸运的是，降雨妨碍了德军的空中轰炸，渡过海峡抵达对岸的官兵数量逐渐增加。他们在敦刻尔克朝东的海滩上排出了长长的队列，耐心地等待着船只。当俯冲式轰炸机袭来时，他们就在脚下的沙滩上掘出仅够容身的小洞，然后像螃蟹一样紧紧伏在里面。

乘船也是困难重重。这里是浅滩，只有避开敌军攻击时才能抢建栈桥，所以需要很长时间。从栈桥往返运送1 000名官兵到海里的驱逐舰上，竟然需要7个小时。

领导者肖像

伯特伦·拉姆齐
Bertram Ramsay（1883—1945）

战争开始时他已经退役，但因为对海峡的熟稔，他重新服役，担任多佛尔海峡防卫部队司令官。他思路清晰，行事果断，丘吉尔首相曾给予他“难得的统帅”的极高评价。

他发挥了陆海协同作战的优秀才能，指挥了英法联军的海上大撤退，使“发电机行动”取得成功。作为盟军海军副司令，他1942年11月在北非登陆实施“火炬行动”，1943年7月实施西西里岛进攻战。同年10月就任盟军海军司令，1944年4月晋升为海军上将。同年6月在诺曼底登陆战中的“朱庇特行动”指挥多达5 000艘舰艇的登陆部队。据说此时他使用的望远镜和“发电机行动”时使用的是同一个。不幸的是，战争还未结束，他就死于飞行事故。

Imperial War Museum

截至5月30日深夜的5天时间里，人们克服了上述困难，撤退出的总人数达到了126 606人。5月31日，一天撤出的人数就达到了68 014人，大撤退达到高峰。到6月2日，英军全部撤退完毕。

6月4日下午2点23分，英国海军部宣布“发电机行动”结束。在9天时间里，包括123 095名法国军人和16 816名比利时军人在内，共有338 226人撤退到了多佛尔港和附近其他港口。他们全都疲惫不堪、饥肠辘辘。尽管其中不乏丢盔弃甲之辈，但从人数上看，已经大大超出了当初的预想，可谓功绩卓绝——“发电机行动”最初的目标，是在两天内救出45 000名官兵。

至于参加行动的船只数量，仅能够明确统计的就达848艘，其中运送人数最多的是56艘驱逐舰，共运送了102 843人。其次是运送了87 810人的45艘渡轮，接下来是运送48 472人的38艘扫雷艇、运送28 709人的230艘拖网渔船等。私人摩托艇出动了203艘，运送了5 031人。同时也

有大量船只葬身海底，其中包括19艘驱逐舰。虽然不能忽略海岸上被丢下的足够装备5万人军队的大量军车、战车以及武器弹药，但总体来讲，“史上最大规模的撤退战”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功。

“发电机行动”成功的五个要素

作战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五个。

第一，由于海岸是沙滩，空中投下的炸弹会扎进柔软的沙子里，威力锐减。开始时士兵见炸弹落下都四散奔逃，后来就气定神闲了。如果是在岩石居多的海岸，恐怕伤亡会严重得多。

第二，幸运之神眷顾。虽然多佛尔海峡因自然环境恶劣而闻名，但实施撤退的9天里全都是风平浪静。所以官兵们可以走进齐肩深的海水里，船只也可以紧贴吃水线，比平常能多载一到两倍的人员。天气也对联军有利，由于多云和下雨的时候居多，视界不良，有好几次德国空军不得不取消了攻击。

第三，英国空军奋勇作战。作为最后预备队的英国本土防卫空军也倾巢而出，成功击落了很多德国战斗机和轰炸机。

第四，正如前面所讲，撤退现场的海军军人、官员，以及应征而来的勇敢的英国民众都做出了顽强努力。

当时就任首相不足一个月的丘吉尔这样写道：

> 平静的海面上，小船在海岸和舰艇之间频繁往来，冒着屡屡造成伤亡的空袭危险，运送着聚集在海岸上的士兵，也把落在水中的人搭救上来。小船的数量如此之多，仅这一点就已经令敌人的空袭无从下手。如同成群的蚊子，作为一个整体，这样的船队是不可能沉没的。即使我们处在失败的过程中，团结一心、不可征服的本土国民也能带来无上光荣。不管到什么时候，敦刻尔克海岸上的故事都能发出耀眼的光辉。

第五，应该说是敌人一个重大失误的决定也帮了大忙，那就是希特勒“停止进攻”的命令。

希特勒谜一样的命令

5月24日——“发电机行动”实施两天以前，德军的装甲部队已经开进到距离敦刻尔克只有24千米的地方，形势可谓一触即发。但是到上午11点42分，希特勒却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虽然这是采纳了装甲部队首脑、A集团军群司令伦德施泰特元帅的建议，但就其结果而言，却好像是特地为已然是口袋里老鼠一样的英法军队撤出大陆提供机会。

希特勒做出这样判断的真正意图至今不明。后世的历史学家们推测，可能是如下几个原因导致的。

首先，是战略因素。希特勒成功地使装甲部队的力量得到充分发挥，将英国的大陆远征军追逼到多佛尔海岸一隅，但是反而对闪击战的意外顺利感到不安起来，打算等后续的步兵和炮兵部队跟上来。要想进入敦刻尔克，必须路过运河以及沟渠众多的湿地，而强行通过可能造成战车损坏。为彻底击溃位于南方的法军，他想再保存一些力量。

其次，就是轻信了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尽管交给我的德国空军”这个口头禅。戈林建议：“只依靠空军，就可以从空中切断英国海军的海上退路，这样就不必消耗宝贵的装甲部队了。”希特勒听信了。但是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德国空军并没有取得戈林所说的那种成功。

最后，是出于政治判断。希特勒对英国的感情很复杂。希特勒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国应该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必须打败的对手。他只要和英国联手，就可以完成击败苏联的夙愿。这一想法在他的著作《我的奋斗》中也有所陈述。如果在敦刻尔克全歼英国的远征军，俘虏幸存的军士，那么高傲的大英帝国国民一定会咬牙切齿地和德国背水一战，这可不是希特勒所希望的。不仅如此，由于希特勒允许他们逃回祖国，他们对德国的战斗意志就会相对减弱，这可以说是一种怀柔政策。

现在大量的英军官兵毫发无伤地逃回本土，希特勒却并未显出恼怒的模样。而且敦刻尔克在被德军攻陷的6月4日深夜，还在庆祝“史上最大战役”的结束，希特勒命令德国全境鸣钟三天，完全是一派胜利景象。

敦刻尔克精神

那么，希特勒这种“使其丧失斗志”的意图达成了吗？正如历史所展示给我们的那样，答案是否定的。英国人发现这和以前“隔岸观火”般有名无实的战争大不一样了，战火已经迫在眉睫，现在他们只有振作起来。敦刻尔克之战在英国国民对德国的憎恨中结束，英国人的反抗意志被彻底点燃。

后来这种不屈不挠的昂扬精神被称为“敦刻尔克精神”，在整个英国扩散开来。其具体内容在丘吉尔6月4日下院的演说中有充分的体现。

敦刻尔克作为史上最大规模撤退战的舞台名垂史册。毫不夸张地讲，对英国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真正战斗是在这个城市开始的。

那么，这里有一个疑问：如果希特勒不让坦克部队停止进攻，而是以全歼对手的决心在敦刻尔克追击英军，不仅如此，他还倾尽全力从海上实施登陆战，向英国本土推进，如果这样的话，战争的走向会怎样呢？可以想象，兵力不足的英军反攻很可能十分困难。希特勒的这个决策可能是错误的。

冒着德军持续的轰炸，从敦刻尔克撤出的英国远征军（Imperial War Museums）

鼓舞了英国人民的“敦刻尔克精神”

我们必须充分注意，不能把这次营救等同于胜利。撤退并不能使我们赢得胜利。……即使欧洲的广阔地域和久负盛名的国度落入盖世太保和可憎的纳粹控制机构的手中，我们也不会胆怯和屈服。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中作战，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

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下也会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一切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丘吉尔的下院演讲（1940.6.4）

经历了“史上最大的撤退战”之后，几乎所有从大陆撤出来的一败涂地的英军都盼望反攻，而他们与新世界（美国）携手再次回到大陆将是四年以后，即因“D日”而广为人知的1944年6月6日所实施的“史上最大作战行动”——诺曼底登陆战。在那之后又过了一年，直到停战前的1945年5月8日，敦刻尔克才宣告解放。

第二章

“法国战败”的冲击和丘吉尔的斡旋

——从不列颠之战到同盟国成立

法国的战败和英国的抵抗

1940.6.5 德军进攻法国

6.10 挪威投降

意大利向英国和法国宣战，在“非洲之角”攻击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军队（东非战线）

6.14 德军攻入巴黎

6.16 法国总理雷诺辞职，贝当政权建立

6.18 戴高乐通过BBC广播首次呼吁抵抗德国

6.22 法国向德国投降，双方缔结停战协定

6.24 法国向意大利投降

7.2 贝当在非占领区建立维希政权（首都维希）

7.10 贝当就任法国国家元首

不列颠空战开始（10.31结束）

7.16 “海狮计划”实施（德国进攻英国本土）

9.13 意大利从利比亚向埃及进攻（北非战线）

9.23 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

9.27 日本、德国、意大利结成联盟

10.12 “海狮计划”终止（德国放弃登陆英国本土）

10.28 意大利进攻希腊（希意战争）

11.10 日本举行纪元2600年大典（11.14结束）

11.12 希特勒在柏林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举行会谈

11.14 德国空军对英国考文垂市实施夜间空袭（使用新电波导航系统）

1941.2.6 意大利军队占领班加西（利比亚）

2.12 德国非洲军（司令隆美尔上将）在利比亚登陆

4.6 德军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

5.9 英国海军从德国潜艇U—110上缴获了恩尼格玛密码机和密码本

5.20 德军登陆克里特岛（6.1占领）

6.22 德军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对苏联开战（东部战线）

8.9 大西洋会谈（8.12结束）

9.30 莫斯科保卫战开始

10.17 布良斯克失陷

12.5 斯大林发布命令反攻德国

12.7 日军奇袭珍珠港

12.8 美国对日宣战

12.11 德国对美宣战

1
败给德国的“世界最强陆军”

“拥有世上最强大陆军的国家”——这是当时法国头上的光环，可是仅仅六个星期，它就在闪击战的攻势下向德国投降。法国如此轻易地战败，导致了本国国民在后来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处于纳粹的掌控之下。

是战是和？

联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德军赶到之前，从阿布维尔西北约100千米的港口城市敦刻尔克成功撤退。

6月5日，就在最后的运输船驶离敦刻尔克港前不久，希特勒实施“红色作战计划”，发出了向法国本土进攻的命令。

抵抗几乎毫无用处，法军接连败退。6月10日，意大利又向英法宣战，简直是趁火打劫。

6月14日，德军开进巴黎。法国政府机构三天前刚刚转移到图尔，在这一天再次搬迁，退到了巴黎以南580千米加龙河沿岸临近大西洋的波尔多。

6月22日晚6点50分，在巴黎东北约80千米处的贡比涅森林，法国代表查理·亨茨格上将在投降文件上签了字。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1918年11月11日傍晚5点，根据联军总司令斐迪南·福煦元帅的指示，德军代表正是在这里签署了投降文件。

德国没有忘记这一耻辱。他们特地用卡车把当时使用的火车餐车车厢拖进森林，放置在当年举行投降仪式的地方，报复性地在车厢中举行了签字仪式。

把政府转移到北非的殖民地继续抵抗的幻想已然落空，为了维护在“非占领地区”的统治，贝当政权把据点设置在维希。

这一时期，拒绝向德国投降的戴高乐在6月18日现身伦敦，通过BBC向法国国民发表了这样的演讲：“我们只是在一次战斗中失败，我们并没有输掉战争。”

6月25日凌晨0点35分，所有的法军都接到了停止战斗的命令。5月10日拂晓的攻击开始6个星期后，德军攻入法国境内仅仅20天，法国就放下武器求和了。

“法国失败”的冲击

相比于德国，法国拥有强悍的军队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同时也是整个欧洲的大盟主，为什么却在极短时间内被迫拜服在德国脚下？

有一本书详述了个中缘由。这本书就是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流亡美国时所著的《法国失败》。

莫洛亚指出，当时法国犯下了三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对军事技术的革新缺乏理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为回避战场上的炮弹，深挖地道的堑壕战成为主流，这往往使战线陷入胶着状态。挖掘战壕和夺取战壕的多次反复，使大量士兵丧失了宝贵的生命。这时坦克和飞机出现了，军事技术的革新打破了战场上的僵局。然而，注意到这些新式武器威力的军人简直屈指可数。

法军重视防御战，思想上无法转变到“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上来，考虑到前线可能还会陷入胶着，法国把巨大的力量都投入到防御上，于是就产生了马其诺防线。马其诺防线的确坚不可摧，然而尽管其南部一

直延续到意大利边境，北部却在比利时附近终止，这是明显的缺陷。

第二个错误，是毫无根据地以为法国和波兰不一样。在德军闪击战的攻击下，波兰束手无策，惨遭蹂躏，但是法国却没有吸取波兰的教训。法国有了新战术，却认为不必改编军队，直到最后，其策略依据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使用大量坦克，力求集中突破战线上的一个点，这就是闪击战的目标。坦克部队突破前线；其后是卡车和挎斗摩托组成的机械化部队，车上的步兵根据现场情况展开战斗；再往后是炮兵部队，实施远距离炮击；此外还有空中的俯冲式轰炸机支援掩护。这种以飞机、坦克为代表的机械化部队以及炮兵所构成的“三位一体”作战方式，具有令对手来不及做出反应的速度。为什么法军不肯学习这种划时代的先进战法？我们只能用傲慢自大来解释。在这一点上，希特勒的确可以说具备军事才能。

第三个错误和第一个错误有关联。法国政府和军事部门认为：“战争是长期的，要为明年甚至后年做准备，要和工业生产与国家财政相一致。”但实际上，西部战线的战斗仅仅经过短短6个星期就结束了。

此外，也存在着政治家之间意见对立、相互争斗的情况。1940年，达拉第总理同他的继任者，即财政部长雷诺之间相互对立，甚至他们的夫人都对政治指手画脚，多嘴多舌，以致政坛混乱不堪。雷诺主张对德积极进攻，而联军总司令甘末林则主张消极防守。结果德军势如破竹，证明了甘末林的想法是错误的。雷诺把甘末林斥为失败的责任人，任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马克西姆·魏刚上将为联军总司令，任命同样是“一战”英雄的贝当为副总理。尽管他如此展示战斗到底的决心，但在德军干脆利落的进攻面前，他们都如同不曾存在一样。

莫洛亚还非常惋惜，因为在法国人中间也存在一种不正确的认识，他们期待国联无论如何应该做点什么。由于政府内部争斗越来越激烈，缺少一位善于团结国民的领导者，因此法国在军备、外交以及加强薄弱产业方面都毫无作为。

如此这般，莫洛亚指出了法国“失败的本质”，同时，莫洛亚也为祖国开出了一个“药方”。

这些警句在今天的日本几乎耳熟能详，但当时法国所欠缺的，正是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应对变化的速度。

英国国内也存在对立意见

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和法国并肩战斗的英国。

法国的草草战败也在同盟国英国引起非议，这就是莫洛亚所说的“过度的乐观主义”，或者说是“战争恐惧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英国内阁就发起了“节约经费运动”，并且根据“大英帝国在未来的10年里不参加任何大战，并且也不再需要远征军”的假设，去决定军备以及其他政策措施的制定，这被称为“10年准则”。

法国的“药方”——作家安德烈·莫洛亚的意见

1. 更强大的国民：如果国民缺乏随时为国家自由而献身的热情，最后国家就可能失去自由。

2. 敏捷的行动：关键时刻制造出一万架飞机比战后的五万架更管用。

3. 引导舆论：领导者应该为民众指出前进的方向，而不是一味顺从民众。

4. 维护国家统一：政治家就好像同一艘船上的乘客，一旦船只沉没，谁也无法全身而退。

5. 舆论上排斥外国的政治影响：拥护思想自由当然是正确的，可是，为了维护这种思想而从外国获取金钱就是犯罪。

6. 使青年免受扰乱祖国统一的思想毒害：国民不肯为保卫祖国而

努力就无异于自杀。

7. 治国依靠高尚的生活道德：不道德的行为不管怎样都是在为敌人提供立足点。

8. 坚信你本来的思想与生活方式：组建军队，不，即便是制造武器，也需要某种信念。自由比暴力更具为之奉献的价值。

这一准则对国防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们以为不会有战争了，军事研究越来越松懈，军备预算大幅减少，军需品生产所需要的熟练工人遭到解雇，军工厂被关闭，很多都转变为一般消费品工厂，国民也逐渐忘记了战争，坊间飘散着过度的和平主义气息。

这一准则也体现在外交政策上。1935年德国发布重整军备宣言，1936年进驻莱茵兰非军事区，1938年兼并奥地利，1939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吞并了苏台德地区。面对将《凡尔赛和约》踏在脚下的希特勒，英国一直采取绥靖政策，始终没有一个果断的态度。当时的首相张伯伦面对希特勒吞并苏台德地区的要求，甚至在慕尼黑会议（1938年）上完全同意。

会议结束后，张伯伦和希特勒举行了单独会谈，重申了维护欧洲和平的意愿，双方签署了一份共同声明，确认英德将相互协助，尽力维护和平。他从慕尼黑飞回伦敦后，在飞机舷梯上就开始不停地挥舞和希特勒签署的共同声明，在欢迎的人群面前大声宣读声明内容。回到首相官邸后，更是详述“在英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使德国和唐宁街归于和平，这是我们时代和平的象征！”

一年以后，德国进攻波兰，这份声明也终成画饼。

2

保卫英国本土的“不列颠之战”

法国向纳粹德国投降。希特勒为了在欧洲称霸，制订了进攻英国的计划。

可是，戈林元帅“只靠空军就可使英国屈服”的豪言壮语化为了泡影。熬过了本土空袭之后，以阻止德军进攻为目标的丘吉尔终于把美国拉进了同盟国，着手对德反攻。

你死我活的不列颠之战

英法官兵之所以能从敦刻尔克渡海逃往英国，是因为希特勒一直没有放弃和英国媾和的可能性。希特勒曾坚信：“和英国开战简直是要德国的命，绝对不可以。”在他看来，英法两国在波兰遭到入侵两天后对德发布宣战文告就是一个错误。

但是，丘吉尔所表现出来的姿态正好和希特勒完全相反。他在1940年6月18日于下院发表演说，号召全体国民奋起履行义务：“大英帝国即将开始的战斗，事关我们的体制和帝国的存亡，如果英国能够存续1 000年，人们将会说这正是他们最值得骄傲的时刻。”

到了这一步，和平谈判的希望日渐渺茫，希特勒开始准备登陆英国本土。这时是7月中旬，希特勒将登陆英国的计划称为“海狮计划”，要求军队到8月中旬准备完毕。可是到具体讨论计划的时候，希特勒就痛感德国海军的劣势。尽管德国拥有令人骄傲的陆军，可是如果不能把军队安全运送到英国本土，那么希特勒最终只能一无所获。所以，希特勒

不得不采取两段式战略，即先对英国空军进行彻底打击，取得制空权后，再利用海上部队开始真正的进攻战。

赫尔曼·戈林曾经发出豪言壮语："只靠空军就可使英国屈服。"他当初也是要确保海峡附近的制空权，然后将轰炸机部队持续不断地送上英国本土。可是战斗机续航时间过短，不能充分实施掩护，再加上英国可通过新武器"雷达"事先侦知，因此希特勒没能达到当初的目的。战斗中出动的德国航空部队配属在北非、比利时以及荷兰的各个飞机场。到8月10日，希特勒共部署了长距离轰炸机875架，俯冲轰炸机316架，单引擎战斗机702架，双引擎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227架。相比之下，英国空军的战斗机部队处于明显劣势，他们不可能同时出动700架飞机。

后来人们把英国本土和英吉利海峡上空反复进行的空战称为"不列颠之战"。根据英国公开发行的战史，"不列颠之战"始于1940年7月10日，终于10月31日，不过这样的时间记载难以完全反映当时的真实状况。无论是7月10日以前，还是在11月到12月之间，相当激烈的战斗仍多次发生。

7月10日，德国空军第一次大规模轰炸在多佛尔海域航行的英国船队；到7月中旬，依然以攻击多佛尔船队和多佛尔港为主；但到8月13日以后，德国空军开始将矛头指向飞机场、司令部、雷达等英格兰南部各郡的空军地面设施。攻击的高峰出现在8月15日，仅在这一天里，德国空军就损失了75架飞机，英军损失了34架。从西面的米德尔渥勒普到东面的马特尔舍姆，有10个以上的机场遭到德军攻击，德军企图引诱英国战斗机出动然后加以歼灭，但并不顺利。

1940年7—8月，在英格兰南部，西部战线得到开辟。将空军基地设在法国前线的德国空军执着地轰炸英格兰南部的机场以及伦敦市区。上图为傍晚袭击伦敦东部的德国轰炸机He—111，连日的空战不断扩大（Royal Air Force Battle of Britain campaign diaries/photo）

在本土防卫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英国“喷火”战斗机（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upermarine_Spitfire_Mk_XVI.jpg）

8月24日以后，德军的战术又变了。因为轰炸机比战斗机速度迟缓，经常被击落，所以德军的战斗机开始近距离掩护轰炸机。这是利用英国空军的战法反守为攻，结果很多英军飞机成了德国空军的盘中美味。并且在这一天以后，德国空军还开始了真正的夜间轰炸。

希特勒空袭伦敦

英德双方交战的日子一直在持续。从8月24日到9月6日，德国空军

出动战机13 700架次，英国空军则为10 700架次。飞机损失方面，德军为380架，英军也达到了300架。和之前相比，英军的损失开始扩大——和德国相比的飞机数量上的劣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英国空军阵亡的飞行员达103人，重伤员达128人，很多机场遭到严重破坏。这种状态如果持续下去，飞行员的补充很快就会出问题，战斗机也将处于无法起飞的状态。

正当英国空军大伤脑筋的时候，德国空军的方针又发生了变化。9月7日以后，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德国空军开始攻击英国首都伦敦。

为什么突然改变了攻击目标呢？——为了报复8月25日英国空军对柏林的空袭，德军希望把保卫首都的英军战斗机引出来一举全歼。同时，轰炸国家中枢和人口集中地区可以使其国民丧失斗志。另外德军认为英国的防空力量已经枯竭，因此把攻击目标从空军作战设施转换到城市的兵站等军事地点。就像命令已经临近敦刻尔克的坦克部队暂时停止前进一样，希特勒前前后后考虑了很多因素，才做出了这样的决策。

很遗憾，这个决策是错误的。

巨大的转折点发生在9月15日，至今英国人仍称这一天为“不列颠之战纪念日”。这一天，英国空军击伤击落德军飞机185架，而自身只损失了26架。虽然德军彻底损坏的飞机仅为这个数字的1/3，即60多架，但毫无疑问，这给德国方面造成了巨大打击。如果说8月15日德军已经发觉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夺取英国的制空权，那么9月15日这一天，他们则发觉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夺取英国的制空权。

“不列颠之战纪念日”两天以后，希特勒决定无限期延迟“海狮计划”。10月12日，根据其他作战任务，他将入侵英国的时间推迟到第二年春季。可是到了1941年7月，又决定延迟到1942年春季，即预计结束对苏作战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就是德军永远也没能侵入英国。

德军提出了夺取制空权的战略，也夺得了局部地区的制空权，可是希特勒却在没有完全确保其领空之前便改变战略，把攻击目标转向伦

敦，结果没能达到预期目的，以至于整个作战计划半途而废。而且，德国空军是以在欧洲大陆作战为前提进行装备的，其战斗机（主力为梅塞施米特Bf—109）固然优秀，但是续航距离很短，也没有大型的战略轰炸机。德国空军在不列颠之战所投入的主力轰炸机亨克尔He—111，在英国空军坚固的防御网面前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这款轰炸机依靠流线型外形实现了高速度，但是这个优点是牺牲了炸弹装载量才获得的。德军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没有给这款He—111配备足够的护航战斗机就派出去深入英国本土执行轰炸任务。可见德军并没有精心准备对英作战，而是处于一种应急作战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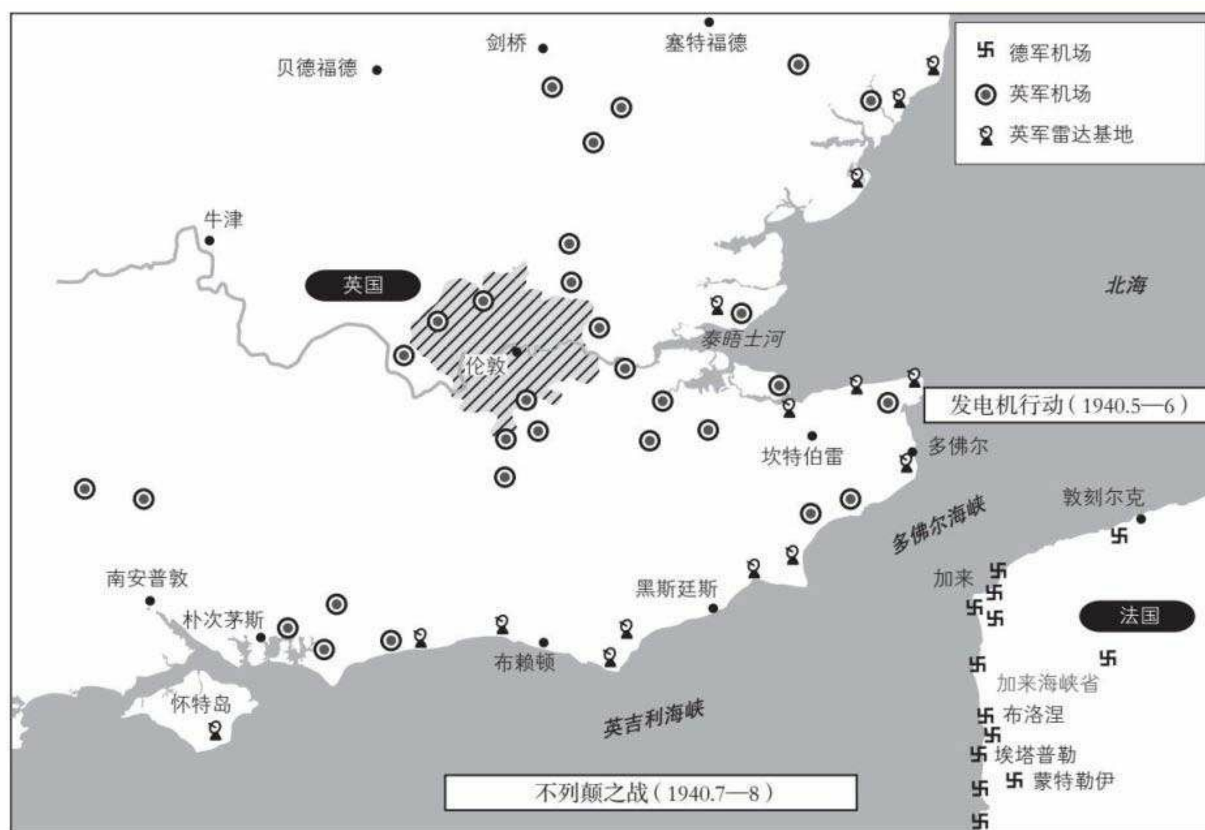


图2-1 围绕英吉利海峡的空战

除了德国方面的对战准备和作战战略缺乏一贯性，英国的战斗机部队司令休·道丁上将始终没有上德军的圈套，直到最后仍缜密地管理战斗机和飞行员，使很多人避免了无谓的牺牲。他高度重视保持预备力量，在他的领导下，英国空军很早就研发出了雷达。（侦察距离最远达

320千米，可测定敌机的位置和高度。）

进一步说，除雷达以外，高效率地利用高射炮、战斗机、阻塞气球（为在飞机航线上制造障碍而设置，气球和地面用金属线连接。根据这根金属线实现精密爆炸，阻拦低空飞行的敌机）等，建立起精致的防卫体系，研发量产“喷火”战斗机和“飓风”战斗机并投入使用（速度和机动性优异的“喷火”战斗机用来对阵敌人的战斗机，“飓风”则对阵敌人的轰炸机），丘吉尔新设飞机生产部，起用报社大亨比弗·布鲁克男爵马克斯韦尔·艾特肯——在他的出色领导下，战斗机成功增产——这些因素也为英国的胜利贡献了巨大力量。

丘吉尔很少对具体作战发表意见，而是对国民不断强调这次战争的意义。与希特勒相比，可以说丘吉尔的领导才能也是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法宝。

3

走向同盟

英国已经没有余力独自对纳粹发动反攻了，为了让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加入对德作战，丘吉尔和罗斯福多次交换意见，首先在个人层面上达成了一致。

再加上其后苏联对德宣战，在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终于成立了。

美英最高首脑的密切关系

现在我们看一看当时的地图。开战不到一年，欧洲地图就发生了巨变。除了中立国（瑞士、芬兰、瑞典、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欧和中欧的绝大部分已经并入了德国版图，只有大英帝国及其殖民地勉强保住了命脉，也就是其岛屿部分。

和希特勒战斗，除了借助美国的力量外别无他法。在怎样把美国及其领导者罗斯福吸引到欧洲战场这个问题上，丘吉尔可以说是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

美国方面，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党出身的第28任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把世界和平作为目标，积极倡导创立了国际联盟。可是共和党掌握政权以后，美国却并没有加入国际联盟，而是采取了“欧洲事务由欧洲人处理”的孤立主义立场。这时美国尽管还没有针对希特勒的行为谋求有效的对抗措施，但已经感到了骑虎难下的危机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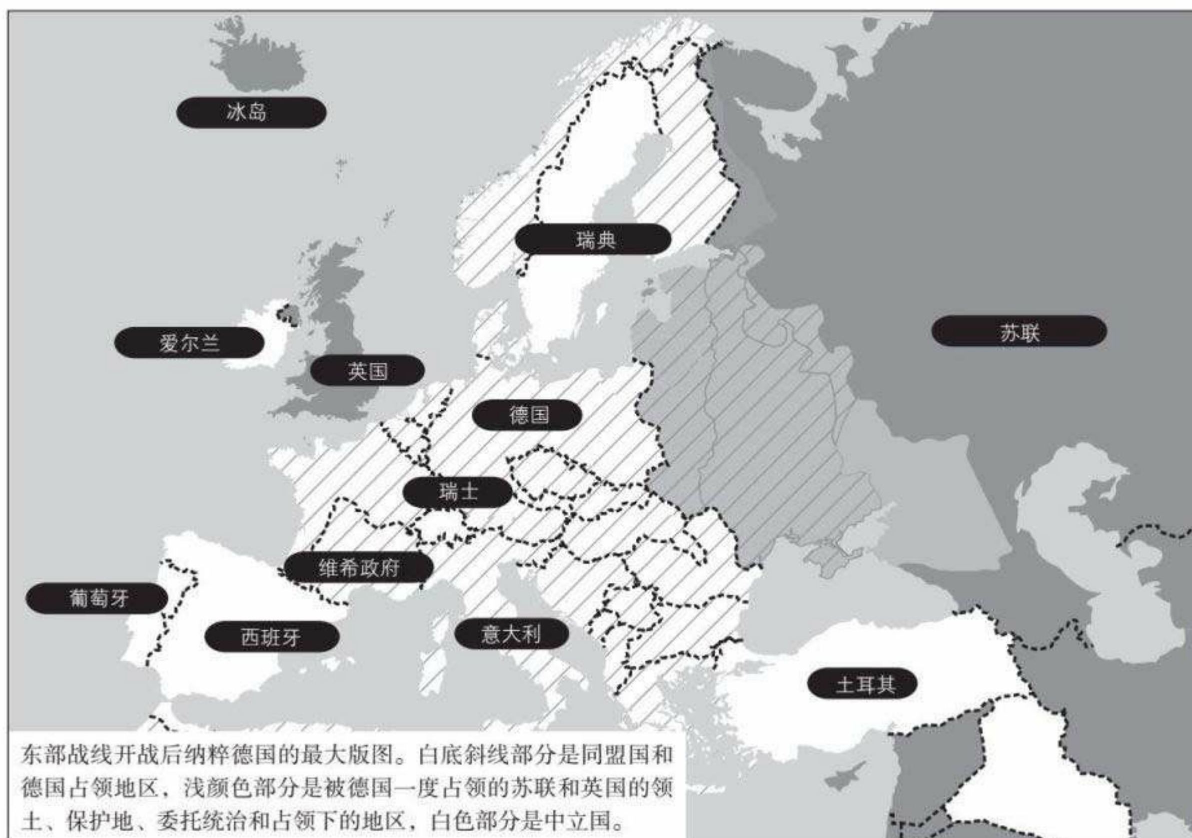


图2-2 席卷欧洲的纳粹德国

罗斯福和丘吉尔是老朋友。28岁成为参议员的罗斯福在31岁时就已经担任海军部长助理的要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和担任美国海军部长助理的罗斯福在一次晚宴中会面。1939年9月，当丘吉尔再次成为海军大臣时，连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给他写了这样的亲笔信：

> 我想让您和首相知道的是，您如果有想通知我的事情，只需私下和我联系即可，我随时都欢迎。您任何时候都可以联系我。

丘吉尔非常高兴，很快以“海军军人”署名写了回信，直到罗斯福1945年4月过世，两人之间的通信多达1 700封，有过12次直接会谈（华盛顿3次，魁北克和开罗各2次，纽芬兰、卡萨布兰卡、德黑兰、马耳

他、雅尔塔各1次），直接会谈的天数长达20多天。这种最高首脑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美英联军引向胜利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这种密切的关系，诺曼底登陆战便难以成功。

第二年的1940年5月10日，德军向西大举进攻，这一天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5天以后，丘吉尔向罗斯福发出信息，提出了“在我们建造出新的驱逐舰之前，想向贵国租借40到50艘老式驱逐舰”的请求。

海外基地与旧驱逐舰的交换

当时英国的海防形势极为紧迫：英国的船只正面临着来自德国U型潜艇的攻击，而且德军还有可能从海上直接入侵英国本土。这时不能全部依靠法国海军。如果意大利参战，这种劣势会更加明显，恐怕会招致致命后果。

面对丘吉尔的请求，罗斯福的回答是否定的。其理由是，将大量驱逐舰租借给英国需要通过国会，这个时机很不好。

美国“空中英雄”查尔斯·林白主张“美国第一”，反对卷入欧洲战争。这种观点获得了很多国民的支持。在第三次参加总统选举前，面对英国提出的请求，罗斯福不得不有所克制。1940年7月，丘吉尔又一次发出了催促转让驱逐舰的电报，在历数本国的窘境之后，还加上了丘吉尔式的修辞：“为了全世界的悠久历史，这件事必须立即办妥。”

美国政府很快就做出了回应。作为转让50艘老式驱逐舰的条件，美国想得到西印度群岛和百慕大群岛的英国海军基地。

用好几个基地交换50艘老式驱逐舰，当然不划算。不过丘吉尔还是先同意了。尽早把驱逐舰搞到手当然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考虑，那就是一旦美国向英国转让了这50艘驱逐舰，就等于美国放弃了中立。如果这样，德国就是向美国发出宣战文告也在意料之中。丘吉尔急切盼望的是在英国遭到希特勒的蹂躏之前，把美国拉进这场战争。

但是谈判并不顺利。首先，英国方面需令基地所在的殖民地政府和国民接受一点，即不考虑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主权变更，美国只能得到租借权。并且英国国内的舆论也不可小觑——用基地去交换驱逐舰很明显是不合算的交易，有可能引起保守强硬派的抵制。

这时丘吉尔的机智派上了用场。丘吉尔提议最好不要把这种行为称为“交换”，而是“相互赠送礼物”。

美国没有立即同意。因为美国总法务官提出，总统没有把政府所有物赠予他国的权限。对此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得到了政府法律顾问提出的一个折中方案，即因为英国没有明确作为转让对象的具体基地，那么不妨由美国方面来指定。这些基地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英国明确赠予美国的，还有一种位于巴拿马运河附近，是对美国具有极高战略意义的加勒比海附近的基地。英国可以把这些基地的租借权作为得到驱逐舰的谢礼赠给美国。这对美国而言是意义重大的举措。最后罗斯福和赫尔同意了这个折中方案，谈判得以继续进行。

9月3日，两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英国将位于纽芬兰和百慕大的基地赠予美国，将巴哈马、牙买加、安提瓜、圣卢西亚、特立尼达、乔治敦各基地的99年租借权赠予美国，而美国把50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的老式驱逐舰转让给英国。

这不是基地和驱逐舰的简单交换。美国相信，英国不会让希特勒得逞，同时英国也在向全世界宣示，一旦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美国会支援英国。这一时期，美国还向英国派出了军事监督团。

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宣言

显示形势发生进一步变化的是，11月罗斯福第三次当选总统。在商务部长、心腹哈里·霍普金斯的陪同下，他前往加勒比海，到从英国“租借”来的基地休养兼视察。在巡洋舰航行在海上的时候，他们收到了丘吉尔的信件。这是一封要求财政援助的长信，信件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 如果阁下坚信打倒纳粹和法西斯专制是美国以及西半球国民的重大事项，那么您绝不会认为这封信的主旨是恳求援助，而是会认为我在对为达成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必须采取的最小措施进行阐述。

罗斯福被这封信深深打动，和霍普金斯共同研究应对办法。第二天，12月7日，他们回到华盛顿，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罗斯福巧妙地用花园里的水管举例，认为应该向英国提供大量援助："当邻居家着火的时候，我家里有150米长的花园用水管，邻居家却没有这么长的水管。如果邻居能将我的水管接到自家的消火栓上，我为了灭火，一定会帮他的。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我绝不会对他说：'我的水管是15美元买来的，如果你要使用必须先付给我15美元。'只要灭火之后他能把水管还给我就行了。"

在12月29日的广播演讲"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这样对美国国民说："如果英国垮台了，那么我们美国人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都会像生活在装满了炮弹的炮口之下。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手中的能源和资源，大力生产武器和船只。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这个"兵工厂宣言"，实际上相当于表明了美国的参战决定。

美国走出孤立主义

转年就到了1941年。1月6日，罗斯福发表了国情咨文，公布了《租借法案》，同时言及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怖的自由"四个基本自由。这四项基本自由成为美国参战后的战争目的，后来引申成为战后世界秩序的理念。

领导者肖像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

自1933年开始直至过世，他是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统，达4届共1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德国投降的前一个月，他统揽美国的战时决策。他是纽约州海德公园一位资本家的独子，经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后任律师。1910年首次当选纽约州上院议员。1921年脊髓灰质炎症发作，下半身行动不便，但他努力进行康复训练，1928年当选纽约州州长。4年后击败当时的总统胡佛，就任第32任美国总统。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他的叔父。

有了美国的支援，在纳粹德国被打垮之际，他一方面力主欧洲问题应由欧洲自己解决，同时又担心中欧被苏联占领。另一方面，他对斯大林并未采取敌对态度，而是向其展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希望以此说服斯大林，达成永久的和平。他还提出了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构想。

对盟军而言，他和丘吉尔的密切关系是一大幸事。但针对他本人的出于帝国主义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反动冲动行为也相当多。他认为戴高乐有成为独裁者的危险，对其始终采取冷淡态度。

在从1月末开始持续了两个月的英美参谋会议上，“欧洲战线最优先”的原则被确立。3月11日，正如罗斯福所预见的那样，《租借法案》获得通过。其具体内容并不只关系到武器的出借，还包括舰船的建造、军舰的修理，以及促进所有对英物资的供给。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债务问题曾使英美关系恶化，所以这一次没有明确支付方式，也没有专门条款对正式的账单做出规定，就连正式的会计表也没有考虑进去。英国希望对所有必要的军事项目进行大规模的长期规划，丘吉尔对大洋彼岸出现的“大兵工厂”自然大喜过望。美国就这样毫无悬念地滑入了战争轨道。

作为纽芬兰岛召开的大西洋会谈的结果，8月14日，《大西洋宪章》发布。宪章包括“主张不追求领土的扩张或变更，各国有选择统治形态的自由（民族自决），各国在贸易和获取天然资源方面机会均等，削减军备以及确立国际安全保障体制”等八条内容。《大西洋宪章》的这些内容也成为战后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到了9月，罗斯福发表了题为《纳粹军舰是大西洋上乱窜的蛇》的演说，下令攻击防御海域内的德意舰船。美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

德苏开战的“巴巴罗萨计划”

现在我们把时间拨回到6月22日星期日的拂晓。

德军3个集团军群超过300万的官兵突然越过国境线，大举入侵苏联。“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实施。北方（左翼）是威廉·冯·李勃元帅指挥下的北方集团军群，他们从德国的飞地——东普鲁士越过国境，侵入苏联占领下的立陶宛，目标是列宁格勒；其南方是华沙的东方，费多尔·冯·博克元帅指挥下的中央集团军群从明斯克、斯摩棱斯克以及莫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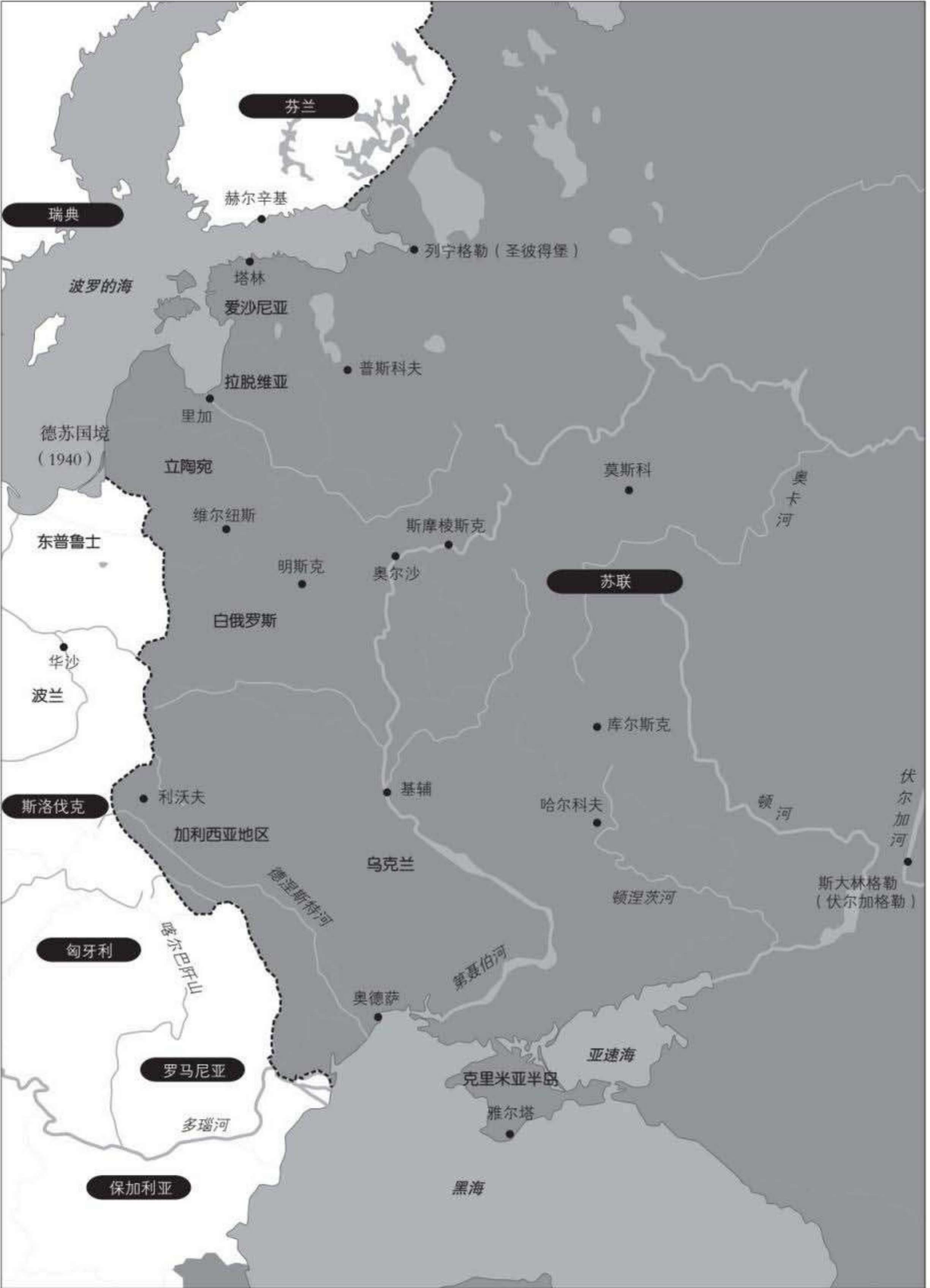
连线的两侧展开攻势，他们的目标是莫斯科；再往南是1年前率领A集团军群突破西部战线的伦德施泰特元帅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他们从喀尔巴阡山附近的加里茨地区向基辅进攻，目标是乌克兰的顿涅茨盆地。

和一年前的西部战线大进攻一样，德军在战争刚开始就表现得所向无敌。第一天德军俘虏了苏军1万人，击毁苏联军用飞机800架。在接下来的3个星期里，大雨滂沱，但除了向基辅进击的南方集团军群有所延迟，没有完成作战计划之外，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仍然保持着快速进击的态势。

当时震惊世界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缔结于1939年8月——正是1年10个月以前。苏联认识到这场冲突不可避免，于是在此期间大力增强军事力量。1941年4月，苏联和一直小摩擦不断的日本缔结了中立条约，防止陷入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局面。不过，已经得到相关情报的斯大林却不相信德军将大规模入侵，还以为这是在希特勒不知情的情况下，德国的将军们所进行的挑衅。

开战5天以后，苏联成为盟军的一员。8月，美国对苏的援助协定缔结；9月，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召开，会议决定援助苏联，美国的武器援助法对苏联也同样适用。

对希特勒而言，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向苏联发动进攻并非意外。他为了在和英法作战时解除后顾之忧才对苏联暂且示好，现在法国已经屈服，打败英国也只是时间问题。希特勒认为，只要击溃苏联，英国最后的希望就会化作泡影，不得不投降。



芬兰
赫尔辛基
瑞典
列宁格勒（圣彼得堡）
塔林
波罗的海
爱沙尼亚
普斯科夫
拉脱维亚
里加
德苏国境
（1940）
立陶宛
莫斯科
奥
卡
河
维尔纽斯
斯摩棱斯克
东普鲁士
奥尔沙
明斯克
苏联
白俄罗斯
华沙
波兰
库尔斯克
基辅
利沃夫
斯洛伐克
哈尔科夫
顿
河
伏
尔
加
河
加利西亚地区
乌克兰
德涅斯特河
顿涅茨河
斯大林格勒
（伏尔加格勒）
匈牙利
喀尔巴阡山
第聂伯河
奥德萨
亚速海
罗马尼亚
克里米亚半岛
雅尔塔
多瑙河
保加利亚
黑海

图2-3 东部战线的作战区域

尽管最初的战斗很顺利，可是7月中旬后，接连发生的事态使得希特勒的乐观情绪逐渐低迷——无论受到怎样的包围，苏军就是不投降，仍然持续战斗。各地也建起了抵抗据点，从德军背后发动袭击，给其造成了巨大伤害。苏军的装甲部队在德军之间巧妙地穿插而过，成功地逃往东部地区。以往苏军在广阔的原野上发动近战，结果屡屡被德军打击；现在苏军对战术加以反省，开始利用沼泽等天然屏障加以隐蔽，开展奇袭。

燃料和物资的补给问题也显露出来了。苏联的铁路和德国的宽窄不一样，无法直接用于运输兵员和物资。由于坦克行动迟缓，步兵的进攻速度也大大下降了。

作战目标对立，“冬将军”到来

7月中旬，希特勒和陆军最高司令部之间就今后的作战方向产生了分歧。希特勒在“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就把占领北方的列宁格勒和获取南部乌克兰的农业及其他产业资源作为目标。可是，德国国防军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与陆军总参谋长弗兰茨·哈尔德则不想分散攻击力量，主张只向首都莫斯科进攻。他们的意见还得到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博克和他麾下的装甲部队指挥官古德里安的支持。

希特勒最后还是决定暂时停止进攻莫斯科——他总是固执己见。博克指挥下的中央集团军群装甲部队得到命令，一部分被派往以列宁格勒为目标的北方集团军群，其余部分则被派往以乌克兰为目标的南方集团军群。对此，布劳希奇以现有坦克需要修理或补充，新坦克需要运输为由拖延时间，命令怎么也执行不下去。整个8月，中央集团军群一直在斯摩棱斯克的东面按兵不动。

希特勒对陆军最高司令部的消极态度十分恼怒，最后只同意中央集团军群计划派往北方集团军群的有限兵力以莫斯科为目标，同时他再次

强调眼下的第一目标是乌克兰，严命军队协助对乌克兰的进攻。

希特勒把话说到这种程度，最高司令部不得不采取行动。实际上，对乌克兰的进攻取得了胜利，9月末，德军在基辅东面俘虏了60万苏军，接下来就轮到进攻莫斯科了。但是天不作美，雨季到来了，整个苏联的道路变得泥泞不堪，眼看着进攻速度慢了下来。并且雨季过后，曾令拿破仑一世吃尽苦头的严冬就要到来。如果考虑到天气问题，那么对莫斯科的进攻至少在8月之前就应该实施了。最高司令部曾考虑到这一点，但该建议后来被束之高阁。以莫斯科为目标的中央集团军群白白浪费了两个月，再次发动进攻时已经是10月2日了。进攻十分顺利，一个星期以后，德军的最前线已经距莫斯科只有130千米了。

可就算到这个时候，希特勒也没有把目标对准莫斯科。希特勒明确指示，在北方，只要还没把列宁格勒烧个精光，战斗就绝不许停止。他同时还命令在南方进攻乌克兰的伦德施泰特元帅越过罗斯托夫，一直进攻到注入里海的伏尔加河。由于战线扩大，非常遗憾地浪费了宝贵的战斗力，在德军士兵没有得到充足的冬服供应的时候，“冬将军”[注]到来了。

12月6日，苏军开始大举反攻。希特勒发出命令：全军“不许后退，维持现有战线”。这个命令根本无视牺牲者的数量，也没有考虑军队指挥官们的建议，可谓草率至极。拒不服从命令的军官一律免职，送交军法会议处置。率领南方集团军群的伦德施泰特进攻罗斯托夫失败，因命令部队后撤，司令官的职务被罢免。在莫斯科战线指挥装甲部队的古德里安也由于后退遭到了同样的处罚。

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提交了辞呈，希特勒在10天后批准。12月9日，希特勒宣布自任国防军最高指挥官。就这样，希特勒除了任国家元首（总统）兼总理，又把国防军最高指挥官、指挥作战的陆军最高司令官的职位攫取到手，“德国独裁者”的称谓可谓名副其实。

希特勒的无情命令致使德军付出了莫大的牺牲——既有被冻死的，

也有被苏军歼灭的。德军虽然还在苏联境内勉强支撑，但“巴巴罗萨计划”最后还是失败了。这完全是由于希特勒错误的形势判断以及据此做出的拙劣决策造成的。

日美开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7日（日本时间8日），被美国的资产冻结、石油全面禁运逼入困境的日本对夏威夷的珍珠港发动突袭。这也是苏军为保卫莫斯科而开始大反攻的第二天。由于珍珠港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欧洲地区扩大到了太平洋地区，结果迫使美国在两个战场同时进行正面作战。据说希特勒得到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消息时又惊又喜。为了使美国放弃参战的打算，他在当年春天会晤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时，曾力劝对方占领新加坡。

希特勒接下来的行动是和日本站到一起，也向美国宣战。根据1940年9月缔结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当日本受到来自第三国的攻击时，德国有援助日本的义务。从当时的情况看，德国并没有向美国宣战的义务，但是希特勒听不进内阁官员们“把美国变成敌国非常危险”的意见，他根本没有思考让美国晚一点参战对德国是不是更有利这个问题。

恐怕任何人都想象不到，两年半以后，美国会和英国携手并肩，实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登陆战。毫无疑问，希特勒的判断和日本的政治家以及部分军人一样，明显低估了美国的国力。也许，日军突袭珍珠港所取得的辉煌战绩也助长了他们的偏见。

这时，除了希特勒，对日美开战同样非常高兴的还有丘吉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包括法国陷落后的17个月里，只有英国一个国家在同德国和意大利战斗。由于希特勒进攻苏联，英国可以得到苏联这样的盟友，但胜负依然未定。尤其苏联是和英国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最值得信赖的，是英国的武器供给仓库，也就是同样说着英语的曾经的殖民地——美国。而且，丘吉尔的母亲是纽约银行家的女儿，丘吉尔体内也流淌着美国人的血液。他并非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据丘吉尔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丘吉尔得知日本突袭珍珠港后，立刻给罗斯福打电话，他问道：

“总统先生，日本怎么了？”

“日本攻击了珍珠港。现在我们终于站在同一条船上了。”

实际上，在此前大约4个月的8月9日，丘吉尔和罗斯福二人在纽芬兰岛的小港口阿根夏举行了后来称为“大西洋会谈”的秘密会谈。其成果就是8月14日公布的表述两国国策共同原则的《大西洋宪章》。

在纽芬兰岛阿根夏湾，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美国战列舰“奥古斯塔号”上举行了大西洋会谈（1941.8.9—1941.8.12）。在这里签订的《大西洋宪章》（1941.8.14）明确了和轴心国军队针锋相对的英美盟军的战争目的，为后来成立联合国铺平了道路。在罗斯福（前排左）和丘吉尔（前排右）后面，可以看到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欧内斯特·金、美国陆军马歇尔将军以及空军阿诺德将军的身影（Imperial War Museum）

在《大西洋宪章》中，美国甚至不顾自己仍是中立国的身份，写入了“击溃纳粹德国的专制政治”这种明显意欲参战的内容，这让丘吉尔非常高兴。对于《大西洋宪章》，欧洲，尤其是英国国民最初以为得到了美国的热烈支持，后来却发现它所表述的并不是真正的参战，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参战，于是变得失望。不过，由失望再次变为欢喜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

丘吉尔说：“这样事情的确就变得简单了。愿上帝保佑你们！”然后挂断了电话。现在美国加入了战争，满怀“我们会赢得战争”的感激与兴奋的丘吉尔高兴地上床就寝。

偷袭珍珠港引发同盟国成立

事实上，有一种“阴谋论”悄然流传着。即对美国而言，这次日本对珍珠港的攻击算不上突袭，根据破译的日军密码，罗斯福事先是知道日本将突袭珍珠港的。为了把对德宣战的消极国内舆论引到战争方向上去，罗斯福挑拨喜欢走歪门邪道的日本对珍珠港展开攻击，使得舆论就此发生变化。他故意让日本先开炮，为把国民引入战争状态，牺牲了珍珠港。（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中的阵亡者达3 500人。）

活跃在美军参谋部的马歇尔的亲信、战后荣升陆军上将的阿尔伯特·魏德迈也是如此判断的，因此这种说法的可信性相当高。在魏德迈的《第二次大战没有胜利者》一书中有如下记述：

> 这里所讲的是珍珠港遭袭前夕的事情。据华盛顿的海军通信部通信保障科科长L. F. 萨弗德海军上校对事件后成立的珍珠港调查委员会所述，1941年12月4日（美国时间），他们从多个不同的情报源获得了“日本攻击美国和英国，与苏联维持和平关系”的确切情报。两天后的12月6日晚9点，他们又获得了“日本政府将在随后下达的指定时间内发布对美宣战文告”的确切情报。12月7日上午10点15分，这次是来自陆军部通信情报处的消息，“日本的宣战文告将于华盛顿时间当天下午1点通告给国务卿”，也是确切情报。华盛顿时间下午1点正是夏威夷的黎明，而菲律宾还处于深夜。“已经知道日军的目标是夏威夷。”——据萨弗德海军上校的证词，柯雷曼海军上尉把来自通信情报处的密码破译内容加上了这样的补充说明，然后提交给了海军高层。

魏德迈的结论是，罗斯福有充足的时间通过广播向国民发出警告。他认为，这样的警告有可能令日本中止突袭行动，就算日军孤注一掷，美军也不至于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3 500名美国士兵的生命也不会陨落在夏威夷。

美国政府似乎的确注意到了珍珠港遭袭的可能性。据当时国务卿赫尔的《赫尔回忆录》，他从身在东京的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处接到情报："多位日本人说，如果日美开战，日军准备倾尽全力攻击珍珠港。"从国务院获知这一情报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斯塔克加进了"海军情报部认为这种说法的可信性很低"的解释，然后用电报将其发给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官赫斯本德·金梅尔。如果天真地理解，人们只能认为这是美国方面的一次粗心大意，但是采信"珍珠港袭击=罗斯福的阴谋论"的人却持有不同看法。如果让夏威夷的军人们得知真相，他们注定将进入警戒状态。如果夏威夷的日本间谍告知日军美军已有防备的话，那么日本对珍珠港的攻击就很可能中止。这样，让日本先开炮的策略就只好推翻重来，美国的参战还会进一步延迟。

奇怪的事情不止这些。日军攻击珍珠港前夕，根据斯塔克的授意，美国最先进的两艘航母"企业号"和"列克星敦号"被分别派往威克岛和中途岛，为陆军运送飞机而离港。留在珍珠港的只有"亚利桑那号"等旧型军舰。阴谋论者认为，海军部长威廉·富兰克林·诺克斯为保住昂贵的航母，得到了罗斯福的允许，让航母离港避难。

的确很难说罗斯福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长期追随他的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曾在日记中引用罗斯福这样的发言：

> 我就是个魔术师，右手和左手完全可以分别活动。比如即使对欧洲有着特定的政策，但是在北美和南美却可以毫不在乎地实施着完全相反的政策。我到处都是矛盾和错位。什么"为了取胜"之类的话都是胡言乱语。

总之，珍珠港突袭巧妙地突破了太平洋舰队的防守，以日本的全面胜利而告终。12月8日，罗斯福发表了“日本玩弄计谋欺骗攻击我们”的演说，在国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对日宣战文告。同一天，英国也宣布对日开战。由希特勒发动的欧洲大战，一下子扩大到太平洋，发展成了世界大战。

丘吉尔对美国的参战大喜过望，不过他还是有点担心。他担心美国倾注全力开展对日作战，却对同德国及意大利战斗的英国置之不理。

事实证明丘吉尔是杞人忧天。12月12日，第一次华盛顿会议召开。“德国是美英的主要敌国，只要击溃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将不得不投降”成为各参会国家所取得的共识，确立了“欧洲优先”的原则。

1942年元旦，《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发表。26个国家署名承诺在与轴心国的战争中绝不单独媾和。这一内容后来成为《联合国宪章》而广为人知，其实是有《大西洋宪章》做基础的。这26个国家是美国、英国、苏联、中华民国（中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波兰、南非联邦和南斯拉夫。就这样，同盟国诞生了。

---

1. “冬将军”是俄国地区极寒天气的拟人化，首次出现在1812年拿破仑进攻莫斯科失败后英国画家创作的讽刺画中。——编者注

领导者的确定

第三章

“伟大而平凡的人”艾森豪威尔的成长

——盟军的三次登陆战

艾森豪威尔登场，三次登陆战

1942.1.1 同盟国共同宣言

1.2 日军占领马尼拉

1.20 万湖会议（计划“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

6月 艾森豪威尔少将成为欧洲远征军司令，赴任伦敦

6.4 中途岛海战（6.6结束）

6.21 德军占领图卜鲁格（利比亚东部）

6.28 德军对苏军展开夏季大攻势

7.1 德军、意军占领阿拉曼

8.7 美军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

8.19 英军、加拿大军突袭迪耶普

9.13 德军包围斯大林格勒

10.23 阿拉曼战役开始（11.4英军获胜）

11.8 盟军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火炬行动”）

11.19 苏军从斯大林格勒开始反攻

1943.1.14 卡萨布兰卡会议（1.24结束。计划进攻意大利以及跨越英吉利海峡，要求轴心国无条件投降）

2.1 日军开始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

2.2 德军第6集团军投降（斯大林格勒攻防战结束）

4.18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阵亡

5.12 第三次华盛顿会议“三叉戟”（意大利战线计划、空袭德国、增强太平洋战线兵力）

5.13 突尼斯的德军、意军投降

5.27 法国抵抗运动委员会（CNR）成立

5.29 日军在阿图岛全军覆没

6.3 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阿尔及尔）

6月 确定登陆地点为诺曼底

7.4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战库尔斯克战役（8.27结束。也被称为“堡垒计划”）

7.10 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爱斯基摩人行动”）

7.25 墨索里尼被逮捕软禁

7—8月 盟军空袭德国汉堡

9.8 意大利无条件投降

9.9 美国第5集团军奇袭萨莱诺（“雪崩行动”）

1

艾森豪威尔登场

似乎与纳粹德国占领下的西欧毫不相干一样，在德军挑起战端的东部战线上，为营救意大利军队而投放在这里的德国非洲军和英国西方沙漠军队展开了拉锯战，东部战线再起战端。

其中崭露头角的是艾森豪威尔。他在北非和西西里岛成功组织了两次登陆。为准备即将到来的诺曼底登陆，他被提升为最高司令官。

围绕开辟第二战场的磋商

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英国外交大臣的爱德华·格雷这样对丘吉尔说：“美国就像一个巨大的锅炉，一旦点火就将产生无限的力量。”那么在欧洲的什么地方利用这巨大的锅炉来打击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呢？这是摆在盟军面前的迫切问题。

在东方，和希特勒对阵的斯大林为了缓解德军对己方的压力，多次敦促罗斯福和丘吉尔开辟第二战场。

那么在哪里开辟为好？对此，设在美国陆军参谋总部内的作战部进行了细致缜密的研究。该部门的第一任部长就是后来指挥诺曼底登陆作战的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当时他51岁，刚刚晋升为少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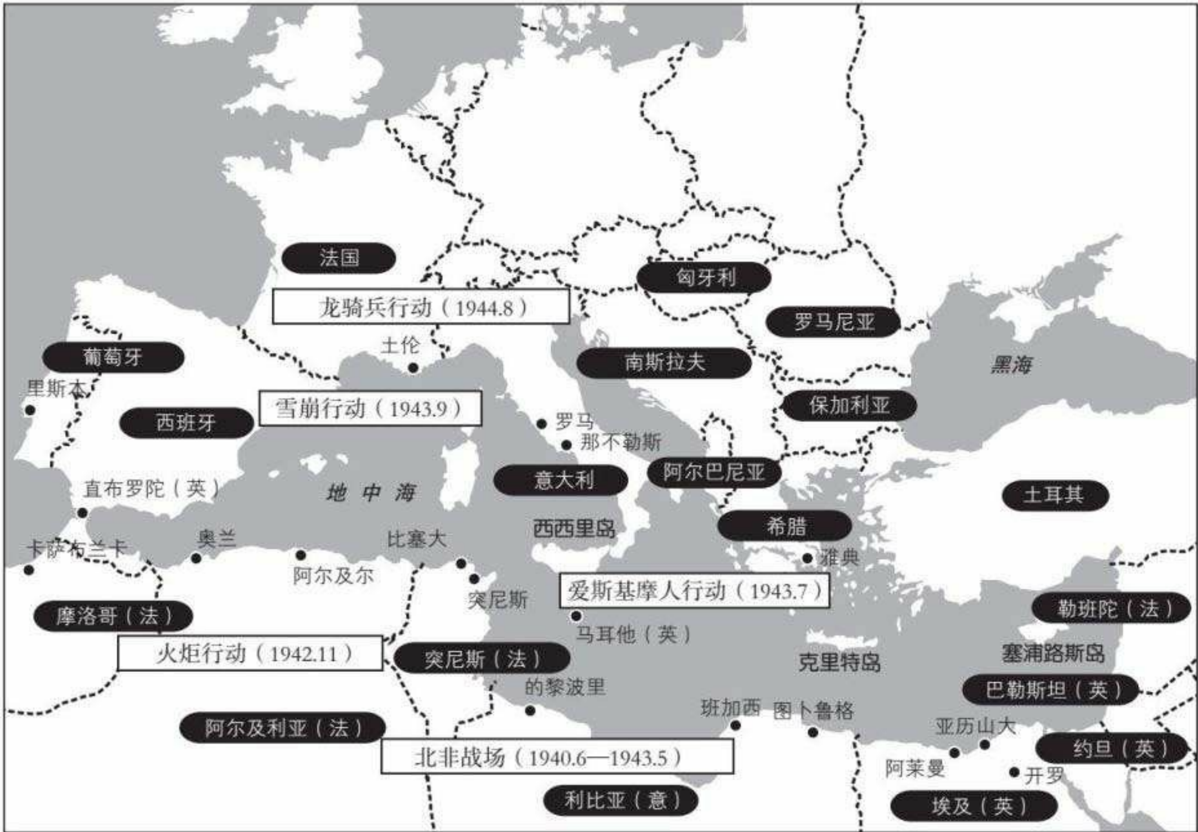


图3-1 东非和地中海战场形势

在作战部，各种各样的方案被提出来，然后又被排除。有方案提出把美军输送到苏联的东部战线，然后在那里进攻德国。但是由于美国距离苏联实在太遥远，这个方案显得很不现实，立刻就被排除了。有的方案经过商讨，如从挪威南下，以及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北上攻入法国，然而都是仅仅从海上和空中发起攻击而未使用陆军兵力，不能说是决定性的计划。

经过商讨，比较有希望的方案有两个。其中之一是从地中海进攻北非。该方案虽然在第二战场的选择中被否决，却在后文将要讲述的“火炬行动”中得以实现。

现在我们看一看非洲战场的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最早把非洲作为领土扩张目标的，是意大利的国家首脑、建立独裁体制的墨索里尼。1940年7月，意大利军队攻

入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肯尼亚和苏丹，并把前锋推进到国境附近。驻守在埃及的英军立刻做出反应。在“非洲之角”厄立特里亚、吉布提、索马里一带，英意两国一个月以来的小摩擦终于发展为正式的冲突，东非战事爆发。战场虽然扩大到埃及和利比亚，但到1941年2月，英军最终在利比亚东部的昔兰尼加打败了意军。

这时希特勒怀有深重的危机感：如果让英军在北非的势力这样扩大下去的话，德军在地中海将无法自由行动，前文所述的向苏联进攻的右翼（南方）也很有可能暴露在危险之下。

于是希特勒决定帮助在利比亚的意大利军队，派遣援军夺取昔兰尼加。直接受命的是埃尔温·隆美尔中将，他立即率领非洲军击溃了对手。英国士兵对隆美尔又害怕又钦佩，称其为“沙漠之狐”。

最后选定的登陆战方案

美国陆军作战部最终否定了从轴心国占领的北非经地中海向北进军的方案。北非距离德国实在太遥远了，这是一个无法突破的瓶颈。就算在北非战场取得胜利，从那里再攻向德国的心脏地带也必须在欧洲大陆上进行长距离运动，而途中还有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等崇山峻岭。

陆军作战部还指出，盟军不能接受失败的结果，要做到一剑封喉就需要把美英两军的所有力量都集中到一起。这样从安全角度上看，地中海并不是理想的集结地点。

最后剩下的方案就是从英国本土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法国北部，具体地点就是勒阿弗尔和加来附近的布洛涅。这个方案也可以说是诺曼底登陆战的原型。这样兵力可以集结到一处，也没有过于险要的天然障碍，且能迅速到达德国的心脏地区。这里距离美洲大陆也相对较近，物资和武器的补给也十分便利。

不过这一方案在一些资深军人里也有反对意见，他们担心无法突破要塞般的西欧海岸线。德军在这一地区加强了防御，使此处成为“大西

洋之墙”。此外，空中是德国空军的战斗队，海上是德国的舰队，海岸线附近还有很多U型潜艇严阵以待。并且，所有能想到的登陆地点都埋设了无数地雷。在很多军人看来，在如此万无一失的防御体系中前进完全是自杀行为。

对于这些意见，艾森豪威尔加以了反驳。他认为，只要按照下面设想的作战计划，不可能也会变成可能：首先以具备压倒性优势的空军力量把德国空军清除干净，同时用空袭来阻击德军对攻击地点的增援，使海岸线上的守敌陷入孤立；继而追杀U型潜艇，使己方的运输船队能安全简便地横渡大西洋，同时用海军的舰炮快速射击敌人的防守阵地；在此期间，用大量的登陆艇把陆军大部队送至海岸，攻击敌人的要塞并向内陆进攻。

在自己的著作中，艾森豪威尔这样写道：

> 我认为我们在战略思想上应该树立一个堪称全新信念的构想。这种构想就是陆空兵力一体化，空军协助地面作战，使双方的战果倍增……如果丢掉这种思考方法，那么整个计划不过是简单的幻想。

艾森豪威尔向提拔自己的参谋长马歇尔提出了这个方案。在耐心倾听了他冗长的说明后，马歇尔这样说：

“好的！我同意这个方案。”

经马歇尔的解释，罗斯福也没有反对。很快，受命于罗斯福的马歇尔和总统亲信霍普金斯前往伦敦，向英国方面讲解这一方案。这发生在1942年4月。

庶民之子“艾克”

艾森豪威尔昵称“艾克”，1890年10月14日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的丹尼

森，在七兄弟中排行第三。他的父母出生在德国，在17世纪的“30年战争”中，为逃避宗教迫害，族人前往瑞士避难，然后经荷兰，在1732年到达美国。

族人务农，他们的故乡是堪萨斯州的阿比林。此后艾森豪威尔的父亲迪彼得在当地经商失败，合作者又背信弃义，最后像逃难一样到了得克萨斯州。两年以后，一家人虽然回到了阿比林，但父亲的工作不稳定，一家人生活贫困。

父亲为人认真，感情很少外露；母亲快乐开朗，性格坚强。后来艾森豪威尔回忆：“我的父亲经历过两次失败。每当这时候，母亲只是带着笑脸，辛勤劳动。”母亲艾达恰似“女汉子”，她的信条是“不努力便一无所获”，经常用“不呛水就学不会游泳”“如果不愿为人生付出努力就去死吧”之类的话语教育孩子们。据说她是主张和平的虔诚的门诺派基督徒，一直为儿子成为军人而遗憾。

艾森豪威尔进了当地的高中，成绩中等，历史和英语的成绩不错，爱好体育运动。高中毕业后，为积攒学费，在乳制品工厂上夜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艾森豪威尔本来和二哥商定每年换班劳动，相互为对方提供学费，但在朋友的影响下，他的目标很快转向了不收学费的军校。他参加了美国海军军官学校（位于安纳波利斯）和陆军军官学校（西点军校）的入学考试，成绩均名列前茅。

不过20岁的艾森豪威尔没能达到海军学校的年龄要求，最后他进了西点军校。四年的学生生活里，他热衷橄榄球，是学校里的明星人物，但由于膝盖负伤，不能继续从事竞技体育，只好改做教练。第一学年结束，艾森豪威尔的成绩在212人中排在第57名，毕业时在164人中排在第61名。

毕业后他很快就成了步兵少尉，被派往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第19步兵团任职。在当地举办的一次派对上，他遇到了玛米·吉尼瓦·杜德，9个月后的1916年7月1日，两人结婚。

艾森豪威尔后来说自己从军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理由，如果一定要找原因的话，自己从小时候就喜欢阅读战争故事，也许受到了一些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屡次希望自己能远征法国，但最终没有实现。1918年3月，艾森豪威尔上尉被任命为科尔特营地（坦克部队的训练场）的指挥官。该营地位于宾夕法尼亚州，曾是南北战争时期激战的战场。当时几乎没有人了解新式武器坦克的相关知识，艾森豪威尔向部下深入地学习坦克及其作用，在这里所学到的，日后在诺曼底派上了大用场。

艾森豪威尔与巴顿

其后，他在米顿营地的步兵坦克学校遇到了年长5岁的乔治·巴顿。二人同为坦克战的开拓者，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们甚至把坦克拆解到螺丝和螺栓，反复进行各种试验，最后他们细致地研究坦克的设计，认为自动化的部队可以横跨整个美国。

与两位上司的缘分

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那样作为尖子生毕业，他的经历也十分平凡，甚至认为“只要能以上校的军衔退休就行了”。那么

他为什么能升任指挥“史上最大战役”的最高司令官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艾森豪威尔遇到了堪称“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上司。

他最早遇到的是福克斯·康纳少将。此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隶属美国欧洲远征军，是约翰·潘兴上将的作战参谋。艾森豪威尔少校当时30岁上下，是康纳少将的副官，在巴拿马运河一带驻防。

在康纳少将的指导下，从拿破仑、恺撒、塔西佗到马基雅弗利，从南北战争史到柏拉图、尼采、莎士比亚，艾森豪威尔博览群书，内容涵盖军事、哲学及文学等所有经典作品。尤其是他曾三次通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一些精彩内容甚至能倒背如流。艾森豪威尔也十分热衷战术方面的研究，当康纳提问时，他都能做出解答。

康纳多次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缔结的《凡尔赛和约》无法阻止新的世界战争，预言新的战争一定会在30年内爆发，世界将是多国联盟间的竞技场，美国也将不得不参战。康纳认为战争的胜负由后勤补给的水平决定，应该以统一指挥下的西方联军的胜利而告终。这些观点每每言中，证明康纳这个人物非比寻常。在他的指导下，爱好英语和历史的艾森豪威尔抓住了使自己才能得到绽放的第一个契机。

领导者肖像

福克斯•康纳
Fox Conner（1874—1951）

生于密西西比州，西点军校毕业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马歇尔一起得到约翰·潘兴上将的赏识，被派往欧洲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任作战参谋。

令他名扬后世的是，他发现了艾森豪威尔。人们评价他是一位优秀的师长，使艾森豪威尔的才能得以绽放。1919年初，他在米顿营地的步兵坦克学校遇到艾森豪威尔后，将其调到驻防巴拿马的第20步兵旅，三年时间里他令艾森豪威尔阅读了一个指挥官所必须了解的经典战史，以及通过实践系统地学习了命令的起草等技能。这种思想培养使艾森豪威尔获益匪浅。

U.S. War Department

1924年，康纳命他前往堪萨斯州莱文沃思的指挥参谋学校学习。艾森豪威尔兴奋之余又有些担忧：自己并没有掌握在那种学校里应该具备的专业知识，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潜质，如果考试总是不及格，岂不遭人

耻笑。得知他这种想法的康纳这样批评他："别说傻话！这两年多来，你不是每天都在记录我所发出的命令吗？那就已经足够了！"于是，艾森豪威尔重振精神，从入学开始就十分努力，毕业时在275名学员中排名第一。

毕业后，艾森豪威尔就任本尼克步兵团团长。后在退役的潘兴领导下，得到了国会创设的"美国战场纪念物调查委员会"（ABMC）的工作，前往巴黎。他跑了近3 000千米，详细调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还负责撰写委员会编辑发行的战场指南。这样的工作使艾森豪威尔对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地理有了全面、透彻的理解，对日后登陆作战计划的制订大有裨益。据说为了能和途中遇到的法国人真诚地对话，他总是红酒瓶不离手，尽管他自己一滴也不喝。

遇到麦克阿瑟

这样撰写的战场指南为他和下一个上司的相遇提供了契机。当时的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发现了他，召他到身边工作。美国当时正处于大萧条的高峰时期。1932年7月，3万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在首都华盛顿游行示威，要求当局提前支付本应于1945年支付的抚恤金，史称"退伍老兵镇压"事件。麦克阿瑟在其中发现了共产主义的影子，打算派出联邦军队进行镇压。其中率领骑兵团的是巴顿少校。

赫伯特·胡佛没能连任总统，当选新总统的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在参谋长身边，艾森豪威尔在做一个忠实部下的同时，也对其全力以赴的行事作风自叹弗如。麦克阿瑟的一切，艾森豪威尔无论好坏照单全收，尤其是从他那里学到了政军关系的知识。

卸任参谋长后的麦克阿瑟被聘为菲律宾政府的军事顾问，却并没有忘记关照艾森豪威尔，而是让他作为高级军事顾问一同前往马尼拉。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的密切关系前后大约持续了9年。

两个人之间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尖锐的对立，但是与康纳和马歇尔形成鲜明对比，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最终分道扬镳。麦克阿瑟这个人目中无人，野心勃勃，极度自大，对同事和部下绝不是一个亲近的人。后来艾森豪威尔和部下开玩笑时说：“就算给我50个麦克阿瑟，我也不会拿一个马歇尔去交换。”不过他紧接着又更正说：“我在胡扯些什么？！就是一个麦克阿瑟我不是也应付不了嘛！”

就任参谋长，才能绽放

1939年9月，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艾森豪威尔中校经由日本踏上回国的路途。据说当时麦克阿瑟没有反对他回国。究其原因，可能是相比于麦克阿瑟冰冷干脆的建议，菲律宾的曼努埃尔·奎松总统更重视其助手艾森豪威尔朴素务实的言语。总统并不认为麦克阿瑟富有魅力。实际上，奎松总统在艾森豪威尔回国之际，高度评价了他在菲律宾群岛的防卫工作，尤其是在空军基地的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功绩，并赠予他一份存入了10万美元的人身保险。

有志于指挥部队的艾森豪威尔回国后先担任了华盛顿州的步兵团团长，经任第3师参谋长，升任为上校，此后又任第9军参谋长，1941年6月被提拔为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司令部第3集团军的参谋长。美国第6集团军司令沃尔特·克鲁格是来自德国的移民，从普通士兵一直做到上将，可谓身经百战。正是他推荐了艾森豪威尔。

这次提拔的效果在两个月之后举行的接近实战的路易斯安那大演习中得以显现。克鲁格率领的第3集团军和本·利尔中将率领的第2集团军展开“激战”，漂亮地击败了后者。作为支配整个第3集团军的大脑，艾森豪威尔的名字第一次上了报纸。

3个多月以后，发生了日本突袭珍珠港事件。12月12日，即珍珠港事件5天以后，艾森豪威尔接到来自首都华盛顿的邀约电话。对方是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上校。正是这个电话，使艾森豪威尔后来不但在诺

曼底登陆战中，而且在整个欧洲战场都成为参谋长。邀请艾森豪威尔的是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不过两个人之间并没有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

马歇尔决定试探一下艾森豪威尔。袭击了珍珠港的日军早已轰炸了菲律宾马尼拉近郊的海军工厂。当见到艾森豪威尔并进行了20分钟的战况说明后，马歇尔这样问道："现在战争有可能扩大到整个太平洋，你思考过美军应该如何行动的问题吗？"

突然的提问令艾森豪威尔不知所措。迟疑再三他还是暂时告退，然后面对书桌陷入长时间的冥思苦想。恩师康纳曾对马歇尔毫不吝惜溢美之词："他是个天才！"对于这样的人，夸夸其谈的小花招和泛泛而谈的平庸见解都不会打动他。再次相见的时候，艾森豪威尔阐述了自己认为正确的见解。

"我们把充足的援军送至菲律宾固然很耗费时间，但这是应该做也是必须做的。因为不但菲律宾，同样面临日本进攻的中国、荷属东印度等国家和地区都在注视着我们的行动。为此我们应该首先保护在澳大利亚的基地。"

对于这样的回答，马歇尔只说了一句："我赞成你的意见。"很明显，艾森豪威尔的考试及格了。

领导者肖像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

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成功指挥了诺曼底登陆战。昵称“艾克”。很多人将其视为典型的美国人。坦率温和、平易近人。抽骆驼牌香烟，喜欢喝可口可乐，尤其喜欢西部片小说和扑克牌。

在富有人情味儿的朴实表现之下，是细致入微的智慧和严肃的伦理观念。在战争结束前夕，美军有一次用列车运送德军俘虏，到达目的地后打开车厢，发现130名俘虏因通风不良，在拥挤不堪的车厢内窒息而死。艾森豪威尔立刻命人进行彻底调查，并要求美国大使馆向德军高级司令部发出致歉信。可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处理方式。致歉信中说：“如果这明显是由于美军官员的疏忽所致，那么他们会受到相应的处分。最高司令官对这一事件深表遗憾，并采取措施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艾森豪威尔战后接替马歇尔成为陆军参谋长，后来拒绝了杜鲁门总统向他发出的竞选副总统的邀请，就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1950年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1953年就任美国第34任总统。

得益于马歇尔的提拔进入参谋部

马歇尔对部下的人事安排总是很公正。他讨厌推卸责任的人、工作懈怠的人、将粗暴和刚毅混为一谈的人、哗众取宠的人、过分夸大困难而不去积极克服的悲观论者等。对于那些强烈主张某些特定计划却对其成果缺乏自信的人，他也不会委以重任。不言而喻，艾森豪威尔非常符合他的用人标准。据说马歇尔经常拿着一个黑色的小本子，就是为了把正在考察的人的名字记在上面。

到了1942年，马歇尔为了备战改组陆军部。他在参谋部内新设作战部，用以取代以前的战时计划部，3月9日，艾森豪威尔就任第一任部长。从此艾森豪威尔就和本章开头所讲的内容联系了起来。几乎与人事升迁同时，他的军衔也晋升为少将。

如此看来，一个才能含而不露、工作一丝不苟的年轻人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行进在成功的台阶上。不过晋升并非一帆风顺。1916年7月他以中尉任职，1917年5月成为上尉，1918年6月成为少校，同年10月升为中校。只看这个过程的确堪称顺利，但这都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有“弹性晋级”制度，即在战时跳过正规的职级迅速晋升，艾森豪威尔升为少校和中校正是因为这种制度。实际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1920年6月，艾森豪威尔又返回到正规的上尉军衔。虽然几个星期后他成为少校，但他这个少校居然做了16年，当他再次晋升为中校时是1936年7月。此时他已经46岁，要想升为上校，机会非常渺茫。

这种“弹性晋级”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推行，美国陆军的人事只在这方面具有灵活性。其实巴顿也曾受益于这一制度。

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美国的参战改变了艾森豪威尔的命运。1941年3月，尽管又是“临时升迁”，但毕竟达成了晋升上校的夙愿。（据说此时他家里一片欢天喜地的景象。）同年秋天，他升为准将，次年3月升为少将，7月升为中将，到1943年2月他竟然成了上将（正式的军衔也从准将升为少将）。诺曼底登陆战半年以后升为五星上

将（正式上任在两年以后）。他仅仅用了3年10个月就完成了从中校到五星上将的升迁。尽管是临时升迁，但是在美国陆军史上也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一见的成功了。

领导者肖像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
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

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据说少时是个喜欢恶作剧的劣等生。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欧洲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作战处长，总司令约翰·潘兴上将的副官。

1939年9月1日，在德军进攻波兰的这一天，马歇尔就任陆军第15任参谋长，军衔也从少将升为上将，1944年12月成为五星上将。

马歇尔战后曾就任驻中国大使，1947年就任国务卿。由于“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的功劳，1953年以一名军人的身份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近乎顽固的马歇尔和平民色彩浓厚的艾森豪威尔完全不同，但他

们的经历却有很多相同之处。或许可以说，艾森豪威尔一直在跟随着马歇尔的脚步。

Dutch National Archives, The Hague, Fotocollectie Algemeen Nederlands Persbureau (ANEFO), 1945-1989

让我们看一看他得以破格晋升的工作状态吧。

1942年4月，在伦敦结束会议回国的马歇尔令刚刚就任作战部长的艾森豪威尔前往伦敦，任务是向驻在伦敦的美军军官们传达将英国本土变为最大的军事基地以横渡海峡的作战计划，同时带回关于美国远征军的编制建议等。

其时盟军拥有了4个大型作战计划，但英国允许美军驻扎和展开的“波莱罗作战”却是在那年1月才提出的。

艾森豪威尔5月中旬前往英国，停留了大约10天后回国，这样向马歇尔汇报：

“统率美国在欧洲驻军行动的人，不但必须通晓美国政府的各项计划，同时应该具备攻击作战时陆海空三军的武器补给以及物资生产方面的实用知识。”

几天以后，艾森豪威尔提交给马歇尔一份书面文件。上面详细记录了派往欧洲的美军统一司令部应该如何作为。马歇尔这样回答：

“指挥这一战役的可能就是你啊！”

这句话最后成了现实。3天以后，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美国陆军欧洲战区司令官。

在反攻行动上美英对立

1942年6月，艾森豪威尔到伦敦赴任之初，就着手具体组织对法国

北部的进攻。这次进攻被命名为“围歼行动”。英美两国在实施时间上达成一致，即1943年年初，艾森豪威尔也是这样打算的。

然而真正到了英国，接触到所有情报之后，艾森豪威尔发现其时实施登陆为时尚早，承担进攻作战任务的英国兵力和装备都有很大不足。推迟到1943年夏天也不现实，而从秋天到冬天海上的环境很危险，更不可行。这样一看，登陆时间只能推迟到1944年年初。

另一方面，斯大林在1942年年中几次要求美英两国开辟第二战场，如果到1944年还不能答应斯大林的要求，最糟糕的情况下，苏联会出现彻底溃败的可能。为避免这种事态，盟军参谋部商定了3种作战方案。

第一，绕道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给驻扎在埃及的英军输送援军，击溃隆美尔的德国非洲军，夺得地中海的支配权；第二，在非洲西北部登陆，横扫敌人之后向东进军，和埃及方面的英军共同夹击敌人，把整个地中海尽收囊中；第三，渡过英吉利海峡在法国西北部登陆，为接下来的大规模登陆作战建立桥头堡。

第一种方案，因“顺利增强驻埃及英军力量的概率很低”，首先遭到否决。剩下的两个方案，第二种被冠名为“体操选手行动”，第三种被冠名为“大槌行动”。英国倾向于前者，美国则支持后者。

美英两国分歧的背景在于两国的国情不同，对战争的思考方法也不一样，同时各种企图也都掺杂在里边。

英国是传统的海军国家，首先考虑的是利用机动性来打击敌人的弱点。他们想在德国分散兵力后，对其实施经济封锁和战略轰炸，最后再从欧洲大陆登陆，彻底击溃德国。英国之所以倾向于这种“间接战略”，也是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惨痛教训。当时采取正面攻击，尽管牺牲了100万以上的官兵，却没能击败德意志帝国。

而美国习惯于采取“直接战略”，直接突击敌人的痛点，认为应该在欧洲大陆直接登陆，这一目标以外的作战都是分散兵力，不应实行。这种考虑的背景，当然基于当时已经是世界第一的国力和经济能力。

英国支持“体操选手行动”还有一个原因：如果能够占领北非沿岸地带，地中海上的船只就能自由通航了。以前从英国本土前往中东只能绕道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如果能从直布罗陀海峡通过地中海，就能大大减轻海上运输的负担。仅这一点就可为英国带来不可估量的好处。而且这一作战行动一旦成功，就可以牵制日军在印度洋的活动，阻碍德军向黑海和里海之间的高加索地区南下，对确保中东安全也有极大贡献。

尽管如此，在实施“围歼行动”，即盟军大规模渡过英吉利海峡、攻入欧洲大陆、向敌人的心脏地带突击这一点上，两国是一致的。在这一行动的初期，应该先实施“大槌行动”。这是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的第一主张。与此相对，英国方面则以“大槌行动”会用尽为“围歼行动”而准备的重要资源为理由加以反对。

尤其是丘吉尔认为，要确保“围歼行动”成功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作战行动本身的规模要大，一个是德军的士气要低落。条件的成熟需要充分的准备和时间上的等待，宝贵的兵力不应该被浪费在其他事情上。

美国方面也有强硬意见。如果英国坚持实施“体操选手行动”，那么就应该在欧洲的“工作”完成之后，倾尽全力发兵太平洋，和日本一战。这种意见也被传达给英国。

尽管如此，英国方面决心已定。7月21日，丘吉尔的战时内阁全票否决“大槌行动”，通过了“体操选手行动”。罗斯福很快认可了英国的方案，不再坚持马歇尔等人的意见，决定采取“体操选手行动”。总统虽然是美国陆海军的最高司令，但也要综合两国军队的意见，因此最终同意了同盟国英国的做法。如果此时美国固执于“大槌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走向就有可能出现巨大变化。左右历史的决策其实就是瞬间之事。

“体操选手行动”（的初始方案）是丘吉尔在1941年末第一次华盛顿会议期间提交给美国方面的，罗斯福虽对这一方案怀有善意，无奈遭到军方的反对，结果没能实现。

如今这一方案的复活令丘吉尔十分高兴。7月30日，他将一个更加

生气勃勃的名字“火炬”赋予这一作战行动。为对美国方面的让步表示敬意，英国邀请了美国人来担任总司令。接受这一职务的，正是马歇尔提拔起来的艾森豪威尔。

2

盟军的三次登陆战

盟军对德国的反攻终于要付诸行动了。

北非登陆战首先打响。将德国非洲军驱逐后，他们横渡地中海，对西西里岛大胆地实施第二次登陆战。当看到盟军在意大利本土登陆后，艾森豪威尔前往英国，着手准备史上规模最大的登陆战。

盟军最早的登陆战“火炬行动”

“火炬行动”的目标登陆地点有三处：位于大西洋沿岸的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位于地中海沿岸的阿尔及利亚——奥兰以及阿尔及尔。

由美军负责进攻卡萨布兰卡和奥兰，阿尔及尔则是美军和英军合作。美军的份额之所以更多一些，是因为罗斯福提出了意见：“英美两军同时登陆会有碍身在非洲的法国人的心情，有招致全面抵抗的风险。”

登陆部队的兵力总计大约65 000人，以卡萨布兰卡为目标的大西洋沿岸登陆部队由巴顿少将指挥。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巴顿和艾森豪威尔两个人是老朋友。艾森豪威尔亲自选择了巴顿，然后上报给马歇尔最后做出这个决定。

负责进攻奥兰的中央机动部队的指挥官是美国人劳埃德·R.弗雷登道尔少将，而攻向阿尔及尔的东部机动部队为显示部队全都是美国人，

特任命美国人查尔恩·赖特少将为指挥官，占领阿尔及尔市区以后，英国人肯尼斯·安德森中将接替了指挥官职务。

“火炬行动”的成败还系于能否拉拢将西北非作为据点的维希政府。如果他们拒绝盟军在非洲登陆，盟军就将面临巨大困难。实际上，法国维希政府有14个师部署在登陆地区。因此，在实施行动的几个月之前，艾森豪威尔就通过驻在北非的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墨菲仔细了解当地政情。

登陆的具体时间被确定在1942年11月8日凌晨1时。艾森豪威尔于11月5日乘坐飞机，从伦敦前往英领直布罗陀。这是盟军在欧洲大陆西部，以及地中海马耳他岛以西的唯一据点。这里设置了“火炬行动”最早的司令部，拥有一座可供掩护船队的战斗机起降的小型机场。

11月7日午夜，第一批船队通过了直布罗陀海峡。艾森豪威尔和几位部下一起，在海岸上注视着登陆船队——没有遇到德军的轰炸和潜艇的攻击。正如盟军所预料的那样，德军虽然侦知了大规模船队的存在，却误以为对方的目的地是马耳他岛。

对维希政权的将军们游说

11月7日下午，在直布罗陀司令部的地下室里，艾森豪威尔和一位法国人四目相对。对方是从德国的战俘营逃脱、却被维希政府拘禁在法国南部的亨利·奥诺雷·吉罗将军。艾森豪威尔认为，如果吉罗能率领北非的法国人部队，德国傀儡维希政府中很可能出现起义，可以为盟军带来很大好处。

可是吉罗怎么也不肯点头。他声称为了自己和祖国法兰西的荣誉，决不屈就低于总司令的职位，关键是必须由自己取代艾森豪威尔，才肯投入战斗。两个人的讨论一直没有进展。到了第二天早晨，艾森豪威尔提出，如果登陆能成功取得法军的支持，那么可以让他做民生长官。吉罗终于同意了。

各处登陆成功的消息被陆续送到司令部。阿尔及尔几乎没有遭到敌人的反击就占领了。盟军在奥兰虽然受到法国海军的顽强抵抗，但美军第1师骁勇善战，在11月10日结束了战斗。

登陆的次日，艾森豪威尔令副司令马克·克拉克少将陪同吉罗经空中航线紧急赶赴阿尔及尔。在那里吉罗通过广播，向北非的法军呼吁立刻停止对盟军的抵抗。但是很遗憾，吉罗呼吁的效果几乎为零。因为吉罗早已是过时的人物，对非洲的法国人没有任何影响力。

正当得知结果的艾森豪威尔在司令部里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得到报告，法国海军总司令弗朗索瓦·达尔朗正在阿尔及尔。他到阿尔及尔是为了看望生病的儿子，和盟军的进攻毫无关系。正是他拥有对北非法军下达命令的权力。而法军指挥官们发誓效忠于贝当元帅，所以除了利用这位贝当的忠实部下之外，的确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

但是，这是在和维希政权，也就是与德国相通的敌方展开对话，可以预料会遭到美英国内的反对，但是艾森豪威尔为了打开局面，决定毫不犹豫地执行。

与此同时，希特勒为了报复盟军登陆北非，侵入法国南部。达尔朗见此情景，决心归属盟军方面，于是在停战命令上签下了名字。当地的法军遵从他的命令，以卡萨布兰卡为中心的西海岸停止了战斗。11月13日，盟军和以达尔朗为首的法军缔结了停战协定。

盟军夹击轴心国军队

在确保了计划中的三处登陆地点之后，盟军立刻向东开进。目的是与在埃及的哈罗德·亚历山大上将率领的英国第8集团军相互配合，共同夹击德国和意大利的轴心国部队，把地中海夺回到盟军手中。

在“火炬行动”实施前的10月23日，隶属英国第8集团军、由伯纳德·蒙哥马利中将指挥的坦克部队在阿拉曼进攻隆美尔率领的轴心国军队。经过12天的激战，敌人溃败，向沙漠以西撤退。好运的天平很明显地向

盟军倾斜了。

当时轴心国军队在非洲最重要的港口是突尼斯北部的突尼斯港和比塞大港。11月中旬，盟军开始向这两座港口城市发动进攻，但是要想占领港口看来还需要很长时间。个中原因较为复杂。且不说从阿尔及尔远道而来的英国第1集团军物资供给机制偏弱，轴心国军队从西西里岛通过空运补给物资，恶劣天气一直持续等原因，单说这两座港口城市的机场即便在雨天都能起降飞机，因此敌机一直不停地轰炸战场，就足以让盟军头疼不已了。

此时还发生了一起出人意料的恶性事件：12月24日，达尔朗在阿尔及尔遭人暗杀。20岁的杀手经过审判很快就被枪决了。

直到第二年的1943年5月7日，比塞大和突尼斯才分别落入美军和英军手中。隆美尔病倒，于3月9日动身回国。

这次胜利对盟国人民来讲可以说是最好的礼物。1943年2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惨败，盟军由撤退转为进攻，无论是谁都能看出这是一个转折点。

艾森豪威尔这样回忆这次战役：

> 这次胜利的显著成果之一，就是使盟军的相互协作更加紧密，指挥系统也得到确立。在盟军这里，很容易看出装备的差异，以及训练、思考方法、参谋部的组织结构的不同；可是这些差异完全无法与国家间的傲慢和偏见造成的分歧相比。……这个问题微妙而重大，当然政府和前线的首脑都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形势，所以他们将“公私两方面的通力合作”这一不可破坏的根本方针视为首要任务。

对艾森豪威尔而言，所有的道路都通往诺曼底。

英国执意控制地中海

罗斯福和丘吉尔带领军政首脑们聚集在仅仅两个月以前还是战场的卡萨布兰卡。从1943年1月14日到24日举行了卡萨布兰卡会议。虽然突尼斯境内的战斗尚未结束，但以“火炬行动”为开端的北非战事结束后，需要再次推敲接下来要做的事。艾森豪威尔也在百忙之中抽出一天时间参加了会议。

很快，美英两国就两个问题达成了一致：全力打击大西洋上神出鬼没的德国U型潜艇，以及加大对德国中部工业地带的全面空袭。问题出在地面战场上。

英国陆军总参谋长阿兰·布鲁克代表英国方面阐述了意见。英国认为，作为轴心国军队的据点，西西里岛距离意大利和非洲都比较近，应该把“火炬行动”的战果扩大到整个地中海。这样德国的兵力将不得不分散，盟军可以获得三大好处。

第一是德国对意大利的援助会减少，意大利将不得不投降。这样一来，一直保持中立的土耳其将加入盟国。第二是可以减轻苏联的压力。对此斯大林的确是举双手赞成。

在苏德军一旦兵力不足，对于将来从法国向欧洲大陆进攻的“围歼行动”也同样有利，这是第三个好处。德军在东西方向上交通便捷，从苏联战场可以同时向法国运送7个师，而南北方向的交通则不便，从意大利和希腊只能同时向法国运送1个师。攻占西西里应该能使德国强化其南北交通，结果会分散其应对“围歼行动”不可或缺的东西交通上的兵力，有望达到削弱对方的效果。

英国空军的查尔斯·波特尔上将还补充了理由。他说：“如果我们对地中海置之不理，只是在这里专心致志地准备进攻法国，那么德国就会猜到我们的意图，从地中海撤离大量飞机去加强防御法国北部，这不但对‘围歼行动’的实施很不利，而且关系到德军在苏联战场上的强弱。”

第二个登陆战“爱斯基摩人行动”

针对英国的意见，美国方面也据理力争。他们提出：“我们的核心是坚决在法国北部登陆作战，地中海的作战行动不应该和它重复甚至取代它。”美国以此作为前提，有条件地支持英国方面的意见。作为“火炬行动”的后续行动，对西西里岛的登陆战被命名为“爱斯基摩人行动”，艾森豪威尔被选为总司令。

由于翌年的诺曼底登陆，人们对“爱斯基摩人行动”印象不深，但是它在当时已经是史无前例的登陆战了。在这次登陆行动中，16万官兵、600辆坦克、1 800门大炮、1 400辆卡车被装载在包括登陆艇在内的3 000艘舰船中。

艾森豪威尔把司令部设在了阿尔及尔，从1943年2月开始制订作战方案，确定指挥官的人选。

“火炬行动”由于考虑维希法国的情绪而由美军主攻，这一次面对意大利就由英军主攻，因为在负责此次作战行动的部队里面，英军规模占优。尽管最高司令由美国人艾森豪威尔担任，但陆军的整体指挥却由英国人亚历山大上将负责。陆军部队是由巴顿麾下的美国第7集团军和蒙哥马利率领的英国第8集团军组成的第15集团军群，空军由英国上将阿瑟·特德指挥，海军同样由英国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负责指挥。

巴顿率领的第7集团军的登陆地点在杰拉附近宽达100千米的南方海岸，而蒙哥马利率领的第8集团军则是从锡拉库萨向南宽约50千米的东方海岸登陆。计划登陆日期在7月10日。为削弱敌军力量，在计划登陆的一个星期以前，他们开始对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机场进行轰炸。

图3-2 西西里岛

7月8日，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上将、坎宁安上将一起转移到马耳他岛。打头阵的是美国第82空降师的滑翔机部队。艾森豪威尔站在一个

小山丘上，注视着从天空划过的滑翔机。后来得知，这些滑翔机有1/3以上降落在错误的海面上，机上人员大多淹死了。由于拖带滑翔机的美国领航员不小心，在时间上犯错，提前令滑翔机飞离，结果遭遇强风，也有损失。

尽管出现这么多事故，但登陆行动还是像计划中的那样成功实现了。幸运的是敌人也有失误，他们以为如果盟军登陆，目标地点肯定是临近北非的西海岸，所以就在那里集中了兵力。

而盟军登陆后的目标是西西里岛东北部城市墨西拿。敌军所有从本土运送来的补给全都需要经过这里分发给岛上的防守部队，一旦这里失陷，胜负就基本确定了。

虽然蒙哥马利一登陆就迅速占领了锡拉库萨，但其后却难以为继。不但在沿着海岸向北进军卡塔尼亚的过程中遭到了敌军的顽强抵抗，而且到了7月17日以后埃特纳山方向也前景不明。虽从山腰远眺尚可，但其实敌人筑有要塞，无法轻易接近。蒙哥马利分兵一部向西挺近，对敌人形成包围态势，但是进展并不顺利。

此时，巴顿却向西西里岛的中心地带顺利进军。巴顿擅长直线攻击的战法，他的迅猛进攻极大地打击了以意大利军队为主力的敌人的士气。

大刀阔斧的巴顿此时高歌猛进还有其他原因。“爱斯基摩人行动”是蒙哥马利主导的战役，若占领墨西拿，他便会得到胜利的桂冠，而巴顿率领的第7集团军的任务是助攻，居次要地位。但是此时蒙哥马利进军受阻，巴顿就想自己抢在蒙哥马利之前攻下墨西拿。他对蒙哥马利怀有强烈的忌妒之心。

一对冤家——巴顿和蒙蒂

在北非战场，包括西西里岛，巴顿和蒙蒂（蒙哥马利的昵称）都是相互竞争的野战军指挥官。甚至在诺曼底登陆战中，这对美英两国的竞

争对手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二人的性格和为人，乃至作战方法都对比鲜明。巴顿是喜欢使用简单、强硬、粗鲁语言的“野人”，其战法也是大刀阔斧；而蒙哥马利则是一个顽固的、爱挑剔的家伙，其作战方法极为克制内敛，甚至随军记者们也时常评价他“过于谨慎”。他不但计划周详，准备严密，并且充分考虑士兵们的士气，从而发出细致的指示，总能按照计划逐步稳妥地围困住对手。

领导者肖像

乔治•巴顿
George Smith Patton Jr.（1885—1945）

巴顿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富裕军人之家，祖辈参加过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巴顿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后进入西点军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巴顿曾在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代表美国参加新设的现代五项全能比赛，获第五名。擅长击剑和骑马，曾留学法国。设计了骑兵用的马

刀。爱出风头，戴着一顶独特的钢盔，腰挎特制的象牙柄手枪。

骑兵出身的巴顿曾在潘兴将军麾下于墨西哥国境附近追剿潘乔·维拉等叛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关注坦克部队，经历过法国战场。晋升少校后在法国的朗格勒高原创立了美国陆军最早的坦克学校。

US Army Center for Military History

那么，二人在西西里岛后来的“战斗”是怎样的呢？

7月17日，在突尼斯举行的作战会议上，巴顿向陆军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建言攻占西西里岛西北海岸的巴勒莫，得到批准。巴顿率领美国第7集团军4天突进160千米，7月22日成功占领巴勒莫。然后马不停蹄，沿着西西里岛北岸快速进击。他试图援救在埃特纳山麓进退两难的蒙哥马利，然后乘势进占墨西拿，拔取头筹。

领导者肖像

伯纳德·蒙哥马利
Bernard Law Montgomery（1887—1976）

生于伦敦，父亲是牧师。在贵族出身居多的英国陆军中绝算不上出身高贵。虽进入了陆军军官学校，却因品行不佳而延迟毕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排长，曾身负重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率第3师进入法国，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负责最艰难的殿后而奏功，晋升为军团指挥官。1942年8月作为第8集团军司令官进入北非，同年11月在阿拉曼战役中击溃了隆美尔的德国非洲军，被奉为国民英雄。

尽管具备极高的军事素养，但他脾气暴躁，目空一切，喜欢隐藏自己的目的。

然而巴顿的计划并没有顺利实现。尽管在英国第8集团军正西面的特罗伊纳进行的战斗才是整个西西里岛战役中最激烈的，但巴顿并没有击溃敌军。

这时发生了一起糟糕的事件。在巴顿视察前线野战医院时，他问一名士兵："你感觉哪里不舒服？"对方回答："我害怕打仗，受不了了！"也许是战斗受挫、心情不好所致，血气上涌的巴顿突然伸手打了这名士兵一记耳光。6天以后，在另一所野战医院，又出现了类似的对话，巴顿又动手掌掴士兵。这是第二次了。一个耳光造成士兵的头盔带子断裂，头盔都滚落到旁边的帐篷里去了。而且巴顿还手握枪柄，对瑟瑟发抖的士兵吼道："好了，你给我滚回前线去！可能你会死在那儿，可你也必须战斗！如果你不服从命令，就靠墙站着，我让人枪毙你！"

野战医院认为巴顿的行为存在问题，于是写报告呈送给美国第7集团军军长奥马尔·布莱德雷中将，可是布莱德雷一直默不作声。亚历山大上将也收到了报告，但他认为这是美军的内部事务，因而没有采取任

何措施。事情似乎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8月17日，盟军终于进入墨西拿。巴顿指挥下的美国第7集团军第3师比蒙哥马利的坦克队先到了几分钟。两个小时后，身着正装的巴顿意气风发地出现了，与意大利第8集团军第4装甲师师长约翰·塞西尔·卡利准将相互握手。此时的巴顿万万想不到，几天前的殴打事件已经发展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

“爱斯基摩人行动”的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此时正在突尼斯，他从医院处收到了关于殴打事件的报告。当巴顿进入墨西拿时，后来成为军医总监的雷蒙德·布雷斯这样对艾森豪威尔说：

“如果这件事传到外面去，巴顿恐怕将承受舆论的沉重压力，所以我们决不能让它传出去。对于接下来不得不进行的欧洲战役来说，巴顿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人。”

艾森豪威尔给巴顿写了信，信中对巴顿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然后命令他向被殴打的两名士兵以及在场的医务人员致歉，在其他师的军官以及士兵代表面前发誓今后再也不会发生类似事件。

巴顿立刻回了信，表示坚决服从艾森豪威尔的命令。事件似乎到此告一段落，可是又向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一个媒体从业人员通过广播揭露了整个事件的全貌。结果舆论大哗，甚至出现了“将巴顿交给军法会议”“剥夺他的军籍”的声音。巴顿自己也无可奈何，意志消沉。此时就连艾森豪威尔也没法袒护他了，巴顿被解除了第7集团军司令的职务，被送往英国。

意大利战败，日本受困，苏联反攻

“爱斯基摩人行动”绝不仅仅是占领西西里这个岛屿。在战斗最激烈的7月24日，意大利国家总理兼元帅墨索里尼因其作战水平问题受到大法西斯议会的强烈批评，尤其在放任盟军进攻西西里这一问题上更是饱受诟病。翌日，墨索里尼被意大利国王罢免，遭到逮捕，长达21年的墨

索里尼独裁统治到此落下帷幕。

9月3日，占领了西西里岛的盟军渡过墨西拿海峡攻上意大利本土。9月9日，盟军突破了德军的猛烈攻击，在那不勒斯附近的萨莱诺湾登陆，这就是“雪崩行动”。这是艾森豪威尔实施的第三次水陆联合的登陆战。由于德军的强烈抵抗，登陆部队遇到了极大困难，但英军立刻把剩余的空军和海军兵力派了上去，最终获得了胜利。9月8日，顶替墨索里尼组织政府的彼得罗·巴多利奥元帅无条件投降。

艾森豪威尔这样总结西西里之战：“前线的英军和美军士兵感情日渐深厚，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越发协调，二者的合作精神更加稳固，司令官和参谋人员此前的烦恼已经一扫而空。现在，等待英美发挥合作精神的敌人只剩下德国了。”

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太平洋。自突袭珍珠港后，日军取得了丰硕战果。1942年1月2日，日军攻占了菲律宾的马尼拉。艾森豪威尔曾经的上司麦克阿瑟退守澳大利亚。可是，日本由于版图急剧扩大，在6月4日开始的中途岛海战中惨败，初始的攻势仅仅维持了半年时间，此后美军开始逐个夺取被日军占领的岛屿。8月，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日本守军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处境。

另一方面，自1941年6月以来一直苦苦支撑的苏联终于迎来了反攻的机会。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取得了胜利。1942年8月23日，德军向斯大林格勒投掷了1 000吨炸弹，保卫战延续了整整150天。9月中旬，包围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冲入市区，隐藏在废墟中的苏联狙击手开始狙杀德军军官。被破坏殆尽的街区埋葬着苏联人的尸体，如果算上失踪的人，苏联军民合计有超过50万人牺牲。

到了11月，苏联开始大举反攻。规模达100万人的军队包围了斯大林格勒。前一年在莫斯科为苏军带来胜利的严冬再次降临。没有充足的防寒衣物，经过地狱般的3个多月，1943年2月，德国第6集团军司令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元帅麾下规模超过10万人的轴心国军队投降，成为俘

虏。同年夏天，在苏联西南部进行的库尔斯克战役，双方共投入了6 000辆以上的坦克，被称为“历史上最大的坦克战”。受此时进行的西西里登陆战的影响，德军止住了攻势。就这样，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日逐渐迫近。

其后，1944年6月，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转折点。6月6日，实施诺曼底登陆作战，两个星期后的6月22日，苏联在白俄罗斯发动了最大的反攻战“巴格拉季昂战役”。在这次战役前不久，6月19日，日本海军在马里亚纳海战中败北，联合舰队失去了大部分主要舰船和飞机，日本的败象越来越明显。

第四章

内阁官员们的战略和领导力

——登陆欧洲本土的“霸王行动”

从登陆意大利本土到“霸王行动”

1943.1.14 卡萨布兰卡会议

3.13 英国陆军的摩根中将就任于盟军特别计划参谋部

5.12 第三次华盛顿会议“三叉戟”（5.27结束）

8.17 魁北克会议（把“D日”定在了1944年）（8.24结束）

9.3 盟军登陆意大利本土

9.8 意大利临时政府和盟国缔结停战协定

9.12 德军特种部队救出墨索里尼（9.23成立萨洛社会共和国）

10.13 意大利对德国宣战

10.18 第三次莫斯科会议（11.1结束。发表《莫斯科宣言》）

11.6 苏军解放基辅

11.22 第一次开罗会议（11.27结束）

11.28 德黑兰会议（12.1。将“D日”定于次年5月1日，开辟第二战场）

12.2 第二次开罗会议（12.7结束）

12.20 盟军轰炸德国不来梅

12.24 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诺曼底登陆战的最高司令官（12.6内定）

1944.1.16 艾森豪威尔就任盟军总司令官

1.22 盟军在罗马近郊的安齐奥登陆（“鹅卵石行动”）

3.8 日军开始英帕尔战役

4.10 苏军占领敖德萨

6.3 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6.4 盟军进入罗马（“皇冠行动”）

6.6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霸王行动”）

1

迪耶普的教训

英美两国的参谋们成立联合机构，开始选择开展欧洲大陆登陆战的合适地点。

他们渡过了英吉利海峡，就多个条件进行对照比较，结果诺曼底成为首选。综合考虑之后，决定在1944年5月1日之前实施登陆。

负责支援登陆的空军和海军制订了缜密、统一的计划，登陆后的主角陆军也确定了内部的任务分配。

从前一年春天就开始准备的大陆登陆战

“火炬行动”的顺利实施，使得在1943年年中开展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大陆的“围歼行动”变得十分艰难，然而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对这一行动都绝没有放弃。对这一行动特别热衷的是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他从美国参战之初就一直坚持欧洲优先，认为击败德国最重要。在1943年1月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他力陈应尽早任命进攻欧洲大陆的最高司令官，同时判断等待这种人事安排将太迟，说服英国方面为制订当前登陆战役的实施方案成立联合机构。

联合机构被命名为“英美计划参谋部”，由英国陆军的弗雷德里克·E.摩根中将负责组织。在3月13日召开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上，摩根被任命为盟军最高司令官的参谋长。从那以后，摩根中将就被称为盟军最高司令参谋长（Chief of Staff to 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COSSAC）。副参谋长由美国陆军雷·W.巴克准将担任，其下是美国海军代表、英国

陆军代表、加拿大陆军代表等，参谋部设在伦敦。

摩根麾下的参谋人员开始寻找适合登陆的地点，一个不漏地调查欧洲沿岸各地。

除了盟军最高司令参谋长，早在1941年，盟军司令部就开始探讨渡海进攻的问题，早早地设置了兼职人员，仔细研究了可供登陆的地区。他们从是否便于空中掩护、敌军是否有机场、海上威胁、港口和防御工事状况如何、海岸是否适合登陆等各种角度细致考察候选地点，结果发现，除了登陆时便于空中掩护，接近敌军机场、可以作为登陆部队深入内陆时的据点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而且，他们还指出了为运送兵员和后勤物资，在登陆作战初期就夺取相当规模的港口的必要性。

那么真的有符合这些条件的海岸吗？

荷兰海岸无法使用战斗机进行充分的空中掩护，比利时海岸的所有候选地点也因容易遭到敌军攻击而被排除，距离英国最近、面对多佛尔海峡的法国加来虽然在地理上正合适，但敌人的防御工事十分坚固，定为大规模登陆战的实施地点并不现实。最后剩下的是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沿岸地区。这里唯一的缺点是没有大型港口，不过如果把拥有瑟堡港的科唐坦半岛东侧也并入作战地域的话，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盟军最高司令参谋长着重参考了盟军司令部的这份资料，决定把诺曼底作为登陆战的第一候选地域。

他们制订的计划内容是：最初的登陆由3个师负责，然后由8个师继续深入，两个星期内占领瑟堡，同时组织“别动队”（特别行动队）在法国南部登陆——这就是后来改称“霸王行动”、在诺曼底沿岸地区实施的登陆战的雏形。

迪耶普登陆突击战

盟军最高司令参谋长制订的作战计划并不是一份闭门造车得来的计

划——盟军在位于敦刻尔克西南约150千米的海滨度假小镇迪耶普进行了一次堪称“彩排”的突击战。盟军虽然惨败，但是从这次失败的经验中获得了很多教训，对制订真正的登陆计划大有帮助。

1942年8月19日，也就是讨论经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大陆以及北非战场的第二次莫斯科会议结束两天之后，英属加拿大军队登陆迪耶普，突袭德军。这次战役被冠名为“银禧行动”，意思是狂欢佳节。

迪耶普曾经是法国最大的港口。1066年，诺曼人组织舰队从这里出发，进攻不列颠岛。这里即所谓“诺曼征服”的出发地。英军发现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防守人员不足，于是展开突袭。

作战行动的最高负责人是联合作战部的路易斯·蒙巴顿伯爵。他后来任东南亚地区的盟军总司令，在缅甸与日军作战。

主力部队是隶属加拿大第2集团军的两个师与第14坦克团，共5 000人。他们是一支志愿军，为援救宗主国，千里迢迢来到英国，已经在英格兰南部训练了两年。此外还有约1 000名特种部队、英国突击队队员和40名美国突击队员。

当最后决定实施行动时，面对心怀疑虑的丘吉尔，蒙巴顿的上司、英国总参谋长阿兰·布鲁克这样说：

“保证成功的行动不具实施意义。正因为不能切实地预料结果，我们才决定实施这次战斗。”

丘吉尔下意识地说：“我不想用不幸去换取教训。”

布鲁克这样回答：“如果这样，我们只能放弃在法国登陆的想法。不通过这种规模的战斗来测试我们的计划，没有一个经过修正的过程，只要是一个负责任的将军就不会实施这种方案。”

话说到这种地步，丘吉尔也只好认可。“银禧行动”被定在潮汐合适的7月4日以后，但是由于天气不佳几次推迟，直到8月18日才真正实施。

从巨大牺牲中得来的教训

当夜，突击部队从英国的4个港口出发，黎明时分到达了迪耶普。由于盟军无线电通信遭到窃听等原因导致情报泄露，德军的准备可谓万无一失，从一开始盟军——尤其是负责正面攻击的加拿大军——就陷入了极为惨烈的战斗。从登陆艇下来到接近海岸的过程中，士兵不得不冒着猛烈的炮火，用驱逐舰应对也几乎不起作用。就算十分幸运，勉强达到了海岸，又遭到德军士兵的精准射击。好不容易上岸的英国“丘吉尔”坦克也因岸边的乱石和陡坡无法继续前行，进退两难，结果全军覆没。

登陆部队的指挥官在驱逐舰中指挥作战，在对前方情况不甚了了的状态下，仍然命令后续部队继续登陆，这也加剧了混乱。

在空中，英军也不是德军的对手：英国空军损失了106架战机，而德军的损失还不到一半，只有48架。

唯一拿得出手的战果来自两翼的突击部队。直到上午9点，总司令约翰·哈密尔顿·罗伯茨少将才下定决心命令全线撤退，到下午1点才撤退完毕。

从开始突击到撤退完毕只有9个小时，在参加作战行动的6 000名军人中，安全返回的不过2 500人。其中加拿大军队的损失尤为惨重：参战的4 963名加拿大官兵中，只有2 210名返回了英国，其余的2 753名中有1 840名成了俘虏，913名牺牲。在当时，伤亡率达到15%以上就被认为是失败，而迪耶普战役的伤亡率达到了65%，死亡率达18%。英军方面，1 057名特种部队成员中有247名战死，死亡率也高达23%。而德军只伤亡了600人。

如果仅从具体的伤亡数字看，“银禧行动”是失败的，但是它带给盟军的收获也很大：首先，知道了登陆前要进行大规模空袭，以及从海上进行强有力的舰炮射击，这两点是登陆战中不可或缺的；同时也了解到，在海岸地区，现有的坦克很可能无法使用，在登陆后障碍物的破除

方法、新型坦克的研发和列装等方面还需要花费心思；由于司令官要和海岸、海上部队频繁联络，以及和战斗机、轰炸机相互协同，应该准备专用的指挥舰；为保证登陆部队向内陆前进，物资的补给和兵力的增强也十分重要，为此港口设施也成为必需。同时，为了欺骗德军，在其他地方登陆进行佯动作战也可能奏效。在诺曼底登陆战的具体过程中，这些都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教训。

后来蒙巴顿这样写道：

> 无论怎样高度评价迪耶普突击战的价值都不过分。……它是进攻方法的转折点，……毫无疑问，1942年在迪耶普牺牲的每一个人，在诺曼底登陆战中都为至少10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提供了帮助。

这真是用鲜血买来的教训。

迪耶普突击失败的教训
——事先应做好的六件事

（1）登陆行动前确保制空权

（2）用舰炮射击为登陆部队提供强有力的掩护

（3）准备好指挥官的专用舰船（用于和空中、海上、海岸的联络）

（4）研发在沙滩上也能行进自如的装甲战车

（5）设法除掉敷设在海岸上的障碍物

（6）考虑在没有港口的情况下进行登陆后的补给（物资、兵员等）

2

最高司令官的人选纠葛

从北非到西西里，再到意大利本土，在接连实施的登陆行动过程中，盟国间也进行着欧洲本土登陆战的讨论。不过，在“究竟在哪里登陆”这一点上，美英两国一直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与此同时，在东部战场，在斯大林领导下与德国进行激烈战斗的苏联强烈要求英美两国开辟第二战场。

另一方面，与日本激烈战斗的美国不但需要大量登陆艇，而且对于如何在欧洲与太平洋这两个战场配备舰船也存在争议。

是马歇尔还是艾森豪威尔

在西西里岛登陆战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1943年8月，各盟国首脑来到加拿大魁北克，召开了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商讨盟军最高司令参谋长制订的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作战方案。

丘吉尔认为，应该再增加25%的兵力，把位于西侧的科唐坦半岛也纳入登陆范围。而且，尽管他欣然认同了由“围歼行动”修改而来的这个名为“霸王行动”的作战方案的意义，但他仍然主张把地中海地区的作战行动置于优先地位。

丘吉尔和英国将军们认为实施“霸王行动”为时尚早，而更青睐在挪威登陆的“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主神）行动”。也有很多将军预料：“因为德国迟早会崩溃，最后结果就是不再需要实施‘霸王行动’了。”他们预计，以“兰金（英国物理学家）行动”命名的快速登陆战

最后很可能取代“霸王行动”。

尽管如此，在这次魁北克会议上，英国还是做了让步。会议达成一致意见，把“霸王行动”列为盟军在1944年优先程度第一的作战行动，实施日期定在5月1日，并且需要增强盟军最高司令参谋长方案的兵力。

这次会议还决定了一个重要事项，即指挥作战的最高司令官的人选。因为“火炬行动”和“爱斯基摩人行动”都是由美国人艾森豪威尔担任总司令，这次如此大规模的“霸王行动”作战又是在英国准备的，所以直到魁北克会议召开前，氛围更倾向于“这次应该轮到英国人做总司令了”。1943年年初，丘吉尔也把这种考虑透露给了很有可能被任命为大陆进攻战司令官的阿兰·布鲁克。当然，这种人事安排得到了罗斯福的私下承诺。

然而在探讨具体细节的过程中，形势出现了变化。在作战之初的登陆行动中，英美两国的兵力规模几乎相同，但随着战事经由法国向德国推进，美军的兵力不断增加，最后美军和英军的人数比例可能达到5∶1。会议过程中丘吉尔了解到这种变化，于是同意由美国人来担任最高司令官。不过，会议并没有立即确定具体人选，因为候选人有两个：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

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倾向于马歇尔。候选的两个人都是美国陆军参谋长，但马歇尔的能力更为人称道。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和罗斯福的左右手哈里·霍普金斯也持有同样意见。他们是这样考虑的：如果由马歇尔担任总司令，那么在伦敦司令部里，他不会很在乎到处吵吵嚷嚷提各种要求的丘吉尔，而是冷静专注地瞄准目标做事；而艾森豪威尔做指挥官虽然能够发挥其卓越能力，但他是否具备超乎军事才能的政治手腕，这是个问题。

然而也有不同意见。海军作战部长金和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就强烈反对马歇尔担任司令官的人事安排。他们二人是这样考虑的：

马歇尔是陆军参谋长，也是盟军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领导者，是美国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而艾森豪威尔，当然也包括其他任何人，当面临以整个世界为舞台的巨大战争时，都不具备像马歇尔那样卓越的见识、陆海空三军的组织学识，以及长于平衡的判断能力。马歇尔做总司令还有一个负面作用，就是任命艾森豪威尔做代理参谋长时，可以预料他和马歇尔将军的关系不会很融洽。

旋涡中的马歇尔对此问题不曾公开表达过意见。不过据熟悉他的人讲，马歇尔极其渴望深入战场，担任“霸王行动”的最高司令官，以此作为他军人生涯的最终徽章。

就这样，关于司令官人选的问题，不得不拖到1943年12月在埃及召开的第二次开罗会议上决定。

第二次开罗会议与英美的温差

1943年11月，盟军眼看就要以快马加鞭之势，在世界各地击溃轴心国军队。

东部战场的苏联在库尔斯克打败德军，乘胜前进，一直将敌人追赶到德涅斯特河，围困在克里米亚一带。同时继续北进，直达从前和波兰之间的国境。

在地中海，正如先前所预料的那样，盟军夺取了西西里岛，意大利很快就投降了。9月，盟军沿意大利半岛北上，追赶继续抵抗的德军，最后迫使敌军陷入罗马南方的山岳地带动弹不得。

在太平洋，美军横扫新几内亚，一直到达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在中太平洋，针对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瓦、马金两岛的登陆战也于11月20日展开。

同时，彻底击溃德军游弋在大西洋上的U型潜艇，盟军的海上运输线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其中做出巨大贡献的是经商船和货船改造而来

的、可以搭载大量飞机的护航航母。英国最早的护航航母是1941年6月服役的“大胆号”，美国的则是在同月建造完成的“长岛号”。后来护航航母主要在美国建造，完成后租赁给英国。租赁数目达38艘以上。

护航航母的作战方法是这样的：护航航母及其护卫舰、驱逐舰和驱潜快艇组成小舰队在运输船队周围铺展开，从护航航母上起飞的舰载机（双翼的“剑鱼式”或“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只要一发现U型潜艇，立刻展开攻击，同时通报给护卫舰。然后，赶来的护卫舰使用深水炸弹进行轰炸。这种战法叫“猎潜”。U型潜艇在航行中必须经常浮出海面充电或休息，也需要经常升起潜望镜进行观察。护航航母通过飞机上的人员瞭望，进而使用雷达和磁性探测装置来发现潜艇。顾名思义，护航航母就是“潜艇猎手”。

在这样的形势下，罗斯福和丘吉尔，以及美英两国的军事首脑齐聚埃及开罗，召开了开罗会议。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结束第二天，有斯大林参加的德黑兰会议召开，首脑们继续会谈（蒋介石没有参加）。德黑兰会议之后，美英首脑又回到开罗，召开第二次开罗会议。因为斯大林出于军务考虑，不同意前往德黑兰以南的地方，所以只能采取这样的形式。

第一次开罗会议自1943年11月22日持续至27日，德黑兰会议自11月28日持续至12月1日，第二次开罗会议自12月2日持续至7日。随着会议议程的进展，英国和美国的决策也产生了分歧。

英国计划在第一次开罗会议上，和美国一起制定欧洲战略。不但要明确接下来将要进行的“霸王行动”和目前正在开展的地中海行动的关系，而且要明确今后的战略。然后两国把商定的战略方案带到德黑兰，让斯大林接受。英美两国，视情况加上苏联成为三国，在决定了各自的任务之后，最后再与蒋介石商讨，决定亚洲战略。

英国为什么要按这种顺序行事呢？是因为在所有战斗中不可或缺的登陆舰船不足的缘故。由于这会影响到战场形势，英国打算解决这个问

题。

数量根本不够的是坦克登陆舰（LST，也属于登陆舰船的一种）。1943年11月盟军拥有的坦克登陆舰不到300艘，大部分都是美国制造的。在地中海的139艘中，有67艘是根据武器租借法案租给英军的。这些舰船主要是同意大利作战用的，在意大利的两栖战斗结束后，将运到英国供“霸王行动”使用。

美国则更为留意对日战略。假设德国在1944年10月战败，那么就应该制订计划使对日战争能在翌年年中结束。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态度。当时苏联和日本签有互不侵犯条约，尚未进入交战状态，所以亚洲的问题可以不必听取苏联的意见，只要和英国谈妥就足够了。问题是，当战场从太平洋向日本推进的时候，中国的任务怎样安排。这一点对英国在东南亚的战斗至关重要。

所以，美国方面打算在开罗会议开始时听取蒋介石的意见，之后和英国一起决定亚洲战略，然后在德黑兰会议上和斯大林一起就欧洲问题取得一致。

在前往开罗的半路上，罗斯福为了视察战场，顺便从海路到了阿尔及利亚的奥兰。艾森豪威尔前来迎接，然后二人一起乘坐飞机巡视。艾森豪威尔很偶然地引领总统到了海边一处名为“白屋”的别墅。为视察附近的战场，两人停留到了次日。

视察过程中，颇有历史造诣的罗斯福问：“这一带不是公元前202年西庇阿和汉尼拔展开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古战场吗？”艾森豪威尔同样爱好历史，两人一起就历史问题高谈阔论。罗斯福惊异于艾森豪威尔渊博的学识，对他有了新的认识。此时艾森豪威尔身边还有一位名叫凯·萨默斯比·摩根的女司机，她是艾森豪威尔的情人。罗斯福对凯也很喜欢，称她为“小朋友”。

丘吉尔的理由

罗斯福发出邀请函，请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丘吉尔尽管内心对邀请蒋介石十分不满，但也不得不同意。

正如美国所打算的那样，“在东南亚怎样打”成为开罗会议最开始的主要议题。各国着重商讨了以进攻日军占领下的缅甸为目标的“中世大炮行动”和“海盗行动”的可行性。前者是出动空降部队对苏门答腊岛北端进行突袭，后者是对位于缅甸当时的首都仰光西南方向的安达曼群岛展开登陆战。

虽然丘吉尔强烈主张“中世大炮行动”，可是除了他个人对该行动很执着，英国对任何地方的战斗都不感兴趣；美国方面也认为“中世大炮行动”很荒诞，加以反对。

英国方面的冷淡是有原因的。因为在什么地方开展作战行动这个问题，应该是在欧洲战略得到明确之后才进行讨论的，并且这个问题也和英国在亚洲的战略密切相关。

正如我们反复讲述的那样，关于欧洲战略，英国的主张，尤其是丘吉尔的主张可用“决不能因‘霸王行动’放弃在地中海的战斗”来概括。丘吉尔认为，强大的轴心国军队的弱点就在意大利以及巴尔干半岛，他称上述地区为“轴心国军队的软肋”。他断定，如果不对这里展开攻击，“霸王行动”不可能成功。

丘吉尔是这样计划的：1944年1月攻克罗马，2月取得一直保持中立的土耳其的支持，占领佐泽卡尼索斯群岛中最大的罗得岛——只要控制了这里，就可以很容易接近爱琴海以及达达尼尔海峡，整个地中海就将完全置于英国的支配之下，然后在这样的形势下敦促土耳其参战，土耳其肯定会配合。这样，就可以坚守轴心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之间的前线，德国将不得不分出针对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兵力，其结果必将削弱德国所依赖的罗马尼亚油田的防御，攻击也将容易得多。另一方面，土耳其的参战可能使德国国内发生轴心国之间的分裂，而盟国给苏联提供的补给也将非常容易运送。地中海的战斗至此会为“霸王行动”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是绝对有必要的。

丘吉尔的这种主张实在是一厢情愿。不是对目标直接出击，而是抄对手的后路，这和美国方面赋予“霸王行动”压倒一切的优先权、必须在1944年5月1日之前实施的主张有着本质的不同。

登陆舰艇的疑难

就算在东南亚开辟新战场，也存在能否确保登陆舰艇数量的问题。

如果“霸王行动”能够推迟到5月至6月，成功占领罗得岛后，可以把登陆舰艇转移到东南亚的苏门答腊岛或安达曼群岛，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可另一方面，如果在罗得岛战役打响之前不得不在东南亚某地开展作战行动的话，地中海的作战计划恐怕只能泡汤了。

前面的“海盗行动”，由于是在以缅甸为目标的“冠军行动”实施期间开展的两栖作战，因而计划在1944年3月开始实施。

蒋介石当然比任何人都期待缅甸战役，因为这里是援蒋之路的入口。蒋对“冠军行动”并不满意，认为“战役规模太小了，应该增加海军和两栖战斗部队的兵力”。他还说：“不管缅甸战役实施得怎样，美军每个月从印度加尔各答越过喜马拉雅山脉送到成都和昆明的一万吨空运都必须坚持。”

美英苏三巨头在德黑兰会议上初次见面，直接商谈（1943.11.30）（Imperial War Museum）

对于前者，丘吉尔表示拒绝，他称对西西里岛的进攻就是如此，海军的作战和陆地上的作战很多都无法联动；关于后者，由于“海盗行动”和空运都侧重利用运输机，英美的军事首脑都说：“究竟是进攻缅甸还是保证空运，只能二选一。”蒋介石只好作罢。很明显，他认为应该优先解决缅甸问题。

就这样，接受罗斯福邀请赶来的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全都被拒绝了，拟议中的“冠军行动”也没有获得同意。于是两手空空的蒋介石向邀请自己的罗斯福索要出席会议的成果。对此罗斯福的回答是：“在两三个月之内开展‘海盗行动’。”

得知罗斯福承诺的丘吉尔大吃一惊。因为这样会导致登陆舰艇不足，这甚至比自己期待的“爱琴海行动”对“霸王行动”的开展影响更为深刻。

斯大林的发言使形势一变

现在让我们看看德黑兰会议。

首先，罗斯福谈论了目前在地中海进行的战斗，然后这样说：

“‘霸王行动’比在地中海开展的任何一个作战行动都更能打击德军，所以这一行动不应拖延到5月或6月以后。”他认为“连接两点距离最短的是直线”。

然后丘吉尔说：“在东地中海，无论是意大利行动，还是‘霸王行动’，都有很多歼灭敌军的有效机会。”接下来丘吉尔问道：“如果因地中海的行动导致‘霸王行动’推迟两个月的话，苏联方面怎样判断其效果呢？”

下面轮到斯大林发言了。他首先这样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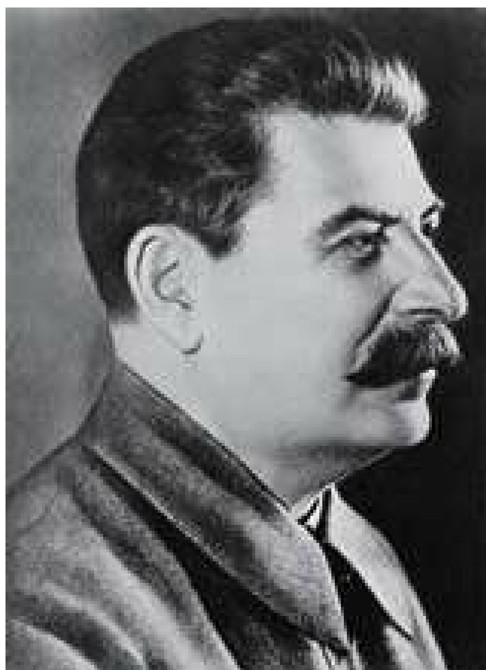
“如果苏联打败了德国，就立即对日本开战。”

在德黑兰会议以前他也经常这么说，但在罗斯福和丘吉尔面前的这次发言，其坚定语气截然不同。

但斯大林接下来的话很温和，使现场气氛为之一变。

“我认为在地中海方向的行动上倾注力量会分散兵力。只有‘霸王行动’是1944年应该实施的基本作战行动，任何其他作战，无论多么吸引人，都应该视为次要的牵制行动。”

领导者肖像



约瑟夫•斯大林
Joseph Stalin（1879—1953)

“斯大林”是笔名，他原姓朱加什维利，是格鲁吉亚人。曾在教会学校读书，参加革命运动，1922年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共产党总书记，在列宁逝世后的竞争中获胜。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从1943年开始担任苏联元帅，统治苏联近30

年。

斯大林暗杀了谢尔盖·基洛夫等政敌，整肃红军，结果导致红军极度缺乏高级将领，在领导苏联人民与德国等轴心国进行卫国战争中：苏联的牺牲人数为德国的两倍以上，军民合计达2 000万人。

斯大林接着说：

“话虽如此，但在地中海方向，尚有一个有意义的行动。”那就是从地中海方向登陆法国南部，然后向北进军，最后和“霸王行动”会师。这是典型的夹击作战，是苏联对德国屡试不爽的擅长战法。

丘吉尔当即反驳斯大林说：“依我看，只有进攻罗马才是从双方出发的战略上和政治上都正确的做法。”

丘吉尔在地中海方向已经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战斗正在进行，此时要求其停止前进是令人极不愉快的要求。

这时罗斯福开口了：

“斯大林元帅的建议提到了‘霸王行动’的日期选择这一极其重大的问题，我们必须现在就做出选择：是坚持丘吉尔首相所说的爱琴海战役，还是采取斯大林元帅所说的先进攻法国南部，然后按照原定方案在5月1日前开展‘霸王行动’？如果进军爱琴海，必然导致‘霸王行动’延迟一两个月。我自己的意见是选择两个方案中的后者。”

听了这些话，丘吉尔不禁心慌起来。因为罗斯福此前的主张中根本没有谈到过“霸王行动”在5月1日之前开始的具体日期。由于登陆舰艇不足，罗斯福的意见只是同意“霸王行动”可以延迟，但是这种延迟是指在极其短暂的期限内的延迟。

毫无疑问，这才是罗斯福真正想表达的意见。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已经在委婉地暗示“斯大林要求5月1日之前行动”，意在敦促拖拖拉拉的丘吉尔尽早确定行动日期。斯大林对罗斯福的话没有表示任何异议。

丘吉尔这次开始同罗斯福争辩了。其言论主旨正如他以前所主张的：完全机械地以不可通融的方式决定“霸王行动”的开始日期是不合常理的。

然后就是冗长的辩论。结果德黑兰会议没能将“霸王行动”的具体日期确定下来。美英间达成的共识是“依靠我们可以利用的登陆舰艇，在可能的条件下，最大规模地呼应进攻法国南部的支援行动，应该在5月中旬实施‘霸王行动’”。

以“铁砧行动”命名的法国南部进攻计划与“霸王行动”在同一日期开始。应在意大利战场上指挥盟军作战的艾森豪威尔的要求，会议承诺，立即将“霸王行动”需要的68艘坦克登陆舰停靠至地中海，直至1944年1月15日。至于缅甸的“海盗行动”和“爱琴海行动”的命运则需回到开罗时再次讨论。

斯大林返回苏联，罗斯福和丘吉尔则再次回到开罗。

对丘吉尔而言，德黑兰会议是亲身感受祖国英国的国际地位降低和苏联地位上升的会议。罗斯福为了不让斯大林产生“美英合伙欲令德国苏联同归于尽”的印象而与丘吉尔保持了距离。丘吉尔用他特有的语言手法，嘲讽不得不与罗斯福和斯大林这两位美苏巨头相对立的自己，说自己是夹在“强大的美洲野牛”和“手脚巨大的北极熊”中间苦恼的“又小又可怜的英格兰驴子”。

第二次开罗会议首先对“海盗行动”进行了批判。不管怎么说，既然有了斯大林如此郑重的“德国溃败后就对日宣战”的约定，缅甸的战略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

会议认为，对于“铁砧行动”和“霸王行动”，能否准备好在两线作战的充足兵力是个问题。这样一来，优先程度大为下降的“海盗行动”已经成了障碍。让那一部分兵力返回欧洲岂不是更好？

罗斯福也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告诉丘吉尔“取消‘海盗行动’”，也给蒋介石发了电报。

到开罗会议结束的时候，以占领罗得岛为开端的“爱琴海行动”终于获得了“应该继续”的结论，但是由于土耳其方面突然大大提高了作为参战补偿的军事援助的金额，丘吉尔不得不放弃此前的想法。“铁砧行动”最后也没能实现，因为在各方对“霸王行动”的指挥官任命以及各自分派的兵力表达不满的时候，这一行动最先受到指责。1944年8月，盟军在法国南部展开了进攻，代号为“龙骑兵”，但是它与同“霸王行动”形成夹击之势的“铁砧行动”相比已经完全是两回事了。

最高司令官定为艾森豪威尔

这时，命运女神对艾森豪威尔露出了微笑。

在第二次开罗会议过程中，12月3日，罗斯福这样告诉丘吉尔：

“‘霸王行动’的最高指挥官已经决定由艾森豪威尔担任了。”

丘吉尔以前还怀有和坊间相同的猜测，相信马歇尔会就任总司令。在德黑兰会议过程中，对于谁来就任总司令这个问题，斯大林也很重视，几次摆出自己的观点。丘吉尔晚餐时谈起这个话题，把内定马歇尔的消息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也表示，如果是马歇尔可以接受。

话虽如此，可对这一决定最为惊讶的，或许还是艾森豪威尔本人。

在开罗会议的归途中，12月7日，罗斯福为视察战场，来到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城，从马耳他赶来的艾森豪威尔也在那里。作为地中海方面的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仍然在率领部队和意大利作战。在罗斯福到达突尼斯的几个小时之前，艾森豪威尔就接到了马歇尔发来的电报，电报上写明了他新的履职地点，但他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

再次赶来的艾森豪威尔把罗斯福请上了车。在车里，罗斯福这样说：

“还有，艾克，你现在能指挥‘霸王行动’了。”

据罗斯福说，如果不任命“霸王行动”的司令官，那么他担心“霸王

行动”的实施日期还有可能继续拖延，所以最近才做出了这个决定。据说马歇尔对此也完全同意。最初的时候，罗斯福虽然考虑应该由更高级别的军官来指挥这一光荣的战斗，可以任命马歇尔，但是马歇尔实在是无法离开华盛顿尤其是美军联合司令部的工作，所以最后选定了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在罗斯福踏上返回美国的行程后，收到了马歇尔发来的便条。上面这样写道：

> 总统致斯大林元帅：
>
> 决定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即时为“霸王行动”的司令官。
>
> 罗斯福
>
> 1943年12月7日开罗
>
> 亲爱的艾森豪威尔，我猜想这可以作为纪念品，您一定渴望拥有。这是昨天会议结束的时候，我匆忙之中写下来的，总统立即签署了它。
>
> G. C. M（马歇尔的签名）

艾森豪威尔感谢马歇尔的盛情，将这个便条当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为珍贵的纪念品，一直保存在自己身边。

曾有一次，罗斯福询问过马歇尔：“你是愿意一直这么做参谋长呢，还是选择做‘霸王行动’的指挥官？”马歇尔回避了直接回答，只是说：“这是总统应该自己决定的事情。”罗斯福于是做出决定，由艾森豪威尔统领“霸王行动”。罗斯福的这一决定，与其说是相信艾森豪威尔的能力，不如说是考虑到艾森豪威尔难以代替马歇尔完成在国会左右逢源、警惕地关注太平洋局势等这些参谋长的任务。当然，艾森豪威尔的确能出色地统领“霸王行动”。

总统对马歇尔这样说：“如果您不在国内，我想我肯定失眠。”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一书的作者罗伯特·舍伍德这样写道：

> 罗斯福就这样宣布了对艾森豪威尔的选择。这是他以往所做的所有决定中最为困难的决定之一，同时也是最为孤独的决定之一。而且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那样，这一决定不仅从西欧的角度看是正确的，即使从全局来看，也是最为正确的决定之一。

3

开始实施的诺曼底登陆战

在设立了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任命了艾森豪威尔为最高司令官之后，其他岗位的人员也都陆续确定了下来。

意欲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展登陆战，需要应对的课题可谓堆积如山——进行巧妙的伪装行动、研发特种坦克、构建顺畅的补给体制、建造人工港等等。盟军就这样逐步积蓄力量，而释放这种力量的时刻也越来越近。

运转的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

艾森豪威尔到达伦敦履行新职的时间是1944年1月15日，当时他53岁，得到了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官的职位。负责制订“霸王行动”方案的盟军最高司令参谋长被编入新成立的司令部，即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Supreme Headquarters Aliied Expeditionary Force=SHAEF）。此前任盟军最高司令参谋长的摩根将军成为副参谋长，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工作。

因为最高司令官是美国人，所以副司令就由英国空军阿瑟·特德上将担任。在地中海战场，他和艾森豪威尔相互合作，关系密切。

领导者肖像

阿瑟·特德
Arthur William Tedder（1890—1967)

特德出生于苏格兰，曾就读于剑桥大学。作为飞行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加入英国皇家空军，从事干部培训，曾任新加坡空军司令等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委派为中东的空军司令，后来在同德国非洲军的战斗中以及地中海战场等任指挥，在西西里登陆战中和艾森豪威尔建立了众人皆知的友谊。

特德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中的地位仅次于艾森豪威尔，为副司令。在战术性空中掩护和破坏德军通信系统的轰炸中大显身手，令“地毯式轰炸”（别称“特德地毯”）战法驰名。丘吉尔认为特德这个人受美国军人的影响过深了。

Imperial War Museums

参谋长由艾森豪威尔自赴任英国以来一直共事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少将担任，这让艾森豪威尔很高兴。

艾森豪威尔曾评价他是“能抓住问题脉络的同时不放过任何细节，性格坚强，思维敏锐，不让步就能实现协调的人”，对他完全信赖。

海军司令官是在敦刻尔克指挥“发电机行动”的伯特伦·拉姆齐上

将，空军司令官由特拉福德·利——马洛里上将担任，他们都是英国人。

陆军方面，美英两军是分开的，但是直到登陆初期他们都由英国司令官指挥。后来被编为第21集团军群的地面部队有两个指挥官候选者，他们都是陆军上将——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尽管艾森豪威尔倾向于亚历山大，但经英国战时内阁研究决定“不能把亚历山大调离意大利战场”，司令官确定为蒙哥马利。

美军方面由艾森豪威尔自己选择。关于这个问题，自艾森豪威尔在“火炬行动”中首次担任最高司令官以来，和马歇尔两人之间已经达成默契。马歇尔这样对艾克说：

“我不需要像不信任您一样把司令官留在我这里。今后我将视您所指挥的前线司令官全都是为了使您满意而尽职尽力的人。因为这是事关众多人生命的战争。您绝不能忘记，不能使您完全满意的人，无论是谁，您都有权也有义务拒绝他，或令其转职。”

成为美军战区（后来的美国第1集团军）司令官的是奥马尔·布莱德雷。他是艾森豪威尔在西点军校的同期生，盟军从北非向地中海进攻时他曾在巴顿手下任职。现在他和巴顿两个人的地位恰好倒转，对于这一点，巴顿予以理解。

“对任何事情都态度认真，视野宽阔，善于识人，不偏不倚，富有理性，能抓住问题的核心”，这是艾克对布莱德雷的评价。而且他尤其赞赏布莱德雷总是和自己一样，亲赴前线和士兵谈话。但是另一方面，布莱德雷也存在缺乏想象力、忌妒心强的缺点。他生来讨厌英国人，对我们后面还要讲述的英军研发出来的特种坦克不以为然，手下部队只使用水陆两栖坦克。

将原来的进攻规模加倍

现在我们把时钟稍稍往回拨一下。1943年年末，被内定为“霸王行

动”最高司令官的艾森豪威尔在阿尔及尔会见蒙哥马利，二人就第一次魁北克会议认可的盟军最高司令参谋长方案进行了短暂讨论。

艾森豪威尔在几个月之前就了解了方案的内容，感到“最初的攻击还不完美”。蒙哥马利也持有相同看法。当时艾森豪威尔必须回美国一次，他命令比自己早回伦敦的蒙哥马利修改行动方案。蒙哥马利领会了上级的意图，就和已经在伦敦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一起重新讨论该计划。二人商讨的结果是，应该扩大在50千米的海岸上部署3个师的计划，在80千米的海岸上安排5个师。为了能更早地占领瑟堡，他们主张把科唐坦半岛的根部也覆盖到登陆战的范围里。

他们的修改方案实际上就是盟军最高司令参谋长摩根中将最早设想的方案。登陆海岸的范围之所以设定为50公里，是因为这是分派给他的兵力所能覆盖的极限。如果扩大登陆范围，就需要先占领瑟堡港。在最高司令官还没有任命之前，他为占领瑟堡而强烈要求增加兵力显然不妥。

艾森豪威尔同意了他们二人的意见，对盟军最高司令参谋长方案进行了修改，并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征求意见。

结果行动本身得到了认可，可是怎样确保新增加的两个师所需的登陆舰艇却成了新问题。除了运送两个师的6艘运输船，还需要坦克登陆舰、更小的步兵登陆艇（LCI）和坦克登陆艇（LCT）等很多舰船。这些舰船只能依靠美国建造，而这需要时间。除将“霸王行动”的开始日期从5月1日推迟到6月1日之外，只有几个办法可以考虑：或者缩小被称为“铁砧行动”的法国南部登陆战的规模，或者延期甚至取消该行动。艾森豪威尔迫不得已，只好决定将“霸王行动”延期一个月，而“铁砧行动”（后改名为“龙骑兵”）也延期到了8月15日。

领导者肖像

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
Walter Bedell Smith（1895—1961）

生于印第安纳州。16岁时成为国民警卫队士兵，此后节节高升，官位直至陆军上将，经历传奇。从步兵预备役军官转至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作为第4师的一员被派往法国，曾在前线负伤。战争期间就读于陆军步兵学院、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陆军大学，后作为马歇尔的工作人员进入陆军参谋总部。

在实施登陆北非的“火炬行动”时，马歇尔派他前往伦敦，担任盟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后直至纳粹德国投降，史密斯一直留在这个位置上担任领导。

战后历任驻苏联大使、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艾森豪威尔手下的副国务卿。

Library Congress

关键是首先在诺曼底登陆，然后在向西向南扩大战果的同时，军队

向东迂回，直指德国的中心地区。把诺曼底做成一个“合页”，然后扇动门板驱散敌人，最后攻入敌人的老巢。为此，在精心准备的同时，也要尽可能移除影响行动成功的因素。

诺曼底登陆战概要
——从登陆到进军德国

> 登陆诺曼底海岸
>
> 确保在诺曼底/布列塔尼地区进行决战的兵力，突破敌军的包围
>
> 陆军第2集团军乘胜追击，左翼军队占领必要的港湾，主要任务是到达德国国境威胁鲁尔
>
> 右翼军队与进攻法国南部的部队取得联系
>
> 通过确保比利时、布列塔尼以及地中海的其他港湾，沿德国西部国境建立新基地
>
> 准备最后的决战，为了占据优势，持续进攻
>
> 歼灭莱茵河以西的敌人，同时侦察渡河桥头堡
>
> 再次以左翼军队为重点，将鲁尔重重包围，进行最后的进攻。在现场决定方向，攻入德国
>
> 荡平德国境内的残军

出自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欧洲十字军》

欺骗德国的“护卫计划”

这次战役最危险的“魔鬼时刻”还是在登陆前后——怎样不受敌人的攻击是最重要的。盟军的方案是在登陆地点上制造假象欺骗敌人，打击德国空军，破坏敌军运输物资和兵员的道路，而这需要事先进行轰炸。

欺骗行动被命名为“护卫计划”。在早前的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曾对斯大林说：“在战争时期，真实是如此宝贵，以至于我们总是不得不用虚假来保卫它。”“护卫计划”即据此而来。

其方案是抢在德军之前下手，使他们远离令盟军感到棘手的地方。具体目标就是将德军从法国和东部战场引诱到意大利、希腊、巴尔干各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种欺骗行动在各主要交战地都要实施，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围绕诺曼底登陆所展开的行动，因此被命名为“刚毅行动”。

“刚毅行动”不过是一些牵制攻击，目标是分散德军对将要在6月实施的诺曼底登陆的注意力，使德军相信真正的攻击是7月底实施的加来登陆战，并且误以为盟军还将在挪威、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地区开展另外的登陆战。

盟军为此展开了以下两个行动。

其一是制造“在挪威登陆的威胁”，名为“刚毅北方”行动。目的是让德军以为英美苏盟军攻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后将进军丹麦，然后从北向南进攻德国。如果这一欺骗计划进展顺利，那么希特勒就不可能调动驻扎在波罗的海沿岸以及加来地区的部队，可以推测，最后迎击诺曼底登陆盟军的德军兵力会减少。为此盟军虚构出了一个驻扎在苏格兰的“英国第4集团军”，反复进行虚假通信，让德军以为这支部队是实际存在的。这是1944年4月着手的任务。

其二是假装在加来登陆的“刚毅南方”行动，开展得比北方行动稍迟。盟军在这里也弄出了一个“美国第1集团军群”的“幽灵部队”，作势从加来地区登陆法国。被选为这个集团军群司令官的，就是巴顿。作为美国军人，他因作战勇敢，才能非凡，具备男子汉气概而声名远播至德国。在德军看来，巴顿绝对是进攻战不可缺少的“黑桃A”。盟军把巴顿的名气用在了欺骗作战上。

假的登陆舰船、气球一样胀鼓鼓的橡胶坦克、折叠式的假大炮、假

坦克登陆舰、假战斗机都被陈列在“进攻阵地”上。大量的无线电通信以及电磁噪音也发送了出来，惟妙惟肖地表演出一支并不存在的大军反复集合训练的模样。在米其林公司的地图上，标有“加来地区”字样的货物也被大张旗鼓地大量订购。

位于整个行动核心位置的是英国军事情报局第五处（简称军情五处）的情报官汤米·阿盖尔·罗伯逊带领的精干的双重间谍队伍。罗伯逊负责将德国方面的间谍改变为双重间谍，这种工作被称为“双面特工系统”（“双面”的意思是背叛）。在罗伯逊及其部下的努力下，原来的德国间谍通过书信和无线电，或者直接口头汇报的形式，向德国的间谍长官编造谎言，用“虚假信息”欺骗德军，发挥掩盖真相的“工程兵”作用，为盟军效力。

“刚毅行动”居然还有鸽子参加。在德军占领下的法国各地，都设有德国情报部门的分支机构，其中就有鸽子部队。一旦盟军登陆成功，鸽子就带着情报从战线后方被放飞到各地。这就是能将敌军进攻的消息第一时间传递给同伴的信鸽系统。

英国空军上尉理查德·沃克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想，如果欺骗德军，让他们以为英国的间谍鸽混进了自家的鸽笼，那么整个信鸽部队都会遭到怀疑，德军可能会一只不剩地把鸽子都杀掉。于是他迅速伪造脚环和翅章，准备了几百只足以乱真的鸽子，在诺曼底登陆的前几个月空投到法国被占领地区。不过，最后的结果很遗憾。德军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的鸽笼里混进了“间谍”。

随着登陆行动日期的临近，设置在伦敦郊外、名为“中心指令室”的机构开始满负荷运转。据说这是当时英国警戒最严格的地方，在一座大厅里悬挂着诺曼底长达193千米海岸的详细地图。这幅地图标记了德军的防御体系，每天都根据新情报进行更新。上面标记着希特勒为防止盟军登陆而建造的大西洋壁垒以及炮兵部队的位置、各部队装备的大炮的口径、射程与视界，甚至水泥掩体的厚度。此外还详细地标有雷达、隧道、无线信号收发站、铁丝网、兵营、火焰喷射器、防坦克障碍物、机

枪部队和雷区，甚至小股部队的配置、指挥官的名字等都赫然在列。

能做出如此精美的地图，全靠活跃在诺曼底的抵抗组织帮忙。在后来遭到彻底毁损的诺曼底地区首府、卡尔瓦多斯省省会卡昂，以水泥公司的营业员、41岁的曼塞尔·吉拉尔为首，包括女人和小孩在内的好几百名谍报人员共同帮忙完成了这幅地图。

战略空军的管理问题

在这些事前行动中，盟军内部最具争议的问题是空中战斗的目标和范围。开辟西部战场以后，盟军计划反复实施战略轰炸。从空袭鹿特丹大坝开始，以鲁尔地区为中心，破坏德方的生产设施等。

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完全掌握以英国为根据地的整个空军的指挥权。也就是说，由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RAF Bomber Command，司令官为阿瑟·哈里斯上将）和美国陆军航空兵第8航空队（Mighty 8th，司令官是詹姆斯·杜立特中将）所组成的战略空军的指挥权可能会很轻易地从他手中旁落。

战略空军方面主张："我们能在欧洲各地自由飞行，又具备空袭能力，无须仅仅局限于和地面部队配合行动，因为那样只能是浪费资源。"对此艾森豪威尔是这样反驳的："我们的行动是不允许失败的，一旦失败，将影响其他战场，对盟国军民的士气也是严重打击，苏联也会对我们失望，甚至可能转而同德国单独媾和。为确保取得胜利，应该把战略空军置于我们的指挥之下。"

实际上艾森豪威尔介意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1943年9月，在意大利半岛的萨莱诺所指挥的登陆战中，盟军之所以在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依然获得惨胜，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两支本不归他指挥的战略空军部队被他说服加入了战斗。

有了那时的教训，艾森豪威尔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把指挥权抓在自己手里。但是他的这个打算遭到了英国的强烈抵制。艾森豪威尔曾对副司

令特德这样发牢骚：

“我已经彻底厌烦了和这么多女主角演对手戏。拜托你和那些人说说，如果他们还是像孩子一样喧哗不止，就让英国首相随便找个什么人来继续打下去吧，我辞职！”

对丘吉尔他也明说：“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我只有回国一途。”1944年4月初，英国方面终于让步了，将战略空军置于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之下。

但是把战略空军纳入麾下之后，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登陆前的战略攻击目标设在哪里。

1944年1月，空军司令利——马洛里上将刚一宣布登陆前的轰炸计划，立刻就引起了争论。这套方案建议轰炸从法国到比利时再到德国的铁路、公路、交通要地及设施，目的是通过大范围破坏德军的运输系统，阻止德国的增援部队进入诺曼底。

首先提出反对意见的是战略空军的两大巨头，英国空军哈里斯上将和杜立特中将的顶头上司、在意大利指挥第15航空队的美国战略空军司令官卡尔·斯帕茨中将。为打击德国经济，对德国空军釜底抽薪，他们已经在“霸王行动”之外，联手实施了对德本土昼间轰炸的“直射行动”。他们是这样提出反对意见的：

“相比于轰炸交通设施，更应该注重对德国空军的打击。不掌握制空权的登陆简直不可想象——只要一登陆，立刻就会遭到猛烈的空中袭击，战斗本身会遭遇失败。”

他们主张用另一种方案取代利——马洛里的计划，即轰炸石油工厂和（制造飞机不可或缺的）轴承工厂等。他们这样说：

“据秘密机构的情报，德国方面在战斗地区只允许每天跑80列火车。对于他们而言，显然是太少了，肯定是为了保证其他运输途径的运营。即使用3个月时间去破坏铁路和公路，最后也很有可能事倍功半。在这一点上，石油工厂则截然不同。只要遭到轰炸，希特勒就会接连不

断地派战斗机去防守。如果能击落这些战斗机，再加上对工厂的打击，可谓一石三鸟，在打击德国经济、德国空军的同时，登陆作战也能顺利进行。”

最后的结果是，艾森豪威尔支持了轰炸交通设施的方案。副司令特德也持相同意见。既然两位上级指挥官坚持这种态度，斯帕茨等人也只好保持沉默了。

然而这时又有人从旁插嘴。英国的国家安全局说，如果轰炸大桥、铁道干线、停车场等交通运输设施，肯定会造成法国平民的大量伤亡——预计轰炸将会造成8万人牺牲，这样做会失去法国人对“霸王行动”的支持。丘吉尔对这一问题也十分重视，要求艾森豪威尔和特德撤回行动计划。

“战后的法国应该是我们的朋友。这绝不仅仅是人道主义的问题，而是最高国策的问题。”

但是，他们并没有接受丘吉尔的意见。由于8万人不是小数目，他们承诺利用广播或传单告知平民不要接近交通要地。丘吉尔又向罗斯福提出这个问题，罗斯福的意见是“要尊重身处战场的指挥官的意见，不要把有碍成功登陆的战术上的限制强加给他们”。丘吉尔只好同意，决定在4月17日实施轰炸交通设施的计划。

巨大的人工港“桑葚”

在进行上述争论的同时，其他行动计划却进展顺利，而其中不乏令德军闻风丧胆的“巨无霸”工程，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被称为“桑葚”的人工港。只要有了它，不适于弹药、粮食、增援部队卸货上岸的沙滩就会变成理想的港口。“桑葚”也是出于迪耶普登陆战的教训而进行的创新，它的卸货能力可达每天12 000吨，而且为避免英吉利海峡常见的恶劣天气的影响，它自身还附带有防波堤。

“桑葚”以巨大的钢筋混凝土沉箱为主体，一个“桑葚”需要100个以

上的名为“椰子”的沉箱。最小的沉箱有1 672吨，最大的有6 044吨，分为6种。并且“椰子”都浮在海面上，像船一样，上面还有乘务员，载有两门高射炮和20吨弹药。

诺曼底海岸本没有港湾，为便于卸货，在远处建起了人工港“桑葚”。几座栈桥延伸到海中。近处用几艘破旧船只相连，凿沉做成“醋栗”（Imperial War Museum）

附带的防波堤由70多艘破烂不堪的舰船像串珠一样首尾相连，然后沉入海底。这部分叫作“醋栗”。

早在1942年的时候，丘吉尔的头脑中就有了人工港这个主意，将其形成具体行动方案的是英国海军参谋长海兹·哈雷特上校。由于需要大

量水泥和钢铁以及建设工人，“桑葚”拖延到1943年12月才开工。

沉箱在英国南部建造，盟军登陆后由拖船拖运到诺曼底海岸。最终，A和B两个“桑葚”建成，分别设置在美军登陆的奥马哈海滩附近和英军登陆的黄金海滩附近。

在后勤补给上，实施了“冥王星行动”，即便没有运油船也能把油料从英国送到法国。英国在索伦特海峡的怀特岛上建立了加压运油基地，从那里铺设了110千米长的海底输油管，直至科唐坦半岛的欧代维尔。实际施工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占领科唐坦半岛要地瑟堡港之后开始的，竣工后每天能输送455万升石油。

霍巴特的“怪家伙”

在迪耶普海岸，装运过去大量坦克却完全不能使用，这一痛苦经历使英军着手研发特种坦克。一手承担起这项工作的是珀西·霍巴特少将率领的英国第79装甲师。霍巴特可谓极端的“坦克万能主义者”，由于想法过于前卫，他在役时未能得到重用，退役后任国防民兵伍长，丘吉尔发现了他，令他回到军队再次服役——他的经历的确不寻常。

诺曼底登陆行动时，英国陆军珀西·霍巴特少将的部队利用“谢尔曼”坦克和“丘吉尔”坦克改装研发出的特种装甲车辆被称为“霍巴特滑稽坦克”（Imperial War Museum）

他们首先研制出了水陆两栖坦克。当这种坦克在水中时，采用折叠式的防水帆布包住车体，注入空气获得浮力，然后把坦克的动力传递到螺旋桨，划水而行。登陆后立即将帆布折叠起来，就恢复成普通的坦克了。由于可以“复合驱动”，这种坦克被命名为“双驱动（Duplex Drive）坦克”，是世界上最早的不必借助登陆舰就能自行上岸的坦克。

因“复合驱动”而得名的水陆两栖双驱动坦克。在海上用防水帆布将坦克裹起来，注入空气使其浮起，靠后部的两个螺旋桨推进（Imperial War Museum）

“线轴坦克”。坦克上方安装着线轴一样的装置，上面缠有100米长的帆布垫子。这种坦克可以敷设帆布垫子作为装甲车辆的行驶道路（Imperial War Museum）

命名为“蟹”的扫雷坦克。坦克前面突出的圆桶上装有锁状的连枷，旋转连枷敲击地面，触发地雷（Imperial War Museum）

“鳄鱼坦克”，喷火坦克的一种。牵引着装有燃料和压缩氧气的装甲拖车，用火焰喷射管换下机枪（Imperial War Museums）

不难想象，就算盟军安全登陆，前方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等待着他们。例如地雷。为排雷而研发出来的，是一种名为“蟹”的扫雷坦克：车体前部安装了许多像蟹脚一样的连枷，用连枷敲击地面引爆地雷的同时向前开进。

还有为应对敌人强大火力而研发出来的喷火坦克“鳄鱼”：车体后部牵引着载有1　800升燃油的两轮拖车，用压缩空气将燃料推送到通常机

枪位置上的火焰喷射器中。火焰喷射的射程大约为100米。

在临登陆战前被仓促研发出来的是“线轴坦克”：坦克前方安装着和车体同样宽度、线轴一样的圆筒，“线轴”上缠着大约100米长的帆布垫子。登陆时如果有车辆因重量过大而陷入沙滩、无法动弹，它便可以接连摊出帆布垫子，敷设“临时道路”。用看惯了普通坦克的眼光来看，这些特种坦克都有着极其古怪的外形。它们被亲切地称为“霍巴特的怪家伙”。这些“滑稽坦克”在“霸王行动”中将大显身手。

此间艾森豪威尔也和其他司令官一样，利用会议间隙频繁视察前线。据参谋人员所做的记录，在2月1日到6月1日的4个月时间里，他除视察了26个师、24个机场、5艘军舰外，还视察了众多基地、工厂、医院等重要设施。士兵们喜欢见到指挥作战的人，他们的士气也因此而高涨。艾森豪威尔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士气，战场上不可能有胜利。他在《欧洲十字军》一书中这样写道：

> 总司令官在完成作战指挥工作后，还必须始终和前线部队保持“感情联系”。身为总司令官，肩负战斗职责，在尽量不侵犯部下权限的同时，必须和部下实现情感上的融合，否则重要的作战行动肯定会失败。为保持和部下的接触，需要经常视察前线。

1942年1月31日，美军开始在英国集结，大约4 000名官兵到达了北爱尔兰。集结行动被命名为“波莱罗行动”。从那以后，美军数量逐渐增加，到临近登陆的1944年5月30日，美军已达152万人。

美军主要驻扎在英国西部和西南部，而英军和加拿大军队则集中在东部和东南部。这是因为美军负责诺曼底地区的西翼，而英军和加拿大军队负责东翼。

艾森豪威尔成为最高司令官

前面的章节主要从艾森豪威尔的军旅经历介绍了他，那么艾森豪威尔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欧洲十字军》一书里有这样一则逸闻。

诺曼底登陆9个月以后，1945年3月23日，为彻底击溃仍在抵抗的德军，盟军在这一天实施了莱茵河渡河行动。艾森豪威尔偶然遇到一个士兵正垂头丧气地走着，于是问他："怎么了？你好像不太高兴啊！"

对方回答："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就是特别忧虑。我两个星期前负伤住院，昨天刚刚出院，突然感到没有自信了。"

对此艾森豪威尔是这样回答的："哎呀，我的心情和你现在简直一模一样。我也很忧虑。但是我们花费了很长时间，终于准备好今晚进攻。为粉碎德军，飞机、大炮、空降部队也全都集结完毕。我想我们一起漫步到岸边的过程中，可能会恢复自信……"

士兵听了这番话，突然这样说：

"好的，我明白。可不知为什么我现在又有自信了。"

艾森豪威尔在叙述了这则逸闻后，又一次重复："我对他的情绪深有体会。"

大战在即，艾森豪威尔不但没有怒斥垂头丧气的士兵，反而直率地告诉对方"我和你一样"，这是最高司令官应有的态度吗？也许，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这位突然搭话、看上去级别很高的长官就是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这个人，一句话概括就是"平易近人"。谦虚坦诚，甚至有人说他天真烂漫，不像通常的军人。他当然具备不可或缺的勇气和执行力，同时也是个乐天派。像前面逸闻里所讲的那样，艾森豪威尔具备从他人角度去考虑问题的本能。他那标志性的"艾克笑"，据说力量相当于一个野战军。

德军在诺曼底海岸修筑了炮台，建成“大西洋壁垒”。今天仍能看到炮台的遗迹（Michel wal）

为众多人所喜爱的人，一定也喜爱众人。对象是女性时，艾森豪威尔也有行为不严谨的地方。比较有名的故事是他在伦敦有个情人，是他的司机兼秘书，名叫凯·萨默斯比·摩根，30多岁，是一位模特出身的爱尔兰人。

美国记者约翰·甘瑟这样写道：

> 艾森豪威尔完成的最伟大的工作，并不是率领盟军横渡英吉利海峡，解放了法兰西，击溃了德国。布莱德雷也好，亚历山大也好，如果身处于和艾森豪威尔一样的位置，应该也能做到这种程度。（同时也不能忘记，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没能渡过英吉利海峡。）艾森豪威尔完成的真正伟大的事业是，在盟军内部营造出了关系和情感都十分融洽的气氛。

如果美国军官称某个英国军官为“那个混账”，艾森豪威尔不会说什么；可是如果称其为“那个英国混账”的话，他一定会把那个美国军官塞进没有护航的货船，遣返回美国。可是另一方面，他讨厌部下受英国影响。在司令部内，他甚至禁止在干杯或离别时使用意为“恭贺”和“再见”的英式英语“再会”。“和英国人好好配合，如果不行就回去，但是不

要忘记美国魂！”这就是他的做法。

英国官兵对最高司令官的这种态度也心怀好感。一位士兵在给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最高司令官衣着朴素，胸前也不挂那些亮闪闪的勋章，举止平和，充满自信和亲切感，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官。”

指挥系统复杂的德军

盟军正制订着缜密的进攻计划，扎扎实实地精心准备，那么与此相对，德军怎么样呢？希特勒当然没有疏于防守，而是时刻小心提防着盟军登上欧洲大陆。1942年8月，希特勒发布总统令，命令用混凝土沿着从挪威到西班牙的大西洋海岸建造坚固的防御网点，这就是所谓的“大西洋壁垒”。希特勒发布这一命令的契机，就是盟军在前不久实施的迪耶普登陆战。

“壁垒”上的每个据点最多驻有70名士兵，还配备了机枪或反坦克炮。最开始时计划修筑15 000个这样的据点，然而，这虽然是希特勒的命令，却很明显不可能实现——由于德国本土正遭受着盟军的轰炸，修复毁损的建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且西西里岛遭到了盟军的进攻，地中海方向也需要筑起大量要塞加以应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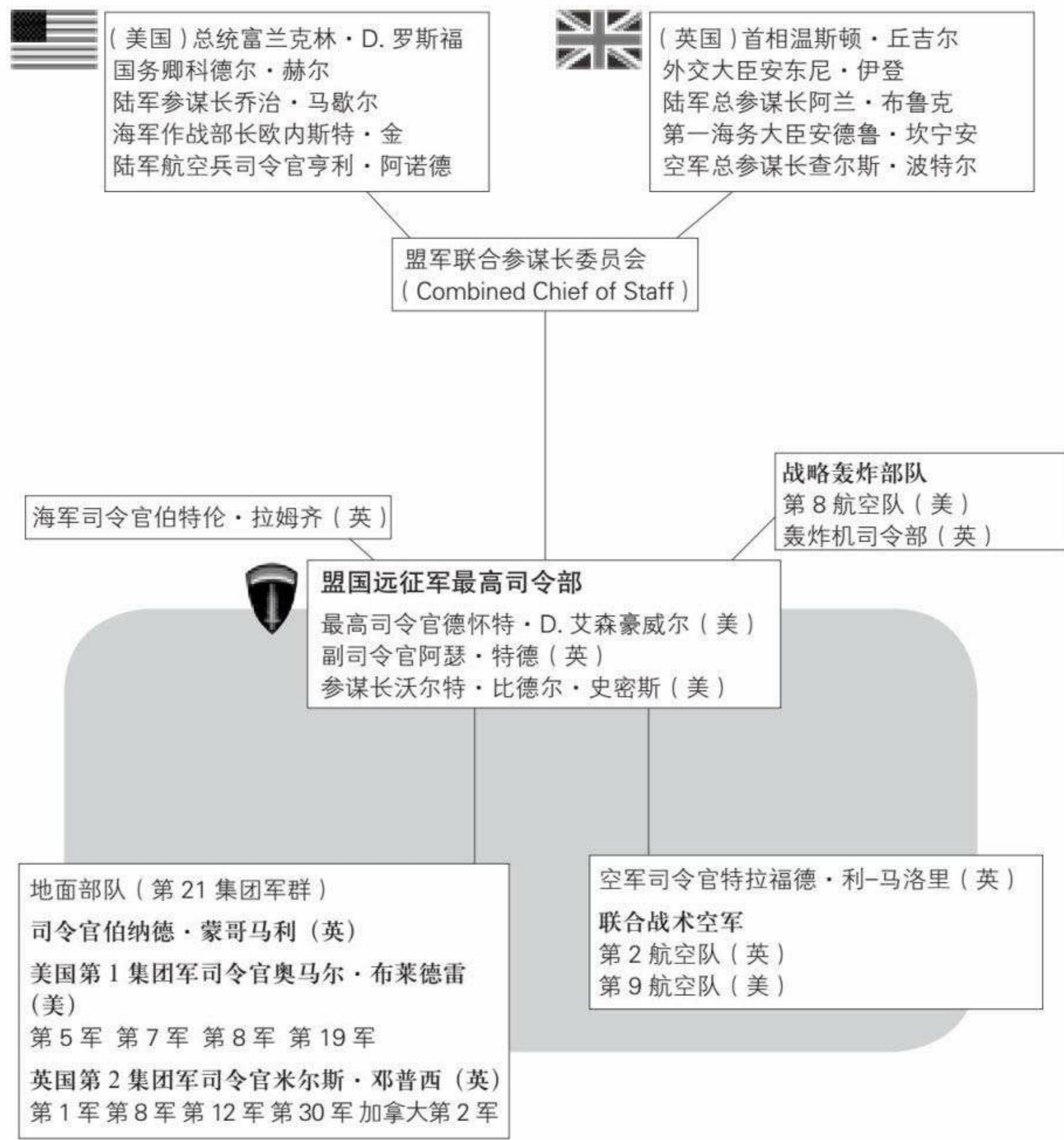
1942年3月，伦德施泰特元帅取代了身体状况欠佳的埃尔温·维茨莱本元帅，出任西线总司令。伦德施泰特在1940年对法国发动的闪击战中率A集团军群建立功绩，在对苏作战初期指挥南方集团军群，但从1941年末到次年进攻罗斯托夫失败，由于违背希特勒的旨意下令撤退，引起希特勒的愤怒，遭免职。但是希特勒对他的能力一直评价很高。这一次正好和四年前相反，他率领西线军队由进攻转为防守。

为防止盟军登陆，德军在法国和比利时海岸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障碍物。图为视察防线的隆美尔一行（Bundesarchiv, Bild 101I-719-0243-33/photo: Jes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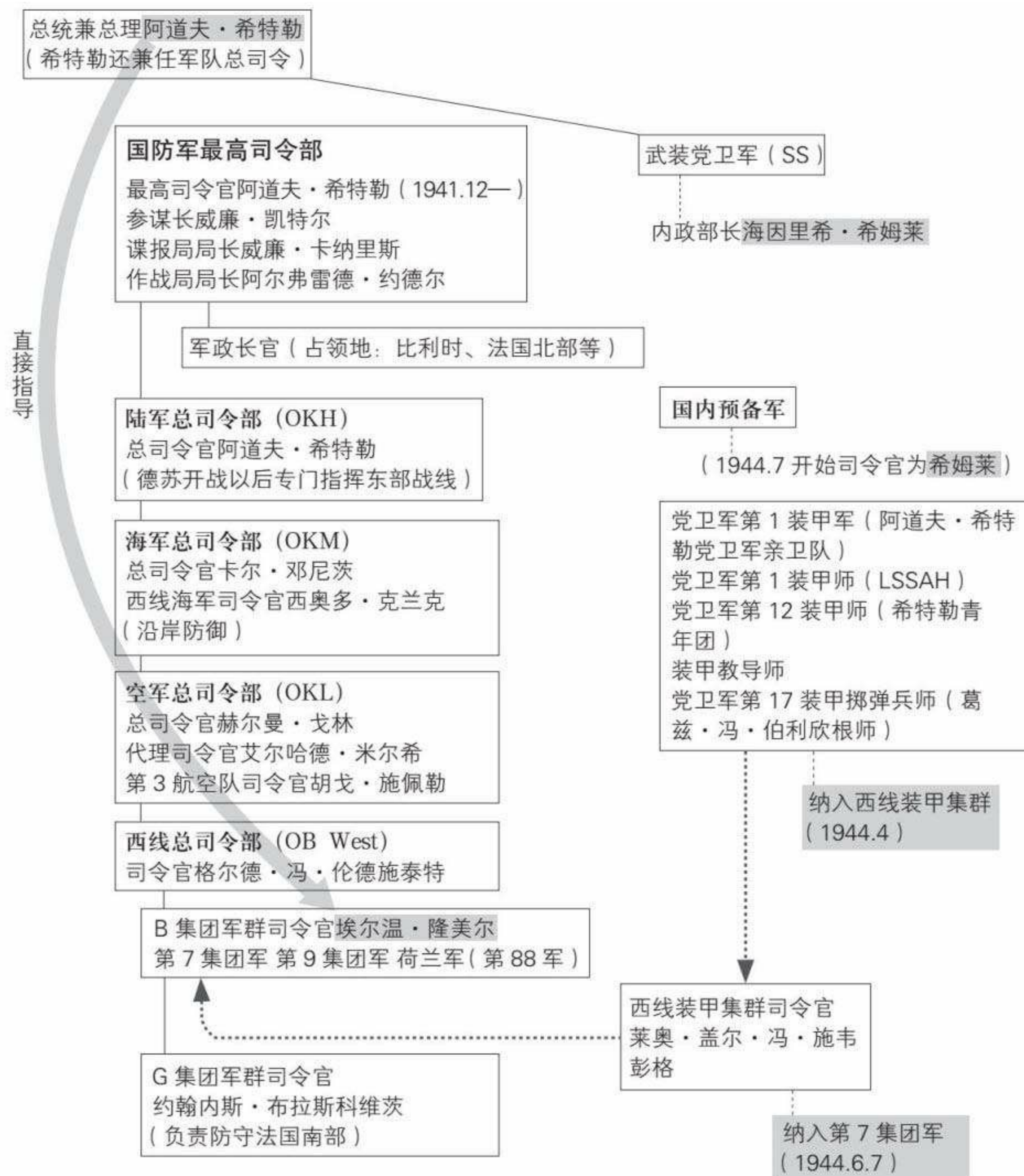
伦德施泰特用很短的时间视察了西部海岸线，把自己所看到的防守力量的真实状况写成报告，呈交给了希特勒。伦德施泰特报告的要点是，西部需要防守的海岸线长达2 500千米，无论怎样都不可能在所有地方都建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大西洋壁垒”无论从实战角度还是从对敌宣传角度都的确是不可缺少且非常重要的，但同时真正能够阻挡敌人登陆的还是具有机动性的武装后备军，而目前自己手上缺少的，正是这种后备军。

希特勒对伦德施泰特的报告没有做出丝毫反应。1943年11月3日，报告提交还没过一个星期，希特勒就下达了有关西欧防御的基本命令。命令的主旨如下：

分形图形VS金字塔形
——西部战场盟军与德军的指挥命令系统图



德军不规则的金字塔形（Hierarchy）组织



“综合所有情报我们得知，敌人制订了最迟于1944年春进攻法国的计划。可能性最高的登陆地点在面向多佛尔海峡的加来，必须最大限度地加强这里的防御。今后，没有伦德施泰特的许可，禁止从西部地区调集部队。万一敌人登陆成功，必须全力击退，将他们赶下海。”

3天后的11月6日，希特勒召见了有“沙漠之狐”之称的隆美尔，任命

他为特殊任务集团军群司令，把调查西部海岸和制订阻敌计划的任务交给了他。隆美尔自突尼斯之战回国后，曾暂时负责意大利北部的防御，但是希特勒采取了战区司令阿尔贝特·凯塞林的防御方针，从防御意大利北部变成了防御意大利全境，隆美尔实际上处于没有任务的赋闲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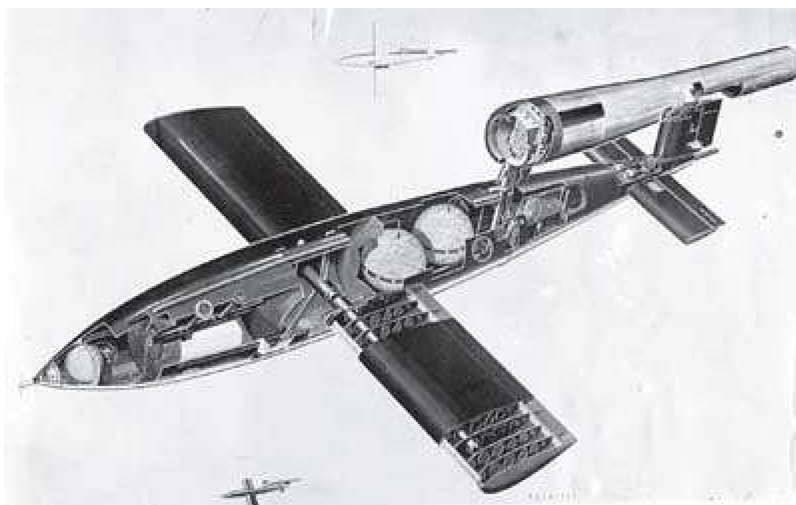
1944年1月15日，隆美尔被任命为B集团军群司令，接受伦德施泰特的指挥。此时隆美尔麾下几乎没有强有力的装甲部队，大部分装甲部队都编入了由莱奥·盖尔·冯·施韦彭格上将率领的西线装甲集群。并且，海军空军和陆军的配合很少，而调动武装党卫军的权力掌握在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手中。

就这样，在西线方面的德军指挥系统有好几重，错综复杂。

登陆阻止战略的对立

在防守构想方面，隆美尔和伦德施泰特之间存在着决定性的差异。

隆美尔主张“海岸防御”，重视水雷和地雷，以及在海岸设置障碍物，尤其是构建“大西洋壁垒”。而伦德施泰特则重视“敌人登陆后的防御”，打算将步兵部队和装甲部队改编成最大的后备军。



飞航式导弹V—1。希特勒为扭转形势，对新武器满怀期待（U.S. Air Force photo）

最后希特勒采用的方案虽然接近隆美尔的构想，却存在一处致命弱点。隆美尔的计划是在从海岸到内陆约8千米的范围内部署由步兵和装甲兵组成的后备军，但是西线装甲集群司令施韦彭格上将却不同意动用部队。后者引用意大利半岛萨莱诺的战例称，把坦克部署在海岸附近，有可能遭到来自海湾的舰炮轰击，造成损失。国防军甚至对双方在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沿岸发生登陆战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认为还是“将坦克部署在内陆比较好，可以四面出击”。希特勒很快做出了让步。

结果很离奇，就是装甲集群作为后备部队留在了国防军最高司令部的指挥之下。只有希特勒本人才可调动这支部队。不只是隆美尔，就连西线最高司令官伦德施泰特的指挥权也遭到了削弱。伦德施泰特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这位高傲自大的军人有可能已经预见到了德国的失败。

领导者肖像

埃尔温·隆美尔
Erwin Johannes Eugen Rommel（1891—1944）

虽然最后被迫自杀，但隆美尔仍旧是希特勒最信赖的军人之一。史上最年轻的非普鲁士贵族元帅。出生于德国南部古符腾堡王国的教师家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率领山地部队活跃在罗马尼亚和意大利。

隆美尔在担任希特勒警卫时崭露头角，1940年5月在西线的闪击战中任B集团军群第7装甲师师长，表现出色。次年为支援处于劣势的意大利，被委任为德国非洲军总指挥，得名“沙漠之狐”。关注“大西洋壁垒”的现实状况，致力于海岸战斗条件下的防御阵地建设。

隆美尔在“D日”因祝贺妻子生日而回国，后组织反击，但效果不佳。诺曼底登陆战40天后遭机枪扫射负伤，从此离开战场。

scan da A.Monticone, La battaglia di Caporetto, Gaspari editore

和盟军的组织结构相比，隆美尔所处的位置和蒙哥马利很相似，不过隆美尔对麾下各师的指挥权却是不完整的。

伦德施泰特的地位比艾森豪威尔低得多，二者简直不能相提并论。艾森豪威尔无论如何都要掌握战略空军的指挥权，伦德施泰特连陆军的全面指挥权都没拿到，而且每当需要海军和空军的支援时，他发出的都不是“命令”而是“邀请”。德军没有像盟军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那样统率陆海空三军的横向组织。

更重要的问题是，盟军的登陆地点会在哪里？

在伦德施泰特看来，在勒阿弗尔到敦刻尔克之间、英吉利海峡最狭窄的多佛尔海峡沿岸最为可疑。这一带的中心就是加来。德国很多将军也持同样观点。他们对此地尤其放心不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正在紧锣密鼓建设针对英国的新式武器V—1（飞航式导弹）、V—2（火箭）的发射基地。

1944年春天，隆美尔认为更西面的诺曼底很危险。他对海岸进行了

深入仔细的调查，在附近的海岸敷设了水雷和地雷，设置了障碍物。他要求后方每个月提供1 000万颗地雷。尽管到盟军登陆前他已经沿“大西洋壁垒”埋设了600万颗地雷，但这仅仅是他要求数量的1/10。他还向海岸后面的低洼地带注水，以此阻止空降部队着陆。他在适合空降部队和滑翔机着陆的海岸纵深地带打下了无数尖头木桩，并在上面安装爆炸物。人们称这种木桩为“隆美尔的芦笋”。

隆美尔对下属部队的指挥官这样说：

“最初的24小时将决定一切。我们必须在敌人发动大规模攻势前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调动所有的防守力量，保持最强大的攻击力。人类在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在依靠山一样的障碍物的同时，还组织如此规模防守的先例。我们必须在敌人到达主战场之前将他们全部消灭。必须在海中抓住他们，迟滞他们的行动，当敌人还浮在海面的时候，将他们的所有装备全部摧毁。”

在临近登陆的1944年春，希特勒独自确定出了构筑防御阵地的优先顺序。根据国防军发出的警告，此时他开始认为盟军不但在加来，而且在诺曼底也有可能实施登陆。所以他排定的优先顺序是，第一加来，第二是英吉利海峡间的海峡群岛，第三是瑟堡要塞，第四是盟军后来真正的登陆地点，包括犹他滩在内的科唐坦半岛东侧海岸，第五奥马哈滩，也是后来盟军的登陆地点。从第三到第五都和诺曼底登陆有关联，应该说，希特勒的嗅觉也可谓高深莫测了。

战场

第五章

现场指挥官的决断与自觉

——“D日”1944年6月6日

诺曼底登陆战（**“D**日**”**前后）

1944.6.4（D-2） 晨会报告次日天气状况不佳（行动推迟24小时）

6.5（D-1） 晨会报告“自本日13点开始36小时内天气状况良好”

6.6（D+0） 实施诺曼底登陆

6.7（D+1） 巴约解放

6.12（D+6） 丘吉尔到访诺曼底

6.13（D+7） 圣索沃大捷（英军大败德军）

6.14（D+8） 戴高乐进入巴约

6.17（D+11） 希特勒视察西部战线（巴黎东北方向120千米处的梅济耶尔）

6.18（D+12） 盟军进攻瑟堡（6.26守军投降）

6.19（D+13） 遇最大级别暴风雨（3天时间里气温下降到11月的程度）

6.21（D+15） 人工港“桑葚A”因大风损毁

6.28（D+22） 希特勒召回隆美尔替换伦德施泰特

7.2（D+26） 盟军登陆官兵已达100万

7.6（D+30） 巴顿抵达诺曼底

7.7（D+31） 英国第2集团军进攻卡昂（“特尔福德行动”）

7.11（D+35） 盟军进攻圣洛

7.15（D+39） 隆美尔被机枪扫射身负重伤，离开战场

7.18（D+42） 英国第2集团军进攻卡昂（“古德伍德行动”）

7.20（D+44） 暗杀希特勒未遂事件

7.25（D+49） 盟军从圣洛向科唐坦半岛西部进攻（“眼镜蛇行动”）

7.30（D+54） 盟军进攻维尔（“蓝衣行动”）

8.1（D+56） 美国第3集团军开始进攻（司令官巴顿）

8.6（D+61） 德军莫尔坦反攻（“卢提西行动”）

8.7（D+62） “总计行动”

8.10（D+65） 巴黎公务人员开始罢工

8.14（D+69） 法莱斯包围战（“温顺行动”）

8.15（D+70） 美国第7集团军在法国南部里维埃拉登陆（“龙骑兵行动”）

8.20（D+75） 法莱斯包围战（诺曼底战役结束）

8.21（D+76） 前方司令部会议，关于东进美英出现对立意见

8.25（D+80） 巴黎解放（8.30临时政府迁至巴黎）

8.28（D+83） 马赛解放

9.1（D+87） 艾森豪威尔兼任地面部队指挥官（第12、第21集团军群指挥官）

9.4（D+90） 加拿大第1集团军控制安特卫普

1

确定登陆地点和时间

导致纳粹德国溃败的决定性一战就是史上最大规模的诺曼底登陆战。仅在“D日”当天，就有以英军美军为主力，包括加拿大、法国、波兰等国官兵共13多万人在长达100千米的海岸上的5处海滩登陆，以约9 000人伤亡的代价，成功保证了在海岸上的立足点。

正因为史无前例的作战规模，从登陆战之初，现场指挥官的判断就左右着计划的成败，决定着部队的存亡。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现场领导者们的动作。

在长达100千米的海岸实施登陆战

“霸王行动”并不只是以诺曼底登陆为目标，而是还包括其后的内陆进攻等一连串作战行动。自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成立后，该行动计划日渐具体。

在对内容反复确认后，最高司令部决定首先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海岸的5处海滩各投入1个师，共5个师展开突袭。5处海滩自西向东分别以“犹他”“奥马哈”“黄金”“朱诺”“剑”的暗号称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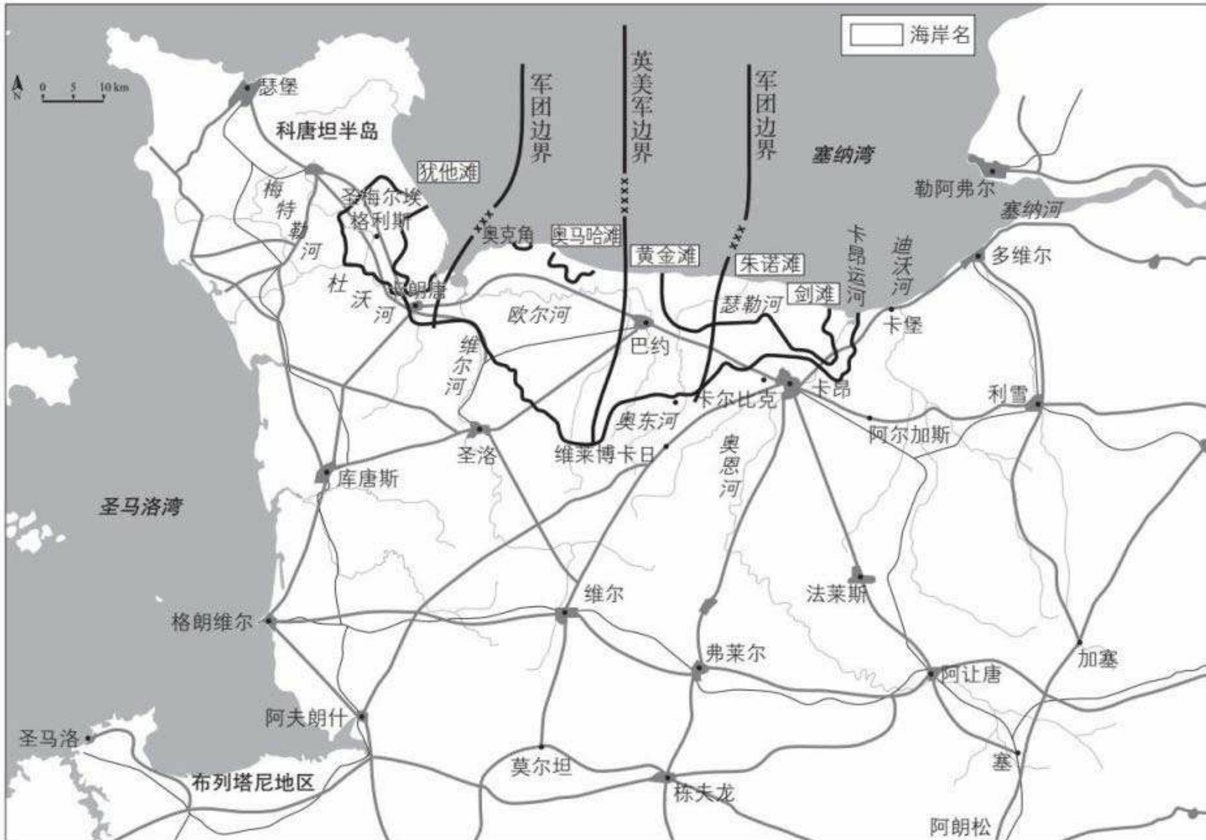


图5-1 诺曼底登陆战的作战地域

犹他滩和奥马哈滩由美国第1集团军负责，黄金滩和剑滩由英国第2集团军负责，朱诺滩由英国第2集团军（下属的英国和加拿大师）负责。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军队和位于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官兵也参与了这里的战斗。正面进攻的海岸近100千米长。

如果能够顺利登陆，就由美军做右翼（西面），英军和加拿大军队做左翼（东面），以交通要地卡昂（卡尔瓦多斯省首府）为轴做合页形展开，战斗部队呈扇形扩大，南面在法国境内指向地中海，东面则向德国的心脏地带进军。

盟军在最前线尽可能多地配备战斗机和轰炸机，大量坦克以尽早保障部队充分活动地域为目标。为此，盟军重视的是尽早占领卡昂及其南方平原。英国第2集团军承担这一重任，从奥马哈滩登陆后向西南进军的美国第1集团军承担辅助任务。

以卡昂为轴的“右勾拳”

同时，在最右翼犹他滩登陆的美军以抢占位于科唐坦半岛北端中部的瑟堡港为主要任务。

为支援上述登陆部队，确保海滩登陆场，美军的2个空降师和英军的1个空降师将事先分别在最右翼的犹他滩和最左翼的剑滩后方内陆地带实施空降。

登陆日“D日”的确定

登陆计划既然已确定，接下来就是登陆开始日“D日”的决定了。在这方面，气候条件绝对关键——如果海上状况恶劣，那么还没和敌人开战，就已经葬身鱼腹了。

5月1日，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和海军总司令拉姆齐就登陆的气象条件问题达成一致，即必须利用月龄、潮汐，以及日出这三个条件。盟军的天气预报组织相比德军格外优秀，登陆开始日最有用的天气信息来自美国陆军设在格陵兰岛的高层气象观测站。

德军在附近的海中部署了水雷，还从浅滩到海湾设置了带地雷的障碍物，盟军已经知道，无论哪一种都数量极大，所以登陆行动的开始时间要确定在这些东西露出海面的落潮时刻才合适。最佳时间是落潮以后，借着具有推力的涨潮，尽快登陆。时间选在敌人容易疏忽大意的黎明，最好能利用月光。

适合这些条件的日期是：5月21日至23日，6月5日至7日，7月19日至21日。5月8日，艾森豪威尔和陆海空三军的司令官经过商议，决定先把“D日”定在6月5日。最终判断是否在这一天真正实施行动，还需要在前一天，即6月4日凌晨4点做出决定。

正当万事俱备，只需等待“D日”最终决定的时候，棘手的问题出现了。5月30日，就“是否在犹他滩内陆地区实施空降行动”的问题，空军司令官、英国空军利——马洛里上将向艾森豪威尔提出反对意见。他的理由是：“敌人的猛烈攻击是可以预料的，两个优秀的美国空降师有可能全军覆没。至少滑翔机部队的70%、伞兵部队的50%会丧命。”艾森豪威尔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独自一人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无视利——马洛里的意见，而他的预测又不幸成为现实的话，数千名年轻人将徒然失去生命，自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不仅如此，一旦空降以失败告终，也会严重影响到整个“霸王行动”。

另一方面，如果接受他的意见，停止空降行动的话，在犹他滩的登陆行动将不得不在没有空降部队支援的情况下进行，或者干脆被取消。如果选择前者，登陆部队会有严重损失，如果选择后者，极为缜密的“霸王行动”计划将变得支离破碎。

艾森豪威尔想到这里，又一次冷静地回到了起点。

结论出来了。对于整个“霸王行动”计划而言，空降师对犹他滩内陆进行的攻击是不可或缺的，利——马洛里的担忧至多也只是推测。回想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经历过的一模一样的空降作战，如此的悲观论调是极不现实的。除了负责犹他滩的美国第1集团军最高司令官布莱德雷，空降部队的司令官都对该计划不持异议，艾森豪威尔决定要和他们再次确认这一点。他拒绝了利——马洛里的意见，决定按原计划实施空降行动。

行动推迟24小时

很快，决定命运的6月4日到来了。

在早晨4点15分召开的会议上，英国空军气象部门詹姆斯·斯塔克上校等气象官员提交的报告令司令官们非常失望。次日（5日），海上状况可能很恶劣，有强风，云层低垂，不宜登陆。气象官员说：“由于视野不佳，空军不可能实施支援，舰炮的射击也将失去威力，登陆舰船难以把舵，沉没的危险性增加。”

海军司令拉姆齐同意他们提出的“舰炮射击难以瞄准”这一点，同时又表示，“尽管天气恶劣，登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士兵们已经整装待发”，对行动的推迟表明了“中立”的态度；而承担登陆任务的蒙哥马利则考虑到推迟行动可能产生的不利，认为“应该实施”；英国空军出身的副司令官特德则因“空中支援几乎不可能”这一理由反对行动。在听取了上述三人的意见后，艾森豪威尔决定暂停行动，推迟24小时。这一决定被直接传达给在海上待命的舰艇和部队。

在做出了重大决定的6月4日下午，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接待一位麻烦的访问者。他就是一天前刚刚在阿尔及尔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

即使在法国被德国打败以后，戴高乐也没有改变其反攻德国的意图。由于他坚持对德的敌对立场，与亲德的维希政府对立，被缺席审判

为叛国罪，宣告死刑。其后逃亡伦敦，发表了“法国只是一次战斗失败了，整个战争并没有失败”的著名言论，继续战斗。作为“自由法国”运动的领导者，戴高乐尽管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承认，但由于他极度自负，无论什么事都按照“法兰西中心主义”处理，可谓桀骜不驯，丘吉尔对他也很头疼。

话虽如此，丘吉尔还是承认他所领导的力量，持续给予援助。在同样都是军事学院毕业、军人出身的政治家这个意义上，也对他怀有亲近感。但是罗斯福的姿态就恰好相反，比较冷淡。罗斯福认为：“戴高乐有成为独裁者的危险，在法国国民能够自由表达意愿之前，不应该去认定究竟谁是法兰西真正的领导者。我们盟军在解放法国的时候，应该把戴高乐的职务限制在军事方面。”

领导者肖像

夏尔·戴高乐
Charles Andre Joseph Marie de Gaulle（1890—1970)

下级贵族的后代，出身于历史教师之家。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至贝当将军的步兵连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5次被俘，多次越狱。

战争停止期间曾任波兰军事顾问、军官学校教官，后于陆军大学就读，赴任中东。因出版《剑刃》《以职业化军队为目标》等知名。主张导入机械化部队。“闪击战”后，作为国防部副部长晋升为准将，为与英国结盟而奔忙。看到法国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决心逃亡，在伦敦成立“自由法国”，呼吁抵抗德国。

战后作为法兰西临时政府代表，贯彻“法兰西中心主义”，后辞职。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过程中，宣布自己的《宪法》草案，就任总统，成立第五共和国。

Imperial War Museum

相反，罗斯福和美国支持的法国军人是在“火炬行动”中出力的吉罗将军。1943年6月3日，由戴高乐和吉罗共同担任主席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CFLN）成立，但是两雄并没有并立，率领“自由法国”军队的戴高乐生来就在政治影响力上压倒吉罗，不久，戴高乐就成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事实上的领导者。

到1944年年初，势力增长的戴高乐逐渐将北非的法国军队置于自己的支配下。当法国本土的抵抗运动各队伍结成法国内地军（FFI）时，戴高乐又将其纳入囊中。2月1日，戴高乐任命马里·皮埃尔·柯尼希为法国内地军司令官。

在接下来的4月4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发布《国防布告》，宣布戴高乐就任三军首长。6月3日，同样是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布改名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戴高乐应丘吉尔之邀从阿尔及尔乘飞机抵达伦敦，于6月4日下午3点半到访位于朴次茅斯的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

丘吉尔之所以邀请戴高乐，是考虑到应该事先把如箭在弦的“霸王行动”计划告知他。以前英国从不向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国方面正式提供

情报，最主要的原因是罗斯福并不信任他，另外也因为他们使用暗号不严谨，很有可能将重要的行动信息泄露给德军。

唯一的例外是联络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势力、事实上的法国军队司令官柯尼希，他以艾森豪威尔直属部下的身份开展工作。从他统率的法国内地等的抵抗组织处，盟军获得了驻扎在各地的德军部队名称等情报以及该组织对德军的破坏活动等众多好处。例如，一个抵抗组织的洗衣店通过查看德军士兵衬衫上的数字，获知了德军设置在海岸上的包括伪装雷区在内的所有雷区。如果盟军没有抵抗组织的帮助，空降部队也不可能拿到所必需的详细的当地情报。

戴高乐和丘吉尔的争执

丘吉尔开始向抵达伦敦的戴高乐讲述登陆行动的要点。尽管丘吉尔等英国政府首脑并没有涉及任何有关法国政治的话题，但戴高乐却显得烦躁不安。当他获悉发给登陆盟军士兵使用的是美国国内印刷的军票时，心中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我共和国政府绝不承认那种假钞一样的货币！”

闻听此言的丘吉尔实在忍无可忍：“我们是要解放欧洲吧？那是因为美国和我们在一起。如果需要我从您和罗斯福之间做出选择，我应该选择罗斯福。”

这是他们在伦敦共进午餐时发生的对话。午餐过后，在丘吉尔的带领下，戴高乐一行前来拜访指挥“霸王行动”的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前线司令部位于朴次茅斯郊外的森林中。

面对“自由法国”的领导人，艾森豪威尔只字未提因天气问题给自己带来的烦恼，而是用了几十分钟时间讲述了具体的行动。“世界上肩负最重大、最危险责任的人目光格外明亮，但是和半年前的会面相比，他脸上的皱纹变得更深了。”戴高乐后来回忆。

在戴高乐了解了行动计划，快要踏上归途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向他出示了自己拟就的对法国国民的声明，这份声明将在“霸王行动”开始后发布。声明内容完全无视临时政府的权威，呼吁法国国民“在法国选出代表自己的政府之前，请服从盟军司令部的命令”。

戴高乐勉强按捺住心中的愤慨，只是说“要稍做几处改动”。返回伦敦的他联系艾森豪威尔的工作人员，具体变更就是删掉“在法国从压制中获得解放的时刻，你们可以选出能够代表自己、同时也是诸位所期待的政府”这一节。但是由于艾森豪威尔的演讲已经录制完毕，变更内容实在是难以做到的要求。

得知结果的戴高乐说，自己拒绝这一针对法国国民的演讲广播。此外还加上：“命令配合美英军队的法国联络官放弃任务。理由是盟军丝毫没有论及攸关我们生死存亡的法国政治问题，就连达成一致的只言片语也没有。”几个小时以后，获悉戴高乐这种言行的丘吉尔怒发冲冠，暴跳如雷。

“D日”确定在6月6日

第二天凌晨3点半，仍然是朴次茅斯司令部，在反复斟酌气象条件的时候，决定“D日”具体时间的会议开始了。雨水横扫进来，宛如飓风到来一般。会议一开始，斯塔克上校就汇报说，正如前一天所预测的那样，恶劣天气袭击了法国北部，如果当时做出行动决定，真的会导致非常悲惨的结局。然后，斯塔克做出了意外的预报：“恶劣天气会告一段落，从今天下午1点开始，有可能迎来36个小时至今不曾预料到的好天气。”

36个小时的好天气称不上十全十美。即便先头部队成功登陆，恶劣天气再次袭来的话，后续部队会进退两难，先登陆的部队有可能陷入孤立，成为德军的盘中餐。

可是如果再次推迟，也会产生很多难题。下一次可能的日期是6月

19日，不能指望这一天有月光。另外，到那时还有大约两个星期，能否保守住登陆地点等秘密？官兵会不会士气低落？艾森豪威尔决定第二天就发动进攻。他这样说：“我们干吧！”（We’ll go！）

这是6月5日凌晨4点15分，没有任何人表示反对。他们飞速返回各自岗位，传达全体出动的命令。

艾森豪威尔做出这样的决断并不容易。它不仅与300万官兵的性命息息相关，而且还攸关所有盟国国民的命运。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后来称“这是最重大的生死抉择”，而且他感叹“至今不了解”最高司令官的孤独。

行动日前夕，有好几个人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要亲眼观看登陆作战或登上掩护舰艇。对“现场”比什么都喜欢的丘吉尔也在其中。现在丘吉尔情绪高涨，自从被德军逐出欧洲大陆，至今正好4年，他终于可以报敦刻尔克的一箭之仇了。当然，艾森豪威尔不同意他的要求——一旦丘吉尔有个三长两短，其后果无法估量，本来已经承受巨大压力的艾森豪威尔将无从招架。当然用这些理由是不会打退丘吉尔的。他提出几个理由，比如他以国防大臣的身份可以乘坐英国的舰艇，盟军最高司令官也无权监督英国的大臣等。

话说到这个份上，艾森豪威尔也只好作罢。幸运的是，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写给丘吉尔的一封信为艾森豪威尔解了围。这封信是这样写的：“我也是海军军人，也是整个英国军队的统帅，我同意留在祖国。我正想做的事情却被您（指丘吉尔）做成了，这公平吗？”于是丘吉尔不得不打消了念头。

和身赴死地的士兵交谈

决定出击的6月5日，夜晚时分，为亲到现场勉励打头阵的士兵，艾森豪威尔乘上凯·萨默斯比·摩根驾驶的军用凯迪拉克，前往英格兰南部伯克郡的科莫，视察马克斯维尔·泰勒少将率领的美国陆军第101空降师

的驻地。空军总司令利——马洛里预言会有悲惨结局的就是这支空降兵以及滑翔机部队，他们将很快登上运输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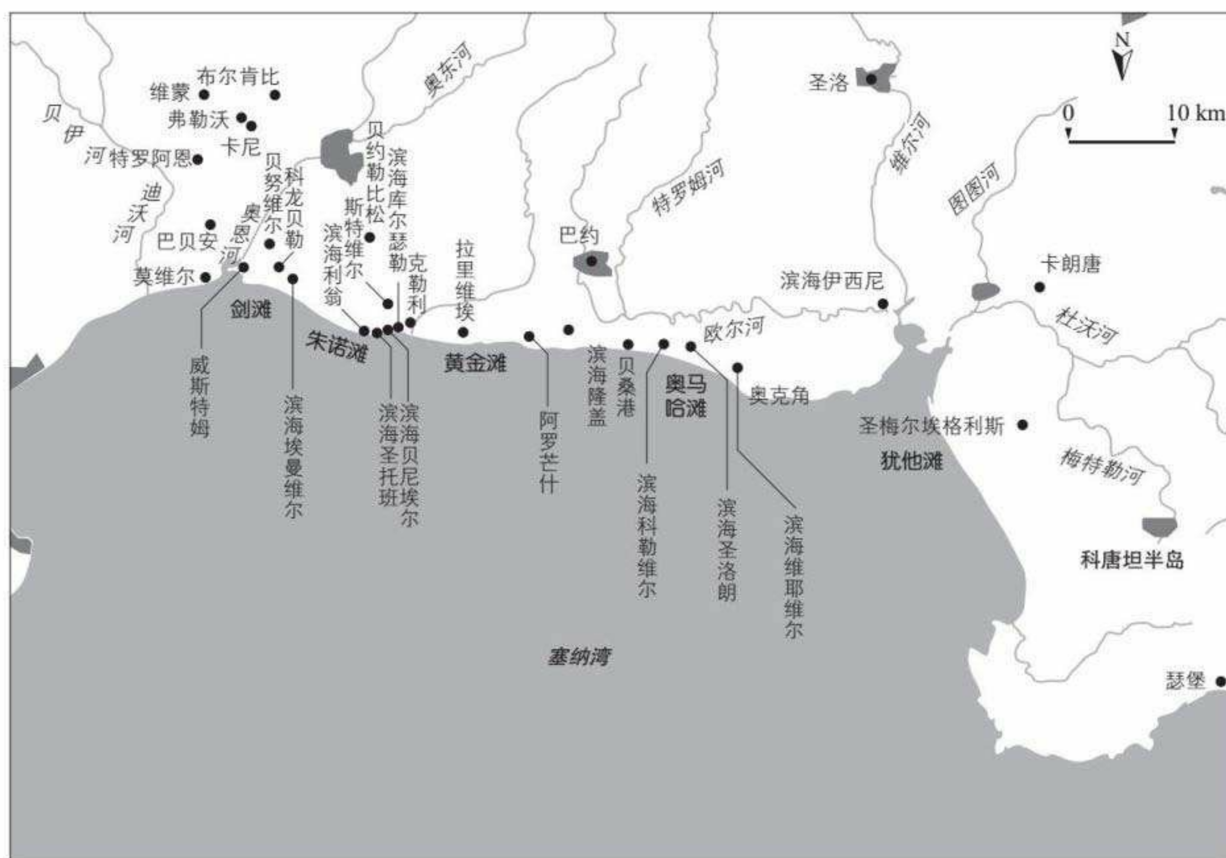


图5-2 “D日”的5处海滩与战斗地区的村落

艾森豪威尔一下车就步入士兵们中间。为便于在黑暗中隐蔽，士兵们都把脸涂黑了。当他们注意到出现在眼前的这个大人物时，到处都发出“最高司令官”的呼喊声。他们欢呼，吹口哨，到处都传来“欢迎你，艾克！”的声音。艾森豪威尔依次走进士兵队伍，和他们握手，亲切地和他们说话。

艾森豪威尔突然想寻找一下和自己一样来自堪萨斯州阿比林的士兵，结果没有来自阿比林的人，但找到了同样是堪萨斯州来自伯灵顿的士兵。在无拘无束地问候之后，艾森豪威尔问道：“你害怕吗？”士兵老实地回答：“实际上是害怕的。”于是艾克为他提出这样的建议：

“我也害怕。不害怕的家伙都是大傻瓜！不过有个要领：一旦你止

步不前，那一瞬间就会露出破绽，结果就可能被击中。关键是保持运动状态。”

泰勒少将事前这样对部下说：“如果不小心捉到俘虏，有可能阻碍任务的完成。如此，最好的选择就是把俘虏处理掉！”在战斗过程中要保护俘虏的时候，必须尽快将其转移到后方的安全地带，采取必要的医疗措施，提供一日三餐。关于俘虏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就是这样规定的。可是，对空降部队而言，战场总是在己方的势力范围之外，那里没有安全地带，医疗措施和饮食难以保证，不可能给俘虏那样的待遇，也无法令他们随同战斗，所以泰勒发出了枪决的指令。作为指挥官，这是艰难的决定：如果战争失败，他当然会被送上军事法庭，即便获胜，也很有可能受到国内的军法处置。泰勒无视那些风险，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发出了枪决俘虏的指令。

尽管恋恋不舍，但出发的时间就要到来了。士兵们开始依次进入C—47运输机，最后泰勒自己也进去了，运输机依次起飞。艾森豪威尔登上司令部所在建筑的屋顶，一直注视着起飞的运输机，直到最后一架消失在夜空里。在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明亮的东西。踏上归程前，他这样对凯说：

“嘿！开始啦！谁都无法阻止我们了！”

2
“D日H时”

6月6日黎明，英美两国的空降师开始在敌军阵地上降落，“D日”的大幕被徐徐拉开。

他们趁着德军混乱占领据点，从海上到来的地面部队也在舰炮射击的掩护下，在各自的攻击开始时间“H时”，开始陆续登陆。

打头阵的美国陆军空降师

时间在推移。6月6日，星期二，“D日”当天。

这一天凌晨1点半，最先在诺曼底地区降落的是艾森豪威尔直接勉励过的美国陆军第101空降师。他们的任务被称为“芝加哥行动”，是在距犹他滩3千米的内陆降落，占据贯穿湿地的干线道路，并进一步确保架设在杜沃河上的多座桥梁。攻占科唐坦半岛根部的小镇卡朗唐以及关闭海岸之间的拉巴尔肯特水闸的任务也交给了他们。

第101空降师的空降队员大约6 600人。为使人员安全降落，C—47运输机必须把速度降低到每小时150～175千米之间，但可能是飞行员初次面临炮火的袭击而惊慌失措，很多运输机根本没有减速，结果在降落伞张开的瞬间，空降队员一下子承受了比训练时强大好几倍的拉力。

他们没能按照原定计划降落。德军把阵地从海滩到内陆布置得天衣无缝，很多人为了避开敌军，不得已降落到海上。在那里，海水成为另一种敌人，接连有人因被吸收了大量海水的降落伞裹住而淹死；有人掉

进涨水的河里，同样也被淹死了；有人因撞到树枝或屋檐而丧命；还有人没有控制好降落伞，直接落到德军阵地中间，深陷地面炮火包围而撒手人寰。

安全降落的队员多数都因迷失方向而不知所措。有人被德军发现而丧命，还有人沿着海岸行走寻找同伴，其中运气好的找到了同伴，三三两两结成小队。他们之间相互提防，为确认是否是同伴，他们使用一种名为“板球”的金属玩具，只要用手指一按，就能发出类似蟋蟀的叫声。

战后继麦克阿瑟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官的马修·李奇微少将率领的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负责“底特律行动”。他们在流经科唐坦半岛中部、与杜沃河汇合的梅特勒河两岸降落，控制一处名为圣梅尔埃格利斯的小镇。只要占领这里，就可将通往半岛顶端瑟堡的铁路和公路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为使从犹他滩登陆的己方部队一举攻占瑟堡，他们还需确保架设在梅特勒河上的多座桥梁。

和第101空降师一样，他们跃入夜空，降落地点很分散，落在目标地域梅特勒河西岸的仅有4%，大多数无法确保梅特勒河以及杜沃河上的渡河点，而按计划降落在圣梅尔埃格利斯及其周边的只有几个排。

有个空降队员在降落过程中，降落伞挂在圣梅尔埃格利斯教堂高耸的塔尖上。多么凑巧！这时教堂旁边面向广场的建筑失火了，教堂的大钟发出震耳欲聋的钟声，广场上出现了传水桶救火的市民。这个空降队员毫无办法，只好装死挂在那里，因为德军的高射炮部队正瞄准不断降落的其他空降队员射击。和他们相比，挂在教堂的塔尖上显然安全得多。

他的忍耐得到了回报。在小镇郊外降落的己方人员结成小队，在隐蔽中朝小镇中心推进，经过约1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德军撤退了。就这样，圣梅尔埃格利斯成为法国最早解放的城镇。

凌晨4点过后，美军的滑翔机部队相继在圣梅尔埃格利斯郊外着陆。滑翔机上搭载着吉普车和反坦克炮等因超重难以和士兵一起从运输

机上用降落伞空投的重型武器，而且增援部队也坐在车里。警戒严密的德军用高射炮打击拖拽滑翔机的运输机，很多运输机被击落了。尽管如此，还是有3/4的滑翔机终于着陆。但是由于着陆时地面的冲击，装在滑翔机后部的火炮和吉普车冲破了苫布向前飞去，给前方的乘坐人员造成了伤亡。第101空降师副师长唐·普拉特准将就在滑翔机着陆的瞬间，被从机舱后方飞来的吉普车挤压而死。

东方的天空变得明亮，黎明终于到来了。渡海而来的登陆部队接近了犹他滩。第101空降师6 600名士兵中，到达点集合的只有1 100人，直到傍晚，这个数字才增加到2 500人。第82空降师的情况也类似，同样是6 600人，在6月6日这一天集合了2 600人。两个师最后损失了1 200人，其中半数失踪。

直到6日晚上，第101空降师和第82空降师也没能取得联系，两个师的师长对战场上的状况究竟怎样也毫无把握，但是从2/3的人员损失上看，头一仗的结果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犹他滩上的美国突击装甲战舰（The National Archives）

不过空降攻击的确给德军造成极大混乱。出人意料的一点是，由于降落地点偏离过大，空降队员分散得到处都是，德军军官不断接到来自

现场的各种各样的报告，对盟军的意图没能做出有效反应，只是任由时间白白流逝。由于到处都有落下来的降落伞，野战电话令德军指挥所里的军官们应接不暇，不断接到“遭到敌人袭击”的报告。当然，由于抵抗组织切断了通信线缆，很多电话根本接不通了。

为了使敌人更加混乱，英国空军实施了“泰坦尼克行动”。他们派出40架轰炸机，空投了大量一接触地面就爆炸的稻草人伞兵，还在空中撒出铝箔片，干扰敌人的雷达。盟军终于让德军中了圈套，德军的大多数指挥官都深信不疑，以为诺曼底的变化是大规模的佯动作战，登陆部队真正的目标还是加来。

保卫桥梁的英国空降部队大显身手

与此同时，英国空军第6空降师降落到登陆地域东侧剑滩更靠东的内陆地带。率领该师的是理查德·盖尔少将。由他们实施的“汤加行动”，任务是在经卡昂注入大海的奥恩河与其东流淌的迪沃河的中间地带降落，保卫架设在这两条河上的桥梁。如果成功，可望阻止敌人的后备军从东方或东南方靠近，使在剑滩登陆的英军更趋顺利。

一部分空降部队还承担了另外两个特殊任务。

一个是保护架设在平行流淌的卡昂运河和奥恩河上的两座桥梁。这两座桥是连接剑滩和空降师展开地域的交通要冲。空降部队只要占领这里，从海上卸下的装甲车辆就能行进到奥恩河东岸；反之，如果桥梁掌握在德军手里，空降部队将陷入孤立，无法阻挡从东方驰援而来的德军坦克。

承担这一重要任务的是约翰·霍华德少校率领的英国陆军“牛津郡&白金汉郡”轻步兵团第2营D连。他们28人乘坐6架运兵用胶合板制“霍撒”滑翔机，由英军“哈利法克斯”轰炸机牵引，赶赴目的地。

霍华德自己也乘坐滑翔机，负责夺取卡昂运河上的佩加索斯大桥。当滑翔机高度达到5 000英尺（约1 500米）时，他们断开曳航索，飞跃

海峡。乘员们听见的只有风声，两名飞行员灵巧地操纵着滑翔机，进入着陆状态。着陆时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大了，滑翔机在地面弹起之后，又在草地上滑动，直到撞上铁丝网才停下来。由于冲击强烈，飞行员晕了过去，不过没有生命危险。滑翔机旁边就是目标桥梁，士兵们从几乎散架的滑翔机中跳了出来，立刻进入战斗状态。他们一过桥就被德军的守卫队发现，一时间枪炮齐发。枪战尽管激烈，但很快就结束了，佩加索斯大桥安然无恙。

大桥附近是湿地，生有一人多高茂盛的芦苇，当时的模样至今仍然原样残留着。在滑翔机着陆的地方，立有约翰·霍华德的胸像。

过了不久，霍华德就接到报告：另一座架设在奥恩河上的霍尔撒桥（蓝威尔桥）也“到手了”。在这里的敌人一枪都没开就逃跑了。他们立即用“火腿＆果酱”的暗号向司令部发报，报告两座桥梁安然无恙，作战行动取得了成功。霍华德的D连对两座桥的成功夺取，几乎是英国第6空降师开展的所有行动中唯一按预想计划实施的行动。

这个师所承担的另一特殊任务是压制奥恩河口的德军莫维尔炮兵阵地，这里就远不如夺取两座桥梁那么顺利。

这个拥有4座炮台的阵地由大量钢筋混凝土建造，只靠轰炸难以完全摧毁，这一任务轮到以精锐闻名的第9营了。由于敌人的防守薄弱，盟军先用“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实施轰炸，然后空降队员在特伦斯·奥特威中校的率领下，分乘4架“霍撒”滑翔机，直接降落到被铁丝网层层缠绕的炮台上。

虽然他们曾使用实物大小的模型反复训练过，但是在实战中还是出现了意外：由于德军的防空炮火异常猛烈，牵引他们的运输机被迫规避飞行，结果大大偏离目标地域，空降队员不得不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着陆。大多数空降队员降落在炮台以东迪沃河开阔的洪泛区，也有人被淹死了。尽管空降队员有600余人，但找到集合地点的只有160人。“兰开斯特式”轰炸机的轰炸也全都偏离了目标，莫维尔阵地依然保持着它的雄姿，纹丝不动。

盟军对德军莫维尔阵地进行轰炸。炸弹散落到很广阔的范围，轰炸没能奏效（Imperial War Museum）

图5-3 从剑滩到奥恩河、迪沃河方向

于是好不容易凑到一起的160人只好放弃以前的战斗计划，一起发

动攻击。敌军的炮火实在是太猛烈了，在攻击开始的几分钟之内，160人中有75人丧命。当英军最后夺取了阵地，却发现坐落在那里的，并不是预想中的150毫米口径的大炮，而只是75毫米的火炮。他们用塑胶炸药炸毁了炮台，一边搀扶伤员一边迅速撤退——这种时候离海上巡洋舰的射程范围越远越好。

凌晨3点左右，盖尔少将带领第6空降师指挥部的所有人员降落在奥恩河东岸蓝威尔桥附近。此时盖尔少将感到喜悦：自1940年6月敦刻尔克大撤退以来，他是第一位重返法国的英国将军。

海上登陆的“H时”

艾森豪威尔为第101空降师送行后，返回他设在朴次茅斯的帐篷办公室。凌晨1点，除了能听到飞往对岸法国的轰炸机群的轰鸣声，周围一切都很安静。艾森豪威尔默默地吸着烟。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失败局面，他准备了这样一篇声明：

> 我们在瑟堡至勒阿弗尔之间区域的登陆已经失败，未能取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立足点，我已命令撤回部队。根据可能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我决定在此时此地发起进攻。陆、空、海军部队都表现出了他们的英勇和忠诚。本次作战行动中任何招致抨击的错误，都由我一人承担责任。

清晨6点刚过，第一封战报终于到来了。艾森豪威尔正躺在床上，却没有入睡，一边阅读他所喜爱的西部电影小说，一边吸着他所中意的骆驼牌香烟。这已经是第4包了。

据战报，在运送空降部队的850架美军运输机中，被击落的仅有21架。英军的损失更加轻微，400架飞机中只有8架失踪。空军司令利——马洛里的担忧已经不复存在，他已经在抓紧时间撰写“您决断的睿智令

我向您表示祝贺”的道歉信了。

“D日”清晨天气晴朗，在诺曼底海滩的登陆部队马上就要投入战斗了。早在前一天夜里，由各种战斗舰艇和登陆船只组成的庞大船队就已经从英国的各个港口起航。现在天亮了，如果从空中俯望的话，恐怕只能发出喝彩吧！

在德军没有发觉的情况下，13.3万名官兵和武器弹药从英国南部以及爱尔兰各港口被悄悄运往对岸的诺曼底，成功登陆。这一跨越海峡的作战行动以罗马神话中海神的名字“尼普顿”命名，使用的舰船数量多达6 939艘。当年在敦刻尔克大撤退时使用的是800余艘，所以二者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所有舰船中包括战斗舰艇1 213艘，登陆船只4 126艘，商船864艘，英国及加拿大舰船占79%，美国舰船占16.5%，其余舰船则属于法国、荷兰、波兰、挪威、希腊等其他盟国。

驶往对岸的过程之所以必须倍加小心，是因为海中存在从布列塔尼基地开出的德国U型潜艇。为切实排除这种威胁，英国空军岸防航空兵第19队的表现格外突出，他们没有让一艘U型潜艇潜至英吉利海峡。

来自最高司令官的问候

出港不久，各舰的舰长就通过舱内广播开始阅读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正是《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致登陆作战官兵的信》。

盟国远征部队海陆空诸位战士：

你们马上就要踏上征程去进行一场伟大的圣战，为此我们已精心准备了数月。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你们，各地热爱和平的人们的期望与祈祷伴随着你们。

你们将与其他战线上的英勇盟军及兄弟一起并肩战斗，摧毁德

国的战争机器，推翻压在欧洲人民身上的纳粹暴政，保卫我们在一个自由世界的安全。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你们的敌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久经沙场。他们肯定会负隅顽抗。但现在是1944年，与纳粹1940、1941年连连取胜时大不相同。盟军在正面战场予以德军迎头痛击，空军削弱了德军的空中力量和陆上战斗能力，后方弹药充足、武器精良、部署得当、后备力量充足。潮流已经逆转，全世界自由的人们正在一起向胜利迈进。我对你们的勇敢、出于义务的献身精神以及战斗力充满了信心，迎接我们的只能是彻底的胜利。

祝你们好运，并让我们祈求万能的上帝祝福这伟大而崇高的事业获得成功。

毫无疑问，这段经最高司令官反复推敲、鼓舞士气的简洁语言令官兵们振奋不已。

凌晨0点，所有的舰艇都接到“全员战斗状态”的号令。接着，士兵们对着烤鱼、香肠、炸面圈构成的豪华早餐大快朵颐，也许这就是“最后的晚餐”了。凌晨4点半，万事俱备，他们开始踏上登陆艇。

好像和此前专注于排雷作业的扫雷艇换班一样，压制德军海岸炮台的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等，也都行进到了指定位置。

登陆用舰船依次下海了。士兵们必须自己从乘坐的舰上使用缆网下去。士兵们背负的火焰喷射器和无线发报机有100磅（约45公斤）重，令人难以动弹，用缆网爬上爬下的确是个苦差事。

面对1.5米的波浪，小小的舰船都剧烈地上下摆动，转移的时机难以把握。有人因被夹在战斗舰艇和登陆艇之间，造成腿骨骨折。

所有士兵都转移到登陆艇上以后，他们就向陆地进发了。这时很多士兵开始晕船。波浪拍打过来，他们全身上下都湿透了，几个小时前刚刚吃下的豪华早餐又被吐了出来——那些吃得太饱的人最难受。到达海岸的时候，将死亡的恐惧转化为暴饮暴食的士兵体力和气力都丧失殆尽，接下来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就是很容易遭到敌人的射击而丧命。

向5处海滩发起攻击的时间（“H时”）是根据潮水的涨落分别决定的：美军负责的犹他滩和奥马哈滩在6点30分，英军负责的剑滩和黄金滩在7点15分，英属加拿大军队负责的朱诺滩右翼在7点20分，左翼在其10分钟以后。美军掩护登陆的舰炮射击在5点50分开始，英军则在5点30分开始。

朝奥马哈滩前进的步兵登陆艇（U.S. Navy Naval History and Heritage Command）

血染奥马哈滩

5处海滩中，战斗进行得最激烈的是奥马哈滩。艾森豪威尔的挚友伦纳德·杰罗少将率领美国第5军下属的“大红1师”，即第1步兵师和第29步兵师的3.4万名官兵承担了这一任务。

清晨5点20分，第一波登陆艇驶离母舰。15分钟后，在距海岸5 000码（约4.6千米）的海上，32辆经改造已可在水面航行的水陆两栖双驱动坦克从坦克登陆艇上直接下水。尽管安装在这种坦克侧面的帆布比车身还高，可以阻挡水流，可是由于风浪太大，27辆当时就进水沉没了，乘员有33人被淹死。剩下的5辆中有3辆开闭门不能动，像坦克登陆艇一样搁浅在海滩上，最后安全上岸的只有2辆。

清晨6点30分，奥马哈滩的“H时”终于到来了。登陆艇在接触到海岸的同时，前部一人高的开闭门就“啪嗒”一声向前打开，霎时间，敌人的枪弹直射进来，德军的机枪正好瞄准船头射击。盟军士兵由于装备沉重，无法及时隐蔽逃脱，要躲避枪弹只能潜入海水中。虽然德军的枪弹在海里同样毫不留情，但枪弹一入水速度就下来了，很多人因此保住了性命。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因沉重的装备和剧烈的波浪而被淹死。

对士兵们而言，到达“近在眼前”的海岸的距离真是无比漫长。从各个方向传来的“我被打中了”的惨叫声不绝于耳。士兵携带的装备越多，生存下来的概率越小。

沙滩上也是一副地狱景象。到处都是咽气的士兵，还有人身负重伤，动弹不得。当海面徐徐上升，在浅滩上被击中不能行动的士兵无法把头抬起，最后都被淹死了。前面的登陆艇被击中燃烧的同时，后面其他舰只又冲了过来，简直就像遭袭击而陷入混乱的牛群。海岸上到处都是牺牲者，尸体在涨潮落潮时被波浪裹挟，一旦大浪拍过来，就像圆木一样翻转滚动。

有的士兵回忆：“我们的武器至少有80%因为进了沙子和海水而无法使用。”由于士兵们的战斗意愿异常高涨，有人下船过程中无意中碰掉了枪口的防水帽，海水就灌进了枪膛。

“D日”清晨，车辆人员登陆艇（LCVP）的门向前打开，美国第1步兵师第16团E连的士兵们在奥马哈滩登陆（Chief Photographer’s Mate (CPHOM) Robert F. Sargent, U.S. Coast Guard）

一位联络官在信封上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11：30 迫击炮、步枪、88毫米火炮、机枪等喷出的火舌朝海岸倾泻过来，或者射向海岸后方的高地，或者被其击中，造成伤亡。

正午涨潮，海岸上漂浮着尸体。最高水位线上多数都是美军士兵的尸体。

12：15 迫击炮和88毫米火炮的猛烈炮火开始从东面打向西面。有好多地方不一会儿就落下5发炮弹……“谢尔曼”坦克中弹后，乘员像老鼠一样跳出来——他们居然还活着。

12：30 坦克登陆艇挨了两颗水雷，继续前进，接着撞到了第三颗水雷，遭损坏，后部沉了下去。由于炮弹爆炸，两名水兵飞向空中，又掉进海里，再也没有浮上来……

14：40 更多的迫击炮命中了更多的人，有5艘车辆人员登陆艇中的士兵登陆，他们伏在海滩上，但有5人被迫击炮打中，剩下的站起身来朝我们几小时前挖好的猫耳洞奔跑。

为什么在奥马哈滩出现如此之多的美军士兵伤亡？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里的地形。自海而上，先是不足10米宽的沙滩，然后是护岸、草地以及高约30米的丘陵。从东侧开始依次排列着滨海科勒维尔、滨海圣洛朗、滨海维耶维尔三个海边村庄，而这一带流淌着5条河流，攀上河流冲刷出的河岸才能来到台地上。在可供攀登的5处地点，是德军修筑了炮台的防守阵地。

也就是说，在高台上可对大海一览无余，易守难攻，这就是奥马哈滩。并且海岸本身也恰好用于瞭望，它的中央部分更是凹了进去，形成一道曲线，从正面和侧面都可以展开攻击。涨潮时沙滩变得狭窄，盟军士兵只能从中央部分上岸。

实际上在盟军的5处登陆海滩中，奥马哈滩是最后一个被选中的。当时盟军也知道这里不利的地形和地势会造成相当数量的伤亡。为了解诺曼底各海滩是否能承受车辆的负重，甚至有几个专家在夜里悄悄上岸，提取沙滩的样本。

那为什么还是选中了这里呢？原因很简单。英军和加拿大军队负责东侧的3处海滩，美军所负责的除了最西侧的犹他滩以外，可供登陆的海滩就只有这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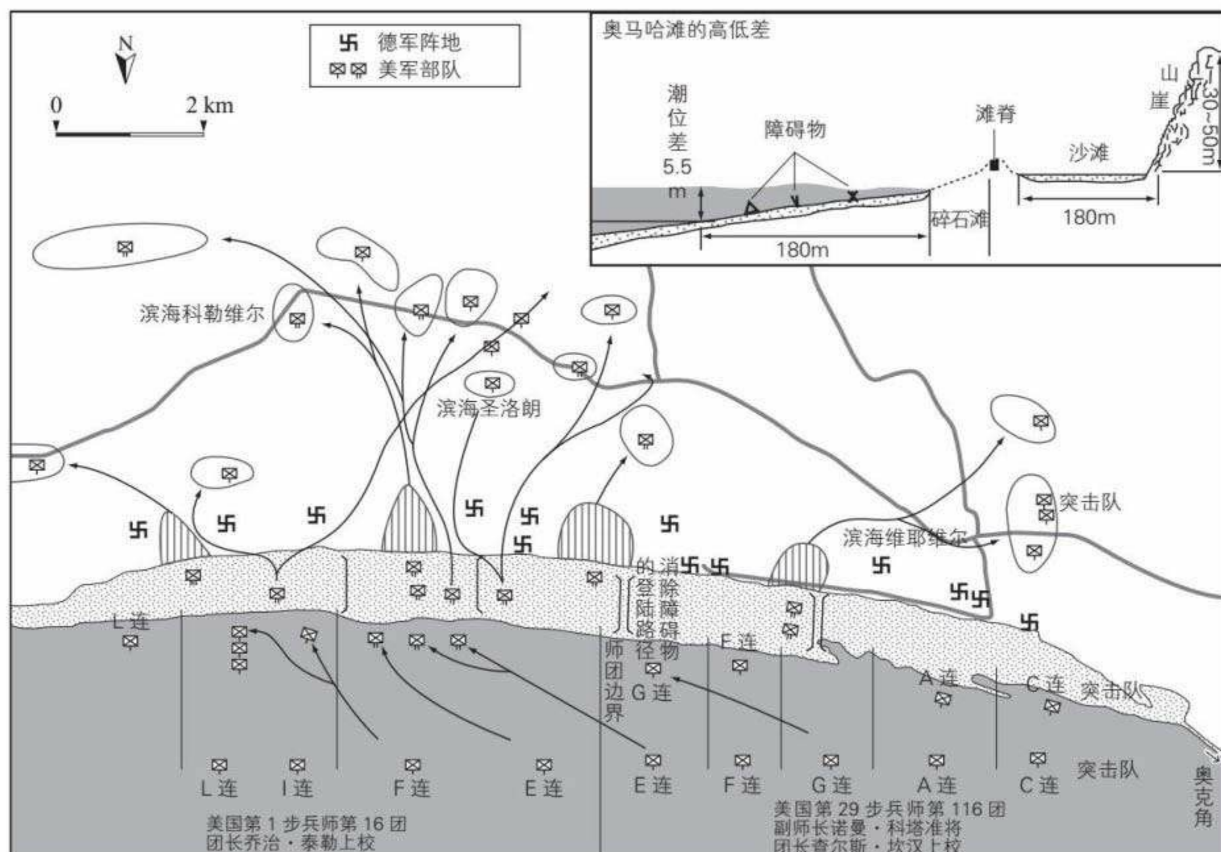


图5-4 奥马哈滩

而且盟军对奥马哈滩德国守军的战斗力判断过低了。糟糕的是，原本驻扎在内陆圣洛的德军精锐第352步兵师于登陆当天恰好进行了反登陆演习，前出到海滩附近。这一偶然事件进一步加大了盟军的伤亡。

美国陆军航空兵为掩护登陆部队而进行的轰炸也没有显著效果。在避免轰炸到从海上蜂拥上岸的登陆艇的同时，自身还需回避在目标上空被敌军高射炮击中的风险，因此炸弹落下的时机都有偏差，没能破坏掉敌军的阵地和铁丝网。舰炮轰击虽能令德军暂时沉寂，可是随着登陆艇接近海岸，他们就又活跃起来了。

进一步造成混乱的是因舰炮轰击而腾起的浓烟和沙土。由于艇长们目测有误，多数登陆艇并没有到达目标地点。结果各部队过于分散，上岸后不能快速进入攻击状态。海滩上极度混乱，部分地方士兵拥挤在一起，而其他地方又过于稀疏了。

现在到奥马哈看一看，海滩仍没有丝毫变化。我们到访的时候正值涨潮，沙滩部分很短。从波浪线到开阔地带仅有10米宽，又经过几米宽的砂石地和防波堤，紧接着就是长着矮草的丘陵。可是登上丘陵后印象就为之一变：到处都是德军的碉堡，也就是“大西洋壁垒”的遗迹。其中甚至还有内部5米见方的大碉堡。丘陵顶部高出沙滩30米左右，视野的确非常好，想从海上攻占这里的确是鸡蛋碰石头。在能够俯视海滩的草地上，建有“大红1师”的纪念碑和追悼阵亡将士的白色纪念碑，在通往内陆的方向上，延展着美军阵亡将士的墓地。

现场指挥官科塔准将的决断

攻击开始后1个小时，7点30分，盟军的指挥官们带领着部下，依次到达海滩。如果此时现场指挥官没有发出恰当明确的指示，打开突破口，战场就会陷入胶着状态。

第29步兵师副师长诺曼·科塔准将和带领该师第116步兵团的查尔斯·坎汉上校就是这样拥有英明决断头脑的指挥官。

两人首先对眼前状况做了判断，商讨下一步该如何行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士兵在对随身武器进行清点检查后，突破铁丝网或地雷阵，登上低矮的丘陵，然后才能攻击德军阵地。为此必须先找到合适的突破口。

科塔冲向海岸的右方，坎汉冲向海岸的左方。坎汉的右手腕很快就被流弹击中，他用绷带包扎好伤口，对军官们大吼：“快把士兵带离海滩！”同时寻找可用于作为突破口的地方。

这时，负责奥马哈滩东侧的第1步兵师也遭到了同样的打击。在巡视海滩的同时，像坎汉一样对官兵们大声疾呼的，是该师第16步兵团的乔治·泰勒上校。他对部下喊道：

“留在这处海滩上的，只有被打死的人和将要被打死的人。快！咱们快离开这个地方！”

科塔终于决定了攻击地点：距离护岸5米左右像小山一样耸立的崖壁一角。他命令身边的士兵：“冲锋枪连续射击，不要让上面的德国兵露头！”接着呼喊其他士兵，向眼前的铁丝网下扔出好几个爆破筒，然后看准时机点火爆破。他还指示第5突击队的马科斯·斯纳塔中校：“让突击队打开其他突破口！”

科塔的眼前火光迸散，铁丝网被完全炸毁了，舰炮轰击也点燃了崖壁上的杂草，一时间浓烟滚滚。见此局面，科塔立刻决定：“现在正是前进的时候！”

但是最早钻过铁丝网的士兵们很快被敌人的机枪打中，看到这一幕的士兵开始犹豫不前。科塔身先士卒，钻过铁丝网，到达崖壁，在那里设立了临时指挥所，与坎汉会合，士兵们从那里攀上了悬崖。

率领第5军的杰罗少将在登陆指挥舰的舰桥上等待着现场报告。战报总也不到，他开始焦虑不安了。9点15分，指挥艇终于送来了第一份战报：“舰船和车辆堆积在岸边，士兵们在海岸上挖掘战壕。敌人等舰船登陆才开始射击。”工兵部队也发来“不能保证打通穿过地雷阵的道路，敌人开始集中射击我方的将校和士官”的报告。

领导者肖像

诺曼·科塔
Norman Daniel Cota, Sr.（1893—1971）

生于马萨诸塞州。北非登陆战和西西里登陆战后，作为美国第29步兵师副师长参加“D日”的战斗。在西点军校因热爱橄榄球和高两届的艾森豪威尔结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第1步兵师情报作战参谋。“火炬行动”后，在“爱斯基摩人行动”中志愿参加前线部队，晋升准将。从诺曼底登陆直至解放巴黎，任第28步兵师指挥官。从1944年9月开始的5个月中，在德国和比利时边境附近指挥阿登战役等。1946年以少将军衔退役。

The National Archives

情况不容乐观。杰罗向重型巡洋舰内的上司、美国第1集团军司令官布莱德雷报告了现状。布莱德雷开始斟酌，既然奥马哈滩走不通，是不是令后续部队通过同样由美军负责的犹他滩和英军负责的3处海滩实施迂回。不过，正因前方科塔所展现出的英勇，事态确实正在好转。也有士兵几乎没有受到敌人的攻击，突破了海岸线，伤亡极小，已经到达丘陵上面的村庄。在不断打开困局的过程中，形势变得井井有条。

舰炮轰击也开始奏效——并不是停泊在海岸附近的战列舰所进行的盲目炮击，而是逼近海岸的驱逐舰发动的炮击。德军阵地遭到毁灭性打击。

这时候，科塔杀开血路，终于来到崖壁下。因为自己派出部下做先遣队，不知情况如何，他非常担心。抬起头还能看见他们的身影。由于敌人的机枪射击异常猛烈，他们遭到封锁，无法继续前进。科塔立即攀到崖上，和部下会合，他走出人群，站到队伍最前面，大声说：“你们能冲到哪里只有走着瞧！只要前面有东西动你们就只管开枪！”然后他手持自己常用的柯尔特0.45口径的左轮手枪，身先士卒，展开突击。尽

管几次被敌人的机枪挡住去路，但很快他们就都站在丘陵上了。

不久，科塔偶然遇到了坎汉的第116步兵团C连。他们借着燃烧的杂草形成的烟幕，登陆变得相对容易。科塔一边用手指轱辘轱辘地旋转着柯尔特左轮手枪，一边问：“哎！小子们，你们想到哪里去啊？”

结果在这一天里，科塔居然深入了美军前线部队两天后才到达的内陆地带。因为此举，科塔荣获了美军银星勋章和杰出服役十字勋章，英国的蒙哥马利也授予他一枚勋章。但因当天过于冒进，第1集团军司令官布莱德雷批评了他。

突击队死守奥克角

奥克角位于奥马哈滩西面的突出位置。在高出海岸54米的断崖上筑有钢筋混凝土炮台，据传上面有6门155毫米火炮。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左面的犹他滩和右面的奥马哈滩都处于其射程之内，登陆部队将遭到毁灭性打击——无论如何都必须避免这样的伤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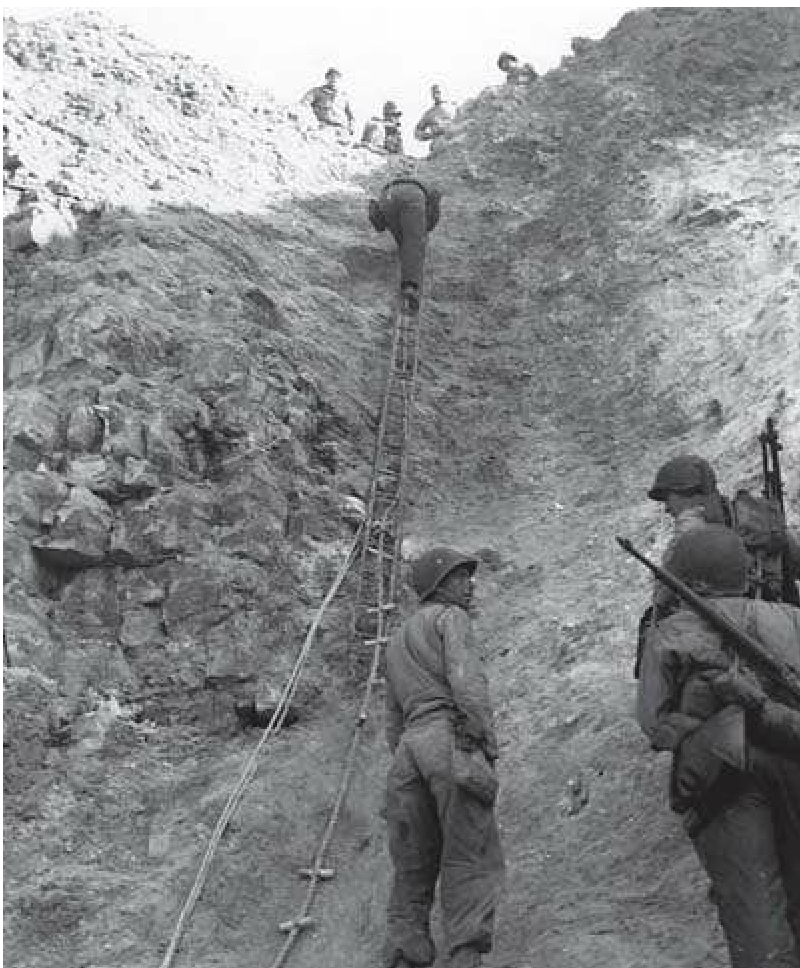
但是空袭和舰炮轰击很难对其造成有效的破坏，悬崖峭壁这种地理形态也不适合使用降落伞或滑翔机。因此，詹姆斯·拉达中校率领美国第2突击营的3个连共计255名士兵，计划从海上接近目标，然后攀上耸立的断崖，控制炮台。

停泊在海上的美国战列舰“得克萨斯号”用舰炮轰击，为突击队提供了后盾。他们在距离海岸20千米处分乘登陆艇和水陆两用车“鸭子”（DUKW）接近崖壁，用特制的投射机将连接了绳子的钩索射向悬崖，然后拉着绳索攀登。还有人使用了伦敦消防队提供的长梯。

德军的防守部队用机枪和手榴弹应战。海上的美国驱逐舰“萨特利号”和英国部族级驱逐舰用猛烈的舰炮射击作为回应，两者之间的战斗趋于白热化。最后，崖上地方被突击队成功控制。

不过，令人惊愕的是，炮台只是一个空壳——突击队员们很快发现

155毫米火炮正躺在150米开外。这时，德军开始反击了，突击队不得不暂时撤退。他们在被己方舰炮轰击得千疮百孔的海角上死守，直到第三天援军到来。最后登陆的255名士兵中，有135人丧命。在奥克角上面，除了德军的碉堡遗迹，就是盟军舰炮轰击产生的无数大坑。



在奥克角挂上绳梯，攀登崖壁的美国陆军突击队战士（The National Archives）

连夜设立军指挥部

10点46分，指挥舰上的杰罗少将收到“情况正在好转”的无线电报，到了12点30分，在奥马哈滩登陆的美军已达18 722人。30分钟后，在第1师第16步兵团和第29师第116步兵团的支援下，美军开始进攻海边村落滨海科勒维尔。第29师第115步兵团也开始向内陆推进，他们的目标是滨海圣洛朗。

17点21分，杰罗收到“大部分登陆的轮式车辆和履带式车辆都可以通行了”的报告。

“总算可以了！”杰罗放心了，他自己也立即登陆。他穿过奥马哈滩，安全登陆，到达距前线450米的军指挥部时是20点30分。

这一天，计划在奥马哈滩登陆的士兵是34 250名，其中伤亡2 000余人，德国方面的伤亡为1 200人左右。和其他4处海滩相比，牺牲者特别多的这片海滩以“血腥奥马哈”的别称流传后世。这一天摄影家罗伯特·卡帕也在登陆部队中，队伍中还出现了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身影。

与奥马哈滩形成鲜明对比，登陆行动推进得最顺利的是旁边的犹他滩。约瑟夫·柯林斯少将负责率美国第7军的2.3万名士兵在此地登陆。最早登陆的是雷蒙德·巴顿少将指挥的第4步兵师。副师长是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儿子小西奥多·罗斯福准将，他也是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堂弟。

担任第4步兵师先头部队的是第8步兵营。由于强劲的沿岸海流以及舰炮轰击腾起的烟雾影响，视野不良，他们所乘的登陆艇到达了比计划登陆地点偏南1 800米的地方。不过幸运的是，这里德军的防守比计划登陆地点薄弱很多。罗斯福准将走在队伍最前面，大声鼓舞士兵：“重返预定地点是混账想法，我们就在这里开始战斗！”这个决定非常正确。战场形势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形成的，而是处于瞬息万变之中，所以必须随机应变，及时更改行动计划。只有在极端复杂的状况中做出正确决策的人才能生存下来。

登陆一个星期以后，落潮时奥马哈海滩的景象。数只坦克登陆舰停靠在岸边，正在卸下人员和货物。为防止俯冲式轰炸机从低空攻击，空中飘浮着系了绳索的防空气球（The National Archives）

另外，犹他滩还有好几个有利条件。和奥马哈滩一样，盟军的舰炮轰击虽然几乎没有命中敌军的防守阵地，却沉重打击了雷区。而空袭则比奥马哈滩距离目标地点近得多。由于波浪相对平稳，水陆两栖坦克几乎没有损伤就登陆了，火炮也都安全上岸。扫荡德军的时间还不到1个小时，工兵就清理了整个海滩。“D日”当天阵亡和失踪的人也才200人，相当于奥马哈滩的1/10。

3

英军、加拿大军队的鏖战

英军、加拿大军队尽管登陆相对顺利，但面对眼前德军的精锐部队，攻占本已经唾手可得的诺曼底中心城市卡昂竟然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

让我们看一看他们所负责的黄金滩、朱诺滩、剑滩三处海岸的战斗情况。

新研发出来的特种坦克大派用场

在英军负责的三处海滩中，位于奥马哈滩东侧的是黄金滩，这处海滩夹在阿罗芒什和拉里维埃之间。负责此次攻击的是英国第30军旗下、由D. A. H.格雷厄姆少将率领的第50步兵师的2.5万名士兵。他们计划登陆后立刻向位于西侧的内陆城市巴约推进，进而右转，进攻英军人工港“桑葚B”的预定建设地阿罗芒什，最后和从奥马哈滩登陆的美军会师。

与奥马哈滩的美军士兵一样，英军也为波涛汹涌的大海和晕船所苦。尽管这里也使用了水陆两栖双驱动坦克，但装甲部队那一瞬间的判断很宝贵——他们无视上级“到距海滩4 500米的地方下水”的指示，劝说坦克登陆舰的指挥官，让坦克登陆艇行驶到距海岸900米的近处再投放坦克，因此，在到达海滩前就“淹死”的水陆两栖双驱动坦克非常少。

除了这种水陆两栖双驱动坦克，带有火焰喷射器的“鳄鱼”、车体前方安装有引爆反坦克地雷连枷的“蟹”等英国陆军霍巴特少将研发出来的

特种坦克也都大显身手。

突袭登陆的实战中，右翼（西方）为第231旅，左翼（东方）由第69旅打头阵。在右翼的登陆地点勒维耶尔，因海浪汹涌，坦克兵迟到，很多陆军步兵在此身亡。不过英军还是很快就成功控制了海岸，迅速卸下了兵员和物资。

到11点，第151旅上岸，紧随其后的是第56旅。在这一天里，共有2.5万名英军踏上了黄金滩。第56旅受命攻打西南方向的巴约，而第151旅则南下直取比塞埃尔。

负责左翼的第69旅以格林·霍华兹步兵营第6连做先导，他们一登陆就向炮台所在地进军，制服了在舰炮打击下早已丧失斗志的德军守卫部队。

在这次战斗中大显身手的是二级准尉斯坦利·霍利斯，他独自炸掉了两座碉堡，还主动承担诱饵的角色，挽救了两名部下的性命。他因表现英勇而荣获了“D日”当天颁发的唯一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国对军功卓著者的最高奖章）。

英军特种部队第47突击队也同时在黄金滩登陆，他们以与奥马哈滩相邻的贝桑港为目标，并计划在那里与在奥马哈滩登陆的美军第1步兵师会师。经过激烈战斗，突击队到达了贝桑港南部的高地，并在高地挖掘战壕过夜。

傍晚英军攻占了阿罗芒什，此时第151旅也抵达了连接巴约和卡昂的公路。巴约城内基本看不到德军，第二天（6月7日）英军控制了巴约。从黄金滩登陆的英军约有400人伤亡。

为迪耶普复仇的加拿大军队

在黄金滩东侧，拉里维埃和滨海圣托班之间，铺展着开阔的朱诺滩，这里由英国第2集团军属下加拿大陆军第3步兵师登陆，师长是罗德

·凯勒少将。加拿大军队也曾参加过1942年的迪耶普突袭行动，损失惨重，人员伤亡过半。对于这次登陆，加拿大官兵的内心都怀着强烈的复仇欲望。

第3师的登陆地点在海滩中间位置的滨海库尔瑟勒和最东端的滨海圣托班。负责前者的是第7步兵旅，后者则是第8步兵旅。

第7步兵旅在索尔河两岸登陆，左岸登陆的部队控制了海滩，右岸的部队则努力控制库尔瑟勒小镇；第8旅奔向位于目的地前方的滨海贝尼埃尔。

几乎所有方向都遇到了敌人的顽强抵抗，但是随着双驱动坦克以及由“丘吉尔”坦克改装、专门拔除碉堡和钢筋混凝土障碍物的皇家工兵装甲车（AVRE）等上岸，盟军逐渐压制了敌人。

尽管第一波加拿大步兵已经深入内陆，但是盟军的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却拥挤在海滩上，引起交通堵塞，以致后续部队的登陆速度明显下降。凯勒少将为眼前的混乱大发雷霆——为了报道自己作战勇猛，他还带着随军记者和摄影师。

由于混乱导致的迟缓，以及德国第716步兵师意外顽强的抵抗，留给后续的第9步兵师的时间变得过于紧迫。他们本来指向内陆，以卡昂西面的卡尔比克机场为主要目标。当拖到下午4点向机场进发的时候，又在前方8千米的村庄遭到猛烈抵抗，无法前进。

结果22 000人登陆，伤亡达1 000人。加拿大陆军第3步兵师仅仅完成了“D日”计划的一半。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责备他们，因为德军也十分强大。在接下来的好几个星期里，在卡尔比克机场以及卡昂周围地区，盟军和德军的最精锐部队“希特勒青年团”，即党卫军第12装甲师陷入了泥淖般的拉锯战中。

与强大德军苦战的英军

剑滩西起滨海圣托班，东至奥恩河口，负责此地登陆的是T. G.伦尼少将率领的英国第3步兵师。

在这处海滩的内陆部，有巴斯——诺曼底地区的中心城市卡昂。地面军队司令官蒙哥马利上将认为，尽早占领卡昂非常关键——在那之后的进攻步骤是以卡昂为轴，同自西而来的美军会师，然后向南再向东。第3师被赋予的使命就是在日落前“占领卡昂，或封锁住这里的敌人”。

登陆前负责舰炮轰击的舰队声势浩大。由于这一带德军的炮台为数众多，盟军调集了2艘战列舰和4艘巡洋舰进攻海滩，用13艘驱逐舰和1艘海防舰加强侧翼。

海里有岩礁，可供登陆的海岸很有限，结果只有1个旅登陆。

剑滩的“H时”是早晨6点45分，首先登陆的是第8旅的两个步兵营。他们的任务是在坦克部队的支援下，攻克距离海岸带状地域1千米左右的滨海埃曼维尔和圣托班达克内。尽管面临着德军的猛烈攻击，包括指挥官在内的阵亡者众多，但英军还是在9点占领了滨海埃曼维尔。

紧接着第8旅跟“自由法国”的两支特种部队一起登陆的英军第1特种旅的任务是保护夜里降落到佩加索斯大桥附近的第6空降旅的后勤路线。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西蒙·弗雷泽准将，在突袭迪耶普时，他曾率领第4特种部队为占领一座沿岸炮台立下汗马功劳。弗雷泽还是苏格兰贵族的后裔，在他身边总有一位名叫比尔·米林的风笛手。比尔即使在海中也吹奏风笛，用来鼓舞己方的战士。

尽管比计划时间稍迟，特种旅还是向内陆进攻了。他们击败河口左岸威斯特姆的敌人后，与守桥的空降部队会合。德军随时可能到来，他们提心吊胆。比原定计划晚了两分钟，弗雷泽准将和约翰·霍华德少校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在剑滩的进攻目标中，尽管盟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控制了东面海滩，但向内陆的进军却无法称为“顺利”。其原因有很多，比如登陆的部队仅有一个旅，很多士兵居然在海滩上煮茶喝，英军不习惯步兵和坦克

协同作战等，再加上因意外的涨潮，本应为进攻内陆的步兵提供掩护的坦克部队迟到，任由时间白白流逝……不过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德军出乎意料的激烈抵抗。

其中最令他们棘手的是一处名为希尔曼的德军阵地。据事前调查，这片阵地纵350米，横540米，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洞穴里架设着机枪，还有钢铁制成的瞭望台，而且它们之间有纵横交错的战壕相连接——这里是德国第736掷弹兵营的老巢。仅凭这一点，其防御力量就不可小觑。

第8旅萨福克营的士兵们负责攻取这片阵地。他们没有坦克支援，需要想办法钻过火炮和机枪的缝隙，越过雷区和铁丝网。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营长认为在没有坦克支援的情况下发动攻击几乎等于自杀，要求派坦克。司令部也接受了他的要求，出动了坦克。只不过在攻取卡昂时坦克部队已然竭尽全力，原本就很脆弱的坦克部队此时越发显得不堪一击。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到晚上8点左右，希尔曼阵地终于安静下来了。

受命进攻卡昂的第185旅也试图迂回希尔曼阵地而过，但其火力强大，枪炮覆盖范围广，难以从侧面绕过，结果在“D日”当天，185旅仅前进至距卡昂5千米的地方。

从剑滩登陆的官兵有2.9万人，其中伤亡有600人左右。第3步兵师是在五处登陆海滩中唯一没有遭到德军大规模反击的师级部队，然而其登陆当天进攻卡昂的目标却完全失败了。

《诺曼底登陆》的作者安东尼·比弗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第3师指挥部的愚蠢无能。普通坦克自不必说，如果派出能破坏敌人坚固暗堡的皇家工兵装甲车等，采取对步兵充分支援的手段，进攻效率就可能大大提高。比弗还指出，不仅如此，英国第2集团军司令官迈尔斯·邓普西中将，甚至是统率第21集团军群的蒙哥马利上将，“在登陆后向内陆部进攻这一重要阶段，疏于统筹思考，未能决定十分明确的先后顺序，才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在这个问题上，蒙哥马利“己方实力的质与量若未占

据绝对优势绝不出击”的极度保守主义显然也应该算上一条。

获取情报的德军

那么德军对“D日”的到来没有丝毫预估吗？答案是“是”，同时也是“否”。

实际上，在装载了空降部队的运输机从英国出发前，在法国的德军最高司令部已经对盟军即将进攻欧洲大陆有所了解了——且不说具体计划。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一切全有赖于谍报部门的工作。

前面已经讲过，有很多抵抗组织在盟军的指挥下开展活动。统筹这些活动的是设在伦敦的英国特别行动处（SOE）。英国特别行动处于1940年设立，目的是协调通过破坏活动和阻碍活动实施的针对敌国的所有战斗。据其记载，1944年春，参加法国抵抗运动的人数已达35万之众。

他们的任务是从事间谍和破坏工作。说到破坏，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大规模的行动，其实举一个例子，在德军的水泥搅拌机中掺进几块方糖就是一种很完美的破坏工作。钙吸收氧和砂糖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易溶的钙糖酸盐，可令水泥失去黏着力——当然外观上完全看不出来，可是炮台和碉堡使用了这种“弱化水泥”，一旦被炮弹命中，很快就会垮掉。

临近“D日”当然要准备一些特殊计划。其中包括破坏法国境内的车站以及铁路要点、阻碍铁路运行的“绿计划”，在德军补给车辆通行的道路上抛洒尖锐的图钉或玻璃碴来扎破轮胎的“龟计划”，切断德军地下线缆的“紫计划”，以及同样是切断高压电线缆的“青计划”等等。

问题在于，如何传达行动开始的具体日期？他们选择的方法是广播。英国特别行动处在每个月的1日、2日、15日和16日，通过BBC的法语广播播告加密信息。通知“D日”时间的暗号是法国诗人保尔·魏尔伦的

《秋歌·落叶》的开篇：

秋天 Les sanglots longs

小提琴的 Des violons

叹息 De l’automne

我感觉到了 Blessent mon cœur

深深的 D’une langueur

伤悲 Monotone.

如果中断其他广播内容插播这首诗的前半部分（至“叹息”），就是“登陆行动临近”的暗号；如果播放的是后半部分，就是“行动48小时内开始”的暗号：这是个双重暗号。

打入抵抗组织的德军间谍刺探到了这一计谋，马上报告给了德国国防军谍报局的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知道这是情报部门的最高机密，于是命令谍报局的工作人员时刻不停地侦听BBC广播。

辛辛苦苦地竖着耳朵的他们很快得到了回报。防守塞纳河与默兹河中间地带的德国第15集团军的情报人员在6月1日—3日的三天里收听到了这首诗歌的前半部分，在6月5日收听到了这首诗歌的后半部分。6月5日的播送时间分别是21点20分、22点、22点15分，共三次。

谍报人员知道了盟军会在6月7日22点15分之前开始大反攻，马上紧张起来。虽然他们将这一重要情报上报给了各高层，却没有产生任何效果。统率第15集团军的汉斯·冯·扎尔穆特大将直接以命令部队进入警戒状态加以应对，但也仅仅如此。隆美尔统率的B集团军群也接到了情报，但是谁都没有认真对待。伦德施泰特的西线总司令部也获知了这一消息，但一位工作人员说：“什么魏尔伦的诗？难道艾森豪威尔会用BBC来宣布开始登陆行动？！”他们不相信这一情报可能也是没有办

法。

此前德军相信到6月10日左右天气状况一直是恶劣的，盟军理应不会发起攻击。德军并没有盟军那么优秀的天气预报机构，因为德军在冰岛和格陵兰岛的气象观测站不是被盟军破坏，就是被盟军占领。最致命的问题是，德军在科唐坦半岛以西从来就没有过气象观测站，而那里却是诺曼底登陆行动的重要地点，所以他们没能注意到那些勉强可以登陆的暴风雨天气的间隙。当然德国也拥有载着气象观测设备的货船，可是英军窃听到了德军的无线电通信，把它们全都击沉了。也就是说，盟军天气预报部门所发现的36个小时的好天气，德军却一点儿也不知道。

实际上，为了祝贺妻子的生日，以及和希特勒当面商讨两个装甲师返回西线的问题，隆美尔趁这种恶劣天气回德国了。守卫诺曼底海岸一带的德国第7集团军司令官弗里德里希·多尔曼大将也相信了早前的天气预报，他原本计划6月6日把各师师长都召集到布列塔尼地区的中心城市雷恩，大家在那里进行室内沙盘演练。

初期迟缓的致命后果

“D日”的早晨，隆美尔正在德国南部巴登——符腾堡州乌尔姆附近一座名为赫尔林根的小镇上。他前一天到达了此地，就是为了能和妻子一起安静地生活两天。此时在他所指挥的B集团军群司令部里看家的是参谋长汉斯·斯派达尔中将。早晨6点半，斯派达尔一接到诺曼底海岸有大规模舰队出现的报告，立刻就给隆美尔挂了电话。情况紧急，隆美尔连忙打电话给希特勒所在的伯格霍夫山庄，取消了对总统的拜访，然后乘上自己的汽车赶回法国。当他们到达B集团军群司令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作战室里的阁僚们正在全力了解诺曼底一带的情况。

关于6月6日早晨希特勒究竟在几点起床的问题一直众说纷纭。不过，他得知盟军正在发动进攻时大喜过望，因为他坚信，德军肯定能在海滩上把敌人消灭，然后可以利用不久即将完成的V—1飞弹把伦敦化

为废墟。

设在巴黎郊外的西线总司令部也和B集团军群司令部一样，从清晨就开始陷入极度的混乱。西线参谋长京特·布鲁门特里特上将给在伯格霍夫山庄的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挂电话，说明事态原委，请求通融一下“没有希特勒允许谁也不能动用装甲师”的规矩，向诺曼底方向派遣必要的力量。结果对方“强烈反对西线司令部贸然出动最高司令部管辖下的后备兵力”，断然拒绝了。

距离诺曼底海滩最近的坦克部队是驻扎在卡昂北面的第21装甲师，不过至少在“D日”这一天，盟军没有和这个强大的敌人对峙。第21装甲师由隆美尔的非洲军改编而成，师长是埃德加·福伊希廷格尔少将。“D日”的前一天，他到巴黎寻欢作乐去了。

B集团军群司令部、第7集团军司令部以及其他各司令部都不约而同地向最高司令部提出请求，要求派遣拥有坦克的强大援军——党卫军第12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团”，但都如石沉大海。理由是只有总统一人能够做此决定，而且他们顽固地坚信，在诺曼底即便有盟军登陆，也不过是佯动作战，敌人真正的突击目标还是在加来。

等到那位总统阁下终于做出决定时，已经是下午3点了：“在6月6日傍晚到来之前消灭敌人！遵从约德尔大将的命令，掉转方向，面对卡尔瓦多斯省的入侵点，把敌人的海岸据点在今晚的规定时间内一扫而光！”

但这是不可能的。初期反应的迟缓给德军造成了灾难性影响。除先头部队，本该迎击盟军的德军主力部队在自己的职责上毫无作为。而在盟军方面，从敌军有力的首领不在岗位，到敌军指挥系统运作低效，的确也是得到了很多偶然因素的帮助。

第六章

着眼“战后”的领导者

——解放巴黎，直至最后的战斗

从“D日”到“VE日”

1944.6.6 “D日”（诺曼底登陆开始）

6.13 德军向英国本土发射V—1飞弹

6.19 马里亚纳海战（日军的航母和舰载机损失大半）

6.22 苏军夺回白俄罗斯（7.3解放明斯克）“巴格拉季昂行动”

7.1 布雷顿森林会议［7.21结束。决定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IBRD）］

7.20 暗杀希特勒未遂事件

8.1 华沙起义（10.2结束。自由波兰军队等）

8.15 盟军登陆法国南部（“龙骑兵行动”）

8.21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10.7结束。商讨联合国宪章草案）

8.25 盟军解放巴黎（8.30临时政府迁至巴黎）

9.8 德军向伦敦和巴黎发射V—2火箭

9.12 第二次魁北克会议（9.16结束。商讨战后的德国占领计划）

9.17 盟军夺取荷兰，进军莱茵河（“市场花园行动”）

10.9 第四次莫斯科会议（英苏划分各自在东欧及巴尔干的势力范围，“百分比协定”）

10.20 美军登陆莱特岛

10.21 盟军占领亚琛（第一座德国城市）

11.11 美军开始出动B—29轰炸机对日本实施日间轰炸

12.16 德军开始在阿登反攻（1945.1.28结束。突出部战役）

12.31 波兰共和国卢布林临时政府成立

1945.1.17 苏军开始包围华沙

1.27 苏军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

2.4 雅尔塔会议

2.14 盟军轰炸德累斯顿

3.7 盟军渡过莱茵河（雷马根大桥）

4.12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逝世

4.16 苏军渡过奥得河（开始进攻柏林）

4.28 墨索里尼遭枪决

4.30 希特勒自杀

5.7 德国无条件投降

5.8 “VE日”（Victory in Europe Day）德国签署投降书

8.15 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9.2 日本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

计划落空的登陆后作战

史上最大规模战役的第一天——“最长的一天”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在诺曼底修筑桥头堡，输送大量官兵和物资，驱逐盘踞在法国的德军，战斗开始了。德军的抵抗出人意料地顽强，盟军没能按照计划进军。

围绕着盟军内部的战略对立，身为最高司令官的艾森豪威尔也被种种调整不停捉弄着。

“最长的一天”结束了

“D日”终于过去了。盟军虽然没有完全达成当初制定的目标，但战果也还是日渐丰富。“D日”当天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兵力为步兵6个师、空降兵3个师、特种部队2个旅，以及1个突击营，总人数超过13万。登陆过程中有9 000人伤亡，其中牺牲人数最多的是奥马哈滩。

德军努力遏制盟军在诺曼底发动的进攻，但没有成功。“沿岸防御”失败的理由可列出以下3点：

第一，盟军完全拥有制空权。盟军打击德国境内的飞机制造厂和炼油厂，目的是把德国空军的飞机吸引出来，然后加以歼灭，此即“联合轰炸行动”。此外盟军还发起“空白点行动”，把击溃德国空军本身作为目标。这些行动都取得了成效，到“D日”前夕，德国空军的质与量两方

面都在不断下降。并且，由于盟军为掩护“D日”行动实施战略轰炸，德国空军部队在距卡昂半径200千米内的一大串机场被悉数破坏，导致德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无法起飞。

实际上，德国空军的损耗非常大。截止到“D日”前夕，德军在各战场的轰炸机、战斗机合计为3 222架，而与此相对，盟军为“D日”这一天准备的飞机数量为：重型轰炸机5 112架，战斗机5 409架，运输机2 316架。其中，在“D日”当天出动的飞机达11 590架。在人类历史上，为了同一个目的在同一天升空如此之多的飞机的确还不曾有过。

承担保护登陆船队任务的是美国陆军P—38“闪电”战斗机，这种战机因双引擎、双机身的奇特外形而为人所熟知。在登陆海滩负责低空防卫的是英国空军“喷火”战斗机，负责高空防卫的则是美国陆军P—47“雷电”战斗机的5个飞行大队。

也就是说，由于盟军飞机在数量上压倒性地超过德军，德军飞机不可能出现在诺曼底上空。实际上，盟军的登陆部队在“D日”当天基本没有受到德军飞机的攻击。

第二，盟军对法国北部的铁路网及其相关设施的轰炸取得成功。早前有人认为此举未必能产生如此成效，更担忧对平民的伤害过大。“D日”当天，法国的铁路网货运量相比年初下降了30%（至7月上旬又下降了10%）。德军不但无法通过铁路把援军送到诺曼底，而且也无法撤回前线部队受伤的人员。

被称为“闪电”的美国陆军航空兵战斗机P—38（U.S. Air Force）

第三，正如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希特勒的大脑怎么也转不过弯来，他始终认为盟军真正的目标是加来，诺曼底不过是佯动作战而已，因此他拒绝派遣装甲部队。

那么盟军必须尽早完成的事情，就是以五处海滩为基点扩大桥头堡，使之连成一片。英军的目标是攻陷卡昂，原计划在“D日”当天完成占领，然而没能实现。而美军的目标则是攻克科唐坦半岛突出部的瑟堡港。虽然英军和美军在各自的行动地区分别建造了人工港“桑葚”，但如果能夺取瑟堡港，无疑可以运来更多的兵员、武器、军需品等。

艾森豪威尔亲自踏上诺曼底的土地是在“D日”的第二天，即6月7日。他乘坐驱逐舰渡过英吉利海峡，从战斗最激烈的奥马哈滩上岸，视察各处海滩。地面部队总司令蒙哥马利、美国第1集团军司令布莱德雷等指挥官已事先赶到，正在热烈地交谈。艾森豪威尔当天就返回了自己位于英国朴次茅斯的司令部。从翌晨开始，他根据自己在战场上的所见所闻，连续几日投身到后续行动计划的修改工作中。

此时幸亏艾森豪威尔事先组织了由陆海空三军代表构成的参谋长委员会。因为如果对像这次一样的大规模行动加以调整，很多事情都涉及

陆海空三者中至少两个，依照以往的经验，这种调整是很耗费时间精力的，不可能迅速确定下来。而通过参谋长委员会，艾森豪威尔可以很顺利地调整部队和军需品的装卸，以及船只的出发、到达时间。

攻取卡昂计划落空

同样在6月7日，意欲占领卡昂的英国第2集团军第1军开始发动了进攻，可是德国第21装甲师却格外顽强，英军被打回到沿卡昂运河而建的贝努维尔——就在前一天空降部队夺取的佩加索斯大桥附近。

英军进攻卡昂受挫的过程就像前一章所讲的那样，此外还有一些判断失误加剧了事态的严重程度：率领英国第1军的约翰·克拉克中将在“D日”的下午，就已经不担心德军在奥恩河右岸发动大规模的反攻了，于是放弃了突破卡昂与其西面卡尔比克机场的中间地带这一重要任务，令准备好的第9步兵旅前去支援在奥恩河右岸的第6空降师。尽管他们第二天就回过头来执行原定任务，可是如果他们没有那么草率地颠倒任务顺序，也许卡昂能更早地落入盟军之手。

为什么德军如此奋勇守卫卡昂呢？率领B集团军群的隆美尔为把在诺曼底登陆的盟军赶下海，就需要调集卡昂附近的部队，首先是能从布列塔尼半岛分出来的增援部队，如果这还不够用，那就从法国南部和荷兰调集。隆美尔不能调动的大部队只有加来及其周边的德国第15集团军。如果卡昂陷落，好不容易调集来的布列塔尼以及法国南部的增援部队就失去了和第15集团军的联络路径，二者的联系会被切断。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只有彻底守住卡昂。

这一天，第9步兵师和其右翼位置的加拿大军队齐头并进，直指机场所在地卡尔比克，但与“希特勒青年团”遭遇，双方立即进入了交战状态。经过多次拉锯战，结果不分胜负。英军、加拿大军以及德军都位于卡昂正面，各方都备受压力，攻守频繁转换。

为打开局面，蒙哥马利打算动用英国第7装甲师和第51步兵师。他

们都曾在北非战场功勋卓著，是蒙哥马利引以为傲的精锐部队。“沙漠之鼠”第7装甲师从美军侧面的蒂希索尔前进至卡昂的右侧，第51步兵师从奥恩河右岸南下至卡昂左侧，一同对卡昂形成包围之势。

6月10日，盟军展开攻势，目标是卡昂西南13千米处的波卡基村。率领第7装甲师的是号称“所向无敌”的乔治·厄斯金少将，但正是他犯下了决定性的错误。

担任先锋的第22装甲旅开始突击，很快突破了敌军阵地的缝隙，6月12日傍晚到达了距波卡基8千米的科蒙街道。天明时分，他们进入了波卡基，受到当地平民的热烈欢迎。不过，他们的高兴也到此为止了。第22装甲旅旅长罗伯特·海顿准将认为有必要事先推进至村庄东北的213高地，就派遣义勇骑兵团A营前往213高地实地考察。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A营的“克伦威尔”坦克隆隆开进的时候，路边的树林里突然闪出党卫军第101重型坦克营的“虎式”坦克，并立即开炮。率领这支坦克营的，是号称“坦克战王牌”的米歇尔·魏特曼中尉。“虎式”坦克的88毫米大炮多次击中“克伦威尔”坦克，不久之后，魏特曼中尉乘坐的“虎式”坦克就单枪匹马，从高地上飞驰而下，冲进了波卡基村。结果英军其余的“克伦威尔”坦克都成了“虎式”坦克的炮击对象。由于英军的大部分士兵正在休息，不在坦克内，因此面对突袭束手无策。最后，魏特曼击毁“克伦威尔”坦克12辆、其他军用车辆13辆以及2门反坦克炮。魏特曼本人所在的坦克虽然成了英军的追击对象，但他历尽艰险，逃了出来。

听到报告的厄斯金少将陷入了焦虑。失败原因是没有派出侦察部队进行充分侦察。敌军的增援格外迅速，反攻扩展出战场的可能性非常大，厄斯金少将不得不命令第22装甲旅从波卡基村撤出来。就这样，由于前期的军事失误，英军打破卡昂胶着局面的计划很轻易地就失败了。

英美最高司令官的不同

这一战凸显出一个问题。英军的“克伦威尔”坦克被德军的“虎式”坦克近距离命中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手毫无惧色、岿然不动。实际上，“克伦威尔”坦克尽管前进速度快，可是对付敌人的正面攻击时却会因火炮威力较弱而力不从心。蒙哥马利虽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缺点，但在6月12日致第21集团军群参谋长的信中却这样写道：“请放下这种坦克性能低劣的想法，全身心地进入临战状态。”

德军也有强大的武器，如88毫米坦克炮和高射炮。射程远，穿透力也非常大，能把距离1 500米远、150毫米厚的装甲打穿，可以抢在盟军的坦克开炮之前就发起攻击，拥有难以匹敌的破坏力。MG—42机枪也性能优异，很多盟军士兵就牺牲在这种武器上。它每分钟可以发射出1 200发子弹，比英制布伦式轻机枪和美制勃朗宁自动步枪的杀伤力都要大得多。

艾森豪威尔也听说德军的坦克炮威力出众，他立即写信给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要求派遣坦克专家赶赴美国，和美国本土的专家共同商讨如何改良美制穿甲弹，使之具备更大的威力。可以说，艾森豪威尔的做法正好和在这个问题上糊里糊涂的蒙哥马利形成鲜明对比。

6月12日，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海军作战部长金以及空军阿诺德将军等一行从美国抵达诺曼底，在艾森豪威尔的引领下，视察了海滩附近的阵地。他们亲眼看到了盟军顺利登陆的景象，十分满意。艾森豪威尔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些大人物亲临现场可能带来的好处。

> 军事首脑层或政府首脑层偶尔对现场的这种视察对提高士气极为重要，这一点不管怎么强调都不会有过度之虞。士兵非常感谢高官能来到身边，这不但能表示该地区是安全的，而且会令他们感受到军队没有等级隔阂。

这一天丘吉尔也踏上了诺曼底的土地。

整个6月中旬，艾森豪威尔每天都在不停奔波，从一个地方赶往另

一个地方。视察诺曼底前线，和蒙哥马利以及布莱德雷交谈，然后立即返回朴次茅斯司令部，修改海上运输计划和作战计划。难以亲临的地方就通过书信、电话、无线电等时刻保持联络。这期间他还必须出席大量会议，接受数不清的人的拜访。百忙之中，他还不忘渡过海峡视察诺曼底的部队。

有很多人屡次建议艾森豪威尔停止这种只是带来疲劳没有其他意义的前线视察，但是他充耳不闻。因为他认为，要想掌握士兵们真正的情绪，再也没有比亲临现场慰问更好的办法了。他和士兵交谈的话题多种多样，不过他尤其喜欢的，是步兵部队有没有研究出新的战术并应用于实战等等。他说过这样的话：

> 以前有个词很生动，叫“光秃秃的战场”。无论是谁，只要身处战场都会产生这样的感受。除了渡河作战这种异常的战术性集合行动，在前线战场上产生的情感就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孤寂。就如同两军交战的瞬间，友军、敌军、武器突然都从视野中消失了一样。无论是谁，都会被极端的孤寂所笼罩，如果看到了其他人或者其他的事物，刹那间人就会被将死的恐惧所俘虏，以至于失去自制力。正因为战场是这样的，才应该充分展现指挥官的信赖和对战友的爱。

艾森豪威尔，这个一次实战也不曾参加过的人，为什么会有如此深刻的洞察？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能够“充分理解人情”的指挥官。

6月13日，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抵达伦敦。他恰巧在“D日”毕业于和父亲同样的西点军校，然后得到了马歇尔给予的机会，利用毕业后的休假，来到身为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官的父亲身边。只要一和儿子说话，严厉的司令官立刻变回了和蔼的父亲。

6月14日，戴高乐带领20余名随从人员，乘坐“自由法国”海军的驱逐舰从朴次茅斯港出发，横渡英吉利海峡，驶抵诺曼底。登陆地点位于

朱诺滩的滨海库尔瑟勒。蒙哥马利前来迎接戴高乐，两个人共进晚餐并交换情报。然后戴高乐前往16千米外的巴约，接受迎接他的市民们的欢呼。戴高乐发表了演讲：

> 我们一起坚持战斗，现在终于迈出了踏上祖国的第一步。但是解放法国的战斗才刚刚开始。我们必须战斗，直到在法国的领土上确立法国的主权！

演讲结束后，由戴高乐领唱，集会的人们一起高歌法国国歌《马赛曲》。

攻占瑟堡

另一方面，以科唐坦半岛突出部的瑟堡港为目标的美军进展如何呢？其先锋部队是美国第7军，由约瑟夫·柯林斯少将率领，他因行动干脆利落而被昵称为“闪电乔”。

“D日”一早，从天而降的第82空降师大显神威，小镇圣梅尔埃格利斯最早获得解放，盟军在小镇西面的梅特勒河建起了桥头堡。第90步兵师的目标是扩大阵地，但该师的士兵大多缺乏经验，不管什么事情都需要上级指示。并且其上级的领导能力也难以恭维，导致该师进攻迟缓，一旦遭遇德军队伍，转瞬间就四散而逃。因此，柯林斯选中了新来的第9步兵师，和第82空降师一起，经科唐坦半岛北上，直指瑟堡。

进攻于6月14日开始。6月18日盟军进至科唐坦半岛西侧的度假胜地巴尔纳维尔，这样就使在半岛北部展开的德军陷入孤立，如同口袋里的老鼠。

这时，希特勒严命散布在科唐坦半岛的德军：“保存实力，且战且退直至瑟堡。”但是瑟堡绝不能放弃。

柯林斯少将率领的第7军顺利北上，但6月19日—22日，40年以来最

大规模的暴风雨意外袭击了英吉利海峡，结果沉入大海的舰船和装备比登陆时损失的数量还多。连大型的坦克登陆舰都不能航行了，几乎在海浪中倾覆。

海滩上也是一片狼藉。刚刚在奥马哈滩设置的美军人工港“桑葚A”正好受到影响，无法使用。而设在黄金滩的英军“桑葚B”由于紧贴着岩石地带，波浪较弱，没有受到致命的损坏。

风暴停止这一天，艾森豪威尔乘坐飞机，从一边到另一边，在空中视察了整个海滩。尽管落入眼帘的是几百艘舰艇严重受损的景象，但他反而松了一口气：如果“D日”没有选在6月6日，那么下一个候选日正是两个星期后的6月19日，如果在19日展开登陆行动的话……英国空军主任预报官斯塔克上校准确预报了暴风雨中将夹带36个小时晴天，艾森豪威尔在写给他的便笺中说：“当时必须做出是否开始登陆的决策，我感谢战神！”

瑟堡由4万名德军官兵一字长蛇般组成的三道防线把守，但他们之中却夹杂着很难称为精锐的乌克兰、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摆脱了苏联支配的“东方雇佣军”，整体士气低落。

6月22日上午，美军以瑟堡港为目标，展开了大规模空袭。紧接着第9师和第79师开始攻城，第4师在东侧实施封锁，战列舰和巡洋舰则负责攻击瑟堡最强有力的防御设施，也就是海岸炮台。

德军尽管骁勇善战，却不是美军的对手。尽管希特勒命令守军“坚决防守，直到最后的地堡，留给敌人的不是港口，而是燃成灰烬的原野”，可是由于防守港口最为关键的鲁尔要塞陷落，瑟堡城防司令卡尔·威廉·冯·施利本中将决定投降。6月26日，司令部里的800名部下一起向美军投降。据说希特勒得知投降的消息时暴跳如雷。

6月28日，瑟堡港被移交给了美军。到7月1日，科唐坦半岛上的德军基本放弃了抵抗。盟军虽然得到了这一重要的运输基地，但由于德军进行了彻底的破坏，需要进行约两个月的修复工作。

隆美尔谏言激怒希特勒

就在瑟堡陷落前10天，6月17日，希特勒召见了防守诺曼底的两位司令官：西线总司令伦德施泰特和B集团军群总司令隆美尔，地点在巴黎东北方向约100千米、埃纳河畔苏瓦松附近的一个名为曼基维尔的小村庄。这里有一座地下要塞，4年前进攻英国时前线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伦德施泰特开始发言，向希特勒简要说明了整体情况，然后就轮到了隆美尔。隆美尔详细汇报了各战场的情形，最后说道：

领导者肖像

卡尔·鲁道夫·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
Karl Rudolf Gerd von Rundstedt，（1875—1953）

开战时已经60多岁，刚刚退役，因大战而重新服役，从担任入侵波兰的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开始，先后任西部战线A集团军群、东部战线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并晋升为元帅。

1941年9月攻占基辅及罗斯托夫时，因违令后撤惹怒希特勒，被解除了职务。第二年（1942年）又被请回，任西线总司令，直接指挥法国的德占区和维希政府领地。为防备盟军登陆，和B集团军群司令官隆美尔等努力充实“大西洋壁垒”，但是二人在登陆战的对应策略上存在分歧。

普鲁士军人世家出身的精英，在诸多方面和隆美尔形成鲜明对照。诺曼底登陆战后，在防御莱茵河的任务中失败，又一次遭免职。

File:Bundesarchiv Bild 183-L08129

“目前在陆海空的所有方面都是敌人占据着压倒性优势，且不说战略，就是在战术上也不可能顺利。估计瑟堡很快就会陷落。虽然总统阁下曾命令死守英吉利海峡和布列塔尼沿岸的16座要塞，但那样并没有什么益处。不但分散宝贵的战斗力量，而且盟军有可能看也不看这些要塞，迂回而过。”

希特勒默默地听着。隆美尔接着说：

“我们应该把部队暂时撤退到奥恩河的东方和南方，重新配置各装甲师，等待日后的大反攻。最后放弃法国的西北部，在卢瓦尔河和塞纳河上构筑防御。”

希特勒完全不接受这一谏言。不仅如此，他还喋喋不休地讲起了V—1飞弹给英国带来的莫大打击。隆美尔于是建议将这些新式武器运到诺曼底的海岸堡垒，或者发给增援部队，用以打击英国南部的港口城市，而不要用于攻击希特勒所说的伦敦。但希特勒对此充耳不闻。实际上，V—1飞弹的命中精度很低，大部分在到达伦敦前就掉进了大海。

焦虑的隆美尔还对希特勒身边的德国国防军军官们说：“你们应该亲自视察前线，亲眼确认情况。”

然后又面向希特勒接着说：“尽管阁下坚信胜券在握，说要继续战

斗下去，但是我们自己并不相信。德军形势孤立，不但在西线战场，而且在东线战场、在意大利，都正在不断失败，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总统阁下，您应该尽早结束这次战争。”

自不待言，希特勒愤怒了。因为这番话是由最不应该说的人说出来的。震怒的同时，他还喝问道：“哪个家伙想停战谈判？！”并对将要离开的隆美尔这样说：“您不必考虑自己，只管注意敌人的进攻就行了！”

6月22日，就在美军大规模进攻瑟堡的那一天，苏军在东部战场也发起了志在夺取白俄罗斯的“巴格拉季昂行动”。行动名称采用了曾与拿破仑作战的俄罗斯将军的名字。这一天正好是德军进攻苏联3周年的日子。在“巴格拉季昂行动”中，苏军以拥有90万兵力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为目标，从正面展开了挑战。

英军的接连失败

与此同时，为占领卡昂而费尽周折的英军正在计划大规模战役。他们用举办德比赛马以及奥克斯赛马等赛事的赛马场名称“埃普索姆”来命名这次行动。具体任务是在卡昂西南部的蒂希索尔和卡尔比克机场之间做出突出部，令德军陷入混乱。

在实施这次行动的奥东河与奥恩河中间地带，战斗的要害所在是位于卡尔比克机场南面的丘陵112高地。此地是从西面进入卡昂的要冲从这里俯视卡昂可一览无余。

英军主力是第15步兵师、第43步兵师和第11装甲师，隶属于理查德·奥康纳中将麾下的英国第8军。军中大都是刚刚登陆的、士气高昂的新兵，尚未完全进入战斗状态。尽管最早的作战开始日期定在了6月22日，但由于暴风雨导致准备工作更加耗时，一直拖延到25日才开始进攻。

首先，担任英军最右翼的第30军属下的第49师和第8装甲旅在攻击区域东侧对德国精锐部队装甲教导师展开进攻，虽成功占领了东侧的两

个村庄吉维尼希索和贝顿，但是对中央部附近的罗赖的进攻却以失败告终。

第二天，6月26日，第15步兵师等主力部队开始进攻。他们的任务是前进至奥东河并占领那里的桥梁，以便第11装甲师的坦克安全通过。如果天气良好，他们本有望得到空中的掩护，可是天公并不作美。

德军的抵抗异常猛烈，党卫军第12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团”的年轻士兵们全都骁勇善战，所以直到6月27日，在第43步兵师的支援下，第15步兵师才占领了奥恩河上完好的大桥。到第二天，第11装甲师陆续过桥，占领了112高地的一部分。不过，英军的进攻到此为止。只要英军这样东进到达奥恩河，那么其正北向的卡昂就岌岌可危了。德军当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派出了好几个强悍的装甲师赶来。虽然英军——尤其是第15步兵师的苏格兰士兵也极为善战，却没能增援位于最前线的第11装甲师，结果112高地很快就被德军夺了回去。

尽管投入的兵力多达6万，“埃普索姆行动”还是以失败告终，盟军依然难以获得进攻卡昂的立足点。这次行动损失也相当大，仅第15师就有2 500名官兵伤亡。5天的战斗中，共有4 000名官兵失去了生命。

不过，这次行动也的确大大打击了德军精锐的装甲部队。以后德军再也没有机会向英军占领地域发动大规模反击。并且艾森豪威尔认为，敌人如果用大军死死防住卡昂的正面，那么将不得不减少在西面抵抗美军的兵力。如果考虑到美军的进攻是在我们后面将要讲述的那么困难的地形上进行的，英军的遭遇反而是一件幸运的事。

2

隆美尔离去，巴顿到来

对盟军的登陆战始终做出正确判断的隆美尔元帅负伤，不得不离开战场，这是德军开始走向灭亡的象征。

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的盟友巴顿，用坚决的行动打开了胶着局面，使盟军起死回生。

希特勒将司令官解职

“埃普索姆行动”中的6月27日晚上，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被召到德国南部巴伐利亚，这里的贝希特斯加登山中有希特勒隐秘的伯格霍夫山庄。由于当地不通飞机和火车，两人乘汽车前往，距离将近1 000千米。两个人都对希特勒干预作战部署、多次无视战场现实发布指令的行为十分不满，尤其是对于希特勒不许装甲部队暂时撤退到敌人舰炮射程之外一事，两个人的内心都很愤怒。

汽车到达山庄的时间是6月28日凌晨3点，两人一直等到晚上8点，可是最后只得到了极其短暂的交谈机会。在二人面前，希特勒和以往一样强调V—1飞弹可使战场形势为之一变，却对增援地面部队只字未提，仍旧要求二人以现有的力量阻止敌人的进攻并夺回海岸阵地。

希特勒只字不提增援部队是有原因的。苏军倾尽全力实施的“巴格拉季昂行动”沉重打击了中央集团军群，德军的东方防线有突然崩溃的可能，已经没有力量加强西方战场了。此后德军多次被两面作战的矛盾所困扰。

再经1 000千米行程返回设在法国的司令部，伦德施泰特非常不高兴。他给堪称希特勒的奴才、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威廉·凯特尔打了电话。

对方接电话后，伦德施泰特平静地陈述了诺曼底的德军令人绝望的状态，问凯特尔“我们该让他们怎么办”，然后说：“应该立刻停止这场战争，我已经受够了！”

听了凯特尔汇报的希特勒立即解除了伦德施泰特的职务，令汉斯·京特·冯·克鲁格元帅接任。克鲁格在1939年对波兰的进攻和翌年在西部战场的作战行动中立有战功，在实施“巴巴罗萨计划”进攻莫斯科的过程中也大显身手，却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失败，接着在1943年遭遇交通事故，退下了一线，现在他刚刚返回现役不久。

7月5日，接替伦德施泰特任西线总司令的克鲁格前往位于塞纳河下游拉罗什吉永的B集团军群司令部，拜访了隆美尔。

克鲁格先这样说道：“伦德施泰特元帅被替换表现了总统对西部战场军队领导层的不满。隆美尔元帅，总统认为您也存在对现状过于悲观之嫌。”

场面突然降温。克鲁格继续说：“尽管时间仓促，但我还是忠实地执行总统的命令。隆美尔元帅，您今后也必须毫无保留地执行总统的命令，我也会为您提供适当的建议。”

接下来两人之间发生激烈辩论，隆美尔最后说：“在对他人指手画脚之前，请您亲临前线，和指挥官们直接谈一谈。”

克鲁格倒是也遵从了隆美尔的话，第二天就赶赴前线视察。

隆美尔是正确的，和克鲁格交谈过的指挥官们都持相同意见。希特勒是不对的。克鲁格立刻返回，向隆美尔真诚地道歉并接受了隆美尔的看法。隆美尔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D日”以后德军有11.7万人伤亡，但是只得到了1万人的补充。克鲁格也了解这份报告的内容，并向最高司令部表达了增援要求，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这时盟军恰好相反。从6月6日开始到6月30日，尽管有6.17万人伤亡，但得到了比伤亡人数更多的7.9万人的补充。

突破“博卡蕉”的下士的智慧

7月上旬，攻克了瑟堡的美国第1集团军开始向科唐坦半岛南部进攻。德军本以为美军主力会沿着防守最为薄弱的科唐坦半岛西海岸南下，可是指挥第1集团军的布莱德雷根本没把西海岸放在眼里，而是直接指向了位于内陆的芒什省首府圣洛。他打算控制那里之后，再向诺曼底西邻的布列塔尼地区进军。

目标区域的两个强大敌人令美军吃尽了苦头。一个当然是德军，他们不但毫无败象，反而斗志昂扬，展现了高超的战斗技能。

美军的另一个大敌是地形和植被。附近整个地区除了湿地，就是由茂盛的矮树构成的篱笆，它们生长在独特的土堤上。这种矮树名为“博卡蕉”，一人来高。在圣洛附近的平原上，苹果地等农地和牧草地都是用这种博卡蕉围成格状，有狭窄的小路延伸其间。这是诺曼底西部的独特风景，至今仍然残留着。

这是一种对守方有利对攻方不利的地形。步兵部队容易成为隐藏在树丛中的狙击手的猎物，而装甲部队行进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时，很容易被敌人的坦克或反坦克炮打中。如果用坦克冲破绿篱，就可能暴露毫无防护的底盘，或者炮口无法瞄准敌人，一旦底盘被敌人的炮弹打中，就很快见阎王了。由于绿篱本身十分坚固，如果爆破的话则需要大量炸药。

难道无法逃出博卡蕉的魔掌了吗？第2装甲师第102骑兵侦察营的卡迪斯·G.秋林下士想出一个好主意，就是把两把钢制的短刀焊接在坦克前面。这两把短刀就如同两把大镰刀一样刺进土堤和绿篱，瞬间就可把树木伐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钢制短刀的来源正是德军为了阻止盟军登陆而在海滩上设置的障碍物。焊上短刀的坦克被称为“犀牛坦

克”。依靠它的帮忙，盟军清除了到处蔓延的博卡蕉。

第三次正面进攻卡昂

此时盟军的最左翼——由蒙哥马利负责的对卡昂的进攻却迟迟没有进展。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二号人物——英国空军的特德和英国海军的坎宁安甚至已经开始商量用其他将军替换蒙哥马利。

英国政府内部对蒙哥马利的评价也开始降低，布莱德雷中将率领的美国第1集团军司令部也出现了不满的声音。艾森豪威尔也十分忧虑，不止一次地敦促蒙哥马利尽快做出最大努力。但是蒙哥马利深知英军很难再增强力量，对可能导致兵力损失的行动极其慎重。他还尽量减少向艾森豪威尔呈送情报，装成一切都在按照原计划实施的样子。

“D日”已经过了1个月，为攻占本来在“D日”当天就应该拿下的卡昂，只能采取正面进攻的手段了。蒙哥马利终于下定了决心，于是就有了“特尔福德行动”。

7月7日下午，英国海军战列舰“罗德尼号”首先用舰炮轰击卡昂市区正北面的高地。一发炮弹炸毁了圣皮埃尔教堂的哥特式尖塔。在当天晚上，英国空军467架飞机向卡昂投下了2 300吨炸弹。不管是舰炮轰击还是空袭，目的都是为了减少英军的伤亡。这是在“霸王行动”中，第一次派遣空军直接支援地面部队。德军用猛烈的高射炮齐射来抵挡空袭。

卡昂市区本来已经严重受损，又经过了这一夜的空袭，基本陷入毁灭状态。建筑物接连倒塌，众多市民被活埋其中，丢了性命。

英国第1军负责地面进攻。7月8日凌晨4点20分，“D日”经剑滩登陆的第3步兵师和刚刚抵达的第59师从北面冲锋，加拿大第3师从西面冲锋。德军已经被猛烈的轰炸吓破了胆，根本经受不住英军的猛攻，前线部队很快就投降了。尽管希特勒曾下令说“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都要死守卡昂”，但德国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官海因里希·埃贝巴赫中将却令卡昂及其周边的所有德军全部撤退到卡昂南方的奥东河对岸。由于弹药耗

尽，他认为已经不可能进行更大规模的反攻了。这一事态发生在8日夜晚。

7月9日，盟军终于得偿所愿，进入卡昂。一位德军军官将卡昂比作“法国的斯大林格勒”，因为卡昂市区瓦砾堆积如山，目之所及都是废墟。

一位英国士兵抱着小女孩站在卡昂的废墟里

一位士兵回忆说：“到处都是瓦砾山，就好像是被犁过的玉米地。”也有士兵写道：“一想到究竟是谁导致了这一切，我们就无法直视幸存下来的市民的眼睛。”因为英国空军担心炸弹落到己方地面部队的头上，于是避开了卡昂北部的德军阵地，把炸弹都倾泻到了卡昂南面开阔的市区。结果瓦砾堆阻挡了盟军前进的脚步，成为有利于守军的地势。

德国的狙击手爬上树，把身体固定在树干上，专门狙杀将校级别的军官。有的部队不得不提拔下士任指挥官，可还是不能避免士气的低落。还有的旅竟然把29岁的士兵晋升为准将指挥官。

英军和加拿大军队尽管拥有炮兵的大力支援，但还是遭到重整阵容的德军打击，损失了3 500人，远远超出了预想。当然，德军也损失惨重。党卫军第12装甲师的战斗力下降到了营级水平，德国空军第16野战

师的士兵也损失了3/4。

一架“哈利法克斯”轰炸机飞越法国卡昂郊区实施空袭，协助作战。有467架飞机参加了这次攻击（Imperial War Museums）

“特尔福德行动”最终只占领了卡昂北部。因敌人炮火猛烈，英军没能从奥东河南进。

7月10日，英军实施了旨在夺取位于奥东河与奥恩河中间地带的112高地的“朱庇特行动”。这是先前在“埃普索姆行动”中被敌军夺回去的地方。围绕着112高地，两方军队谁都不肯后退一步，反复展开以血搏血的惨烈战斗。虽然英军最后占领了这处高地，却付出了2 000人伤亡的代价。在112高地战斗的德国士兵称这里为“耶稣受难地”。

有效吸取战场教训的美军

7月11日，美国第1集团军开始大举进攻圣洛。

当天晚上，美国第2师的士兵们预料到德军可能为了避开盟军白天的炮击而趁夜后撤，就悄悄派出一个营，借着夜幕的掩护，占领了德军的堑壕，成功控制了前线，并经过激战占领了战略要地“192高地”。该高地距离连接圣洛和巴约的干线公路很近，能够俯视周边，沿着山脊眺望观察目标地域。

美军占据了优势，却并非高枕无忧。德军士兵隐藏了起来。尽管仍旧被博卡蕉所困扰，但美军却在之前的战斗中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教训。例如，在掩护步兵的坦克车体后部安装电话。有了这样的电话，率领步兵的指挥官即使不冒险爬到炮塔上，也能和坦克内的士兵对话，指示炮击目标。空中和地面也悄悄保持着联系。装甲部队带着对空联络员同行，让他们坐进坦克。他们使用无线电联络空中的轰炸机群，这样做不仅能防止误伤，还能通过地面指示攻击在空中无法侦知的目标。

“D日”以后，盟国空军破坏了桥梁、干线道路等交通设施，断绝了敌人的援军，转而开始发动战术空战。这时大显身手的是战斗轰炸机：在机翼下装备了76毫米火箭弹的英国空军霍克“台风”、能投下227千克炸弹的美国陆军P—47“雷电”、搭载了127毫米火箭弹的P—38“闪电”都让德军吃尽了苦头。此外如果再加上装载了907千克炸弹的美国陆军B—26“掠夺者”，德军就只能望风而逃。

从192高地进入圣洛，必须越过东侧一道名为迈坦维尔的山脊。尝试进攻的第19军第29师因德军的强烈抵抗，不得不停下脚步。包围了与山脊同名的迈坦维尔村后，他们与德军展开激战，最后美军取得了胜利。7月18日下午，在奥马哈滩因勇敢而声名大振的科塔准将（第29师副师长）率进攻部队进入了圣洛。（进攻部队由侦察兵、战斗工兵以及坦克等组成。）

离开战场的隆美尔元帅

尽管“特尔福德行动”事实上以失败告终，但蒙哥马利仍不为所动。他仍旧坚持自己的方案，即由英军在卡昂近郊挡住德军的装甲部队，由美军乘机自西面突破。但这一作战方案有一个很明显的短处，就是兵力损耗过大。实际上英军和加拿大军队的伤亡数字已经增加到将近4万人，而英国的补充兵员已经开始不足，并且可以说，在未来几个星期将一直处于不足状态。

另一方面，英国第2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兵力却很充裕。率领第2集团军的邓普西中将做出决定，认为要打破胶着状态就要使用坦克部队。幸好奥恩河东岸的敌人防守薄弱，可以从那里南下，做扇形阵势展开，然后直接进军东南，指向法莱斯。

起初蒙哥马利对邓普西的方案面露难色，后来也许是考虑到这次战役一旦成功的话，自己所面临的指责之声也会沉寂下去，所以最后同意了。

7月12日，蒙哥马利向艾森豪威尔推荐了这一行动方案。艾森豪威尔正对他消极的态度束手无策，立即非常高兴地做出了“以极其乐观和热情的态度关注这一行动”的回应。

被命名为“古德伍德”的这一行动于7月18日开始实施。就在行动的前一天，隆美尔来到了位于卡昂东部的党卫军第1装甲师指挥部。他注意到了德军阵地周围尘土飞扬，盟军的坦克正在集结，及时地发现了英军即将发动的攻势。下午4点过后，隆美尔离开了指挥部，乘车返回拉罗什吉永的B集团军群司令部。为了不让盟军的飞机发现，司机一直沿小路行驶。可是1小时后只能走干线道路了，结果他们很不幸地被两架英军“喷火”战斗机所发现，遭到机枪扫射，车辆翻入沟中，隆美尔被甩出车外，头盖骨骨折，身负重伤，昏了过去。

从此以后，隆美尔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战场上。他的继任者没有确定，B集团军群总司令的职务由西线总司令克鲁格兼任。就在关键时刻即将到来的时候，德军却失去了一位才能卓越的指挥官。

“古德伍德行动”开始了。和早前的“埃普索姆行动”一样，这一战役的名称来自英国有名的赛马场。行动本身比较简单，就是充分发挥英国第2集团军属下近卫、第7、第11三个装甲师的坦克力量，沿卡昂东面的奥恩河与巴贝恩森林之间狭长的走廊地带南下，攻克布尔格比山脊，向法莱斯进军。

从7月18日凌晨5点30分开始的3个小时里，英美空军的2 600架轰炸机朝卡昂东面的村庄投下了不计其数的炸弹。这是有史以来，空军为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而开展的最大规模的行动。英国海军舰艇也同时实施炮击，以支援地面部队。敌人基本没有防空炮火，也没有战机迎击。由于走廊地带相当狭窄，地面的第一次进攻由第11装甲师承担，其后才是近卫装甲师和第7装甲师。

点燃战火的是第11装甲师第3皇家坦克团。德国空军第16野战师所建立的最初防线已经被空袭粉碎，其背后的第21装甲师也受到了严重损失。被英军的锐气吓坏了的德军慢慢恢复了神智，在先头位置的英军坦克部队到达卡尼的时候，开始发起反攻。

最让英军吃亏的德军武器并不是坦克，而是作为反坦克炮使用的88毫米炮。盟军的十几辆坦克立刻就瘫痪了，剩下的坦克改向西南行进，指向目标布尔格比山脊。

面对这种变化，昵称为“泽普”的党卫军上将约瑟夫·迪特里希令党卫军第1装甲军的坦克部队向山脊集结，党卫军第501重型坦克营赶赴山脊东面的村庄弗勒努维尔。结果英军在横穿连接卡昂和维蒙间的公路时，遭受了来自山脊正面和东侧的猛烈进攻。这可能是个信号，德军的防守部队重振士气，坦克炮开始发射呼啸的炮弹。英军在这一天损失了近200辆坦克。

第二天，7月19日，英军再次发起进攻，可是布尔格比山脊的大部分仍旧掌握在德军手中，架设在山脊线上的88毫米炮一辆接一辆地摧毁着英军的坦克。

7月20日天降大雨，没有取得什么战果战斗就停止了。仅仅3天时间，第2集团军就损失了近400辆坦克，英国和加拿大两国的伤亡军人合计达5 537名。蒙哥马利7月18日接待记者，急忙承认自己的预测过于乐观了。连艾森豪威尔都大张旗鼓地加以宣扬的计划就这样草草收场，实在是令人沮丧。

不过从大局着眼的话，“古德伍德行动"依然具有深远意义。因为它将德军的装甲师完全吸引到了诺曼底东部，使西部的美军此后实施极其重要的突击行动“眼镜蛇”变得容易得多。

刺杀希特勒

就在“古德伍德行动”停止的7月20日，德国发生了一起刺杀希特勒的事件。地点就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近郊的肯琴附近。为指挥对苏作战，这里建有总统大本营，俗称“狼穴”。

这一天中午，战况报告会议按预定计划在“狼穴”的木屋中召开。希特勒在12点半左右出席了会议。当陆军代理总参谋长阿道夫·豪辛格中将开始进行战况说明时，国内预备军参谋长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上校走进会议室。他手里提着一个大得吓人的公文包，将在这次会议上就东普鲁士新组两个师的计划向希特勒进行说明。施陶芬贝格把这个公文包放在了距离希特勒不远的桌下。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参会人员都在聚精会神地听取豪辛格中将的发言，谁都没有注意到施陶芬贝格几分钟后就离开了。

12点50分，突然发生了大爆炸，房间里烟火弥漫。是公文包中的定时炸弹！当时室内人员包括希特勒共24人，离希特勒最近的4人死亡，3人重伤。希特勒自己奇迹般地只是受了轻伤。因为放在希特勒右侧的公文包正好对着陆军总司令部参谋海因茨·勃兰特上校的脚，上校觉得这个公文包有些碍事，就用脚往桌下推了推。结果支撑大桌子的坚固立柱成了希特勒的盾牌，吸收了爆炸的冲击力。

希特勒站起身来大叫道：“这正说明我有上帝的保佑！”

施陶芬贝格自己坚信刺杀已经成功，他乘车火速赶往“狼穴”附近的机场，飞回柏林。根据他的消息，陆军内部的反希特勒派立即准备发动政变。首都柏林为防止发生颠覆政权的大规模叛乱，事先安排了非常时期的应对机制“瓦尔基里行动”，反希特勒派打算直接利用这一机制控制首都。

尽管国内预备军司令弗里德里希·弗洛姆大将以希特勒的死亡无法确定为由加以拒绝，反希特勒派还是决定下午4点发动政变，命令大德意志警卫营指挥官奥托——恩斯特·雷默少校对政权中枢所在的柏林政府机关大街实施戒严并逮捕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

雷默少校对反希特勒派发出的“希特勒已死”的消息半信半疑，亲自赶赴戈培尔处，告诉他自己收到的指令。戈培尔说：“那都是错的。”

接着戈培尔就拨通电话，将话筒递给了雷默。电话那边正是希特勒本人。

当希特勒还活着的消息传开，政变也就此流产。刺杀实施者施陶芬贝格等4名军官立即遭到逮捕，其中包括施陶芬贝格在内的3人当晚就被枪决。主犯原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上将自杀。此后盖世太保也对整个事件进行了彻底调查，不但事件的参与者，而且和事件并没有直接关联、仅仅是同情政变的反希特勒派人士及其家属都遭到逮捕，据传其数量高达5 000人。其中隆美尔元帅也被希特勒怀疑袒护政变人士，最终隆美尔选择了自尽。

己方的误炸

美军接下来实施的“眼镜蛇行动”，是以圣洛西面长达6 400米的直线道路为起点，西进至库唐斯，目的是将德国第7集团军的大部分“赶进”他们身后的大西洋。自“D日”以来，围绕着海岸桥头堡所进行的攻防战已经结束，针对内陆的突击战开始了。美军根据密码破译的结果，得

知德军的前线已经扩展到了极限，眼看就要崩溃了。

承担这一任务的是攻克瑟堡的美国第7军，他们由柯林斯少将率领。和“古德伍德行动”一样，在发动进攻之前，航空部队先对德军阵地实施了地毯式轰炸。

这次轰炸导致了悲剧。因天气恶劣不得不数次推迟，“眼镜蛇行动”的“H时”最后被确定为7月24日下午1点。和事先得到的天气预报不太吻合，这一天很难说是晴朗天气。航空部队负责人利——马洛里上将打算亲眼确认一下现场状况，从英国本土飞往诺曼底。他望着天空，预计轰炸效果难以实现，所以将“攻击延期至次日”的指令下达到英国本土。可是美国第8和第9航空队1 000架以上的轰炸机部队已经起飞，正在接近目标地域。

尽管大多数飞机接到了中止任务的命令，返回了基地，但是有的飞机没能及时收到指令，按照原计划投下了炸弹。在队伍前面的一架飞机因炸弹投掷装置故障，在到达轰炸地点之前就把炸弹扔下去了。后面的飞机受这一错误信号的指引，随即也投下了炸弹。落弹地点正是美国第30步兵师所在地，25名士兵不幸身亡，131人受伤。

第二次误炸与司令官之死

第二天，7月25日上午11点，“眼镜蛇行动”正式开始。然而，地面上的美国大兵再次遭遇厄运。虽然这一次的空袭的确瞄准了目标，但爆炸导致硝烟和尘土升腾起来，恰好顺风向南飘散，结果轰炸机飞行员的视野被遮住，误以为目标就在眼前，投下了炸弹，而第4师和第30师的士兵正在那里。此次误炸造成的损失比前一天还大，101人身亡，463人受伤。第1集团军群司令官莱斯利·麦克纳尔中将正在前线视察，也被误炸而死。可能是担心消息传开影响斗志，上面下了封口令。

就这样，伴随着己方的牺牲，盟军通过空袭给予了德军毁灭性打击。地面就如同用锄头翻过的农田，到处都是孤零零的、四脚朝天的卡

车、火炮和坦克。

美国的步兵部队继续在瓦砾堆中前进。本该支援掩护步兵的坦克部队在爆炸中后退，步兵只能自己向前了。由于事前计划好的步兵和坦克部队相互配合没能充分实现，这一天仅前进了2.5千米夜幕就降临了。

7月26日，统率第7军的柯林斯为提高行军速度，提前投入了装甲师。统领这个第3装甲师的莫里斯·罗斯准将曾针对步兵和坦克的一体化作战进行密集训练，现在检验训练成果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第4师第22步兵团的士兵们坐到坦克上面警戒，每辆“谢尔曼”坦克上配备8名士兵，轻型坦克配备4名，其余的士兵分乘卡车前进。

一旦遭到攻击，士兵立即下车搜寻敌人的装甲车。如果顺利找到就报告给坦克，由坦克开炮射击。由于博卡蕉和爆炸造成大量弹坑，有步兵坐在上面的坦克平均时速仅有1英里（约1.6千米），但和以前博卡蕉所造成的困扰相比，这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空军和坦克部队的配合也十分默契。美国陆军航空兵战术空军第9航空队司令刘易斯·布里尔顿中将把“从空中掩护装甲车辆”看成自己的使命，他的部队就好像等待客人的出租车一样，在战场上空盘旋，根据地面指令俯冲攻击。这样的空中力量的确是地面部队的可靠伙伴。

同样都是盟军，美军和英军的战法大相径庭。美军赋予现场指挥官一定的任务和兵力，参谋长联席会议基本不会过多干涉其执行任务的具体方式。这种做法的出发点在于，他们认为现场的人肯定比远在数千英里之外的人更熟悉情况，判断也更为准确。艾森豪威尔曾这样评论现场指挥官：“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能无须上级指示就做出敏捷有效的行动。”与此相对照，设在伦敦的英军总参谋部每天都和指挥官们保持联络，不停地接收军情和兵力状态的报告。美军通过实战，总结出了前文提到的“犀牛坦克”、步兵坦克一体化等新战法，而英军就没有这些引人注目的创新。也许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国军队在战法上的不同。

攻克大西洋港口阿夫朗什

“眼镜蛇行动”进展顺利。据盟军引以为傲的密码破译系统“超级”获取的情报，德国西线总司令兼B集团军群司令官克鲁格元帅仍然坚信盟军主力并不打算沿科唐坦半岛面向大西洋的海岸南下，而是从东面的卡昂来攻。因此德军精锐的装甲师没有向西转移，“眼镜蛇行动”越发顺利了。

7月27日，布莱德雷发出了新命令：以现有态势继续南进，一直攻到诺曼底地区通向布列塔尼地区的入口阿夫朗什。这一天，第6装甲师进入了当初的目标地域库唐斯城。翌日，他们开始向西南方向的大西洋港口阿夫朗什进发。7月30日日落前，第4装甲师抢先一步，进入了阿夫朗什。

8月1日，德国第7集团军前线司令部收到了美军控制了阿夫朗什的情报。克鲁格对周围的部下说：“诸位，对我们而言，对德国国民而言，这意味着苦难结束的开始。今后我已经没有任何方法能阻挡即将到来的攻击了。”

希特勒也接到了这个坏消息。不过他依然派出使者，强硬地命令克鲁格：“决不让敌人进入平原。将B集团军群所有的装甲部队都投入反击。阻断敌人的进一步行动，并将他们逼到阿夫朗什予以歼灭。把所有的装甲部队，包括机动兵力都拿出来展开进攻。远征法国的未来就在此一役！”

克鲁格对此命令表示异议：“如果把各装甲师从阵地调开，不但和英军对峙的地区有陷落的危险，而且整个战线都有可能崩溃。”他接下来说：“应该全面放弃法国西部，令所有部队后撤。”并且，克鲁格还向希特勒提出了和隆美尔一样的建议。

不出所料，希特勒暴跳如雷，根本不听意见，只是反复强调“只要按照我的命令执行，就能获得完全胜利”。随后，希特勒着手制订从东方的莫尔坦向阿夫朗什进行大反攻的“卢提西行动”的计划。

登陆后盟军新组织图（1944.8）

第 21 集团军群 司令官 伯纳德·蒙哥马利（英）

加拿大第 1 集团军 司令官 哈里·克里勒

英国第 2 集团军 司令官 米尔斯·邓普西

第 12 集团军群 司令官 奥马尔·布莱德雷（美）

美国第 1 集团军 司令官 考特尼·霍奇斯

美国第 3 集团军 司令官 乔治·巴顿

美国第 9 集团军 司令官 威廉·辛普森

美国第 15 集团军 司令官 伦纳德·杰罗

第 6 集团军群 司令官 雅各布·德弗斯（美）※ 从法国南部攻往阿尔萨斯方向

美国第 7 集团军 司令官 亚历山大·帕奇

法国第 1 集团军 司令官 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

第 1 空降集团军 司令官 刘易斯·布里尔顿

第 18 空降军 司令官 马修·李奇微

第 82 空降师、第 101 空降师、第 17 空降师（美）
第 1 空降师、第 6 空降师（英）

第 9 人员运输机联队（美）

第3集团军司令官巴顿的指挥艺术

8月1日，美军的指挥体系焕然一新。第1集团军司令官布莱德雷就任新设的第12集团军群司令官，与第21集团军群司令官蒙哥马利平级，布莱德雷手下的副司令官考特尼·霍奇斯中将继任第1集团军司令官。并且新的第3集团军也加入战列，其司令官就是巴顿。这一人事安排是艾森豪威尔亲自做出的。

经历了两次打人事件的巴顿一直在英国本土待命，默默执行着欺骗德军的任务。他的职位是并不存在的幽灵部队“美国第1集团军群”的司令官，由此德国方面一直坚信巴顿率领的盟军主力部队最近肯定会在加

来附近登陆。

“D日”当天，巴顿给妻子写了信：“被打发到一边坐冷板凳，错过所有荣耀的滋味，真是像地狱一样。”在“D日”过后1个月的7月6日，他怀着兴奋的心情勇敢地踏入法国。他逐步调整第3集团军的战斗状态，耐心等待战机。7月27日，第8军根据布莱德雷的命令沿科唐坦半岛西海岸南下，巴顿被任命为该军非正式的军长，参加了战斗。

8月1日，巴顿麾下的第3集团军火速派遣第4及第6装甲师，开始扫荡布列塔尼地区的德军。约翰·伍德少将率领第4装甲师从阿夫朗什攻向西南方向的布列塔尼地区最大城市雷恩，和随后赶来的第8步兵师共同战斗。3天之后，雷恩落入美军手中。

同时，巴顿嘱咐率领第6装甲师的罗伯特·格罗少将：“只管一心一意地攻向布雷斯特，如果中途遭到敌人抵抗，就迂回前进。”布雷斯特是布列塔尼半岛西端的军港。美军按照地图的标示，朝半岛顶端高歌猛进，到了这一张地图的边缘，就马上展开接下来的地图，这正是巴顿的风格。

不过他跳过中层的军长，直接向下面各师下达命令的做法也导致了混乱。格罗的顶头上司、第8军军长特洛伊·米德尔顿命令他进攻布列塔尼半岛北部的圣马洛。

巴顿如同追赶第6装甲师一样坐车进入布列塔尼。这时格罗在两位上司相互矛盾的指令中间左右为难，“怎么办呢？”在野外帐篷中的他正想冲一杯咖啡，巴顿突然出现在面前。

“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命令你向布雷斯特急行军。”

“米德尔顿军长命令我先到圣马洛……”格罗拿出米德尔顿所写的便笺，只见上面写着“不要绕过迪南和圣马洛，进攻！”的字样。

巴顿看过后一边把这张纸片塞进衣服口袋一边嘟哝：“如此看来，这小子是步兵出身。”然后对格罗这样说：“米德尔顿那里我去说，你还是按照我的命令，向布雷斯特直线前进！”

步兵出身的米德尔顿行事谨慎小心，骑兵出身的巴顿一见胜机就非抓住不可，二人在战法上存在着明显不同。

巴顿为获知敌人的驻地，以及自己手下各师和装甲部队的准确方位，组织了“第6骑兵群”这一独特部队。该部队由13支侦察小队构成，每支小队都拥有安装了强力发报机的装甲车和卡车各6辆。他们被派往战场的各个方向，时刻转移并报告各自的位置，巴顿的指示也都是由他们传达给各前线部队的。

结果，虽然第6装甲师负责进攻布雷斯特、圣纳泽尔、洛里昂等比斯开湾沿岸城市，但由于希特勒一直努力将布雷斯特及洛里昂建成要塞，攻克它们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盟军占领布雷斯特的时间是9月19日，至于洛里昂以及它南面的圣纳泽尔，则是直到停战也没能攻克。所以说，巴顿的第3集团军实际上有1/3的兵力陷在了布列塔尼。

巴顿和布莱德雷在那之前就已经开始对布列塔尼失去兴趣，毕竟这里并没有德军主力。另外，向东看的话，卢瓦尔河北岸依稀可见德军的身影，如果突破那里的话，前往巴黎岂不是一条直线了吗？！

于是布莱德雷向巴顿发出了新命令。令其派遣属下的第15军进至东方的勒芒，第20军进至勒芒西南的昂热。实际上就是把布列塔尼的兵力直接东移。毫无疑问，巴顿心头暗喜，因为这一命令正中其下怀。此后，巴顿自西西里以来的顾虑一扫而光，一路高歌猛进，成就了一次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数不多的闪击战。

德军莫尔坦反攻失败

8月4日，在拉罗什吉永的B集团军群司令部，克鲁格接到了希特勒下达的命令。其内容是，投入所有的坦克部队进攻阿夫朗什，将巴顿的第3集团军从其他美军中孤立出来。这就是被盟军称为“莫尔坦反攻”的“卢提西行动”。不久以后，克鲁格所担忧的“固守战线和大反攻难以并举”成了现实。

德军的“豹式”坦克以强大火力给盟军造成困扰，盟军使用空地火箭解除其威胁

德军大反攻的舞台就位于美国第1集团军第1步兵师这一天清晨刚刚占领的莫尔坦。他们成功占领了俯瞰小城的314高地，这里位于阿夫朗什以东30千米。

德军扎扎实实地做着准备。党卫军第2、第116以及最精锐的第1各装甲师悄悄地从现有阵地上撤退转移，巧妙地隐藏到北至苏尔德瓦勒、南至莫尔坦的森林地带。

控制了莫尔坦的第1步兵师向东南方向的马耶讷进军，改由第30步兵师守卫莫尔坦。实话说他们太大意了，这也并非不可理解，因为敌人败象明显。美军横扫了布列塔尼，苏军已经到达华沙郊外，盟军的这些消息都能传到这里。另一方面，盟军的密码破译系统“超级”正确预料到了德军的反攻。布莱德雷在命令加强部队战斗力的同时，还向第30步兵师发出了“加强314高地的防守”的电报。不过，这封电报对于后者为时已晚。

“卢提西行动”开始于8月7日零点。德军3个战斗群开始进攻莫尔坦和314高地，他们要尽量在太阳升起之前插入敌军阵地。

德军尽管骁勇善战，但在这次战斗中盟军的空中力量派上了大用场。英国空军的“台风”战斗机向德军的“豹式”坦克发射空地火箭，逐一

击毁它们。出于对“台风”的恐惧，德军的坦克兵都跳到了坦克外面。美国陆军的P—47战斗机“雷电”为防止德军战斗机接近莫尔坦而勇猛奋战。由于盟国空军的努力，德国第2装甲师和党卫军第1装甲师根本不可能在干线公路上移动，他们停止了进击，被迫四散躲藏。这给了美国第1集团军编入新的炮兵和装甲部队以强化阵地的余地。

话虽如此，胜负却并没有一下子就见分晓。激战的“舞台”位于一条小溪谷对岸的314高地。防守那里的美国第30步兵师第120步兵团（由哈蒙德·巴克斯上校指挥）的第2营，他们被完全从己方部队中孤立出来，尽管弹尽粮绝，却根本看不出他们有投降的打算。孤守一隅的伊思·哈达维中校指挥的第2营700人中有300人牺牲。为表彰他们的英雄行为，罗斯福总统向他们特地颁发了奖状。

到8月11日傍晚，德军开始撤退。从南方开始反击的美国第35步兵师和第2装甲师已经接近了314高地。“卢提西行动”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加拿大军队也没能达到目标

同时，盖伊·西蒙兹中将率领加拿大第2军发起“总计行动”，从卡昂南部向法莱斯进军，目的是突破德军在卡昂南方和东南方建立的防线，进至法莱斯，切断德军的退路。负责这一战斗的，是新设的加拿大第1集团军（司令为哈里·克里勒中将）。为加强兵力，英国第1军和波兰第1装甲师也加入了进来。

西蒙兹中将从英军以“古德伍德行动”为代表的失败中学会了作战。他感受到了敌军坦克的88毫米火炮对己方的威胁，在行动开始时就把时间设定在坦克难以行动的夜间。并且，为了进一步提高先锋步兵部队的速度，让所有的步兵都乘坐在装甲车辆上转进。一旦目标或敌人出现，步兵可立即跳下车进攻。

为保证运输步兵的装甲车辆，他们从自行火炮“圣职者”上拆除了火

炮、基座以及弹药箱等。由于装甲钢板数量不足，他们甚至用上了夹着砂土的软钢板。士兵们无奈地称这种特殊车辆为“降级的圣职者”。

8月7日晚上11点，盟军开始炮火准备，“总计行动”拉开了帷幕。为保证部队在黑暗中也能正确前进，他们用探照灯照射空中的云朵，形成人工光亮，还用高射炮向高空发射绿色曳光弹，或者通过无线电指路。

卡昂至法莱斯道路的东侧是英军车队，西侧是加拿大军和波兰军的车队。英军顺利前进，但是加拿大军陷入黑暗和尘土中，难以辨别方向，并且遭到了德军的猛烈抵抗。到8月8日天明，虽然包括波兰军队在内都已进至目标地点，但盟军却无法继续前行了。到了下午，意见沟通不畅、没太看懂地图的加拿大军的进军速度明显下降。前面的劲敌是由“希特勒青年团”构成的党卫军装甲掷弹兵和党卫军第1装甲师。和“古德伍德行动”时一样，他们也吃尽了88毫米火炮的苦头。

而西蒙兹中将的决策还存在严重失误。因为猜测到德国方面会以党卫军第1装甲师为中心布下强有力的阵势，他们将“总计行动”分成两个阶段。最初的突击进攻之后，由己方实施掩护空袭。空袭时间定在8月8日中午，然后从下午1点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的行军。

可是很遗憾，己方的美国陆军轰炸机错误地向加拿大军和波兰军的阵地投下了炸弹。伤亡人数高达315人，西蒙兹只好推迟“总计行动”第二阶段。趁此机会德军重新布置，结果到8月10日晚，“总计行动”被迫中止。

3

登陆战结束，巴黎解放

登陆战以法莱斯包围战的胜利而告终。

戴高乐骄傲地自称为战胜国的一员，“政治”开始挥动镰刀。盟军开始攻占巴黎——这是当初计划外的行动。“D日”之后的第80天，巴黎解放。

对以美军为中心的盟军而言，攻克柏林、迫使德国投降之前，还需持续8个多月的战斗。

布莱德雷组织的法莱斯包围战

这时，巴顿指挥下的美国第3集团军仍在高速进军。眼下巴顿苦恼的是补给问题，尤其是油料补给问题。他计划抓住一切机会，为第3集团军筹措尽可能多的油料。他经常讨好载着补给油料的卡车司机，甚至在接收补充来的步兵时连同转运步兵用的卡车也一起“糊里糊涂”地接收了。这些伎俩正是巴顿的风格，体现了他时常挂在嘴边的“石头汤战法”：

“一个流浪汉到一户人家，说他要做石头汤，求人家给他少许热水。那家的主妇——正如常言所说——受好奇心的驱使，就烧了点热水给他。流浪汉拿出自己的锅，把热水倒进去，然后投进两个反复研磨过的白石头。接着流浪汉又想给石头加点味道，请求人家给点土豆和胡萝卜。最后他居然凭花言巧语成功讨来一小块肉。这种办法可以运用到所有事情上。发动进攻时，先让对方以为这是侦察部队，然后慢慢增加人

数，最后再加进油料和弹药，全力进攻。”

8月8日，“总计行动”已显现失败端倪，布莱德雷开始策划下一次行动。其具体做法是，在法莱斯及其东南阿让唐之间的连线处“收口”，让德军成为口袋里的老鼠。时而到访布莱德雷司令部的艾森豪威尔立刻就同意了这一行动。布莱德雷还对一同到访司令部的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兴奋地说：“对一个野战军指挥官而言，这可谓百年一遇的大好机会。我们现在正想把敌人整个包围歼灭。”

布莱德雷马上分别给蒙哥马利和巴顿挂电话。不过他们二人都认为包围网的口子并不在法莱斯和阿让唐的连线上，而是在更东面的塞纳河附近。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他们同意了布莱德雷的想法。

不久以后第3集团军就控制了勒芒，而德军对其兵锋所指却不甚了了。

8月10日，遭到美军无线电窃听的德军开始慌乱起来，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第3集团军左翼的进军路线已经从勒芒大幅向北，指向了阿朗松，那里有德军的后方部队和大规模补给基地。如果那里被攻克，德军将兵败如山倒。阿朗松开始匆忙组织部队集结。

担任第3集团军左翼的是韦德·海斯利普指挥的第15军。巴顿按照布莱德雷的指示，告诉海斯利普：“如能占领阿朗松，就继续北上，控制阿让唐，进而向其西北方向的法莱斯挺近，到那里再和其他盟军联系。”

8月12日，巴顿给布莱德雷挂电话，要求由自己来扎住包围网的口子。布莱德雷没有答应。翌日，巴顿又挂电话，重申了前一天的请求，结果得到了“第15军如果到了阿让唐就在那里待命”的命令。巴顿思忖这可能是英军，也就是蒙哥马利嫉妒自己，或者是无视战场状况，令人讨厌地横加干预的结果。不过，至少在倾听了布莱德雷和巴顿“告状”的艾森豪威尔这里，怀有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担忧，即从南向北进攻的美军和从北向南进攻的加拿大军在攻打同一个目标的时候，有可能相互误

伤。

“诺曼底之战”的终结

诺曼底的战斗终于渐入佳境。8月13日，艾森豪威尔给盟军司令部写了一封信，部分内容如下：

> 夜以继日地不停进攻，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在飞行中，始终把敌人置于危险的境地——我要求全体空军将士把这视为自己最大的责任。
>
> 不要让敌人从海上逃跑，或者得到海上支援，不要让地面军队感到枪炮、舰船、乘务人员等一系列支援不足——这是我对全体海军将士的要求。
>
> 我要求全体陆军将士，带着敌人不投降就消灭的决心不断进攻。只要是在我们取得胜利的土地上，就一步也不退让。只要是在已经建立起来的战线上，德军的一兵一卒都不许逃跑。

领导者肖像

奥马尔·布莱德雷
Omar Nelson Bradley（1893—1981）

出生于密苏里州，父亲是教师。在西点军校成绩优异，作为垒球和橄榄球选手也很有名。与艾森豪威尔同期，并同为五星上将。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没有被派往欧洲。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时期任步兵学校教官，在陆军部任职时曾是马歇尔的助手。尽管有人批评他缺乏想象力，但他拥有长期担任教官的经验，善于统率士兵，可谓“诡计多端”。

经马歇尔推荐，任军长，参加“火炬行动”，“D日”任第1集团军司令官，在蒙哥马利指挥下参加战斗，登陆后任美国地面部队总司令。

战后成为退役军人管理局局长，继艾森豪威尔之后任陆军参谋长。

8月14日上午11点，继艰难结束的“总计行动”，加拿大第2军的西蒙兹中将又发起了“温顺行动”。在蒙哥马利的要求下，加拿大军的目标再

次指向法莱斯，波兰第1装甲师的目标是其东面的特兰。盟军希望加拿大军在占领法莱斯后和指向阿让唐的美军会合，完成对敌包围圈。

这一次并不是在夜间进攻，所以充分利用了炮兵射击，队伍在浓重烟幕中前进。右翼的加拿大军坦克怎么也过不了眼前的河流，右翼的波兰军倒是顺利开往特兰。

这一天，巴顿会见了布莱德雷将军。巴顿无法忍受自己的第15军停留在阿让唐的状态。他跃跃欲试，打算先向东，然后向塞纳河方向进攻。为此他直接来找布莱德雷谈判，布莱德雷最终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巴顿迅速将第15军派往图尔，将第20军派往沙特尔，将第12军派往奥尔良。这些都是通往巴黎干线公路上的重要城市。

艾森豪威尔否定了丘吉尔的打算

第二天，8月15日，在濒临地中海的法国南部，盟军启动了“龙骑兵行动”。它是本来想在“霸王行动”之后马上实施、后因登陆船只不足而被迫中止的“铁砧行动”的替代品。

直到最后，丘吉尔仍旧反对在法国南部发起的这次登陆行动。“龙骑兵”一词也有“武力强制”的意思，丘吉尔最终被迫同意了该行动，结果行动代号中也嵌入了丘吉尔式的挖苦。

到最后丘吉尔仍没有放弃干预该行动。8月4日，丘吉尔向罗斯福提议，“龙骑兵行动”不应在法国南部而是应该在布列塔尼海岸展开。当时以布雷斯特为首的布列塔尼各港口都功能受损，在补给方面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罗斯福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第二天，丘吉尔又去找艾森豪威尔交涉，也被后者断然拒绝。

这次行动原本的目的是把在美国待命的各部队安排到欧洲战场，于是决定攻占一座目前占领区域以外的港口——其中心是马赛港。

对此丘吉尔认为，美军也可以经由布列塔尼半岛进入欧洲，未必需

要马赛港；行动的实施地点在法国南部，和目前正在进行战斗的法国北部相距过远，二者之间难以实现战术上的联系；相比于进攻法国南部，在意大利战场投入新的部队，可以进军巴尔干半岛，从南方进攻德国更加致命。

艾森豪威尔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布列塔尼各港口城防坚固，就算成功占领，其港口设施也很可能被破坏殆尽，而马赛并不会遭到那么惨重的破坏，而且大部分守卫部队已经北上来围攻盟军了，防守薄弱；布列塔尼地区西端的布雷斯特和法国东北部洛林地区的中心城市梅斯之间的距离比马赛到梅斯的距离要远，容易受到来自右侧的攻击，而且前者的铁道线路比后者弯曲，更容易受到敌人的破坏；登陆部队现在已经抵达意大利和北非，从转移距离的长度上考虑，法国南部也比布列塔尼更适合等等。

艾森豪威尔认为丘吉尔考虑这个问题并没有从军事观点而是从政治观点出发的，即战争结束后，驻扎在巴尔干半岛的是盟军而不是苏军更有利于政治稳定。艾森豪威尔反驳丘吉尔说：

“如果以这个理由主张进占巴尔干的话，那么您应该直接和罗斯福总统去交涉这个问题，而不是我，然后再得出结论。如果你们二人得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必须拖延战争的结论的话，我立刻更改作战计划。如果不是这样，单纯从军事角度出发，我的确不能同意您的主张。因为在军事层面，我相信做出所有决定和承担所有责任的人只有我。”

就像以前一样，丘吉尔还是想尽办法也没能把自己的意见掺和进去。不过当他明白自己的意见不可能被接受以后，又像往常一样，施与援助时毫不吝惜。并且他还飞往地中海，坐在驱逐舰上，想见识一下真正的战场。

丘吉尔之所以力图回避从法国南部开始进攻，更多的是担心遭到德军的顽强抵抗，蒙受莫大的损失。但实际上，这种担忧实在是杞人忧天。8月15日凌晨4点过后，首先是空降部队完成了伞降，占领了戛纳以西40千米处的小村鲁梅伊，随后“自由法国”的特种部队成功夺取了波克

罗勒岛和罗贝恩岛。由3个师组成的美军主力部队也在舰炮的支援下成功登陆，德国第19集团军几乎没有抵抗就撤退了，就连希特勒也不得不很快认同了撤退的必要性。

法莱斯包围圈的完成

诺曼底的德军已经狼狈不堪了。克鲁格元帅终于下了决心，在8月16日发出了全线撤退的命令。

“撤退至奥恩河，等到晚上开始渡河。”

这是克鲁格作为西线总司令官发出的最后命令。因为希特勒怀疑他和盟军秘密接触并进行和谈，所以将他解职，改派在东部战场防御出色的“希特勒的救火队员”瓦尔特·莫德尔元帅接替他。8月17日，克鲁格在陆路返回柏林的途中，饮下氰化钾自杀了。他也许是担心自己遭到逮捕，可是人们并没有发现他和盟军接触的任何证据。

8月16日，加拿大军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已成废墟的法莱斯。

这一天，盟军进行的欺骗战“刚毅行动”正式取消。巴顿也终于可以不再扮演指挥幽灵部队“美国第1集团军群”的幽灵将军的角色了，他麾下的各师已经控制了图尔、沙特尔、奥尔良，“成就如此丰功伟绩的人正是巴顿”这一事实开始人尽皆知。艾森豪威尔亲自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样说道：“向着塞纳河高歌猛进的第3集团军的领导是谁？是巴顿将军！”

法莱斯南部的包围圈正在慢慢收紧。不过，无论是负责北方的加拿大军，还是负责南方的美军，实力都有不足，并没有做到完全封锁。党卫军上将保罗·豪塞尔指挥的德国第7集团军和党卫军上将约瑟夫·迪特里希指挥的德国第5装甲集团军从包围圈内侧拼死抵近，还有其他几支装甲部队也正在袭来。这时候，盟军的战斗轰炸机出动了。他们在纵不足8千米，横不足20千米的狭长地域内倾泻火箭弹，在打击装甲车辆方面战果颇丰。

“袋子口”部分从最初预想的法莱斯和阿让唐之间的连线开始向东移动，变成了特兰和尚布瓦之间的连线。

8月17日，法莱斯东面的波兰第1装甲师得到“向尚布瓦方向驱赶德军”的命令，同时美国第90师北上，目标同样是尚布瓦。

两天之后的8月19日，两军终于在尚布瓦会师，士兵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虽然在20日早晨，受到追赶的部分德国装甲部队从法莱斯西方的圣朗维尔和尚布瓦之间仅有的缝隙中逃了出去，但一路遭到猛烈的炮击。结果他们成了最后逃出的队伍。8月21日，“袋子口”被完全扎紧了，德军有1万人阵亡，被俘4万人，好不容易逃出包围圈的只有5万人左右。

包围圈内是什么情况呢？

图6-1 法莱斯包围战

2天以后，到达法莱斯的艾森豪威尔这样说：

> 法莱斯战场就像我们常说的“屠宰场”一样。不管是道路还是农田，到处都是损坏的武器和死伤的人马，通过这里是极为困难的。……这种景象只有但丁才能描绘出来。如果不想双脚踩到尸体，就连数百米都走不了。

不过，关于许多德国兵从包围圈中逃脱这一事实，蒙哥马利受到很多指责。他命令美国部队停止前进，不要进入英军的战区，结果造成包围圈的口子没能完全关闭。这种批评是英军相关人士提出的。

“霸王行动”终结

以这次法莱斯包围战为标志，诺曼底之战结束了。不过如果以更广泛的阶段区分，还应该把解放巴黎包括进来。

在最初的“霸王行动”计划中，并没有“尽早解放巴黎”的字样，到了行动实施阶段，则是诺曼底登陆3个月以后巴黎才获得解放。至于其缘由，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所做的行动预算书中有所表述：

> 解放巴黎有可能引起危险的巷战，不但会对巴黎造成巨大的破坏，而且夺取巴黎后，我们将不得不参与其市政建设工作。包括燃料在内的民生物资的补给运输等会占用很多兵力和车辆，从而给整个行动带来障碍。

关键是，为了尽早结束战争，应该把击溃德军主力视为首要目标，占用额外的战力和时间的方案都不是上策。不过这一方针很快就变化了，促成这种变化的是戴高乐。

8月19日，戴高乐来到位于瑟堡近郊的艾森豪威尔司令部，听艾森

豪威尔说巴顿已经控制了沙特尔后，他说：

“我们‘自由法国’军必须攻进巴黎。现在巴黎正需要维持国内秩序的军队组织。”

可是艾森豪威尔回道：“我们还没有考虑进占巴黎，向东追击德军比进入巴黎更为紧迫。”

意见没有被接受，戴高乐只好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司令部。但是翌日他得知了巴黎发生起义的消息。他立刻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这样说：“将勒克莱尔将军派至巴黎是绝对不可拖延的。”

菲利普·勒克莱尔是编入了美国第5军的“自由法国”第2装甲师师长。戴高乐在这封亲笔信中这样写道：“如果这一要求得不到实现，那么我将亲自向勒克莱尔下达进军巴黎的命令。”

领先于其他各国军队率先进入祖国首都巴黎，这对戴高乐而言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冒险解放巴黎

巴黎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中。8月19日，3 000名巴黎警察占领了警察局，升起了三色旗，庄严地合唱法国国歌《马赛曲》。次日，其他抵抗组织占领了市政厅。市政厅一被占领，邮局、派出所之类的公共建筑也相继被占领，处处升起了三色旗。

德军当然不会允许这种行为，结果发生了枪战。而抵抗组织也并不是紧密团结的整体，而是分为共产党派和戴高乐派，二者在内部争夺着主导权。

共产党派的指挥者是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罗尔上校（原名亨利·唐吉），他的目标是通过巴黎解放斗争在法国实现共产主义。他们所依靠的力量是在市民和德国占领军之间左右为难的巴黎警察。

与此相对，戴高乐不但周密地把政治领导者亚历山大·帕洛蒂派进

了巴黎，而且还有军事领导者沙邦——戴尔马（战后成为政治家，在蓬皮杜总统任内长期担任总理）。

接到巷战爆发的消息后，希特勒给德国国防军大巴黎卫戍司令肖尔蒂茨下达了“必须摧毁巴黎”的命令。

8月22日，在科唐坦半岛西侧格朗维尔的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同瑞典驻巴黎总领事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国国内军官谈话，接到了“每天因饥饿死亡的孩子和老人达四五千人”的报告。

戴高乐认为，如果巴黎得不到尽早解放，那么不但法国，甚至整个欧洲大陆的解放都将是困难的。对戴高乐这种观点已经有所认同的艾森豪威尔终于下了决心：

“真不可想象！我们决不能过巴黎而不入，我们同意‘自由法国’第2装甲师解放巴黎！”

而且艾森豪威尔还考虑为戴高乐派出美国第4步兵师做掩护部队。

从布莱德雷处听闻“您胜利了，决定派您到巴黎”消息的勒克莱尔以最快速度飞奔回自己的师指挥所，不停地大叫着：“向巴黎！立即出发！”

第二天，8月23日，“自由法国”第2装甲师进至巴黎西南50千米处的朗布依埃，抵达法国历届总统用作公务别墅的朗布依埃城堡。他在这里和戴高乐会合，共同商讨进军巴黎的方案。

8月24日黎明，第2装甲师从朗布依埃森林出发，从经过了多次零星战斗、敌人较少的南面向巴黎进军。当天晚上先头部队进入巴黎。25日清晨，勒克莱尔也抵达了巴黎。由于通信设施良好，蒙帕尔纳斯车站成为第2装甲师的前进司令部。

进入巴黎的“自由法国”军官们首先在蒙帕尔纳斯车站集合。左起第2人为戴高乐，其右侧是统率装甲师的勒克莱尔将军（1944.8.25）（Imperial War Museum）

德国国防军大巴黎卫戍司令肖尔蒂茨被带到巴黎警察局，在勒克莱尔面前签署了投降书。不久戴高乐也到达巴黎，在蒙帕尔纳斯车站和勒克莱尔会合，接受了投降书。接着戴高乐前往位于圣多米尼克大街的国防部，视察了他曾经工作过的国防副部长办公室。和4年前相比，这里没有任何变化。离开这里后戴高乐又去了警察局，最后来到巴黎市政厅，在市政厅大厅发表了演讲。

> 巴黎！巴黎被侮辱，巴黎被损害，巴黎历经磨难，但是巴黎获得了解放。她是靠自己的手获得解放，她是靠国民的手获得解放，她是靠整个法国的支援获得解放，……靠的是这个真正的法兰西、这个永远的法兰西的战斗获得解放的！

这一天，在距巴黎1 500千米的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部所在的暗堡里，希特勒敲着桌子怒吼：

“巴黎烧光了吗？”

闻听此言的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只能保持沉默。根据希特勒的指令安放在巴黎各处的炸弹直到最后也没有爆炸，肖尔蒂茨没有执行

他的命令。

8月26日下午3点，胜利游行开始，巴黎沉浸在欢乐的浪潮里。

8月27日一早，艾森豪威尔到了巴黎，拜访了戴高乐。这一天恰好是星期日，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二人从布莱德雷司令部所在的沙特尔出发，一起前往巴黎。他们还邀请了蒙哥马利，但被后者以公务繁忙为由婉拒。

凯·萨默斯比·摩根驾驶着汽车，进入巴黎后驶向凯旋门。大街上到处都洋溢着解放的欢乐。他们恰好路过无名战士墓，二人打算表达敬意，就在下车的时候，简直好像遭到了暴徒袭击。

“啊！艾克！布莱德雷！”巴黎的人们已经熟知他们的容貌。他们被人群紧紧地围了起来，为了返回车上，他们不得不求助近20名宪兵护卫。二人的脸上都印满了女性的口红。好不容易回到车上，缓过神来的艾克对凯说：

“哈哈！突然间还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想当年我住在塞纳河右岸，经常带儿子约翰到凯旋门散步，回想那时，看我的人一个也没有啊！”

折中是失败的第一步

始于诺曼底的战役就这样以盟军的胜利宣告结束。9月1日，加拿大军占领了迪耶普。这里是加拿大军在两年前8月的“银禧行动”中失去众多同胞的伤心之地。同日亚眠、博韦，9月2日阿布维尔、兰斯、那慕尔获得解放。除了比利时的那慕尔，其他都是法国北部城市。

9月3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解放；4日，佛兰德地区的港口安特卫普解放。就这样，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里，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部队跨过塞纳河，进入默兹河流域，而从法国南部登陆的部队则从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到达了瑞士国境边上的杜省。

9月11日傍晚，进入卢森堡小村希特尔兹布尔的美国第85侦察连渡过架设在国境绍尔河上的桥梁进入德国境内。这是诺曼底登陆后的第96天，盟军首次踏上德国领土。

照此势头，德国年内就只能投降，战争就可以画上句号了。然而事实上这不可能实现，因为盟国在前线的汽油、弹药、装备等补给方面已经面临枯竭。尽管盟军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比如利用始自英国的输油管线、空运、铁路，组建名为“红球特快”的汽车运输部队等，都没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这关系到重大战略问题，让我们把时钟稍稍回拨一下。

随着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到来，诺曼底登陆部队的队伍越发庞大。8月1日，英美两国各自的两个集团军变成了两个集团军群，即把邓普西的英国第2集团军和克里勒的加拿大第1集团军纳入麾下的蒙哥马利第21集团军群，以及把霍奇斯的美国第1集团军和巴顿的美国第3集团军纳入麾下的布莱德雷第12集团军群。

图6-2 诺曼底登陆后，历经三个月的解放法国的战斗

8月17日，蒙哥马利向布莱德雷提出如下建议："渡过塞纳河后，第21集团军群和第12集团军群应该保持严密的集体行动，以安特卫普和亚琛为目标，向北方进军，占领鲁尔地区（德国最大的工业地带）。"可是布莱德雷却在思考其他战略，即"利用美国第1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突击德国西南部煤炭资源的宝库萨尔地区，到达法兰克福南方的莱茵河"，和蒙哥马利的建议截然不同。巴顿也同意布莱德雷的意见。

面对这两个方案，艾森豪威尔没有二者选一，而是在两者中间寻求平衡。不久之后，他优先考虑了蒙哥马利的北进方案，接受后者的要求，令美国第1集团军承担右侧掩护任务。不过，当北进的第一目标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被攻克时，再返回到向莱茵河一线东进的布莱德雷的方案。也就是说，艾森豪威尔采用了二者的折中方案。

此间付出最大"牺牲"的是巴顿的第3集团军。因为他把自己大部分

的油料和运输能力分给了英国第2集团军和美国第1集团军。被迫延缓进军速度的巴顿愤怒地称这一决策是“本次大战最恶劣的错误”。

艾森豪威尔的正面作战之过

9月4日，英军进占安特卫普，巴顿第3集团军不再受油料限制，可以领取和第1集团军相同数量的油料了。第3集团军立刻开始向莱茵河一线进军，但是由于敌军抵抗顽强，不得不停止在摩泽尔河一线。巴顿愤怒地说：“这都是艾森豪威尔在8月第4个星期这一决定性的时间段里，优先接受了蒙哥马利的申报，限制我们油料补给的过错！”就在两天前，他和艾森豪威尔会面时，还抱怨“没有粮食我的部下可以吃皮带战斗，可是坦克缺乏油料就只能投降”。

早在8月21日，艾森豪威尔就被委任从9月1日开始亲自指挥地面部队第12集团军群和第21集团军群。盟军最高司令官同时兼任地面部队总司令，是考虑到现在对内陆的进攻已经正式开始，最高指挥官应该在占据着大部分战略要素的地面部队中承担起责任，而地面部队大部分是美军，所以艾森豪威尔就任了这一职位。以前地面军队总司令是蒙哥马利。也有声音要求由蒙哥马利来担任此职，但没能实现。因为很多美军指挥官讨厌蒙哥马利过度自信的态度，而美国国内的舆论也的确不允许由英国人来出任地面部队总司令。

蒙哥马利不但表示“自己也可以在布莱德雷的指挥下”，而且向艾森豪威尔建议“应该任命盟军最高司令官以外的人为地面军队司令官”，但遭到拒绝。

这次蒙哥马利提议发起的，是名为“市场花园”的空降行动。即在接近德国边境的荷兰中南部、莱茵河下游阿纳姆等地，派空降部队占领河流及运河上架设的桥梁，与地面部队会合后，再以鲁尔地区为目标。这一行动可谓十分大胆，艾森豪威尔同意了。

9月17日，1 068架运输机和478架滑翔机满载着3个师的空降兵，在

战斗机的掩护下，覆盖了荷兰上空。紧接着当地居民就看到了降落伞不断张开下落的景象。德国方面没有飞机迎击，防空炮火也很弱，开始时的作战很顺利。

在诺曼底登陆战中大显身手的精锐部队，即美国第82空降师和第101空降师成功控制了荷兰南部代表性的工业城市艾恩德霍芬以北的多座桥梁。在阿纳姆以西的英国第1空降师成功占领了空降地域，接着毫不费力地进入了阿纳姆，可是地面部队的进军速度却比计划中的迟缓，德军在奇袭的惊恐中很快反应过来，逐渐进入状态，开始反击。

令盟军没有料到的是，在诺曼底曾令盟军吃尽苦头的强大的党卫军第2装甲师居然被部署在了这一地区，结果英军没能占领阿纳姆，这次空降行动以失败告终。

从此以后，艾森豪威尔完全停止了蒙哥马利所建议的打击敌人薄弱部分的运动战，代之以消耗战，在前线大范围和德军对峙。对盟军而言，这是个灰暗之秋，战场陷入胶着状态。天公也不作美，冰冷的雨水在整个西欧下个不停，战场遭到水浸。此间德国逐渐恢复了强大态势。

利德尔·哈特概括总结了艾森豪威尔在这一时期军事指挥上的过失：

> 在敌人还具备强大的实力、没有被打垮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在诺曼底登陆前所计划的以莱茵河为目标“大范围正面攻击”的进攻行动可谓最好的战法；可是在现实中，面临敌人已经开始崩溃的战况，应该说完全不适合。不如迅速果断地使敌人彻底崩溃，不给敌人重整旗鼓的机会，这时候需要一鼓作气地追击。

那么蒙哥马利是正确的吗？

利德尔·哈特反手一刀，认为“把集团军群拧成一股绳，以密集阵势进攻”的思考方法是正确的，可是这种方法未能实行。他对蒙哥马利也

予以了批评，认为他最大的过失是9月4日至7日部队进抵安特卫普后令士兵停止了进攻。这和蒙哥马利自己所讲的“使敌人继续败往莱茵河，不给敌人以重整战线的机会，跨越莱茵河向前进”相互矛盾。

直到10月中旬，德军仍没有破坏任何一座渡过莱茵河所必需的桥梁，正如蒙哥马利所言，只要布莱德雷和巴顿合成左翼后能突破一点，德军就将难以坚持，战争有望提前半年结束。

成功的关键是勇往直前地追击，保持对敌人的强大压力，不给他们以喘息之机。只要有一天的迟缓，成功就有可能擦肩而过。遵守这一铁律的只有巴顿。盟军内部的高层指挥官认为己方已经胜券在握，担心进攻可能造成无谓的兵力损耗。利德尔·哈特对巴顿的评价是：决战才刚刚开始，巴顿对进攻时保持紧密步调的重要性认识最深刻，保持着能往所有方向扩大战果的态势。结果巴顿在后来的战斗中果然备受瞩目。

希特勒的最后赌博“突出部之役”

由于艾森豪威尔采取正面作战，盟军的战线向南北方向延伸，战争进入胶着状态。盟军的补给问题依然没能解决。而希特勒也掌握了盟军的状态，虎视眈眈地寻找着挽回颓势的反击机会。他决定在盟军兵力最薄弱的地方发动反攻，地点就在阿登。

布莱德雷率领的第12集团军群分为南北两部分，阿登正好位于这两部分的中间。这里接近德国边境，是从比利时东北部直到卢森堡的大面积湿地和森林地带，德军总算还控制着这里。

阿登是1940年5月10日开辟的那条西部战线上闪击战的起始地，也是德国对法国的一次大获全胜的地点。希特勒决定从阿登开始再次发动闪击战，只要重新夺取安特卫普这个渡过默兹河的盟军的主要补给港，就能击中盟军要害。这样，英军的补给就被彻底截断，只能从大陆撤退，会出现“第二个敦刻尔克”。如果英军脱离战斗，德国的这部分兵力就可回到东部战线对付苏联了。希特勒考虑得相当长远。

12月16日黎明，德国开始了这次以“保卫莱茵”为代号的行动。艾森豪威尔本打算利用圣诞节的机会，以巴顿的美国第3集团军为主力，在阿登的西面展开一次凌厉攻势，因而只给阿登保留了极少的兵力。

图6-3 德军最后的大反击“突出部之役”

阿登地区已经久不闻炮声，甚至被称为“幽灵战线”。谁都没有料到德军会从这里展开突击。艾森豪威尔和手下的工作人员去巴黎参加婚礼了，蒙哥马利去打高尔夫球了。并且蒙哥马利还在德军发动攻击的前一天，即12月15日写了这样的信给艾森豪威尔：“12月23日星期六我想飞回英国，和儿子共度圣诞节。自从‘D日’以来，我一直没有见过他。”

负责整个攻击行动的是德国B集团军群，司令官为瓦尔特·莫德尔元帅。所有兵力由3个集团军的25个师，即25.7万名官兵以及1 000辆装甲车构成。而与此相对的盟军队伍是米德尔顿少将麾下的第8军，仅有4个师，8.3万名官兵，装甲车也只有420台。

德军的事前准备几乎没被发现。有关反攻的所有情报都不是通过无线电而是利用有线通信设备进行联络的，所以盟军的“超级”密码破译系统也没能侦知。被击中要害的盟军被迫撤退。制空权虽然掌握在盟军手里，但天气一直很恶劣，空军始终无法出动。

不过盟军还是逐渐稳住了阵脚。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艾森豪威尔的当机立断。“在这次战役中艾森豪威尔作为军事指挥官发挥出了最优秀的能力。”让·爱德华·史密斯这样写道。

艾森豪威尔的高明决策有两个。一个是从法国和英国调集预备队的同时，派包括这些预备队在内的援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向德军的进攻地区迅速推进。预备队还包括第82空降师和第101空降师。尤其关键的是，他命令巴顿的第3集团军停止进攻萨尔，让巴顿带领这6个师北上打击德军。

巴顿打开一条生路

12月19日，德军展开进攻的第3天，盟军在凡尔登召开了最高领导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艾森豪威尔、特德、布莱德雷、雅各布·德弗斯（第6集团军群司令官）、巴顿以及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等。沉闷的气氛中，只有艾森豪威尔一人比较乐观，给司令官们打气：“现在正是大好机会，不应该悲观。希望今天诸位都拿出生气勃勃的样子来！”

巴顿回答说：“让小伙子们到巴黎去，这群家伙就振奋起来啦！”

这一句话就让会场活跃起来了。

艾森豪威尔马上说：“必须坚决阻止德军渡过默兹河。乔治，你来做这件事。什么时候可以出击？”

“3个师，12月21日早晨。”

仅仅两天以后，不管怎么说都是太快了。艾森豪威尔以为巴顿是在

有意出风头，但实际上巴顿的承诺并没有掺杂水分。第3集团军已经完成了进军准备，而且为了达到艾森豪威尔的所有要求，他还特地带了3份出击方案到凡尔登。

艾森豪威尔惊讶之余，说：“出击日期稍迟一点也可以。这次可不是小打小闹，要狠狠给他们一家伙！”

结果巴顿展开闪击战，将攻往萨尔的全体部队撤回，向北90度转进，沿着冰冻的道路在72小时内赶到了目的地。以前艾森豪威尔曾两次把巴顿从不幸事件中解救出来，现在轮到巴顿拯救艾森豪威尔了。

艾森豪威尔的另一高超决策是将战线分成南北两部分。北部由蒙哥马利负责，南部由布莱德雷负责。具体执行上，由于布莱德雷的第21集团军群本部和北部战线存在一定距离，艾森豪威尔打算将第1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置于蒙哥马利的指挥下。当然这必须有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的同意才行。

第二天，12月20日，艾森豪威尔先同蒙哥马利谈话。由于蒙哥马利一贯目无领导，两人的关系比较生硬。可是出人意料，不满现在的指挥官地位而觊觎地面部队总司令位置的蒙哥马利并不反对将部分美军编入下属部队的计划，问题反而出在布莱德雷这边。布莱德雷强烈反对这一安排。

“艾克，如果你一定要这样，我无法向美国国民交代，只能辞职。”

艾森豪威尔这样回答：“布雷德，需要向美国国民交代的不是你，而是我。这是我的命令。”

这是只有最高司令官才能说出的金句。蒙哥马利在当天下午就迅速接管了面临德军进攻的北部战线所有地面部队的指挥权。

从12月18日开始，德军的进攻就已经缓慢下来了，在阿登地区形成了一个“突出部”（所以后来称这次战役为“突出部之役”），失去了进攻的锐气。美国第10装甲师和第101空降师防守的要地巴斯托涅虽被德军包围成了孤城，却顽强坚持，救援他们的是巴顿麾下的第3集团军第4装

甲师。巴顿命令该师一刻也不准停留，直捣巴斯托涅。经过激烈的肉搏战，26日下午4点55分，第4装甲师的坦克终于出现在了巴斯托涅防守部队面前。

同时，从12月23日开始，天气转好，盟军的战斗机逐步打击德军的坦克。重型轰炸机攻击铁路及交通枢纽，阻挡住了敌军的增援部队。伦德施泰特和莫德尔等人向希特勒提出撤退请求，希特勒没有批准。伦德施泰特不禁叹息“突出部”将成为“第二个斯大林格勒”。

盟军一旦阻挡住了德军潮水般的冲击，就开始从南北两个方向压迫突出部。12月31日，希特勒试图增派援军反攻，结果失败，反而令德军遭受到了更大的损失。

转过年来，1945年1月7日，蒙哥马利为表彰属下的美军特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可是会议过程中他又居高临下地说“美国佬在强有力的领导下表现勇敢”。得知此言的美方指挥官终于厌烦了，从那以后，他们和蒙哥马利的关系就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突出部之役

英国军事史专家马科斯·海斯提克认为：“蒙哥马利才华横溢，作为职业军人比艾森豪威尔优秀得多，可是对人性的迟钝却成为降低他伟大程度的决定性因素。”艾森豪威尔必须小心翼翼地管理这个麻烦的异国部下。

1月15日，盟军在恰好位于突出部中央的乌法利兹会师，1月底结束了全部战斗。在这次“突出部之役”中，德军损失了12万名官兵和大量宝贵的武器弹药，败北已成定局。

“不取柏林”的决断

1945年3月下旬，盟军各部队渡过了莱茵河，浩浩荡荡开进德国的中心地区。德军几乎没有抵抗。接下来的目标是包围鲁尔地区，然后占领对德国来说在政治上和心理上都十分重要的首都柏林。

这时艾森豪威尔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把柏林让给苏联去占领”。他有如下几个理由。

一个是盟军和柏林之间的距离自莱茵河东岸算起有300英里（约483千米），而且中途还有易北河阻挡，相反苏军距离柏林只有30英里（约48千米）。也就是说，即使盟军优先进攻柏林，苏军也会抢先到达，不管怎么赶路都来不及。

还有一个理由是，从以莱茵河沿岸为根据地的盟军部队中专门分出一部分去进攻柏林的话，会损害盟军整体的机动能力，使原来的任务难以充分完成。艾森豪威尔认为夺取德国北部的吕贝克地区更为重要，因为这样可以切断丹麦半岛和挪威的德军同德国本土的联系。而且盟军还必须阻止德军固守南部山岳地带做游击战的据点。如此一来，占领柏林的优先顺序也不得不后调。

艾森豪威尔毫无保留地把包围鲁尔后的作战计划——布莱德雷的部队拼命开进德国中央地区，然后在易北河某地和苏军取得联系——透露给了斯大林。对此丘吉尔又横加阻挠。他提出的问题是，盟军对斯大林的通告超出了“只有纯粹的军事事务才可与苏联军事当局联系”的最高司令官权限，以及不应该把柏林让给苏联去攻取。关于后一项，丘吉尔强烈主张，应该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抢在苏军到达之前攻占柏林。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认为“进攻德国应该横穿北部平原”，并将这一内

容通过马歇尔转达给了艾森豪威尔。对此艾森豪威尔给马歇尔回电报表示，按照当初计划，包围并孤立埃森、多特蒙德等鲁尔工业地区以后，应该立即把部队向东方的卡塞尔集结，并进军东方的工业城市莱比锡。艾森豪威尔认为，柏林的军事功能已被破坏，德国政府准备转移到其他地方，所以柏林已经不是重要目标了。他接下来这样写道：

>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一个是为突击战集中兵力。与其分散兵力提前攻陷柏林，解放挪威，不如尽早控制舰船，占领瑞典各港口。……我的整个作战计划富有机动性，同时我必须拥有能够充分应对情况变化的行动目标，而最大的机动性来自最大限度地在德国中央地区集中兵力。

艾森豪威尔的确从以前广泛的正面作战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关于艾森豪威尔向斯大林通告作战计划的问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是“因作战需要而传递出的信息，今后也应自由联系”，没有将其视为问题。

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只好沉默了。

向高贵的墓碑致以由衷的敬意

德国命运已定。4月21日，B集团军群司令官莫德尔自杀；30日，希特勒和同他前一天举行婚礼、从情人正式变为妻子的爱娃·布劳恩一起自杀。5月7日凌晨2点21分，希特勒的亲信、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签署了投降书，在欧洲战场持续7年的德国和盟国之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根据投降书，德军首脑于5月9日前往柏林，在苏军总司令部签署批准书。在这次投降书签署仪式的当天，艾森豪威尔发表了《胜利宣言》：

在诸位所经过的这数百英里没有前人经历的征途上，遍布着战友用生命做成的路标。在战场上倒下的人都和诸位一样，是这个以热爱自由、反抗奴役的精神共同组成的队伍中的一员，也以这个队伍中的一员的身份而死。我们在最近——当然也包括遥远的未来——有可能面临的问题，都可以将这种相互协助和不惜为自由大义而献身的精神作为出发点顺利解决。在这次浩大的劫难期间，正是热爱自由的内心使得全体盟军不断做出正确的抉择。

我不清楚别人的情况，但是我不愿参与无谓的争论，争论究竟是哪一个国家，或者是哪一支军队赢得了这场欧洲大战的胜利。派代表到这里的所有国家的所有男人、所有女人，都依照自己的能力为这次胜利做出了贡献，我们不能忘记这一事实，即这次胜利的确源于每个人的努力。我们应该时刻铭记这一点，以此向每一座墓碑表达敬意，向未能看到这一天就死去的战友的亲人表示慰问。

从1944年6月6日“D日”开始的3个月时间里，德国国防军损失了约24万名官兵，此外有约20万人成了盟军的俘虏。此间还有83 045名英国、加拿大、波兰的官兵牺牲，美军的牺牲人数为125 847人，盟军航空兵部队牺牲了16 714人。此后，随着源源不断的勇士赶赴战场，相继又出现了无数的牺牲者。当然，如果把平民包括在内，这个数字还会增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中，艾森豪威尔成功指挥了进攻欧洲大陆这一史上最大规模的战役，建立了史上最伟大的功勋，他的确对战争的荒谬和崇高两方面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决策的本质

第七章

诺曼底登陆的行动战略

——从战争复杂系统的视点

至此，大至国家战略，小至每一次具体战术，我们逐个展现了诺曼底登陆行动的事实及由无数事实交织而成的历史状态，此间我所关注的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将原因和结果相联结的复杂的、动态的关联性。

战争可谓复杂系统的极致，我所呈现的是以诺曼底登陆行动为题材的复杂系统的战史。

历史的本质和学习历史的意义

我们常说“历史没有‘如果’”，在这句话的背后是“历史是固定且客观的事实”这种思考方式，可是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即使就同一时代同一事件，各国的“历史”也是不一样的，容易成为矛盾的构成因素，所以说，历史是极为主观的、因书写者而变化的东西。

历史不是对过去事实的简单罗列。我们从过去抽取什么样的事实，又怎样将它们彼此联系起来加以记述说明？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历史性事件的意义在于历史学家意欲“创造”什么样的未来的这种想象力。其中必然会加入历史学家主观的、基于自己价值观的解释。

19世纪以来的实证史学讲究实事求是地对历史事件加以客观分析，可是历史研究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体，甚至艺术方面的特性更强一些。所谓“历史”是为开创未来而叙事（narrative）的，是对基于原本的历史性事实的史料本身所进行的选择和解释，是主观的产物。20世纪代表性历史学家E．H.卡尔在著作《历史是什么？》中揭示了这一点：“历史是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是现在和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并且卡尔还进一步说：“历史应该是过去的各种条件和逐渐展现出来的未来的各种目的之间的对话和呼应。”他认为，历史学家无论是对过去的解释，还是对重要的东西、有意义的东西的选择，都是随着新目标的不断出现而进化的。

如果不针对人类的未来，而是对过去赋予意义，就不能形成历史。从这个原理出发，新的历史，以及新的未来才得以被创造。所谓“现在”并不只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简单的间隔点，而是过去流进这里，未来从这里开始形成的重要的转换点。我们为创造未来而“叙述”历史。

如果诺曼底登陆行动提前一年的话

在“通过历史讲述未来”之中，有一点很有益处，就是围绕已知的历史事实探讨有无其他可能性。历史并不是对过去的简单记录，而是为创造未来而汲取意义乃至教训的绝佳题材。因此观察史实背后的关联性乃至脉络不可或缺，因为意义来自其中的关联性。

有一种展开观察的好办法，就是把通常所说的假设“如果”拿到历史之中，建立基于史实的模型。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当时人物的决策经过，最大限度地从中吸取教训。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在敦刻尔克的“发电机行动”开始前，希特勒的装甲师始终马不停蹄地追剿英军，刻不容缓地进攻英国本土，英军很可能遭到毁灭性打击，其后的反攻将变得极为困难，甚至可能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走向。

对这种假设，《战争论》的作者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谈到战略时用“可能的战斗”一词来表述。他认为，即使是在现实中没有发生的战斗，只要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有可能发生，分析研究结果对总结教训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列举三个更大的“如果”。

第一个，“如果诺曼底登陆战不是发生在1944年而是发生在1943年的话……”，战史研究家哈罗德·C.杜切等人对此有详细论述。他们推测，在1943年的时候，盟军已经拥有了充足的进攻大陆的战斗力，尤其是1943年8月，担负着主要进攻任务的美国陆军的战斗力达到了顶峰，后来的进攻部队只是增加了海军的两个师。唯一的“阿喀琉斯之踵”是运输能力，但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讲述过的那样，由于护航航母的出动，敌人在运输海域的U型潜艇被驱逐干净，想在1943年登陆的话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的确，在1943年防守诺曼底的德军相比在1944年实际迎击盟军的部队要软弱得多——隆美尔所构筑的强大防线在1943年还没有形成。盟军只要登陆就可迅速建起桥头堡，也更容易突破敌军防线。

并且在1943年，德军为阻止东部战线上苏军的反攻和防守地中海地区，很有可能派不出充足的援军到诺曼底。这样盟军不但可以占领诺曼底，而且能轻易突破法德边境，先于苏军到达易北河畔，柏林就可以由盟军占领，到1944年春天德国就将被迫投降（实际上是苏军占领了柏林，德国到1945年5月才投降）。

这种假设如果成为现实的话，就有可能挽救在战争最后一年里遭杀害的200万犹太人的生命，东欧也不会拱手让给苏联。在诺曼底登陆战上犹豫观望、总是纠缠于从“小腹”开始进攻这个间接战略的丘吉尔就不会出现判断错误。

如果希特勒采取不同的战略

第二个“如果”是有关希特勒的战略的假设。谙熟军事与历史的美国

记者贝文·亚历山大认为，希特勒取得胜利的关键步骤是停止对苏联的正面进攻，然后进占北非。

1940年法国投降后，英国只用一个装甲师来防守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而同时德国在北非却拥有20个整编的装甲师，轻易占领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可能性很大。最终法国占领下的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将被轴心国部队占领，英国只好放弃地中海。这样，濒临地中海的希腊，以及其相邻的南斯拉夫也不得不同德国展开和谈。因为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本属于和德国一伙的轴心国，德国不用出动一兵一卒就可支配东至南斯拉夫的广大地区。

而德军一旦进占苏伊士运河，就可踏入叙利亚、阿拉伯半岛、伊拉克、伊朗等，得到实施战争不可或缺的石油宝藏。首先孤立中立国土耳其，进而威胁英国对印度的支配，还可以将高加索和里海沿岸的苏联油田地带纳入德军的火炮和坦克的覆盖范围之内。

最后，土耳其将被迫在加入盟国和赋予德军领土通行权之间做出选择，使英国不得不专注于印度的防卫，苏联只好和德国继续保持和平状态。一旦苏联不能在东部战线上增强兵力，美国就不能在地中海开展大规模的海陆两栖战，而且美国还不得不在太平洋地区迎击强大起来的日军……最终亚历山大得出这样的结论。

> 这样德国就成了所向披靡的无敌帝国，获得了可与美国相抗衡的防御和扩展资源的自由度。英国即使拒绝和平，也不得不在事实上继续停战状态。美国即使继续研发原子弹，也会在是否投在德国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如果希特勒不去正面进攻苏联，而是采取进占北非的间接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就有可能是上述的样子。

第三个“如果”以日本为例。我们第二章介绍过的美国陆军军官阿尔伯特·魏德迈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犯下了“在太平洋上向美国

挑起战端”的战略性错误。那么日本应该怎么办？魏德迈主张日本应进攻苏联的沿海各州，比如东西伯利亚的要冲符拉迪沃斯托克，如此结局会怎样呢？

> 苏联只好在东部保留强大兵力，最后不得不在西面同德国、在东面同日本开展两线作战。这样日本的盟友德国将得到帮助，以至攻陷莫斯科，斯大林格勒也逃不脱同样命运。如果德军进一步占领高加索，那么战争就将长期持续。眼见形势不利的美国参战会更加迟缓。如此一来，轴心国可能至少不会那般捉襟见肘。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希特勒得知日军攻击珍珠港的消息后大喜过望。魏德迈指出，如果希特勒真的具备独特的战略眼光，也许会力劝日本不要攻击美国而是进攻苏联。

对类似的可能性多做几次思考，就能切实地体会到，未来并非不可改变。尽管在后人看来，领导者的决策有的英明，有的愚蠢，但它们的确创造着后来的时代。

真实的历史和推测的历史

要想让历史学家发挥想象力，不能缺少一些关于过去的“证据”。这时，历史学家必须发挥“感性的想象力”（Perceptual Imagination），提出与过去的证据相联系的事实。可是，比这种想象力更重要的是历史学家需要发挥“概念想象力”（Conceptual Imagination），将这些事实作为有意义的事件或过程加以理解。

感性的想象力建立在用眼睛能看到、用手能触摸到的“证据”的基础上。万里长城和“关原之战”等就属于这一种。具体到本书的例子，就是奥马哈滩的战斗以及对卡昂的大轰炸等。无论是当时的人们还是后世的我们，通过观察现场残留下来的历史性证据——砖瓦、弓箭以及弹片等

——能直接感受到过去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正是“真实的历史”。

另一方面，当时的人们无法发挥概念想象力，因为历史事实正处于发生过程中，不可能赋予其意义或找出其关联性。这些是“推测的历史”。可以说，这种“假设”行为是只有后世的我们才拥有的特权。“工业革命”“文艺复兴”“中世纪”这些词语，都是后世的历史学家根据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而命名的概念。具体到本书，则是“诺曼底登陆战”以及“D日”这些概念。历史学家能够站在现在的立场，去理解与过去的证据相关联的过程（事件），即能够以更宽广的角度去观察过去。

真实的历史建立在过去的具体证据的基础上，而推测的历史则是一种想象，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同时能够以现在的立场为这些事实赋予意义。

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说：“所谓有意义的事件，就是该事件的潜在影响超过眼睛能看到的当前的影响。”就如同小说家讲述人类行为、姿态、沉默等非语言沟通的潜在意义一样，历史学家也需做文学家甚于做科学家。因为历史是由人针对其他人的知识构成的，所以人会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置于中心位置，而那些知识也都和人的所有感觉相关。视觉伴随着思考和想象，这种想象也参与意志与历史的构成。

历史的乐趣正在于此。我们将“彼时彼地”（there　then）和“此时此地”（here now）的经过联系起来，以此解释历史并创造未来。什么是创造未来？我们想象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为实现更符合自己愿望的未来而对现在的行为深思熟虑，然后付诸行动。

有一件事很重要。正如历史学家以谦虚谨慎的态度从过去的证据中探求出成果一样，我们也必须对现在的事实和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在这一点上，虽然目的同样都是实现未来，却不同于不必拘泥于过去的证据而“编写剧本”。我们虽然能够创造未来，却不能捏造过去的事实。所谓学习历史的过程，也是培养谦虚谨慎态度的过程。

丘吉尔擅长的“历史想象力”

丘吉尔毅然决然地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针锋相对，把欧洲从危机中解救了出来。他还是当代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能够为创造未来充分利用历史。

历史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认为，在丘吉尔的知性世界里，拥有着以过去的历史轮廓想象未来的“历史想象力”（Historical Imagination）。丘吉尔正是擅长这种以今天的符号解读过去历史的“模型认识能力”。正如我们在序章中讲过的那则逸闻：在大家都以为德军就要发动进攻的一个夜晚，丘吉尔和身边的人高谈阔论的，虽同样是英国本土遭到攻击的话题，却是发生在11世纪的诺曼征服的故事。

常人难以模仿丘吉尔的一点，是他建立在卓越的模型认识能力基础上的描述未来故事的能力。

丘吉尔很早就预见了纳粹的威胁和纳粹势力的兴起。由于协约国和德国之间缔结的《凡尔赛和约》的内容成为束缚德国的枷锁，丘吉尔预测德国很快就会反抗，走向重新武装的道路。他还预想德国会和苏联展开合作。作为对应手段，丘吉尔主张英国应该和法国一起联合位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波兰，并让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加入这个同盟关系中。与丘吉尔的意见相对立的，是丘吉尔的前任首相张伯伦等温和派，他们认为英国应该同德国以及意大利结成三国同盟，完全没有预料到德国会和苏联走在一起。历史正如丘吉尔预测的那样发展，德国刚和苏联签下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马上就开始进攻波兰。

丘吉尔还预见到了二战结束后东西方的冷战，猜测到了“自由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垂挂着的“铁幕”。

他对未来的预测能力在当时就备受好评，当周围的人问“怎样培养出这种能力”时，丘吉尔这样回答：“学习历史！学习历史！管理国家的秘诀全都在历史里。”

丘吉尔还留下了这样的名言："越是追溯历史、展开洞察，越能看见遥远的未来。"张伯伦决意推行怀柔政策的历史想象，背景正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疲敝的英国国民肖像。而丘吉尔所想象的时间轴，是以铸就海洋国家基础的德雷克、给拿破仑时代画上休止符的威灵顿、纳尔逊以及令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得以成功的议会领导者等由历史证实了的英国人的强韧品质为基础的。难道不正是历史想象力的宽度和深度，促使他毅然站在纳粹主义的对立面，做出了"共同善"的决断吗？对丘吉尔来说，所谓历史，就是预知未来会怎样，并根据这种预知来创造新的未来的"想象力的源泉"。

战争复杂系统和危机领导力

历史是复杂系统的叙事。复杂系统研究的是混沌。所谓混沌，就是某一事件尽管是依据规则发生的，可是却出现不规则的现象。所有的事件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的。一件事件包含其他事件的同时，还对其他事件施加影响。虽然短期预测事件产生怎样的影响比较容易，但长期预测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诺曼底登陆战初期，虽然很多空降部队士兵没能降落到目标地点，可结果却给德军造成了巨大混乱。初期事件造成后来的意外结果。

还有英国第2集团军早期进攻卡昂失败。如果把这件事情视为初期事件，那么英军把德军吸引到卡昂周围，使西南方向美军的进攻变得容易，结果给盟军带来胜利，也是一个事件导致后来的意外结果的例子。

在战争中，战斗层面的失败后来可能会成为战略层面的胜利，或者反过来，战斗层面的胜利后来可能会成为战略层面的失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经历类似情况。在时间的流逝中，出现了无数种原因和结果的相互作用。起初看上去是一件小事，但若干个偶然相互重叠，最后变成一件大事。这叫作"初始条件敏感性"（sensitive dependence on initial condition），历史正是被它所支配。"北京的蝴蝶扇动翅膀，纽约会刮

起大风”，这种复杂系统混沌理论的隐喻同样也切中历史。

冷战研究的泰斗约翰·L.加迪斯认为，把历史作为复杂系统考察时，重要的不是观察那些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偶然性因果关系的连锁反应。正因为如此，相比事物的模型化，历史学家更喜欢模拟实验。在众多的可能性中选择一个不可逆的分歧点，然后对历史提出假设。即使看起来是一个很不起眼的选择，但在其后的历史中，很多原因和这个选择相交的分歧点也会发生大范围变动。在诺曼底登陆行动中，就有很多不可逆转的分歧点。

决定盟军胜利的分歧点

诺曼底登陆行动究竟是怎样的一场战役？盟军获得胜利的拐点究竟在哪里？我们重新整理一下。

1 否定间接战略，选择直接战略

作为盟军的中坚力量，英国和美国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是不一样的。英国的意图是发挥海军强国的机动性，打击德国的弱点，使其兵力分散，同时实施经济封锁和战略轰炸，最后登陆欧洲大陆，给其最后一击。这是一种间接战略，具体主张就是攻击非洲以及地中海这些德国占领区。这样就能实现保卫英国本土、维护本国海外领地、分散敌人的军事力量这三个目标，进而对德国本土进行战略轰炸，这样就能遏制敌人的战斗力，锁定胜局。

而美国首先筹划攻入敌占区，向德国的心脏地区进军。请回想一下艾森豪威尔担任作战部长时，就第二战场的地点选择所研究过的众多方案。比如美军赶赴苏联境内、在东部战线和德军决战的方案，从挪威南下进攻德国的方案，从西班牙或葡萄牙北上进军法国的方案等。正像我们前面讲过的那样，几乎每个方案都各有长处和短板，最后只剩下一个关于诺曼底登陆行动的方案了。

结果力主直接战略的美国，即罗斯福和马歇尔，同主张间接战略的英国即丘吉尔达成妥协，实施了“火炬行动”。该行动的目标是扫荡北非的德占区，把整个地中海置于盟军的支配下。

而苏联方面，斯大林衷心支持美国的直接战略。在斯大林看来，“火炬行动”不过是一场小型局部战役。独力承受德军猛攻的是苏联，为减轻自己的负担，斯大林热切地盼望着英美两国尽早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火炬行动”之后，英国继续对美军让步，具体表现在对意大利的进攻行动上。以登陆西西里岛为开端的“爱斯基摩人行动”造成了墨索里尼的垮台，结果意大利只好脱离轴心国联盟。对意大利的进攻行动虽然在政治层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在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登陆后，面对德军精心构筑的防御体系，盟军一筹莫展，不得不停止前进。结果就是强烈主张进攻意大利、采取间接战略的丘吉尔颜面尽失，直接战略派马歇尔和斯大林的意见变得更有说服力。

打开局面的是德黑兰会议。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会议上首次聚首，斯大林发言说：“在地中海方向倾注更大的力量是在分散兵力，只有‘霸王行动’才是1944年应该采取的基本行动。”罗斯福立刻就同意了斯大林的意见，并提出了“5月1日”这个具体日期。罗斯福是把斯大林的发言作为良机，故意不让丘吉尔的主张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最终决定实施诺曼底登陆行动的其实是斯大林。

有人指出，斯大林在成功地令盟军做出让步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有意识地放出消息，说盟军的进攻行动如果继续兜圈子的话，苏联有可能“单独对德媾和”，并且斯大林还一边暗示日本自己可以充当日美和谈的中间人，一边进攻“满洲”（中国东北），最终使自己在欧亚大陆的地位坚如磐石。这些都是狡猾的斯大林高超的军事外交策略的胜利。

2 决定“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

为削弱德国的力量，应该从哪里抽出宝贵的兵力呢？斯大林所说的第二战场应该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开辟呢？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以艾森豪威尔、马歇尔为首的美军高层针对“史上最大规模的作战”的地点和时间聚首商议。

登陆地点的选择自然是登陆行动决策中最重要的事项。部队登陆需要大量时间，运送上岸的不只是官兵，而且还有武器装备、各种物资，向内陆进攻的诸多事项也必须事先安排妥当。尤其是当附近没有机场和港口，只能依靠不稳定的海上补给时，情况就越发如此。

反过来，防御方也必须在对方的登陆部队仍在海上，或者正处于登陆过程中，抑或已经登陆但立足未稳的时候，发动攻击，把敌人赶进大海。

也就是说，登陆行动的成败，取决于进攻方和防守方在怎样的登陆地点集中多少兵力。登陆部队为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必须选择没有敌人防守的地点，寻找敌人的疏忽之处，然后迅速奇袭登陆，尽早做好进攻内陆的准备。

盟军在选择登陆地点时，考虑的是：第一，登陆根据地内的海滩以及港口具备强大的吞吐能力；第二，便于从英国本土基地起飞的战斗机提供空中掩护；第三，敌人能够用来反攻的兵力比较少；第四，能够比较容易地利用登陆舰船。

经过对欧洲沿岸各地的仔细考察，满足这些条件的候选地点最后只剩下两处，就是法国的加来地区和诺曼底地区。最后诺曼底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这里不论是德军防御阵地的强度，还是兵力数量和增援能力，都比不上加来，进攻这里的海滩和内陆相对容易。

然而加来也并没有被完全舍弃，而是煞费苦心地用来牵制敌人，使之以为盟军真正的登陆地点在加来，在此期间趁机完成在诺曼底的登陆。

登陆地点一旦确定下来，盟军就要完全掌握制空权，使德国空军无

法靠近。给德军造成巨大打击的，是盟军从1944年2月20日开始对德本土集中轰炸一周的“论证行动”。德国大量的工厂因此遭到破坏，战斗机生产受到毁灭性打击，德国空军的威力遭到严重削弱。到同年4月，也就是登陆行动实施的两个月以前，盟军成功地获得了制空权。

接下来盟军便开始破坏道路和铁路网等既有的交通设施，努力把诺曼底地区孤立出来。正如我们前面讲过的那样，这一行动受到“成果可怜”“只杀伤了法国平民”等指责。在艾森豪威尔的努力掩护下，特德以强大的信念完成了这一行动，使诺曼底地区的德军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结果这次战略轰炸的确给盟军带来了胜利。

为什么选在6月6日

登陆地点一旦确定，就需要开始计划具体的登陆行动。不言而喻，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登陆时间，也就是“D日H时”的决定，这也是决定诺曼底登陆行动成败的重要拐点。

陆军担心被敌人发现，主张夜间登陆，而海军则主张白天，这样不但部队可以准确地在既定地点登陆，而且掩护登陆的舰炮轰击和空中打击也将更加容易。最后海军的意见得到认可。

在“H时”的决定上，为最大限度地借助涨潮的推力，盟军事先侦察了德军在登陆海滩的水中和岸边设置的大量障碍物——本来在最大限度利用海水推力的涨潮时分登陆最为容易，但由于障碍物的原因，盟军不得不选择在落潮时刻登陆。

那么“H时”设定在落潮时的几点呢？

为保证登陆行动的成功，需要事先通过舰炮轰击，破坏掉德军设置在海岸的防御阵地。这种舰炮轰击在日出后1小时最为适宜。并且为了让第二波后续部队也能顺利登陆，需要在日落前再有一次落潮。还有第三个条件，就是月光。要想令空降部队的活动和舰炮打击海岸防御阵地获得成功，月光绝对不可缺少。

综上，“H时”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得是适合清除岸边障碍物的落潮时分；为获得空军支援，需要白昼时间较长；为使空降行动和舰炮轰击都能准确执行，需要光亮，因而得是满月或者近乎满月。

1944年5月1日以后，满足上述条件的日期为5月21日—23日，6月5日—7日，7月19日—21日，具体时间都定在涨潮的3小时前和日出后1小时。决定将登陆行动从5月推迟到6月后，尽管在5月5日，艾森豪威尔暂时决定1个月后的6月5日实施行动，然而最终因天气恶劣再次延期至6月6日。

登陆的地点以及时间确定后，盟军开始隐瞒真实情报，实施扼制敌军机动能力的破坏活动。

法国的破坏活动组织，即通常说的“抵抗组织”是由英国特别行动处负责培训的。临近诺曼底登陆行动实施时，他们破坏铁路网络，阻碍有线通信，给向登陆地区推进的德国战略部队制造障碍等。

欺骗计划把隐瞒登陆地点和行动内容置于首位，即在登陆之前设法让德军相信盟军的登陆地点在加来，而登陆后进一步使敌人相信诺曼底地区至多是牵制行动的舞台，真正的登陆作战还是7月在加来地区。正如我们前面讲过的那样，为了故意让敌军发觉，巴顿“就任”从加来出发进攻的幽灵部队的首领。

德军很快就落入了圈套。对盟军总兵力做出过度判断的德军一直相信加来才是巴顿率领下的主力部队真正的登陆地点，精锐的第15集团军被牢牢地拴在加来不动，眼看着向诺曼底发动反攻的时间白白流逝。

最后，盟军缜密的行动计划完全切中了德军的疏失，登陆行动得以成功。部署在西部地区的10个装甲师中，隆美尔能自由调动的只有1个，想调用其他装甲师的话必须得到希特勒的许可。结果这1个师发动了反击，大大延缓了英军对卡昂的占领。如果“D日”当天隆美尔能调动更多的装甲师，那么在登陆地点建起牢靠的立足点之前，盟军很有可能已经被赶到海里去了。

德军也被命运所抛弃。隆美尔相信了天气预报，为庆祝妻子的生日返回了德国。负责诺曼底地区的第7集团军司令官弗里德里希·多尔曼大将因去雷恩参加室内沙盘演练，也不在岗位。亲自掌握装甲部队调动权限的希特勒正在睡梦中，约德尔没有去叫醒他。这些偶然因素相互重叠，导致德军轻易放任了盟军的登陆进攻。如此看来，登陆行动得以成功的最大原因，恐怕还是诺曼底这一登陆地点的选择。

3 把法国境内的交通设施作为战略轰炸目标

登陆前的轰炸目标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拐点。前面谈到过，将击溃德军的战斗机作为最优先事项、主张破坏德国境内的炼油厂和轴承厂的“德国本土轰炸派”与法国国内的“运输设施破坏派”相互对立，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决断，后者取得了胜利。如果没有这些决策的话，肯定会对诺曼底登陆的前景造成巨大影响。

德国本土轰炸派的代表人物有英国的阿瑟·哈里斯空军上将、美国的卡尔·斯帕茨大将和亨利·阿诺德上将，他们已经开始实施轰炸德国本土的“直射行动”。

运输设施破坏派的代表是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二号人物、英国的阿瑟·特德空军上将，以及同样来自英国的查尔斯·波特尔空军上将，他们首先考虑的是破坏运输系统，阻止德军的增援部队驰援诺曼底。

艾森豪威尔接受了特德的建议，决定截断德军的增援路线，结果使“D日”当天的铁路货运量比年初下降了30%，到7月上旬又下降了10%，令德军的增援和撤退都出现了困难。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指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军事政策。”

这种对立产生的另一方面，是艾森豪威尔掌握着整个空军的指挥权，努力劝服了英国战略空军。归根结底的问题是，究竟是把航空兵视为一件独立的武装，还是视为应与其他兵力相互配合形成陆海空三军一体的复合武装。这还和战略轰炸目标的选择有着密切关系，艾森豪威尔

和英国战略空军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探讨，并且说：“我已经彻底厌烦了和这么多女主角演对手戏。”

直到“D日”前一天的晚上，攻击目标还发生着变化，最终英国战略空军也被纳入艾森豪威尔的统一指挥下。艾森豪威尔明确对丘吉尔说：“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我只有回国一途。”他的战略调整能力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也是决定诺曼底登陆行动成败的关键。

盟军对德国本土轰炸简史

如此说来，对德国本土的轰炸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呢？当然不是。正因为战略轰炸以击溃德国战争能力的根基为目标，盟军在诺曼底才得以完全掌握制空权。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不列颠空战以后盟军对德国本土的轰炸行动。

最初的主角当然是英国空军。与德国空军对英国本土的轰炸相对抗，英国也实施了报复性攻击。由于双引擎轰炸机损失比较大，英国改为在德国空军的单座战斗机难以升空的夜间轰炸。可是由于多数轰炸实施日德国上空都有厚厚的云层覆盖，而且导航装置和瞄准器都很粗糙，准确地击中目标近乎不可能。根据英军1941年8月的报告书，在这之前对鲁尔地区实施的连续空袭中，到达攻击目标8千米以内的轰炸机仅占全体轰炸机的一成。丘吉尔非常沮丧。所以，英国空军认为“夜间攻击唯一的有效目标是德国的所有城镇”，实际上的意思就是无差别轰炸。在这过程中，担任轰炸机司令部司令、对德国本土实施了多次战略轰炸、人称“轰炸机”及“毁灭者”的正是阿瑟·哈里斯。

到了1942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机。由于日本攻击珍珠港，美国参战，也向德国宣战了。美国第8航空队协助英国的轰炸机司令部，开始对德国本土及德占区的军事目标进行战略轰炸。

美军完全坚持了英军很久前就放弃的“日间精确轰炸计划”，其理由有二。

一个是作为电影《孟菲斯美女号》“主角”的主力轰炸机B—17性能极其优异，装备着多挺12.7毫米口径的机枪，防范敌军攻击的装甲也十分坚厚，机体牢固，空气动力学设计先进，哪怕战斗中毁损相当严重也有返航的可能。并且诺顿公司研发的高性能轰炸瞄准器是B—17的标配，英军根本无法比拟，美军根本没有理由放弃精确轰炸。

在战略轰炸中大显身手的美国波音B—17“空中堡垒”和英国阿佛罗“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右下）（U.S. Air Force）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担心夜间进行无差别轰炸会殃及无辜平民的生命。和英国不同，美国除了夏威夷的珍珠港受到日军的突袭外，尚未遭到敌人的其他轰炸。而且美国国内来自德国的移民众多，对德国进行无差别轰炸很有可能受到舆论的强烈谴责。

以哈里斯为代表的英国空军高层和丘吉尔都动员美国也进行夜间轰

炸，但美军称“这种行为和正义战争的基本要求相悖”，始终没有同意。结果就是美军在白天精准轰炸德国的飞机、轴承以及和车辆有关的工厂，夜间轮到英国空军以整个城市为对象进行无差别轰炸，这样德国各城市几乎都遭到了24小时连续轰炸，这对德国来讲是非常恐怖的负担。

当然，德军也并没有闲着。为迎击英美的轰炸机，德国的战斗机都装备了大口径机枪和对空火箭弹、对空导弹等，编成了一旦情况需要不惜撞击自爆的战斗机群，以至于美英的重型轰炸机群深入战斗机无法护航的德国中心地区时损失巨大。

解决这个问题的是美国第8航空队从1943年年末开始陆续配备的P—51“野马”战斗机。这是北美航空公司研制的单引擎战斗机，最初有发动机性能低劣的问题，改装了罗尔斯·罗伊斯的梅林发动机后，性能得到飞跃性提高。这款发动机此前是装在“喷火”战斗机上，因在不列颠空战中拯救了英国而名声大噪。“野马”战斗机最初就是英国空军订购的，碰巧试飞员隶属于罗尔斯·罗伊斯的梅林工厂，后来便据其建议做了这种改装。该机型的突出特点是续航距离超长，增挂副油箱时完全可以为深入德国的轰炸机护航（时速394千米，增挂副油箱时续航距离3700千米）。1941年1月以后，美国第8航空队正式配备P—51，B—17、B—24这些轰炸机的损失终于开始减少了。阻击轰炸机的德国战斗机很多都不是P—51的对手。据说1944年年中，戈林望着柏林上空飞翔的P—51，嘴里嘟哝了一句：“这场战争我们输了。”

为战略轰炸机护航的P—51“野马”战斗机（U.S. Air Force）

4 机动力的组织化

两军的组织和指挥系统形成鲜明对比（请参考第四章的命令系统图）。德军是不规范的层级组织，盟军则是分形组织。分形组织的部分和整体都是相似的，具备联动性，或者说具备变化的活力。而且盟军设有统一指挥陆海空三军的最高司令官（Supreme Commander）这一职位，德军则没有这一职位，如果一定说有的话，那大概就是希特勒。不过，在现场级别上，提倡权限移交和独立行事的德军也是分形的。

德军在包括诺曼底地区在内的整个西部战场连战区级别的统一指挥官都没有。尽管名义上伦德施泰特任西线总司令官，但在他之外又有B集团军群司令官隆美尔。从组织图上看，隆美尔是伦德施泰特的部下，可两人的军衔又都是元帅。元帅拥有特殊地位，二人都拥有向希特勒直接汇报的权限。也就是说，隆美尔在情况危急时，可以跳过伦德施泰特直接向希特勒提出意见建议。实际上，德军各部队的指挥官们也弄不清楚自己真正的上司究竟是隆美尔还是伦德施泰特。一个组织拥有两个权限相同的领导不可能不混乱。

德军组织上的不协调还不止于此。以法国为基地的空军和海军也不在西线总司令官伦德施泰特的指挥之下。伞兵和高射炮部队归空军管辖，海岸炮台归海军管辖，伦德施泰特必须向空军和海军“借调”这些部队。疑心很重的希特勒担心特定的人物或组织会反对自己的方针甚至反戈一击，所以建立起了一个非常离奇的组织体系，既不是有条不紊的官僚组织，也不是彻底贯彻权限委让的自律分权型组织。此举彻底削弱了德军的战斗力。

这种没有统一指挥官的体系所采取的战略也是割裂的。与隆美尔集中所有兵力到海岸实施“岸际防卫”的做法相对照，伦德施泰特主张“机动防守”。由于不知道敌人的登陆地点，就让敌人暂时登陆，将他们引到敌军舰炮射程之外的内陆地区再加以歼灭。

对此希特勒一面下达命令，严禁登陆之敌踏上欧洲大陆一步，必须

在岸边将其击退，同时又命令安排强大的后备部队。这样的命令模棱两可，前后矛盾。可以说德军败北的决定性因素就在于希特勒这种模糊不清的态度。

而且德军的组织结构本身也非常复杂。在身为国防军总司令的希特勒之下，陆海空三军设有各自的总司令部，东部战线的陆军总司令部的司令官由希特勒兼任，同时国防军最高司令部急于在西部战线下设西线总司令部，用以连接下属的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这样组织层级又多了一层。仅这一点就明显削弱了德军针对突发状况的处理能力。更严重不协调的是，所有的机动部队都处于国防军最高司令部的管辖下，由于“D日”当天希特勒在熟睡，因此大大延误了初期反应的时间。

盟军根据现场形势实现自我组织

双方的这些差异也体现在具体的战斗中。例如在有着“血腥奥马哈”之称的奥马哈滩，我们在第五章已经讲过，这场战斗极其惨烈，产生了大量伤亡。海滩上一片混乱，但在混乱中，逐渐显现出了秩序。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现场官兵的领导能力。

诺曼·科塔准将发出“让突击队打开其他突破口！”（Rangers,lead the way！）的命令，坎汉上校和步兵以及突击队员组成部队，自称“傻瓜旅”，向敌军阵地发起冲锋。乔治·泰勒上校对部下大喊：“留在这处海滩上的，只有被打死的人和将要被打死的人！快！咱们快离开这个地方！”科塔准将一旦看准突破地点就召唤工兵部队，向铁丝网下投出爆破筒，亲自冲锋。从这里开始，战场形势出现了逆转。

当战局陷入胶着的时候，一旦有人采取特别勇敢的行动，这种行动就成了突破口，新的秩序得以产生。这是盟军尤其是美军最为自豪的地方。艾森豪威尔对美军曾有评价：“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能无须上级指示就做出敏捷有效的行动。”就是因为美军是自立分权型的分形组织。这种组织形式不但超越德军，而且超越英军。其典型事例就是卡迪斯·G.秋林下士为清除到处都是的博卡蕉，在战场上想出妙招，研制

出了“犀牛坦克”这种新式武器。

空陆一体的协作关系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后半期展开的空陆一体作战是“自我组织化”这种行为的典型，具体表现方式为提高火箭弹和导弹命中率的“抵近空中支援”的方法。掌管关键步骤的是地面配置的领航员，即“前线空中管制官”（Forward Air Controller，简称FAC），他们乘坐在装备了空中无线电发报机的装甲车辆中。这一岗位由现役飞行员轮流担任。

前线空中管制官的任务是帮助战斗轰炸机的飞行员更清楚地确认目标，在参照地面部队标示的白线或发烟弹的同时，使用无线电为飞行员指示攻击目标所在。他们处于飞机和地面部队的中间位置，可以说承担了二者的交流翻译任务。

实际上这是德国空军王牌飞行员维尔纳·默尔德尔斯在参加西班牙内战时创造出来的方法。由英国空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北非战场上率先成功运用，后来美国海军在太平战争中将其作为海陆两栖作战的一环，独自研发出“抵近空中支援”的战法。美国航空兵迅速采纳了这一战法并在诺曼底加以运用。最后盟军甚至如探囊取物一般，到距前线仅几十米的地方攻击敌人。德国空军不胜其烦，把经常使用“抵近空中支援”战法的美国P—47“雷电”战斗机和英国霍克“台风”战斗轰炸机等称为“烦人轰炸机”。

5 消耗战和运动战的结合

诺曼底登陆行动在缜密计划和准确实施方面，即使在盟军开展的众多行动中也属于极其卓越的典范。不过，它也并非完全没有失误。

在“抵近空中支援”上发挥威力的英国霍克“台风”战斗轰炸机（左）和美国P—47“雷电”战斗机（右）（Imperial War Museums，U.S. Army Air Forces）

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英国第2集团军进攻卡昂的屡次失败。这个责任恐怕应由指挥官蒙哥马利来承担。蒙哥马利是个完美主义者，认为自己为战斗制订了周密计划，要求部下一丝不苟地彻底执行。在对敌的绝对优势得到保证之前，他宁愿谨慎地中止战斗。面对相互牵制、瞬息万变的战况，这使得盟军对卡昂的占领不得不大幅延迟。特德、坎宁安、哈里斯等空军将领也严厉指责其大幅拖延了机场建设，甚至要求解除蒙哥马利的职务。

不过，虽然战术上是明显的失败，但第2集团军在付出巨大牺牲的同时，也将德军主力牵制在卡昂周围，使美国第1集团军从西面的圣洛展开的突破变得容易。从整个战役考虑，延迟占领卡昂所带来的好处也是切实可见的。

那么，艾森豪威尔是不是当初就想让英国第2集团军在卡昂周围吸引德军，然后让美国第1集团军趁机突进呢？答案基本是否定的。或者应该说，随着战事大局的演进，艾森豪威尔根据变化中的现实做出了及时恰当的判断。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艾森豪威尔自己写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中明确表示，由于己方的计划具备充分的机动性，如果英国第2集团军突击失败，可以变更方针，命令布莱德雷的美国第1集团军展开进攻。

对于这一点，蒙哥马利做了反驳。在他战后所著的《蒙哥马利元帅战争回忆录》中有如下表述。

> 在种种事情上，我明显感觉艾森豪威尔和我分别处于互不相干的两个极端。我的用兵思路是，在充分保证己方均衡的同时使敌人进入不均衡的状态。我的作战计划通常是尽力强迫敌军把后备兵力投入宽阔的正面，用来填补其防线上的漏洞，然后我军的后备兵力投入狭窄的正面，对其予以猛烈打击。……在我看来艾森豪威尔的信条则是必须在所有地方展开全面攻势。有一次，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艾森豪威尔比作一个橄榄球教练，如果按照这种比喻的话，那么艾森豪威尔总是在标示线的内外到处活动，鼓动每个人都奋勇前进。

蒙哥马利曾发出豪言壮语，称登陆当天就可拿下卡昂，结果他的迟缓成了艾森豪威尔后来很恼火的原因。他们二人究竟谁更有道理呢？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争议。美国权威的战史研究者认为占领卡昂延迟几乎一个月的责任在蒙哥马利，而英国的研究者认为美军进攻瑟堡的计划极为粗糙和迟缓，导致迟迟未能占领卡昂。

艾森豪威尔是喜“动”的人。他自己考取了飞机驾照，还到坦克部队亲身体验运动战。当时他乘坐兜风的法国雷诺坦克可以在大路上以96千米的时速疾驰，下了大路还可以变换为履带模式。米顿营地的坦克兵非常喜欢这个速度。

以卡昂为轴的“右勾拳”

与此相对，蒙哥马利则喜“静”。他条理清晰，遵守计划，生来脾气暴躁的艾克一直很受不了他，认为其“严谨势必自灭”。艾森豪威尔充分认识到立即占领卡昂的重要性，视这里为从诺曼底打向塞纳的“右勾拳”，是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

而且蒙哥马利在占领卡昂后还继续犯错误。英国空军的特德和坎宁安指出，法莱斯包围圈未能扎紧，致使德军逃走，正是应由他来负责。当时也有人提出批评，认为他阻止巴顿的美国第3集团军前进是不想让外人插手英军战区，从而独占功劳。还有人说蒙哥马利喜欢把各种作战行动的目标混杂在一起，用打板球的典故做比喻，如果取得战果则说那是自己当初的目标，如果进展不顺利就强词夺理。

针对这一点，《诺曼底登陆》的作者安东尼·比弗写道：“蒙哥马利

这样的人作为指挥官，拥有不容置疑的资质，敢于将大量德国装甲部队吸引到自己这里来，面对强大无比的88毫米反坦克炮最大限度地集中使用也毫无惧色、继续战斗，他所指挥的部队也付出了无出其右的牺牲，但他竟然丝毫也没有得到理所应当的瞩目。”

最后，把英国第2集团军对德军的牵制这一“成果”和诺曼底登陆战的胜利联系到一起的是巴顿。他指挥美国第3集团军快速进击，令德军陷入了极度混乱的状态。并且如果没有他的第3集团军防守南方，决定盟军胜利的法莱斯包围圈的口子就不可能扎住。

可以说，诺曼底登陆战中功勋最为卓著的是巴顿。艾森豪威尔充分认识到胜败的关键是无论如何尽早拿下卡昂。但是由于蒙哥马利部队的迟缓，进攻卡昂举步维艰，他也焦虑不安。很快，艾森豪威尔注意到了位于诺曼底地区南部到东面塞纳河方向的空白地带，于是把进攻那里的任务交给巴顿。巴顿也充分理解自己的责任所在，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诺曼底行动的成败。

阿兰·阿克塞尔罗德用如下言辞评价巴顿作为指挥官的灵活性：

> “所谓指挥官，是能让原则适应现实情况的人。”巴顿熟读战史和军事科学论著，养成了做索引卡片的习惯，这句话就是巴顿写在索引卡上的。这里关键的是“适应”（adapt）一词，通常情况下这里似乎应该用“应用”（apply），但巴顿作风积极，独创性地用了“适应”一词。因为不能只是简单地把原则运用到实际中就了结了，他还寻求干脆又敏捷的过程。原则应该重视，但必须先解决燃眉之急。在现实面前最重要的，不是无视或忘记原则，而是根据需要加以变通使用。

运动战和消耗战的扬弃

艾森豪威尔最大的功绩是把运动战和消耗战结合起来，通过陆海空三军实现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多国作战行动，决定了盟军的胜利。

这里对“运动战”重新说明一下。

所谓运动战，指的是加快意向决策、兵力转移以及兵力集中的循环，确立相对于敌人的物理优势和心理优势，掌握战斗主导权的战法。在战场上以从精神方面压迫对手从而获胜为目标，常常迅速采取不可预测的行动，使敌人陷入混乱，乘机攻击敌人最薄弱的地方，令对手陷入不安状态，导致其动摇和混乱，以确保优势地位。为此需要高于对手的战况观察、形势判断、意向决策和迅速行动等能力。

为保证运动战能够有效实现，需要组织是分权的、相互协调的网络型，指挥系统必须拥有适应性和独立性以尊重现场。士兵的精神、心理、体力方面必须稳定，最好是相互信赖、在作战行动上具备专业水准且具备自律分权型领导能力的人才。只有这种人才可以采取对手想象不到的战略战术，成功地令对手产生“这样不可能取胜”的想法。

古代与罗马对阵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擅长运动战。古德里安的闪击战、毛泽东的游击战、越南战争中北越和越共采用的战术等都是运动战。

运动战赖以成功的要素有率先垂范、崇高的道义、正确的形势判断、创造性应对等，十分依赖个人资质，所以很难渗透进组织里。也就是说，运动战的战果很大程度上是由执行它的官兵所决定的。很多地方需要依靠优秀士兵的个人技能等难以把握的智慧，所以预测运动战的战果非常困难。

运动战的反义词，最大限度地利用武器的力量，迫使敌人陷入物理性的毁灭状态，便是“消耗战”。消耗战所必需的是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和后勤补给力量，多为中央集权式的管理组织以及支撑这种组织的垂直指挥体系所运用。为准备大量的兵器和补给，还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和工业实力。这种战法利用准备好的大量战力破坏敌人，使其不能继续战斗。

拿破仑以及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军（北军）总司令尤里西斯·格

兰特擅长消耗战。越南战争中美军也采用了这种战术。

很多消耗战都令战事陷入胶着，拖延了战争，伤亡者的增加不可避免。由于敌我双方的战力相对容易比较，所以预测战果也较为容易。但是另一方面，这种预测容易陷入理论性或抽象性的窠臼。

运动战和消耗战是两个相反的概念，在现实战争中这两种战法多结合使用。即在某些战斗中经常采取在量上超越对手的消耗战，在另外一些战斗中，也可能同时采取在质上压迫、扰乱对手的运动战。也就是说，将运动战和消耗战加以临时性综合最具效果，并且短时间内就可决出胜负。因而，同时运用这两种战法，将二者互补综合，最有望获胜。

诺曼底登陆战具备运动战和消耗战两方面的特性。不是只靠官兵以及武器的数量，人的判断力、智慧，以及执行力也是成功的关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取得胜利的盟军除了拥有通常的指挥体系，还注重现场每个人的思维判断与行动。

盟军的上层组织和官僚体制下德军的等级组织相比，具有压倒性的“分形性”，大众智慧管理因而成为可能。在盟军内部，美军比英军更适合运动战——不管在什么时候，美军指挥官都能参照上级指示，根据现实情况采取主动、迅速、有效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诺曼底登陆战最引人注目的主角还是巴顿。

践行“黑暗中的人”理论的艾森豪威尔和巴顿

利德尔·哈特提倡“黑暗中的人”理论：要想在漆黑的房间中打倒对手，必须用一只手把对手束缚住，用另一只手打击对手的要害。如果把这个比喻运用到战争上，就是使用一部分战力牵制敌人的主力，用自己的主力打击敌人的弱点，突破战线。正是这种做法打破了诺曼底登陆的胶着局面。

双方以主力相对峙的是消耗战，利用强有力的后备战力出击的是运动战。前面的理论也符合利德尔·哈特对运动战的解释。艾森豪威尔的

确将消耗战和运动战有机地结合到一起了，因此这位曾因对士兵动用暴力而引起舆论大哗的“倒霉蛋”，具备出类拔萃的军事才能的、年长艾森豪威尔5岁的米顿步兵坦克学校的同道，也就是巴顿的力量不可或缺。

消耗战和运动战的对比

	消耗战（Attrition Warfare）	运动战（Maneuver Warfare）
焦点	战斗：战场上的战力、战力比和消耗比、数量	对敌人的”结束力”：精神、道德、身体方面的稳定性、素质
强调点	军事能力、计划：以优势地位和雄厚物资取胜	信赖、革新、速度：用战况观察——形势判断——意向决策——迅速行动的循环速度来扰乱敌人，取得胜利
性质	层级式的	网络式的
风格	综合性、中央集权性、竞争性、指令性、标准化	分权性、自律性、协调性、适应性、独创性
手段	破坏敌人的战力和执行力	制造“无法获胜”的认知
目标	破坏敌人的战斗力	创造新模式
事例	拿破仑、尤里西斯·格兰特、“D日”、越战中的美军	汉尼拔、闪击战、北越军队和越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要点	大量的火力、技术、工业基础、中央控制	信赖、职业精神、个人领导力
风险	不均衡的威胁、附加损失、长期化、伤亡者的增加	对个人领导力及其道德高度依赖、对正确判断和创造性回应的依赖、对组织进行思想渗透的难度
特征	约米尼的战争论、科学性、定量性、系统性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艺术性、定性的、非线性

出处：《战争思维》G.T.哈蒙德（2001）

现代运动战的典型，是我们在第一章阐述过的德军导演的闪击战——仅用6个星期就横扫法国。闪击战的谋划者海因茨·古德里安借鉴了利德尔·哈特的“洪水泛滥式的进攻”概念。

利德尔·哈特的战略论来源于《孙子兵法》。孙子用水做比喻，陈述兵法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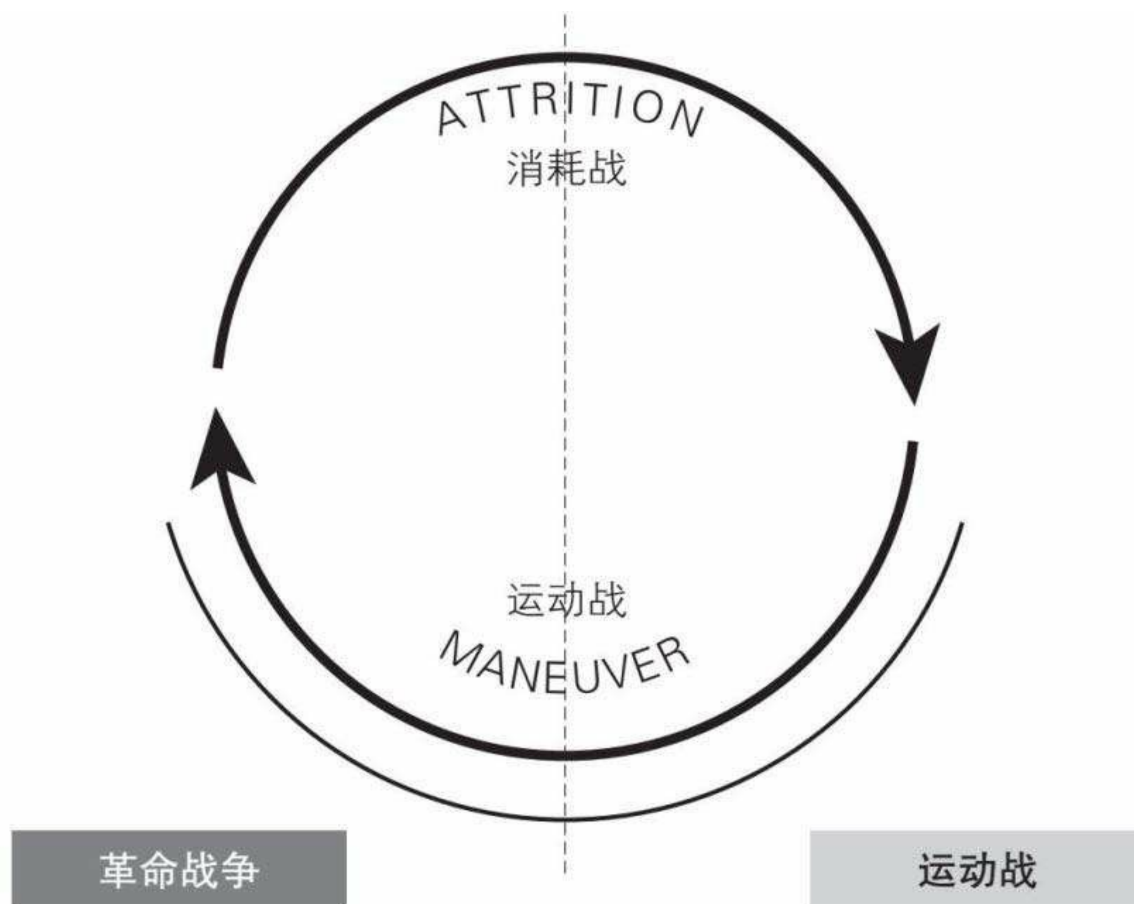
>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英国陆军军官理查德·E.辛普金在著作《迅速竞争》里，通过对德苏战争中苏联红军的战法研究得出结论：“消耗战和运动战的二分法在突出二者各自特点的对比上是很有效果的，但在现实中，二者其实是互补关系。”他认为，完美的运动战是由牵制敌人的常规兵力和突击敌阵的临时兵力共同完成的。虽说前者侧重消耗战，后者侧重运动战，但最成功的运动战是二者的适时结合。

并且辛普金认为，运动战的决定性要素是物理学中“质量×速度”所形成的冲力，双方实战部队的作战节奏、指挥部的战略战术以及规划每一位官兵使命的决策速度是操作运动战的决定性因素。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对于美国坦克部队初创期有着共同体会，在这一问题上有着直观的理解。艾森豪威尔这样说：

> 令敌军士气低落是司令官的最高目标之一，在这一点上朱可夫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要达到这一目的，奇袭战术最有效。向最能影响敌军战斗力的地点——至少是向敌人的重要地点突然出兵，出乎敌人意料。而如果奇袭导致敌人的前线部队发生恐慌乃至崩溃的话，其效果还会进一步提高。无论是地中海行动，还是欧洲大陆的作战行动，我们都成功地在战略和战术两方面运用了奇袭作战。

消耗战—运动战的互连模式



出处：《迅速竞争》理查德·E.辛普金

这里所说的“奇袭战术”和“奇袭攻击”等，都属于运动战。

第八章

艾森豪威尔的领导力

——从“实践智慧”的视点

攸关众多人的宝贵生命，不到最后关头无法得知结局，这就是战争。由于双方都在为自己的正义怀着必胜的信念战斗，胜败很难预测。当然，如果战争能够被预测，那么当初也不会发生。

在战争中，胜败的关键在于政治家以及军人的“领导力”，也可以说这是直接关系到众多人宝贵生命的“终极”领导力。史上最大规模的作战行动——诺曼底登陆战正是可以深入挖掘这种领导力以获取珍贵教训的绝佳素材。

六种能力构成的实践智慧

我们在序章中已经对丘吉尔的领导力做了阐述，他毅然决然地和纳粹德国对峙，把欧洲从危机中挽救出来。

这里的关键词是“实践智慧”。这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宣扬的概念，可译为“深谋远虑”、“实践智慧”，或者“实践理性”。现在我们重新说明一下实践智慧领导力的6个才能的背景。

为什么是亚里士多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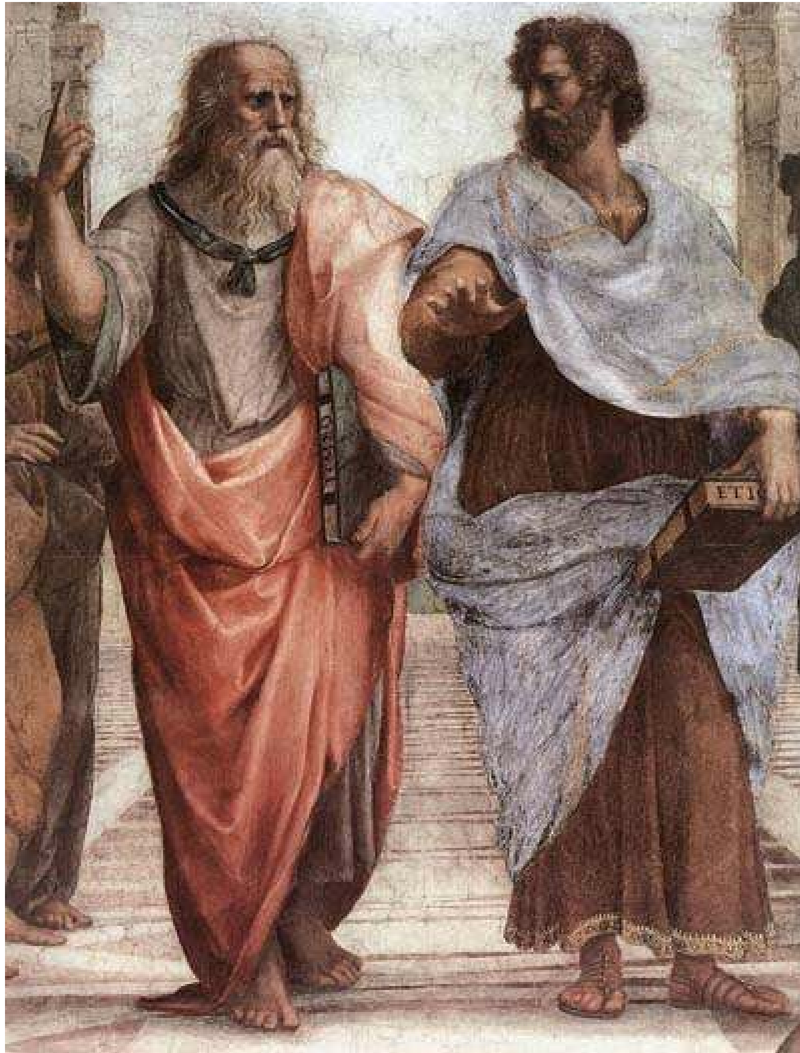
在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悬挂着文艺复兴时期活跃在意大利的画家拉斐尔的名作《雅典学院》。画中的主要人物是古希腊的思想家们，画面中央是以手指天的柏拉图和以掌遮地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否定活着的肉体，认为用理性的力量将现实加以理念化能够接近天上的诸神，然后人类才可获知真理；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依靠身体，将个别的、具体的经验汇集成普遍规律，方是获得真理的途径。画面中两个人的姿态正好表现了他们相互对照的哲学思想。

同为哲学上的认识论，两个人相互映照的思想从过去的古希腊直到现代，表现为心灵与肉体、理性与经验、演绎与归纳、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些矛盾之间的辩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演化。

说到方法论，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同样有着“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经济学成功地彻底排除了主观，为完成社会科学的“数学化”也即“科学化”而骄傲，但是也不能忘记，由于过度的抽象化，它也受到了“沦为‘智力游戏’主观唯心论”的批判。

既然观察现实并加以解释的是具有主体性的人，那么就不可能完全排除主观性。甚至可以说，过度的抽象化、客观化会导致对现实的乖离。在不断变化的复杂系统的世界里，追求真善美、要求及时做出恰当判断的政治和经营，需要科学和艺术的结合，甚至可以说，艺术的必要性更大一些。也就是说，在政治学和经营学中，不是学习柏拉图从几何学角度对普遍性真理进行主观唯心论的考察，而是要更多地向从生物观察角度通过现实经验和实践探求真理的亚里士多德学习。

领导力的本质在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持续张力的动态平衡过程。二者的平衡不是来自静态的分析，而是由辩证法上动态的综合这种难以表述的实践智慧来保证，因此它很难，可也因此有趣。



柏拉图（左）和亚里士多德（右）

如果把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实践智慧的内容具体化，就是“向往‘共同善’，身体力行，在个别的、具体的背景和关联中，随时采取及时且恰当的判断和行动的智慧”。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将知识分为三种，即“学问”“科技”“实践智慧”。“学问”指的是科学的、认识论的客观知识，换句话也可以叫“显性智慧”；“科技”指的是实用性技巧或技术知识，可以说是一种“隐性智慧”。我们认为显性智慧和隐性智慧通过相互变化的螺旋运动实现知识创造，也就是创新。促进这种创新过程的就是第三种知识“实践智慧”。

实践智慧也译作“实践理性”，是兼具实践和理性这种综合平衡感的智者的智慧。实践智慧不是用于实现利益最大化或者简单地歼灭敌人，而是一种树立更多的人能共同感受到的“善”的目标、在各种关系和关联性中做出最恰当最妥善的决策、并能主动向目标推进的能力。同时也正是在难以预测结果的时候，在不确切的混沌状态里，实践智慧才能发挥真正的价值。它是产生新知识、持续革新的创造型领导力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能力。

我们通过对大量优秀的政治家、军人、企业领导者进行研究，发现具有实践智慧的领导者具备如下六种能力。

（1）树立正确目标的能力

（2）直面现实的能力

（3）适时创造氛围的能力

（4）描绘直观本质的能力

（5）将想象变为现实的能力（“政治力”）

（6）组织实践智慧的能力

如果没有正确的目标，就无法团结更多的人；如果不能正确地把握现实，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如果没有创造氛围的能力，就不能开启众智；如果没有高超的鼓动能力，就不能说服别人；如果没有政治力，再精彩的构想也是画饼；没有实践智慧的组织能力，就无法培养后续人才，组织只能持续一代。正因为如此，这六种能力都不可或缺。

艾森豪威尔的实践智慧领导力

下面要呈现给大家的，是成功指挥诺曼底登陆战的艾森豪威尔的领导力。

恰好彼得·德鲁克对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以及马歇尔）做了如下

对比：

> 天才论很流行，到处都在议论，也有无数本书讨论。但是期待天才出现等于政治集团的自杀。……重要的不是天才的有无，而是在于究竟向正确的方向引导还是向错误的方向引导。20世纪所取得的建设性成果，并非都是天才创造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盟军走向胜利的军人也是具备出类拔萃的才能却无甚情趣的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

下面我们就依照德鲁克所言，体会在“天才”这个意义上与丘吉尔正相反、却同样优秀的领导者艾森豪威尔的领导力的内涵。

1 树立正确目标的能力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认为：所有的行为或选择都是对某种善的希冀。在这一点上，他和追问“美好生活”本质的导师苏格拉底有同感。富有远见卓识的实践的前提是“共同善”原则下的正当目标。

艾森豪威尔在其著作《欧洲十字军》中说，在盟军第一次登陆战，同时也是自己第一次就任司令官的北非“火炬行动”结束之后，他的战争观“发生了彻底改变”。

“18世纪之前，军人指的就是佣兵。战争就类似一种竞技，军人对敌方并不怀有憎恶之情，之所以投身战场只是为了胜利时拿到一笔奖金。结果敌方的司令官被俘时都有可能成为座上宾。现在的战争完全不一样了，”他认为，“我们发誓摒弃私利私欲，为了实现人类幸福而奋斗，决不向侵害人类权利的恶行妥协。对我而言，这场战争是如同十字军东征一样的神圣战争。”艾森豪威尔用希腊罗马时代的“历史想象力”来证明，自己“共同善”的基准和丘吉尔一样，在于“人类”这一层面。

有则逸事如实地表现了他的思想。

德军军官汉斯尤根·冯·阿尔尼姆被盟军俘虏，在前往战俘营途中，他得知自己将路过艾森豪威尔所在的阿尔及尔。阿尔尼姆是一名在盟军中也很有名的德军军官，这时他向多位盟军参谋表示，按照“过去的惯例”，自己应该得到面见胜方司令官艾森豪威尔的待遇。

可是艾森豪威尔断然拒绝了他提出的要求，并传令直到战争结束，不允许任何俘虏面见自己。不！不只是俘虏，直到1945年德军的约德尔大将在投降书上签字，艾森豪威尔和德军的将军都不曾有过一句交谈。此事足见他对战争的认真态度，足见他和丘吉尔一样，从整个人类的立场上憎恶希特勒。

充分表现了他这种思想的，是“D日”清晨在开往诺曼底的战斗舰艇中宣读的《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致登陆作战官兵的信》。

这封信中充满了“伟大的圣战”“保卫我们在一个自由世界的安全”“祈求万能的上帝祝福这伟大而崇高的事业获得成功”这些鼓舞激励士兵的理想，我们可以相信，艾森豪威尔擅长树立正确的目标，他拥有这种能力。

2 直面现实的能力

要想清晰地面对现实，对个别的、具体的经验加以综合的过程不可或缺。这一点近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共同感觉”，或迈克尔·波兰尼的“隐性知识”，即部分和整体持续交替，面对事物的过程不是名词性的面对，而是动词性的面对。这种能力在艾森豪威尔身上也很明显。

有人批评艾森豪威尔“缺乏战斗经验”，可他竟然是一个摒弃了观念论、重视现实主义和直接经验的实战派军人，一直努力获取包括空中作战在内的水陆两栖战的丰富经验。

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在马里兰州米顿营地的步兵坦克学校结识，两人

趣味相投，彼此都认识到了新武器——坦克的前景。他们把坦克拆解至每一颗螺丝，然后再重新组装。他们进行了运用坦克的各种试验，甚至研究坦克的设计，他们都相信以坦克为中心的摩托化部队能横跨整个美国。

不只是坦克，他在1939年5月就取得了个人飞行驾照，飞行时间达350个小时。他亲身感受到了飞机作为一种比坦克更为先进的武器的威力和前景。

他重视战史研究，包括在康纳带领下进行的战史战例研究，尤其重视南北战争中尤里西斯·格兰特的作战研究。格兰特对维克斯堡的进攻可谓水陆两栖战，在海军的协助下将国内水上交通要道密西西比河南部截为东西两段。艾森豪威尔和格兰特都在从军初期有兵站军官的经历，积累了战争大局的观察经验。

艾森豪威尔首次作为指挥官掌握兵权，是在北非进行的“火炬行动”中。其后是西西里岛（“爱斯基摩人行动”）、萨莱诺（“雪崩行动”），三次指挥水陆两栖战，无一例外都取得了成功。这一经历令他获得了连马歇尔都缺乏的水陆两栖战的经验智慧。这种经验智慧就积累在他的头脑和身体里，后来帮助他成功指挥了诺曼底登陆战，这个史上规模最大、且由多国军队实施的水陆两栖战。

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在此之前也真实面对了欧洲的现实。依照潘兴将军的指示，他作为美国战场纪念物调查委员会成员前往法国，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为了能在途中和人轻松地交谈，尽管他没有饮葡萄酒的习惯，可仍然总是拿着一瓶红酒。此行获得的知识和感受在16年后的诺曼底登陆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决定诺曼底登陆“D日”的具体日期时，他也展现了直面现实的能力。艾森豪威尔每个星期一听取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然后在每星期的后半段观察预报的准确率。从4月份开始，他一直用这种方法来测试气象队的技术能力。尽管他的确是一个喜欢扑克牌游戏的赌徒，但最后决定6月6日为“D日”，绝不是毫无根据的危险的孤注一掷。

3 适时创造氛围的能力

制造氛围正是艾森豪威尔的强项。他的笑容被称为“艾克笑”，他本人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乐观主义者，喜欢倾听别人谈话，总能以开怀的笑容顺利地团结起一个团队。

他曾进入西点军校的橄榄球队，二年级时膝盖负伤，运动员生涯就此终结。但是后来他却在教练的岗位上发挥了才能。参加陆军以后，担任过多支球队的教练，指导的球队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许他鼓舞队员、制造合适氛围的能力就是在那时锻炼出来的。

1943年11月，罗斯福为参加开罗会议，千里迢迢来到非洲。艾森豪威尔引领他前往迦太基古战场，两人聊了一阵那段时期的历史。罗斯福也爱好历史，和艾森豪威尔产生了共鸣，这拉近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D日”诺曼底登陆战》的作者R. W.汤普森这样写道：

> 艾森豪威尔从到达英国的那一瞬间开始，就努力打造一个紧密团结的团队。他注意到相互协助的必要性，强烈主张“摒弃国家间的偏见”。如果除去和英国上层的关系，可以说他取得了完美的成功。两个国家的国民所持有的傲慢与偏见，历史、地理、从国家成立开始就存在着的政治、社会、军事上的外在以及行为的差异——也许是由于语言类似，这些差异反倒更为明显——这些差异所带来的困难，由于艾森豪威尔的决心和手段，都被卓有成效地克服了。

艾森豪威尔从不吝于慰问前线，他乐于和士兵毫无顾忌地交谈。有朋友说他这样浪费时间，只会让自己更疲劳，艾森豪威尔对此充耳不闻。他的考虑是，让官兵们亲眼见到司令官很重要，应该让士兵们知道，纵然是司令官，也不总是隐藏在安全地带安然度日。

同时艾森豪威尔也从不让随军记者使用“艾森豪威尔司令部”一词，而是必须用“盟军司令部”。他从全球范围展开思考，谦逊的态度却根本

不像一个军人。1945年6月，他在伦敦行会大厅发表演讲时说道：“荣誉是由部下的鲜血和同事的牺牲换得，我对此的态度只能是谦让。”

但是艾森豪威尔本身却并不是那种任何事情都开放坦率的性格。他的情人凯·萨默斯比·摩根在手记中这样记载：

> 艾克喜欢闲聊，看上去十分坦率，可同时他却不轻易打开心扉。在堪萨斯州的成长经历、父母兄弟、乳酪工厂的劳动，这些内容他能说得令人入迷，可是他一次也不曾谈过自己的情绪，谁也不知道这个男人内心想的究竟是什么。

艾森豪威尔和凯的恋情最终没有结果。据第33任总统哈里·S.杜鲁门的传记称，战争结束后，艾森豪威尔曾给上司马歇尔写过“我要离婚和凯结婚”的信，但马歇尔断然否定了他的想法，回信说只要艾森豪威尔做了类似的事情，就会被逐出军队，以后也不得安稳度日。

与艾森豪威尔断了联系，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才得知这一经过的凯又写下感想，原谅了身不由己的艾森豪威尔：

> 将军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男人。如果让我假设一下我们今后在一起的人生的话，我会想他会怎样幸福的同时，也会想，如果他决意以放弃为国家服务的特殊权利来争取个人的幸福目标的话，那他绝不是尊重他自己。……他曾经对我说过，如果人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都是充满荣誉的优秀道路，其他一切也不发生改变的话，他一定会选择对我伤害最小、最好的道路。我相信，他所选择的正是这样的道路。

艾森豪威尔极其注意人际关系这一制造氛围的基础。艾森豪威尔视蒙哥马利为“肉中刺”，对他实在喜欢不起来，但除了称其为“英国的国民英雄”之外什么也没说过。因为英国陆军元帅阿兰·布鲁克坚决认

为“战场经验丰富的蒙哥马利正适合做英国地面部队的司令官”，所以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如此。

艾森豪威尔没有任命蒙哥马利为副司令官以做自己的左膀右臂。这一职位由能够抛弃国家偏见而参加到盟军中的、设计出人称“特德地毯”空中支援方式的英国空军上将特德充当。艾森豪威尔起用了大批将领，比如指挥敦刻尔克大撤退、熟悉水陆两栖作战的英国海军上将拉姆齐，比如长于兵站建设、信心坚定的美军司令官约翰·李，比如西点军校的同期生布莱德雷，还有在北非为地面部队提供支援、指挥战略空军的斯帕茨，以及自坦克部队存在以来就是盟友的巴顿等，都得到了马歇尔的认可。

我们把“氛围”定义为“动态关联的共享”。“关联”（context）一词有“决定特定词语含义的因素”以及“事件背景及发展”两个意思，这里指的是前者。“关联”一词的词源是“con”（共同的）+“text”（织物），有“把关系性和含义编织到一起”的意思。

词语的意思由其在文中的位置和与其他词语的关系所决定。另一方面，人也能感受到非语言的身体和情绪的共鸣，人生活在这种与外界关联的动态关系中，感知人与人、人与事物、事物与事物、部分与全体这些关系，然后令新的关系得到完善、转换、创立，这种力量称为“关联力”（Contextualizing Capacity）。

只有在超越从前的自己的同时深入这种关联，才可能发现真理。不过一旦融合进这种环境中，就弄不清楚整体了，因此必须是把“深入关联”和“如实观察事物”二者并立，也就是说不带主观色彩，站在对方的角度把自己相对化，以平常心享有各种关联中提炼出来的信息，以此来丰富自己隐性智慧的同时，预测他人的内心，对其意义加以综合解释。能够像这样适时且适当地运筹这一切的人，才是有“关联力”的人。

艾森豪威尔深谙这种关联力之奥妙，并经常有意识练习。培养他这种能力的，是扑克和桥牌这些纸牌游戏。他总是揣摩对手心理，考虑到接下来的好几步。

据长期担任他秘书的人讲，艾森豪威尔是直觉型游戏选手，且无论是打牌还是搞军事行动，都是制造假象的高手。他有预测的才能，可用来分析他人的内心活动，分析他们有哪些选择，以及如果这些选择被本人以外的人知晓该怎样取胜等。

在康纳手下学习战史时，相比于过去的指挥发令过程，他更关注南军领袖罗伯特·李将军在南北战争中决战葛底斯堡时内心做何思考等这种对指挥官的心理分析。艾森豪威尔不喜欢打电话而喜欢面谈，就是因为不见面就无法洞悉人的内心。

4 描绘直观本质的能力

我们在第三章曾经讲述过，艾森豪威尔在担任美国陆军参谋本部内设的作战部第一任部长时，曾构思出一个堪称诺曼底登陆战原型的行动方案。

正如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所表明的，这是一个“将陆地和空中的力量作为一个整体，使二者的战果都倍增的空军协助地面行动”的方案，在当时绝对是空前绝后的崭新战略思想。

先以登陆地点的欺骗作战开始，充分实施战略轰炸、空降和舰炮轰击；然后派兵一鼓作气实现登陆，同时建设港口，后续部队依次抵达；接下来是以坦克为中心的摩托化部队朝德国的心脏地区突击。他在做美国陆军参谋部内设的作战部第一任部长时，就凭借优秀的直觉，制订了这样的计划。

那么他这种优秀的想象力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呢？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康纳、麦克阿瑟、马歇尔这些优秀的引领者，也就是师长的帮助。在康纳处他受到了自己称为“军事大学”的教育，通读了战略论、战史、历史、哲学方面的典籍，实地考察了法国地理。艾森豪威尔喜欢克劳塞维茨和格兰特将军式的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抵近攻击的战法，同时他又亲自驾驶坦克，拥有操纵飞机的丰富经验，是美军中唯一充分理解机动

性空陆战重要性的将军。在后来的海湾战争中，这种机动性空陆战终于收获了成果。

尽管麦克阿瑟在私人关系上和艾森豪威尔不太和谐，但幸运的是，麦克阿瑟会将所有工作都托付给值得信赖的部下。作为副官，艾森豪威尔能在麦克阿瑟之前接触到各种战争计划、谍报信息、军人升迁等人事信息，以及新武器的实效等各种报告和文书，对整个陆军了如指掌。这对他自己担任军队首脑是非常好的锻炼。

马歇尔不喜欢巴顿那种行事夸张的人，而是喜欢对自己的荣耀与升迁淡然处之、拘谨缄默、能胜任繁重工作、交办的任务总是有始有终的人，马歇尔也具备识别并提拔这种人才的能力。他总是拿着一个黑色的小本子，上面记载着能做某些事的军官的名字，艾森豪威尔也名列其中。

艾森豪威尔善于运用历史典故进行隐喻或叙事，战略就是讲述故事，构思（情节化）“情感剧”“讽刺剧”“喜剧”“悲剧”等，但最重要的题目则是“善的胜利”，象征这一点的是“情感剧”。战争中的艾克喜欢西部牛仔式的通俗小说和电影。战后任艾森豪威尔政权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这样回忆：

> 艾森豪威尔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他彻底的乐观主义。他总是精神焕发地和助手合作。会议上大发雷霆之后肯定变得兴高采烈。他曾在内阁会议上说过：“一脸晦气的人在战斗中不会获胜。”

艾森豪威尔在历史想象力方面虽不及本身就是历史学家的丘吉尔，但在他的著作《欧洲十字军》中随处可见充满历史洞察力的情节。本书也多次引用艾森豪威尔的文章，他堪称美文作家。《欧洲十字军》是他用7个星期干脆利落地手写而成的。

在进行重要演讲时他非常注意准备讲稿。虽然也曾令部下帮忙，但最后的文稿都是他自己完成的。他的演讲大多语言朴素，言简意赅，却

能深深打动人心。这一点和讲究修辞的丘吉尔大相径庭。艾森豪威尔认为语言就是武器或工具，他喜欢简洁有力、首尾呼应的文章，尤其倾心“明确表达意愿的技术”，讨厌“被动型”的文章。比如部下用“使我想要如何如何”来结尾，他总是修改为“我想要如何如何”。

5 将想象变为现实的能力（“政治力”）

艾森豪威尔是那种能“哄骗”很多人助他一臂之力的人，这成为巨大的推动力量，使他所想象的故事得以实现。

对于“领导力”我们可以和有些人所拥有的力量或影响力相联系来定义。如果我们把领导力宽泛地定义为“为达到目标对人们施加影响的过程”，那么人类所拥有的社会性力量的基础由以下6种力量构成：①合法力（从组织正式获取权限）；②报偿力（赋予报酬的能力）；③强制力（能够加以处罚的能力）；④专业力（专业性知识或技能）；⑤亲和力（“互为一体”感觉的力量）；⑥情报力（信息的质与量）。前三种力量可以划分为“硬力量”，后三种为“软力量”。将这些力量加以动态综合，就是个人拥有的“政治力”，这个政治力也成就了各自的领导力。这里面最有约束力量的是亲和力（Referent Power）。所谓亲和力，是指人认同他人、集体、规范、任务等时受到的约束力量，也可以说它的别名是“爱的控制”。建立在亲和力基础上的控制，是对人最强、最深的控制，不过基于“同一性”的认识，这也是一种意识不到的“自我控制”。艾森豪威尔强势管理（power management）的本质正是这种亲和力。这种亲和力究竟能发挥出怎样的威力呢？2007年，艾森豪威尔新传记的作者迈克尔·柯达的如下记述或可窥其一隅：

> 美英两国的民间人士、士兵、肤浅的政治家、“问题儿童”一般的法国人都为艾克而着迷。他时常开怀大笑，行走时迈着堪萨斯牧场上那种大步伐，对上自乔治六世下至普通士兵都能坦率交谈，没有架子，为人诚实，主动承担超乎想象的沉重责任，因此所有人

> 都喜欢他。每个人都高高兴兴地接受他的指挥，信赖他，甚至愿意为他身赴死地。很难想象阿兰·布鲁克或乔治·马歇尔能获得艾克那样的自信、爱戴和信赖。身为政治家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慧眼识珠，立刻就发现了艾克的这种资质。

就连蒙哥马利都认为艾森豪威尔作为军人政治家是伟大的，不能简单地以军人去评判他。战后蒙哥马利这样说：

> 他伟大的原因在哪里呢？他头脑灵活，非常聪明，但他真正的强大之处在于“人”的资质。他这样的人极其罕见，他就像磁石吸引铁片一样，拥有把每个人的心朝自己的方向以及引的力量。只因一个简单的微笑，人们立刻就信赖他。他几乎是诚实的化身，并且具备丰富的常识，所有人都寄予他莫大的信赖。

应付权力争斗中的亲和力

前面已经讲述过艾森豪威尔对“问题人物”巴顿的巧妙处理。他并没有简单地给巴顿戴高帽，或是出于坦克学校的老朋友关系而特殊处理，而是经常给唯我独尊、听不得别人意见的巴顿敲警钟，使其认识到“你的升迁危险啦！掌管你命运的是我！”

这并非虚言。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不再需要那种拿破仑式的骑兵指挥官才能时，艾森豪威尔“冷漠地”解除了巴顿第3集团军司令官的职务。这可以说是建立在前面所讲的报偿力基础上的控制。

实际上盟军这一组织本身就是权力斗争的场所，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陆军和英国陆军争夺主导权导致的。和分散在太平洋诸岛上开展海陆两栖作战的海军相比，美国陆军在相对容易集中兵力的欧洲常常炫耀自己的存在。同时美国陆军航空兵的首脑认为自己是仅次于美英陆军的第三个独立军种，急于尽早拿出显著战果，结果就出现了对德国持续

不停的战略轰炸，而且空军领导们之间还存在个性冲突与纠纷。

要解决这些权力斗争，需要“政治力”来根据具体情况保持部分适合和全体适合之间的平衡。在此，艾森豪威尔发挥出了他的亲和力。罗斯福从与戴高乐第一次见面起就视他为一个令人厌烦的、自我表现欲极强的人，可是由于艾森豪威尔令人钦佩的亲和力，罗斯福最终不得不改变做法。艾森豪威尔开展以亲和力做后盾的权力游戏来靠近人的本质，得到的效果远远超过了游戏理论中的均衡状态。

以政治力为武器，艾森豪威尔巧妙地处理了他自己都称为“D日以前最令人烦恼的”戴高乐问题。这是只有艾森豪威尔才可能成就的巧妙的权力管理。罗斯福认为如果赋予“自由法国”政府某些任务，公开承认其存在的话，必然导致法国内战的爆发。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比盟军中的任何一个人都理解戴高乐。两人恰好都出生于1890年，都是很早就注意到坦克前景的军人，都具备美法两国各自的优良传统和美德。艾森豪威尔认为只有戴高乐才是唯一能抵抗希特勒的人。

在戴高乐的强烈主张下，艾森豪威尔支援了在当初作战计划中并不存在的解放巴黎的行动。首先迅速派出勒克莱尔追击德军，保护巴黎的历史遗产，同时镇压共产党发动的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起义。艾森豪威尔让戴高乐抵达巴黎后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盛大游行，使他作为法国的“民族英雄”得到国内外的广泛认可。相比于军事上的合理性，艾森豪威尔所做出的解放巴黎的决策更是一种充满政治性和道德感的行为。戴高乐以钢铁般的意志领导了法国的复兴，而艾森豪威尔作为盟军的首脑，间接地促成了令自己的上级罗斯福不得不承认的局面，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意图。

戴高乐在战争结束后不久，赠送给了艾森豪威尔一件极为贵重的礼物。这是一个精美的、用白金和黄金铸造、镶嵌着蓝宝石的香烟盒。据艾森豪威尔的情人凯·萨默斯比·摩根说，那是他收到的各种礼物中最珍贵的。可见戴高乐也深深感谢艾森豪威尔的深谋远虑。

6 组织实践智慧的能力

艾森豪威尔善于充分利用自己不能全部延揽的各组织中的优秀人才。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美军的组织本来就比德军，甚至比己方的英军具有更高的自律分权型特征。艾森豪威尔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起用了巴顿，靠他突破了陷入胶着的战线。

前面介绍过的逸事充分体现了艾森豪威尔的组织能力。他接到德军坦克炮性能优异、难以对付的前线报告后，立刻和马歇尔取得联系，讨论将坦克专家从诺曼底送回美国，改良美军的穿甲弹。蒙哥马利也得到了同样的情报，却将其置之高阁，没有做任何处理。

美国记者约翰·肯瑟这样写道："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放手任用自己所信任的人。所以他的部下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处理大事。"

战争结束后，艾森豪威尔得知相熟的苏联元帅朱可夫自己什么事也决定不了，必须向莫斯科的中央政府一一请示，觉得他可怜。不，是为延迟重要的决定感到愤慨。于是艾森豪威尔告知朱可夫美国政府给予自己的自由裁量权的内容。他这样说："如果我把这么琐碎的问题拿到华盛顿请求决定，我立刻就会被解职。政府肯定会去找能够自己处理这些问题的人了。"

也许是艾森豪威尔的话产生了效果，苏联元帅开始充分发挥最初不曾运用过的自由裁量权，也改正了总是把政委安排在身边的习惯，也不再忌讳和艾森豪威尔进行一对一的会面，并且一改作风，当机立断。

不仅如此，艾森豪威尔到莫斯科拜访斯大林时，提到了这个问题，最终促使斯大林说出了"一个国家的代表只是到处跑腿没有意义，代表必须拥有可以实施的权限"这样的话。中央集权、神一样的领袖、上意下达，所有这些词语都和艾森豪威尔不沾边。

可是艾克对不尽完美的人却并不宽容。尽管他不曾像巴顿那样声嘶力竭地咆哮，却是面红耳赤地真正发怒。因此他也特别注意选择足以胜

任工作的人。他总是用纵10厘米、横12厘米的卡片作为备忘录，上面写的是斗志昂扬、有独到见解、他认为有前途的年轻军官们的名字。艾森豪威尔也可能是在模仿拿着黑色小本子的马歇尔——他就是这样提拔自己所欣赏的人才的。

对第三次世界大战防患于未然

战争结束后，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第34任美国总统。作为总统的他获得的评价是："和蔼可亲，沉着镇定，反过来也可以说他在很多时候优柔寡断，像个老祖父。"

可是近年对他的评价中出现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新观点。与他那总是一副笑脸的温和外表相反，实际上他运用"看不见的手"，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以防范战争惨祸再次裹挟人类。

为罗斯福、格兰特、艾森豪威尔等人撰写传记的著名作家让·爱德华·史密斯这样概括他的功绩："艾森豪威尔终结了朝鲜战争，使美苏的敌对关系得以稳定，没有激化。他没有在欧洲各国推行殖民主义，反之还加强欧洲的联合。他在国际上避免了美国陷入孤立主义，在国内把共和党从麦卡锡主义中拯救出来。他维持了经济繁荣，促进了产业均衡和技术革新。不过，他对黑人的民权运动态度比较消极。"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苏联装备了可直接空袭美国本土的轰炸机，接连取得了中程弹道导弹（IRBM）以及洲际弹道导弹（ICBM）试验的成功，此后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旅伴1号"的发射也取得了成功。与此相对，美国的人造卫星计划"先锋"却两次失败，在导弹技术上还出现了"美国只能在苏联后面吃烟"的"导弹差距"争论。

尽管艾森豪威尔怀疑"导弹差距论"是虚构的，但迫于政治压力，他决心大规模强化导弹研究。其后，由于战略空军自信保持着充分的核战力，艾森豪威尔逐步减少常规武器预算，以集中研发核武器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抑制国防费用的增加。针对苏联攻击能力的提高，艾森豪威

尔并未实施大陆防卫计划，而是以导弹研发相对抗，使得军事预算得以大幅降低，几乎解决了财政赤字问题。

面对当时苏联首脑共产党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挑衅，艾森豪威尔没有上当，而是处以冷静的外交判断。他看穿了赫鲁晓夫“苏联能像做香肠一样制造导弹”的豪言壮语只不过是虚张声势，使用U—2侦察机拍摄了清晰的照片，确认苏联根本没有能打到美国的核导弹，进而一边通过文化交流促进苏联体制的地缘变化，一边推行封锁政策。尽管没有打出一枪一弹，但艾森豪威尔对苏联推行的一连串政策，却仿佛重现了在诺曼底以德军为对手的运动战和消耗战相结合的情景。

身处最特殊境况中的最普通的人

现在我们用实践智慧领导者的六种能力来观察一下成为总统的艾森豪威尔。

他遏制了核战争的爆发，没有使军事预算有更多的增长，发扬了保护国民的大义。他最早注意到了军工复合体的威胁，在1961年卸任总统之际发表的演讲中提到了这一点。由此可见他仍然有树立正确目标的能力。

艾森豪威尔出生在虔诚的基督教家庭，这个家庭总是充满宗教气氛。下面的事情发生在第34任总统就职仪式上。在总统开始第一次演讲前，他从衣袋中取出一张便笺，阅读起来：

> 全能的主啊！此刻我们站在这里，我和那些将在本届政府行政部门工作的同事一起祈祷，我们恳求您让我们鞠躬尽瘁，为在场的各位以及四面八方的同胞竭诚奉献我们的一切。我们祈求您赐予我们明辨是非的能力，并使我们的一言一行由此得到指导，受我国法律的制约。我们特别祈求，我们能够关心全体人民，而不论他们身居何种地位、属于哪一种族、从事何种职业。愿持有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们，能根据我们宪法的思想融洽地合作，并怀着共同的目标，

这样所有的人都将为我们可爱的祖国、为您的荣耀而工作。阿门！

也许，明辨善恶、“用同一条船装载不同信仰的人们”的力量，都是从他的宗教信念中派生出来的。

在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的8年多时间里，匈牙利事件（1956年）、苏联人造卫星“旅伴”发射成功（1957年）、苏联的柏林中立化设想引起的“第二次柏林危机”（1958年）、苏联击落侵犯领空的美国U—2侦察机事件（1960年）等，一触即发的重大事件频频发生，但艾森豪威尔都以其“直面现实的能力”予以了妥善处理。

他也充分发挥了适时创造氛围的能力。苏联自不必说，就连美国国会也被他的笑脸和恭谨态度所“欺骗”。他本人虽是共和党，却不忘和民主党保持平衡，以此强化总统的地位。同时还和以朱可夫元帅为代表的苏联要员保持个人交往，促进了东西方关系的缓和。

身为总统的艾森豪威尔还得到了来自修辞学研究者的“战略沟通者”的评价。在总统选举中他创造了“I Like Ike”（我喜欢艾克）的竞选口号，巧妙运用电视传媒提高知名度。对于冷战时期的政治家而言，高超的修辞能力是必需的，艾森豪威尔在这方面也很熟练，可以说出色地发挥了“描绘直观本质的能力”。

至于实现故事的能力（政治力）就更上一层楼了。除了前面讲述过的人格魅力，他还具备“虚构的能力”。可以说，他以前所具备的能力到了政治家时代开始四面开花。

艾森豪威尔时而夸大事实以制约对手，时而卷起一支烟，对某些问题避免直接回答。他将这种手段运用到了赫鲁晓夫身上。有时他也会给对手失去干劲的弱势印象。就这样他直到最后也不让对手看到他的底牌。艾森豪威尔长于虚张声势、威胁对手，被称为“纸牌高手”。在扑克游戏中，往往是人称“扑克脸”的情感封闭的人取胜。而表面一副笑脸，却绝不让人看到内心，在政坛上，这是极为重要的能力。

因此也有人说艾森豪威尔“充满阳光的笑脸”是装出来的。时任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在回忆录《领导者》中表示，艾森豪威尔“比很多美国人所实际感受到的要复杂得多”。并且尼克松还介绍了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的一桩逸事。史密斯长期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他曾哭诉道：“我是艾克的刽子手，艾克需要一个刽子手。”所谓刽子手，指的是出面解雇别人的人。无论如何，对任何人都表现得可爱可亲的艾克，的确需要一个像史密斯那样的卑污助手。

据说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在埃本·托马斯教授的访谈中，就父亲开放性的温暖和冷血之间的平衡问题，笑着回答说：“父亲75%是冷血的。”

最后，在组织实践智慧的能力上，一个明显表现就是起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做国务卿，用以操纵外交政策。如果说艾森豪威尔充满世间的温情，开放且感性，那么杜勒斯则冷漠苛刻，是极为理性的人。艾森豪威尔利用自己所擅长的亲和力，使一个与自己完全相反的部下开辟出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力量的环境，同时在关键时刻也倚仗强制性力量发出威胁。

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在卸任总统时已经超过70岁，由于身患心脏病，难以为继任者约翰·F.肯尼迪提供帮助。与看上去十分保守的艾森豪威尔相比，肯尼迪外表年轻而充满朝气，充满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但经验尚浅，缺乏政治家所必需的圆滑和聪慧。

《艾森豪威尔的威慑》的作者埃文·托马斯指出，艾克的威慑之所以屡试不爽，只能说是因他从不对任何人暴露本心，然后用武力来实现和平。实际上，包括那些吹捧奉承他的人，谁都没有理解他的真正意图。可是，艾森豪威尔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只有他本人才能做到。艾森豪威尔做出过很多战争中面临生死考验的判断，而他的继任者肯尼迪和约翰逊尽管有小规模战争的经历，却没有与史上最大战争相匹敌的大规模战争的经验。他们拒绝大规模报复战略，只是采取灵活反应战略，最后未能防止美军陷入越战泥潭，这可能也是无可奈何的结局。如果肯尼

迪能得到机会学习艾森豪威尔那种实用的、难以应对的战略论，其后的美国可能就不一样了。

超越“普通人”概念的复杂的人

那么艾森豪威尔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美国有一部2004年上映的电影，名为《诺曼底大风暴》（罗伯特·哈蒙导演）。主演艾森豪威尔的汤姆·塞莱克在介绍电影时说：“艾森豪威尔有两副面孔。一个是一步也不后退的最高指挥官，另一个则完全是个普通人。”塞莱克在和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会面时，约翰问：“扮演我父亲那么平凡的人很难吧？”或许塞莱克由此想到了艾克普通人的面孔。最后塞莱克这样评价艾森豪威尔：“身处最特殊境况中的最普通的人。”

当然，我们迄今为止所看到的艾森豪威尔，依然是超越了“普通人”概念的复杂的人。艾森豪威尔过世多年以后，他的孙子戴维问祖母玛米：“奶奶，您真的了解爷爷吗？”玛米回答说：“不，我不了解，谁也不了解他。”

世界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和这个世界有关的、试图理解并创造这个世界的人本身很复杂。可是复杂却并非不可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只要运用复杂系统历史观和实践智慧领导力的理论，基本能够一窥战胜危机的高超的领导力的本质。

结语：从常人到伟人的过程

艾森豪威尔是一位军人，他和上司马歇尔一起，指挥盟军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他并非天才，既不是功勋卓著的前线指挥官，也算不上足智多谋、运筹帷幄。既然是不无破绽的极其普通的人，为什么能够成为在历史上留下足迹的领袖人物？在本书的最后我们探讨一下这

个问题。可以认为，有几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很重要。

（1）真诚地追寻专业道路并加以实践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具体的事物发展过程中，为实现“共同善”而发掘并实施最合适的行为的能力称为实践智慧。比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阐述人应该具备美德的，是美国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麦金太尔认为美德这种东西存在于无限实践所蕴含的专业道路中，而无限实践的目的是致力于实现社会所确立的卓越性标准。他所说的“美德”，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很接近。

艾森豪威尔应该就是沿着寄予这种“美德”的专业道路大踏步前进的人。

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各种各样的人所给予的，或者偶然出现的资源，全面参与眼前的现实课题，绝不逃避。他毕业的学校西点军校虽然在当时评价很低，但由于免收学费，家境窘迫的艾森豪威尔只好去那里上学。在学校里他全身心地投入橄榄球和纸牌游戏中。后来艾森豪威尔回忆说：“其他任何运动都比不上橄榄球，它使我树立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即胜利是可以从刻苦努力、团队精神、自信以及狂热的奉献中得来的。”在“从军和玩扑克同样都需要头脑和胆略”的认识下，艾森豪威尔也喜欢上了扑克。他用年轻时赚的钱就可以给未婚妻玛米买新娘礼服。尽管他有高超技巧来补充军队的工资，可即便赚得盆满钵满也不曾伤害过牌桌战友的感情。

他在坦克部队结识了巴顿，两人友情深厚。他们友情的基础在于军人的专业意识。他们甚至分别给一家名为《步兵报道》的杂志积极投稿。艾森豪威尔在严酷的训练中迅速崭露头角。他曾说：“我们都研究最新的军事理论，坚信坦克的威力。……乔治（指巴顿）和我都专心致志。”

关于盟军在“D日”之前开展的一系列作战行动，艾森豪威尔有一句

名言：“英军与美军的联合就如同狗和猫混到了一起。”在初次参加实战的艾森豪威尔所指挥的这一系列战役中，他从不曾怠于对“至善”的追求与实践。在“火炬行动”中他作为调整盟军内部关系的角色，担任所谓的总司令。不过从西西里岛登陆行动开始，他就参与到包括部下选拔、教育训练等战略战术的决策中，直到史上最大的作战行动，他都在保持麦金太尔所说的“卓越性”的标杆。

（2）受益于多位卓越的师长

艾森豪威尔一直置身于幸运的环境里，这指的是他能受益于上级，尤其是陆军中最有修养的康纳、天才的榜样麦克阿瑟，以及提供镜鉴的马歇尔三人。当艾森豪威尔自己成为领导的时候，在他们手下任职锻炼的经历发挥了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当属康纳。名义上艾森豪威尔是他的副官，实际上几乎是他的学生。康纳作为参谋，是隐身幕后发挥威力的卓越战略家，同时也是在才智方面培养马歇尔和巴顿的师长。

在巴拿马，艾森豪威尔从康纳那里得到了针对他个人的指教。艾森豪威尔本人称自己在巴拿马驻防的3年为“战史和修养的研究生院”，在那度过了要求严格而充满学术氛围的时光。他们的住所相邻，每当遇到康纳，艾森豪威尔都会向他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

康纳尤其推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向艾森豪威尔提问书中每一个概念和命题的正确意思，有时是德语原文。艾森豪威尔3次通读此书，几乎倒背如流。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论断已经成为艾森豪威尔自身的一部分，发挥着不可思议的作用。毫无疑问，在当时的军官中，只有艾森豪威尔能做到对克劳塞维茨了然于心。

在评论家小林秀雄和数学家冈洁的对话中曾阐述过通读的重要性。有人认为不求甚解的背诵毫无意义，小林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例如《论语》。对《论语》的理解往往因人因年龄而异。即使年轻时不明其

中含义，但随着常年的熟读，有些章句会逐渐铭刻于心。小林认为，在某些时候，教授《论语》的方法正应该是一种“模糊教学”。

毫无疑问，艾森豪威尔这一时期对克劳塞维茨的通读乃至背诵对他日后能力的提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第一任作战部长，到欧洲战区远征军司令官，再到盟军最高司令官，每当艾森豪威尔的地位和任务发生变化，他都会想起这部经典中的语句，他对经典的理解也可谓越来越深刻。

> 每当年轻人问我，要想成为一位政治家该怎样学习，我就告诉对方，不要去学政治学，而是要充分阅读历史、哲学、文学书籍，从而活跃自己的精神，扩大视野。对于政治，只要通过具体的事例去学习就可以了。但是那些想成为政治家的人，只有从年轻时代就开始在读书习惯、思考训练、严谨的分析技术、价值观、哲学基础等方面充分注意，此后也努力坚持，别无他法。（《领袖们》，理查德·尼克松）

艾森豪威尔心中的最大英雄实际上是林肯。在他的总统办公室中，悬挂着本杰明·富兰克林、华盛顿、林肯以及南北战争中南军统帅罗伯特·李的肖像。艾森豪威尔在成为总统的第一年里又重新阅读了南北战争的故事，通过回顾林肯——尤其是他的狡猾和坚忍，为自己提供参考。艾森豪威尔在葛底斯堡居住的书房中也悬挂着林肯的肖像，电视上方摆放着林肯的胸像。

艾森豪威尔和林肯具有共同点。和林肯一样，艾森豪威尔也是情绪无常的人，同时有着莫大的自信。可是艾森豪威尔由于自信而谦虚，他从未感觉到需要展示自己的强大与深谋远虑，也从未想要成为“伟大的解放者”。他深刻地理解到，在进入核武器时代的世界里，人们需要的是一位从容沉着的领导者。

林肯通过发动战争保卫了美国，艾森豪威尔通过避免战争拯救了世

界。在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大力发展毁灭世界的武装力量的时候，他却在努力实现和平。只有比其他任何人都理解战争的真正本质，深谋远虑，具备隐忍的智慧，才能够实现和平。他一直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找答案。托马斯评价艾森豪威尔说："他是自信、乐观和诚实兼具的非常罕见的人。"

艾森豪威尔的思想行为模式来自美国的实用主义方法论。与其说他用沉默思考的观念论切入现实，不如说他重视简单不懈的实践理性，即首先以自己的信念为起点展开行动，如果结果理想就继续下去，相反，如果结果糟糕，就运用其他假设试行错误，直到自己所期待的结果出现。实用主义的源泉之一，不是来自柏拉图的"真理是净化了的现实的意念"，而是亚里士多德主张的"真理是在实践中通过深思熟虑发现的"。重视行动的实用主义的逻辑与伦理基础是"重视原则的同时不迷信，灵活的同时不陷入机会主义"，其典型就是艾森豪威尔所敬爱的林肯。

（3）掌握难以匹敌的"关联力"

我们的知识和信息是有限的，为了顺利应对不确定的环境，适时适当地做出决策，需要一个可供依靠的基准。归根结底，这个基准只能是我们自身的信念。在信念的形成方面，尤其是领导者所追求的最重要的能力，是历史想象力和关联力。

我们已经阐述过，艾森豪威尔是具备优秀关联力的人（丘吉尔则擅长历史想象力），关联力是对有关因素的"察觉、变换、创造"的一种理智的方法。艾森豪威尔在担任总统期间，有一则发挥其关联力的逸事。

1959年9月，美国邀请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起初在总统别墅戴维营举行的会谈并不热烈，双方只是平淡地谈论各自准备好的话题。前一年的11月，苏联建议把柏林建成自由市，要求美英法国的盟军退出。如果柏林成为自由市，那么西柏林就会陷入东德意志的孤立和包

围中，这一点盟军绝不会轻易答应。如果形势恶化，难免会和苏联发生战争，甚至是爆发灭绝人类的核战争。现场气氛一触即发。

艾森豪威尔在会谈中感觉到了赫鲁晓夫所具备的人道主义的一面，休息后他想出一个办法。赫鲁晓夫原本想参观戴维营附近的南北战争决战地葛底斯堡，美方提出这个建议后，不出所料，赫鲁晓夫答应了。不过艾森豪威尔考虑的是，赫鲁晓夫是否愿意不去参观战场遗迹，而是深入一般平民家庭去看一看。

艾森豪威尔的农庄附近恰好是他儿子的家，夫妻二人和4个孩子住在一起。艾森豪威尔立即给儿媳妇挂电话："30分钟后我将带领赫鲁晓夫去农庄，快给孩子们打扮一下，让他们到农庄的大门口欢迎赫鲁晓夫。"

艾森豪威尔的主意切中了要害。赫鲁晓夫在总统朴素的家里会见了他的儿子、儿媳和可爱的孙子，内心似乎被打动了。他甚至为艾森豪威尔的孙子分别起了俄文昵称。他们相处得十分愉快。在返回戴维营途中，赫鲁晓夫和上午不同，态度明显软化了。

艾森豪威尔避免了与苏联之间军备竞赛的白热化，推动了双方关系走向缓和。家庭象征了和平。通过展示自己的家庭和生活状况，艾森豪威尔表达了和平的重要性。赫鲁晓夫的态度之所以发生变化，也许就是因为他看到美国领导人的儿子和孙子之后想起了自己在国内的儿子和孙子。

据说赫鲁晓夫这次为期两周的访美之旅非常愉快，甚至有出人意料的结果。赫鲁晓夫后来对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说了这样的话："这次访美超出了我的预期。美国国民和政府领导人，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家庭所表达的友好感情，使我印象尤为深刻。总统的人品令人折服。如果总统能连任，相信我们之间的问题一定能得到解决。"

赫鲁晓夫对后来担任驻美大使的多勃雷宁说的话语则更为直接："我不知道艾森豪威尔做总统会怎样，这是美国国民决定的事。不

过，作为一位父亲和祖父，我倒是愿意在学校和托儿所里请他照看孩子。”

结果赫鲁晓夫一改从前对美国毫不妥协的态度，不再要求将柏林设为自由市。这是1961年8月的事，当时的美国总统已经由艾森豪威尔变成了肯尼迪。

谁都不愿意自己所热爱的亲人卷入战争。赫鲁晓夫在艾森豪威尔的家中，深切地感受到这个敌对国家的领导人也和自己一样是一位父亲和祖父。这难道不是艾森豪威尔发挥关联力、在直面现实这一层面上改换和创造了氛围吗？艾克的足智多谋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认为，正是识人所未识，见人所未见，在看上去毫无关系的人之间开辟道路的关联力才是所有专业道路所必需的顶级能力。艾森豪威尔的这种能力，就是靠从不满足现状而是向更高目标努力的专业道路的实践、受教于师长的卓越的实践智慧、康纳所教导的对事物关联性深刻洞察的渊博学识（康纳在日常谈话中经常引用莎士比亚来展开现实关联），以及多次战场经历所共同培养出来的。可以说，实践智慧的方法论是演绎，更是归纳和假设性推论。

（4）美国陆军作为组织富有成长性

用人来打比喻的话，艾森豪威尔最初所属的美国陆军可以说是进入青年期的组织。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陆军仍受大萧条的影响，而来自战争的威胁相对较小，所以一般国民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之类的部队并不向往，认为军队可有可无。实际上，美国陆军的规模曾被缩减到和当时希腊陆军一样的程度。

缺乏战斗经历的军官也很多，在历史传承方面也比不上英军，但好处在于没有旧弊，敢于挑战新事物。并且晋升制度也很灵活，平时靠年限资历，战时还有弹性晋级制度，二者并用。

艾森豪威尔并不属于那种成功欲特别强的类型，能以上校军衔退役对他已经满足了。平时担任橄榄球教练，深入学习坦克知识，考取飞机驾照，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而最终随着受到提拔取得成果，他努力抓住时机实现了晋升，充分利用时势，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1939年9月，罗斯福经过深思熟虑，提拔马歇尔为新的参谋长。为对抗德意日三国同盟，马歇尔决心扩充陆军，实现现代化，坚决调换落后于时代的守旧军官，为艾森豪威尔和巴顿提供了一展身手的舞台。艾森豪威尔受到康纳、麦克阿瑟、马歇尔这样一批卓越的上级领导的关注，受益于多种经验的积累和人脉的扩大，能够身处正从青春期进入成熟期这一富有成长性的组织，的确可以说有非常好的运气。

将常人变成伟人的“品质技能”

归纳起来，常人变成伟人，不外乎这几个条件：本人向着更高目标努力，胜不骄败不馁；有认可他的努力并刻意栽培的上级；有可供他大展宏图的制度和大显身手的环境。

那么推动这一蜕变的关键究竟是什么呢？

是师徒制。对艾森豪威尔来讲，在“战史和修养的研究生院”里，以通读古典著述为开端，从军事战略到语法修辞、思考方式，认真教诲他的康纳对他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他们之间并不只是机械的知识传授。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詹姆斯·赫克曼教授等人提出过“非认知技能”（noncognitive skill）的说法。可以用书面考试测得的知识技能是“认知技能”，非认知技能则相反，无法用考试测得，而是与个人资质有关。赫克曼教授指出，这种非认知技能可以改称为“品质技能”（character skill）。认真工作、和他人愉快合作、积极地解决问题、不怠惰，这些都是具体的品质技能。这些品质和认知技能不同，在课堂上学不到，只能以师长为榜样，得到个人指导或建议，或被师长的人格所感动，在过程中一点一滴地习得。品质技能是一种能力，

不具遗传特征，而依赖于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塑造。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讲的“习性”（habitus）以及日本文化的“守、破、离”等也是这种品质的养成过程。所以品质技能的培养是个动态的过程，方法得当就能够培养并扩展。

不管头脑多么聪明，即使书面考试总是满分，品质技能欠缺的人都难以获得肯定，也难堪大任。可以认为，艾森豪威尔通过和康纳的师生关系学到的不只是知识，这种品质技能也占了相当大的部分。

师徒制培养出来的这种难得的品质技能和广泛的修养，以及在专业上的无尽努力，使常人变成了伟人，使一位军官学校时代热衷橄榄球和扑克、从军后也长时间无缘于战场、本想以上校军衔退役优哉游哉地生活的平凡的男人，树立起了成为十字军首领、打倒我们人类共同敌人的“共同善”的伟大志向。

后记

坦率地说，我做梦也没有想过这本关于诺曼底登陆战的书能够出版。

1992年春，我和神户大学的加护野忠男、庆应义塾大学的奥村昭博一起，前往巴黎出席当地举行的国际经营学会议。由于飞机于清晨落地，未能立即办理酒店入住手续，而会议是在第二天才正式开始，所以时间充裕。正当我们考虑如何打发时间时，一个念头闪过：对！去诺曼底。

我突发奇想的建议得到他们二人的认同，于是我们三人乘坐火车前往卡昂。在本书中也讲到过，卡昂是诺曼底地区的中心，也是损毁最为惨重的城市。我们进入仍留有遗迹的卡昂市区，参观了战争博物馆。我们还前往奥马哈滩，进入了德军以前的碉堡，瞻仰了盟军的墓碑。伫立在沙滩上，任由“那一天”的思绪不断涌现。当天我们就返回了巴黎，后来关于会议的情形反而没什么记忆了。

当时我正和创作《失败的本质》一书的朋友们一起，策划一本以反败为胜的形式取得胜利的领导者们的故事（即2005年出版的《战略的本质》）。实际上候选资料中就包括诺曼底登陆战，无奈其叙事过于复杂和庞大，最后不得不放弃了。另外当时我还想写一本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书。海军陆战队擅长水陆两栖作战，而诺曼底登陆战正是水陆两栖战，而且是史上最大规模的水陆两栖战。

由于有这两本书的写作意向，我心里一直暗暗想着“什么时候到现场去看一看”。

说来也是偶然，还有一件事。不久以后我参与“北陆先端科学技术

大学院大学知识科学研究科”的设立事宜，录用了一位名为菲利普·皮杰埃尔的教师，他曾开车带领着我游览他的祖国比利时，参观二战时希特勒的最后赌注——突出部之役的战场旧遗址，具体就是巴顿救援的激战地域巴斯托涅。我至今还记得，在市中心的广场有一辆巨大的“谢尔曼”坦克，那是广场的标志。

因这次访问，我将诺曼底登陆战和突出部之役联系了起来，深刻理解了是这两次战役决定了德国的失败。

时间推移到了2012年夏。我和同事竹内弘高（现哈佛商学院教授）以及一條和生（一桥大学大学院国际企业战略研究科教授）从2008年开始主持知识论坛，每年召集日本30家大公司的后备经营干部做研讨。按惯例，2012年举行夏季拓展，当年的5期生和第二年（2013年）的6期生以日语译本出版不久的安东尼·比弗的《诺曼底登陆》做案例研讨，主题就是领导力。学员们彻夜讨论谁的领导力更为优秀，谁的相对拙劣，决定盟军胜利的究竟是什么……

就在那时候，我开始构思这本书。我不仅关注登陆行动本身，也会关注前后一段时期的国际政治状况。从构思到动笔，我仔细探寻这场人才济济的史上最大战役，试图从中发现在战争这种极端场景中发挥力量的领导力的本质。当我把这个想法说给当时钻石出版社《钻石哈佛商业评论》的总编辑岩崎卓也以及编辑柚本佐智子时，他们很感兴趣，于是开始策划。后来该杂志的出版人、原杂志编辑部副主任中田雅久也加入进来。

关键词是本书多次谈到的“实践智慧”，这一概念原本在《战略的本质》一书中提出。最初我更关注实践智慧的领导者丘吉尔，但随着考察的深入，指挥了史上最大战役、是常人也是伟人的艾森豪威尔的卓越领导力引起了我的注意。丘吉尔没能做到的，“常人”艾森豪威尔却做到了。

成书的时候，在就业研究所发行的人才经营刊物《WORKS》担任《成功的本质》连载栏目责任编辑的荻野进介也作为文字高手加入了进

来。《成功的本质》连载每期一次，内容是报道创新的成功案例并对其意义加以解说，到2014年已经连载13年了。我和荻野每两个月进行一次现场采访，说起来也是因为与我合作默契才加入的。起初他好像因为工作内容不同而不知所措，但到了2012年年底，从和钻石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宫崎伸一前往诺曼底现场采访开始，突然好像开动起来的发动机一样。

以上就是本书的形成经过。这并不是一本从开始就归纳出明确思路的书，就如同本书所阐述的偶然和必然相互联系的复杂系统的历史一样。

贯穿本书的关键词是“实践智慧”，实际上在当今国际政治学领域，这种实践智慧也开始引人注目。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出现了“实践转换”（practice turn）的潮流。把握国际政治的要领并不是理论性知识，而是以理性和共同感觉为基础的使世界生生不息的实践智慧。

丘吉尔也好，艾森豪威尔也好，无疑都是拥有实践智慧的领导者，可以说本书正是从这一点上评价这两人的。我也非常希望在国际政治学的最前沿也能存在这种对实践智慧领导者的评价潮流。

本书是广义上的经营学书籍。

经营，也就是管理，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认为的，它的目标是培养综合实践范围内的广泛修养。经营学中有着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独特性以及自由宽广的横向理论体系的趣味性。

但是经营学书籍并不是明天就能产生作用的入门宝典，尽管可以引出有助于企业经营的教训，却不涉及眼前的具体事务。每个人都应该带着问题意识，思考自己能从史上最大的战役中学到什么。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因此本书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历史事实，而只是选择事实，解释事实。在解释过程中，也不仅仅局限于讲述起承转合的情节，而是尽可能透彻地说明事情的整个过程。

本书也是领导力理论构建的尝试。实践智慧领导力的六个命题尚未

完成。本书可能在历史事实方面存在纰漏，而且观点也可能耽于武断和偏见，期待读者赐教和指正。

和水陆两栖作战一样，没有多方帮助和指导，本书不可能完成。首先我要感谢原防卫大学教授杉之尾宜生，他不仅作为顾问参加了前文提到的知识论坛夏季拓展，而且通读了本书的原稿，着重在军事方面提出了非常有益的建议。同事一桥大学大学院国际企业战略研究科特聘讲师广濑文乃通读了原文，对史上最大战役的经过做了详细的解说。当获野和钻石出版社的宫崎在诺曼底时，江田智昭从相邻的德国杜塞尔多夫远道赶来，在不熟悉的道路上驾驶汽车，在此也表示感谢。同时也感谢野中知识学会的佐波奈绪子和富士通综合研究所的中山元子帮忙调整计划、收集整理文献。

钻石出版社出动豪华阵容，以宫崎为先锋，岩崎、柚本为副将，后面是中田压阵，为我的写作提供帮助，在此对4位编辑表达深深的谢意。

诺曼底登陆战到今年正好是70周年，我在本书中所涉及的，不过是参与行动的极少数领导者，谨以此书献给追随领导者战斗、负伤、牺牲的无数无名战士！

野中郁次郎
2014年5月 诺曼底登陆70周年前夕